

电子版前言

《沧桑岁月》出版二十年之后，接到陈景丽女士电话，告知劳改基金会准备推出电子版，事隔二十年，人与事均发生了巨大变迁；回忆当年吴弘达先生主持黑色文库期间鼓励我写回忆录，当时我也同意将我的劳改经历公布以使大众对这一恐怖的制度有所了解。

同吴弘达先生相识，最初是从 CBS 的 60 分钟访谈中，当初他给予我有极深的印象，他讲述他的劳改生涯十分生动，充分揭露了中国专制政权的面目，相比在之前的节目访问了郑念女士，她同我家相识，我也知她的一些状况，我到美国之后也读过她的《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她的访谈以及著作，我总觉得对中共政权的揭露有所保留，不如吴先生那么痛快。

在书店里买到并读了吴先生写的《Troublemaker》，对他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直到有一天老友姚琪打电话告诉我，他把我介绍给“阿三”即是他叫的吴弘达家中的小名，姚琪之前是上海市棒球队的捕手，而吴弘达本人以及同他的二哥吴弘义也都是打棒球的，而我在初中时也是喜欢棒球，当时在上海淮海广场打棒球并加入白熊队，同吴弘义很熟，而且他的大姊又是同我家很熟悉的友人马太太家的儿子结婚，弘义来过我家几次，而且他们的妹妹吴申兰也是我小学同级的而且四年级时还是同一班；一谈之下我们应早已相识。不久就收到弘达先生电话，谈得十分畅快，他似乎长我三至四岁，就读同一小学与中学，他认识的一些人我也认识，他邀请我去华盛顿参加由劳改基金会举办的劳改研讨会，我也欣然答应了，当时我还在保险公司管理大型电脑，为此我请了假，在华府同弘达先生第一次会面。

虽说不是一见如故，却是有共同语言，初会之时他很忙，一次有美国议员来访，他发觉我的英文可以当翻译，就由我担任了，之後有人指摘我译名不当，由於我习惯于美国之音当年的名词，例如当这位议员提到前美国总统甘迺迪，我就沿用了 60 年代美国之音的中文名称，有多人就说听不懂，但我发觉他们是有意的，他们只能接受他们的所谓“新社会”的名词的肯尼迪，热衷于中国国务院的翻译标准！？

研讨会的主题是从经历过劳改的受害者去寻求一个办法去结束那种不人道的迫害，为此我的确想不出在中共那样根深蒂固的统治之下，有什麼可能？而结束中共的罪恶统治，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何况我一向不善于谈吐或说讲话，故此我根本没有发言的意图；而在会上听到的发言成了劳改经历的诉苦会。事前吴弘达告诉我，参加这次会议的人物很复

杂，而且各类不同派别的又相互攻击斗争，如果碰到有人说哪些人怎么怎么的就听到算数不要参与，否则很麻烦，他的忠告对我帮助不少。会议临结束前，我根据东欧重获自由之后受害人得到赔赏的事实，提出劳改人员可以向被害当局通过法律途径索取赔赏，吴弘达先生立即表示赞同并倡议设立劳改索赔机构或称委员会；我们建议访问劳改受害者，凡是有意愿索赔的，提供受害事实，经过核实编成档案资料再由专业律师立案通过国际机构向中共当局施行诉讼，使受害者获得赔赏。弘达先生建议由我负责，当时有多人表示愿意参与，我们交换了电话和电邮；待我回到洛杉矶之后，数星期没有一人同我联系，除了高寒先生之外，多人电话都已注销，个别完全无人接听，发出电邮当然没有回应，同高先生通了二、三次电话，也是不耐烦地说太忙而急于收线，也从未回复邮件，这事就不了了之，连胎都没有形成，如果说胎死腹中的话。由此可见吴弘达先生推动的美国禁止劳改产品的进口，以及能揭发中共摘取犯人器官以获取利益的暴行是付出何等巨大的努力。

《沧桑岁月》是在吴弘达先生鼓励之下动笔的，在此前后他赠我一本他的自传《Bitter Wind》，文笔流畅，可惜就是正如他告诉我这本书是他的口述由 Wakeman 代笔，语言上的沟通以及有多情节遗漏而无法补充，是一件遗憾的事。上面我已提刊，我的写作只不过是中学毕业前的水平，求学时也是很少阅读文章和小说，工程技术的文章书藉除外；诚然在监狱中写改造年终总结、检讨书、以及在狱中被迫编写自己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交代材料--有厚厚一大叠呢，或许也可以是算作一种写作练习？。描写监狱生活的是被苏联击落的 U2 飞行员鲍威尔 (Gary Power) 的书《Operation Overflight》，他把监禁的生活以及心理活动写得十分生动，另外就是郑念女士的《上海生与死》，她用流畅和平实的英文确切地描绘了自己的遭遇。由上述的启发开始写作，既然是回忆录或叫作自传，自然包括了成长过程以及家庭背景。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人生观及意识形态，这种观点和意识的形成是不可能用简单的词句来归纳的，就我而言，母亲的影响看来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从小到大，直到我被捕之前，父母不曾为我担过心，父亲是美术家，他除了关心家人的衣着外似乎没有其他专注，记忆中他从来都没有看过我的成绩单，当然我的成绩也一直是在 85 分以上，也是他不在乎的原因，我想是由于他在职业上的不称心，他从来都没有使我成为美术家的意愿，尽管他的同事常对他说为什么他不培养我继承他的专业，他总是笑笑地说志趣不同，勉强不来；实际情况却不是我父亲认为的那样，如果说我完全没有受他影响的话。例如有朋友去买油画常要我陪着，我可以看得出哪位画家的水平——当然是廉价店；在机械工程中测绘

零部件时，我的草图就比较准确，当然我从来都不会花时间去画东西，更谈不上考虑过成为画家。

父母从来都没有对我长时间的说教，只记得有好几次我讲述学校发生的事(详细具体的事都记不得了)之后，有些同学对此事件讲出他们不同的看法，我母亲就会问我：“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我在思考后说出自己的之后，得到“这就对了”的答复。她常要求我清楚地表述自己的要求--“You have to express yourself clearly.”(你必须清楚地表达自己)；有次她表述了她的观点说，基督教不同于其他宗教，它的特征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讲道理，耶稣对他的门徒不止一次地用“我老实地告诉你们”或“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决不用隐晦的词句让人去猜测。我是极之平凡的人，谈不上奉行什么主义的，但是同我的母亲一样是右派—即强调个人；我反感诸如大公无私、天下为公、舍己为人诸如此类的词句，我认为这是当权者为了奴役众人而欺骗人的说教；圣经中基督的要求是爱人如己；为此亚当斯密就是认为人是自私的，社会必须是契约的，制定法律以保障每个人的权益不受其他人或团体的侵害。个人主义同自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奉行个人主义的可以为他的信仰、他的亲友或团体献身，这仅仅是为了他个人的信念。

生性保守，追求原本，或许是我选择信天主教的原因，生长在一个基督教新教家庭但家庭成员中没有排斥天主教，天主教庄重的礼仪，严格的教规，健全的哲学体系都吸引我，从儿时跟家人去做礼拜就一种有去天主堂的冲动，可惜到我十四五岁能独立时天主教就被共产党镇压，但是我倒是有家中的天主教友人送我的英文祈祷小册及一本《师主篇》，因此我可以背诵天主教的经文祈祷，我已说过我是不善词令，我十分佩服有些牧师甚至教友可以滔滔不绝地用自己的话祷告长达半个小时，而天主教倒是早已编成各种祷文供背诵，这更对我合适。我曾经有过两年以上等待被处死的时间，当时难友们在事后说：“伟大伟大，那时你还有说有笑，换着我们要哭煞脱了。”如今想起来的确是后怕的，而我又是怎么过来的？回忆起，那段时光的确有上主陪伴着，使我坦然走过这段可怕的路程。哲学家圣奥斯定(又译作圣奥古斯丁 Aurelius Augustinus Hipponensis)在他的《天城》中说：‘要爱那不可能被剥夺的’，我认为就是信仰，是天主。至于我怎么正式成为天主教徒，书中有述，这里不重复了。

回忆录刚完稿时，吴弘达先生是第一位阅读的人，他读后表示十分赞同我平实地叙述事件而不在后面加以评论象很多其他人那样，事后我才发现他说得很确切，这也不是我克意要这样写，而事实上我所记录每一事件发生时同我写出来时的想法极可能有很大的变化，

观点、意识形态随着时间推移不可能一成不变，何况所记录的人物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不是我可以控制的，记得一次阅读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phenson)的文章大意是作者没有可能去支配文章内的思想；何况我写的是自传式的回忆。

每个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我也不可能例外，因此记录只能是片面的，我想即使是历史学家的作品，都设有可能确切全面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何况象我这样的门外汉；不过我也尽力记录了我的经历，试着让人们看到一个小小的空间。

再版对原稿进行了增删，由于当时时间十分仓促，错字、谬误以及编辑时的种种失误在所不免，今次作了些调整希望能确切表达我的原意，还有特别感谢陈景丽女士，杨子立先生能使这篇回忆再版。

我特别怀念吴弘达先生，我的挚友，愿他在我们的慈母怀中得到安息，期待我们再相见。

引子

我们要调往北大荒劳动改造，我排在犯人中间，别的犯人都提了行李，只有我一个人穿着染成黑色的军装，正愁着我的行李哪儿去了。又想起，似乎我已经到了美国，为什么还会回来？后悔之余，惊醒了。那是一场经常作的恶梦。当我意识到我正睡在洛杉矶宁静的家中时，就心有余悸地告诉自己，无论如何，千万不要去中国大陆。

…见到吴继玠我急忙奔过去抱住他，“唉呀，我们都到了美国！”他不讲话，只是望着我。正当他要开口，我醒了，我真希望不要醒得那么早，想着想着，枕头湿了一大片。

一些零星的记忆

在睡梦中被叫醒，八姑告诉我：“太平了！太平了！”，我听了很高兴，不久又睡着了。第二天，大人带我到亲戚家中，我们是坐有轨电车去的。路上正在派号外，二次大战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下结束了。那时我不到五岁，日占时期，只记得几件事。

每逢星期天早餐，我们坐在那英国胡桃木做的长餐桌前，由祖父分派每人一茶匙的花生酱——我们每周的美食。大人们常回忆以往的好日子，他们告诉我，只要太平了，一切都会回来。每天晚上，大人就到三楼那间小睡房去听“之音”，我认为这是件很神圣的事。大人们一再警告我，不能对外人讲，否则全家杀头。其实我也不可能接触到外人，我们住在安和寺路（现在新华路）的一栋英国都铎式三层楼房，有前后花园，我的房间就在二楼，在那收听“之音”房间的下面。我由祖母的堂房弟妇八姑照顾，父母都是早出晚归。当时，人们都骑自行车，只有日本人有汽车，“汉奸”坐木炭汽车。

我家的两边，一边是汪精卫秘书曾仲鸣的房子。曾仲鸣在越南河内被军统特务枪杀。当时是准备杀汪精卫，据说那天汪觉得在自己房里头晕，只要走出房就好了，于是在旅馆内同秘书换房，曾仲鸣因而丧命。听说曾的太太住在我们隔壁的屋子里面，但我从来没有见到她，只看到有一队日本兵，一个带队的年纪很轻的军官，穿着一双擦得很亮的黑马靴，有时他站在街上，就有一大堆孩子围着他玩，最后他带着纸袋给孩子们发糖，孩子们拿到糖就散去了。这个军官见到我祖母总是鞠躬行礼，为此我祖母说这后生仔一定是出自好人家，有规矩，而且都生得几靓仔。我们家另一边是眼科李医生的住宅，当时也是由日本人占据。有个比我大的日本小女孩，骑在三轮脚踏车上，看到在阳台上的我，总是对我吐口水。

一天，住在附近的马太太，我叫她 Auntie Lydia，带了她的邻居吉良太太到我家，要我母亲教她做蛋糕。吉良太太曾留学美国，会讲英文，她带来了许多棒头糖送给我。由于我不喜欢日本人，克制自己不吃。说实在的，这种大块的糖我以前没有见过，的确有点馋，结果都是我姐姐吃了。我家有全套做糕饼的厨具，打蛋机、搅拌机及各种模具一应俱全。厨房很大，有电灶及煤气灶。据说当初电力公司和煤气公司为了生意，都替顾客安装。英国都铎式房屋在厨房同饭厅之间尚有一间同厨房相当大小的食品储藏室（pantry），也有水池，四周是厨柜，而且冰箱也是放在里面，餐具厨具都能放到柜中，中间有张大理石抬面的长桌就是供做糕饼准备食品用的，还有一张圆桌就是供家人吃饭，母亲就是在那里教吉良太太，她来过几次。

当时没有钙片，母亲就向亲友收集鸡蛋壳，洗净了，送到附近的拜耳药厂，打碎压成钙片，我就是服用这种钙片长大的。记得有一次送蛋壳去药厂，我坐在自行车后面，当左转弯时，撞倒了一个领队的日本军官，大家都摔倒了。那刚站起的日本军官把我母亲扶起，过来摸我的头，见我没有哭，就翘起大姆指。我对他的武士刀发生了兴趣，过去握住它，想把它抽出来，只觉得很紧。日本军官忙把我推开，又翘起大母指，并来个立正，向我母亲敬礼，队伍开拔了。事后人们说我们幸运，碰倒的军官可能是日本人，如果是高丽人满州人，那就有大麻烦了，最坏的还是满州兵，识讲中国话。

印象最深的是我祖父被捕。一天上午，八姑告诉我“出事了”。我从三楼的楼梯口向下面走廊看，只见近大门处站着个日本军官，穿黑色皮靴，旁边站了两个持枪并上了刺刀的日本兵，祖父和祖母站在另一边，中间是一个穿棕色皮靴的日本军官同一个穿唐装的人。只见那穿唐装的翻译在日本军官和我祖母中间走来走去，一会在军官耳边讲几句，又到我祖母耳边讲几句。那日本军官一会给祖父带上手铐，一会又开了。这样反复了多次，祖父最终还是被他们铐着前铐带走。这时，我才开始哭起来。

我担心是不是祖父收听“之音”被抓，大人们告诉我不是这原因。当时父亲在公司上班，母亲是家庭老师，事发后我家茶房阿勇，打电话给他们，父母立刻赶回家。阿勇还打电话给我姑母、还有马太太，全家人商量怎么办。有的猜是因为我祖父常接济在集中营里的老同事，有的猜是因为我伯父(陈康齐)是宋子文的私人秘书兼行政院经济委员会顾问当时他在美国。最后马太太说她会向吉良太太打听，因为吉良是宪兵副司令。

消息来了，日方怀疑我祖父“通重庆”，没有什么证据，只是查查。或许是吉良太太发了善心，吉良答应会善待我祖父。

三个月后，祖父释放回家，大家松了口气。他告诉我们，最初是关在“76号”，第一天日本人对他很凶恶，但没有用刑。第二天态度温和些，到第三天，日本人大概发现我祖父是英藉的，就把他送到大西路集中营，同英籍人关在一起，直到释放，也没有再问话。祖父为人极随和，他没有向任何人诉苦，只是说“饭团从地上滚入监仓”，初时他嫌脏，但饿了只得吃，不久就习惯了。

到后来才知道，是我祖母的一个堂弟在搞鬼，之前他因赌博输了钱，故此向我祖母借钱，但由于当时我们家手头也不宽裕，没答应他。那时他正在76号任职，是潜伏在76号里的中共党员。解放后是上海市公安局里的高层干部，同潘汉年一齐被捕，最后死于劳改农场。这件事还是在五十年代初那位堂弟的老婆在丈夫被捕之后到我家告诉我祖母的。

我父亲名陈康俭，大家叫他 Kim，是画家，早年就读华童公学，入圣约翰大学习商科。未毕业就赴美国学美术，次年去该学院的巴黎分校，毕业後又入法国的国立艺术學院取得文凭，又去意大利佛罗伦斯美术學院到毕业。最后是在欧洲各国学画，在维也纳美术學院毕业後再留在該學院教了一年书，他的专长是印象派波希米亚风格的绘画，在中国没有发挥的天地，49 年之前一直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部主任，没有什么作品。大陆政权易手之后，广告部解散，失业了几个月，找到了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影音部的工作，创作了耶稣的一生及路得传。中共的三自革新运动，影音部美籍牧师回国，父亲又失业了。他只能再改行画连环画，进入人民美术出版社。他画的人物，都像西方人，所以专画西方译本的作品。他的茶花女，曾掀起读者抢购潮，该书有一段时间遭出版当局禁绝。他是典型的有才华的艺术家，可惜他不懂中国画，因此在中国得不到尊重而一生不得志。如果他在美国，又有一位精明的经理人帮助，肯定是一名大画家。

母亲名胡宝芬出身于富豪家庭，外祖父是创办中国水泥公司、统益纱厂的商人。母亲并没有富家小姐的娇气，她就读上海的广东小学至圣玛利亚女中，中学时取名 Daisy，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日佔时期为了帮补家用而外出当家庭教师，二战结束後往联合国救济署做义工。50 年代初開始當中學英語教師直到 58 年退休，她为人随和，平常家中都由父亲作主，但遇危急时她却颇有主张而能当机立断。

由于长住祖父家中，因此祖父对我们影响甚深。祖父继承父业，任太古洋行卖办幾十年之久，他的英文带有浓重的广东口音，但书写很流利。我是他最小的孙儿，对我特别关爱，常带我外出。

抗战胜利

一切都变了，阳光也似乎更灿烂了。父亲拿到了在日占时期被扣的工资，祖父也取得日占时停止了的退休金，那是他退休时，他的老友太古东主士怀 John Swire 存入汇丰银行的。他认为我祖父为人太忠厚老实，又不善经商，恐怕一大笔退休金会被人骗走，因而建议将它存入汇丰银行，仍用太古名义，连本带利分十五年发还。每月三千港元，如果十五年之后祖父仍在世，则继续支付，当然祖父也可以随时将这笔退休金取出。祖父认为这是个好办法。退休时，太古为他买下那栋大屋，那是在三十年代初期。

大屋内外翻修一新，祖父一下就买了三辆汽车，两部大的分别是 Bentley 和 Chrysler，另外一辆敞蓬的 Sunbeam，是自己开了去打网球的。祖父是个英国迷，什么都买英国货。家中家具都由英国订做，他在餐桌上对我们说“千祈唔好学美国人，用右手揸叉，好失礼架。”即千万不要

学美国人用右手拿叉子，好失面子的。他也要求我自己铺床以及整理房间，女佣把洗完的衣服叠好放在我的床上，要我自己放到抽屉里去，我母亲每天都检查。姐姐性格比较反叛，不像我这样守规矩，而我祖父也不是严肃的人，也就随她了。

太古的大老板士怀从英国到上海，特地来探访我祖父。祖父请他喝下午茶，我母亲做了鲜奶油蛋糕。他吃光蛋糕，又拿起碟子舔得干干净净，我们对他的失态有些惊奇。他说上海比英国好多了，在英国，战争虽结束了，物资仍然很缺乏，继续实行配给。并说如果邱吉尔见到了这样的蛋糕，会更馋，因为他们的配给是最少的。

那时最令我高兴的，莫过于往机场接飞机了。每次，总是祖父开他的跑车，我坐在他旁边。其他人坐着司机阿祥开的 Chrysler，上江湾、大场、龙华机场。我沿着空地边上跑，热了可以喝可口可乐。亲友有的从内地来，有的从香港和美国来，分别多年见了特别亲热。

我们自己的屋子，以前被日本人占据，也装修完毕，我们一家就搬回去了。这是四座房子的小弄堂，房子是法国式的，四座面积相同，而房间的间隔各不相同，是我父亲设计的，安排恰到好处，没有一点空间是浪费的。当然比起祖父的大屋要小很多，但并不局促。一个小花园，二楼三间睡房，假三楼，即房顶是斜的，也有两间睡房，我就睡在三楼的小睡房里，大睡房由女佣住。四栋房子，我们住第一家，其他出租。弄堂位于法界雷上达路，后改名兴国路。父亲买了辆 De Soto，停在车房里。

我母亲仍有学生要她补习，我在家中觉得闷，因此我的姑母和祖父建议将我送往附近的大屋里去玩。那间大屋叫 Hazelwood，是太古大班的住宅，占地 100 华亩，里面有泳池。这栋屋就是现今的兴国宾馆，是五十年代太古洋行赠于当时市长陈毅作官邸用。这一带所有的房子都是太古的产业。英籍的股东，高级职员，每天把孩子送到大屋，由一位“阿嬷”照顾。我在那里学会了游泳，交到了朋友，同我最好的叫 Michael，记得我去的第一天，母亲将我送到那花园，同阿嬷讲了几句话就离去，这时 Michael 就伸出手过来，不知怎的我也学他伸手了我的手，我们就握了手，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的握手，接着他带我到一个沙盘那里，有多个同我相仿大的在玩，Michael 对他们讲了我听不懂的话，他叫我 Eddy，因我家中最小，大家叫我阿弟；他们一个个都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我感觉很开心，虽然言语不通，我也不知怎样地度过时间，但的确可以交流，最后当然学会讲英文。后来同我同年的邻居 Samuel 从美国回来，也跟我去那里。回忆起来，这是我平生最愉快的时光。

入学年龄到了，先报名最近的南洋模范幼稚园。由于我不会讲上海话，他们不收。再到世界小学，幼稚园沈老师是中西女中毕业，她同我讲英文，我的英文是从大屋里的英国小朋友那里学

来的。上学了，由于言语不通，我就被排除在小朋友之外。他们不让我参加集体玩耍，要老师干涉才勉强让我进去，他们叫我“外国人”。世界小学一年级就学英文，有些高班学生，倒会同我来往。我很怕同班的小朋友，他们几乎完全不同于先前我在邻居大屋里的和善的朋友，他们似乎完全听从中间的一对双生儿，尤其是其中一个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如此凶恶，经常突然打我一拳或踢我一下，我胆小又不敢出声；这是我第一次尝到了被排斥，被歧视的滋味。沈老师后来也发觉了，建议我母亲送我到美国学校。

美国学校幼稚园分两班，华裔的在一班，其他另一班，而华裔新生都不会讲英文，虽然有一两个广东人，但他们都会上海话，我又被孤立了。

我得了伤寒症，那是去了虹桥路姚家花园吃了生菜之后发作的。姚家是我外祖父的合伙人，那花园后来被共产党没收，日后毛泽东在上海的行宫称西郊宾馆的就设在那里。患病躺在床上有好长时间，父亲生意上的朋友，一个电台的老板，送给我一架通讯接收机，那是一台 RCA 的 CR88 型十四管的。当时的长途电话局就是用这类机器，他对我说可以听得到火星人的电台。

我家有一户邻居姓莫的，我母亲有时带我去走访，莫太，我叫她 Auntie Mock，她总请我吃自制的冰淇淋，家中有个小 baby 在童车里，想来只是一岁左右吧，莫家有好多电器设备，听我父母说莫先生是电气工程师，客厅里有台开关很多的收音机，同我以上提到的 CR88 相似，当然到我长大之后才知是一台 hallicrafters 的 SX28 型收音机；有一天去见到莫先生在家，还有一位客人，大概莫先生介绍说我家有一台 CR88，因此他们随我母亲到我房里看机器，我只见那位客人高高个子，穿了件夏威夷衬衫(短袖花衬衫)，脸上有酒窝的，他不会广东话，同我讲英文，一开始他就发现天线一端是压在我睡的黄铜床四脚中一个轮子下面，就问我是谁如此做的，我告诉他送我这台收音机的 Uncle 先前告诉我这条线是没有电的，因此我就大胆去握住一端，果然音量响了些，而有次我把另一只手碰了床，发觉又响了些，为此我直接把线的一端按在床架上，声音清晰了很多，因而我就请了有力气的阿祥(司机)帮我把床脚抬起一些，以便将线的一端压住。当即他高兴地同我母亲讲了上海话，又玩了一阵我的那台通讯机才告辞，事后我母亲告诉我那位靓仔高佬(俊俏的高个子)是戴笠手下的“大粒佬”(大人物)，他大赞你聪明，说将来一定是了不起的工程师；后来才知这位先生就是魏大铭将军，但可惜他对我的未来没有言中。

家变

伤寒症好了不久，一天晚上，平时极宁静的街上，灯火通明，人声嘈杂。我被吵醒了，下楼看究竟。只见父亲急得六神无主，母亲对我说没有我的事，要我上楼去睡。次日一早，母亲要我收拾平时常穿的衣服，大门有警察守着，不让其他人进门。不久司机阿祥驾车来了，姐姐和我在警察护送下，被接到祖父家。

事后我才知道父亲被流氓敲诈了。事情发生在前一天晚上，住在我们汽车间楼上的，是以前我大姑母家的男佣一家。那男佣叫阿义，当时看管弄堂，他大儿子是哑吧。那天他们在外边乘凉，同对面马路在大便的三轮车夫发生口角，那哑吧过去同人打斗，将人打伤了。附近的流氓见有机可乘，冒充伤者家属把他送入医院，却又不准医院动手术抢救，三轮车夫因而丧命。流氓们诬告我父亲指使那哑吧打死人，当时的小报绘声绘色描写道，“那个恶少身穿睡袍，站在凉台上，手叉着腰，高声叫喊：‘给我打，打死了也不要紧，我有的是钱！’”

我的父亲一向胆小怕事，这突然发生的事，弄得他手足无措。那天晚上，棺材抬到大门口，门外人山人海。这时，好心的邻居蒋先生半夜打电话来，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我父亲就从三楼老虎窗爬到蒋家，次日一早，蒋先生用他的汽车将我父亲送到他的公司。

父亲躲在公司里不敢回家，只留我母亲一个人，同流氓讲斤两，上法庭都由我母亲出面。结果付给流氓头子顾祝谦八万美元，法庭对我父亲的判决是“查无证据，宣告无罪。”

另有一插曲，就是出事那天，我伯父想帮我父亲。把事情同宋子文讲了，宋子文拿起电话打给杜月笙，杜答应做和事佬，但要车马费，我家又多付了八千美元给杜月笙。

母亲虽然继承了五十万美元的遗产和一些房地产，但屡经战乱，以及数次失败的投资，所剩无几。母亲只得变卖首饰，汽车也卖了，再加上我祖父卖出一些古董，以及两幅法国名家的油画，才凑足这八万多元。

事后，那帮流氓还敲诈了我们的邻居 2 号和 4 号的两家。蒋家被敲诈之后，我父亲曾内疚地问蒋先生，是否是因为我家而连累了他们，蒋先生说“不关我们的事，说‘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一直十分感激 2 号的蒋家在危急时伸出援手。他们是美国华侨，不久他们又搬回美国去了。Samuel 是我第一个华籍小朋友，他走了，我一直想念他。

兴国路不能再住了，我们又搬回祖父家。那时我正好入学，父亲同觉民小学倪逢梅校长是在美国留学时住同一宿舍大楼的校友。当时倪小姐要比他们年长很多，大家推她做首领。校长见了我问了几个问题，我忘了问些什么，只记得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我记得我说我最讨厌别人乱吐口香糖，她又要我写字，我把平时祖父教我的中、英文都写了。由于祖父教过我拉丁花体，她赞

我英文写得好。又问我会些什么，我即用广东话背诵了《木兰词》。我也直言讲了我怕上学，是怕学生欺负我，她向我保证在她的学校不会发生欺负人的事。

入 学

我开始上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我真不知道老师讲些什么。同伴们不像以往那样孤立我。幼稚园的曹老师以及教英文的沈老师，一有机会就同我说话。同学们听我讲英文，都待我热情。记得有一次他们同我开玩笑，我急得用广东话直说“唔得架！”（不可以），弄得大家大笑。上半学期考试，我居然也通过了。到了下一学期，我已完全学会了上海话。那时唱歌都用上海话，大多学赞美诗，如‘信徒如同精兵’，‘耶稣爱我万不错’等，圣诞节前教圣诞歌，‘远远在马槽里’，‘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老师的名字是郁秀芳，是意大利钢琴家，上海交响乐团的创始人梅百器(Mario Paci)的学生，中学毕业于中西女中，比蒋宋美龄高一班。

当时祖父的大屋，住了很多人。我们一家住在三楼，我的睡房，就是以往收听“之音”的那间；姐姐在我隔开浴室的一间大房；父母亲住在三楼另一端的一间大房。这时我伯伯已从纽约回到上海，亦同我们一起住，是在二楼。还有我二姑母一家，他们从桂林回来。

二姑母名凤琼(Rosy)，我叫她“顺意”。我是属于那种叫“乖仔”的孩子。做乖仔，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听话，只是克制自己而已。那时，孩子往往不是放在第一位，我的一些要求，常在“没有意思”的回答下被否决了。而二姑母能够了解我的心情，我的大多数要求都能得到满足。她有二个儿子，昭远(Leo)当时就读沪江大学，现在住在洛杉矶；昭阳(Eddy)当时在岭南中学念书，现在是千橡市一所大学的教务长；一个女儿，叫超群(Maria)，也在沪江大学念书，后来到了香港，白手起家创办超群西饼。后来我到香港时她对我特别关照。我双亲到香港之后，经济上完全依靠她，为此我永远感激她。

一天，二姑母带我外出，经过徐家汇天主堂，她带我进去祈祷。她不是天主教徒，但笃信基督教。我一进到大堂，就被那宏伟的建筑，美丽的彩色玻璃吸引住了。再加上那风琴声，感觉好极了。我一向喜欢听风琴，但那琴声，同我常去的三马路圣公会主教堂三一堂的西敏司大寺式的有不同格调，是那么宁静而优雅。自此以后，我决意要成为天主教徒。

那时祖父几乎每周都请客，有时是酒会，有时是舞会。因为我年龄小，只在下楼见了客人就上楼。姐姐比我年长六岁，她同我的表兄妹们年龄差不多，他们玩在一起。我家二楼、三楼都有间吃食间，有水池冰箱，我就在那里吃饭。他们很少有请小孩的，请的也是以前同我玩的那班英

国小孩。我们在后花园野餐，宾客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顾维钧夫人，她见到男仕，总是伸出手让人吻她的手背。

祖父每周都带我去跑马总会，他是会员，那里有他的老朋友，我几乎每次都见到 Michael，我们一起玩。那里的糕点很精美，他还带我去过近静安寺的“大理石大厦”（Marble Hall），是上海名建筑之一，后来被共产党没收，改为上海市少年宫。

蒋总统及夫人

我的伯父也带我到他上班的地方，建国西路的宋子文办公处。那里的花园大，但没有小朋友。其中有一个会讲广东话的警卫同我最好，他把子弹里的火药倒了，放在一佩枪里让我玩，引信一样能发出响声。真枪要比玩具枪重多了，扳机也紧多了，但我还是喜欢真枪。一天，我在花园里见到一位身材高挑的老人出来散步，穿唐装，头是剃光的，头顶有点尖，由一年纪轻些的人陪着。我见到他就过去叫他“阿公”，他笑着摸摸我的头，旁边的人对他说陈秘书什么的，他们走开了。他走后，我的那警卫朋友问我认识那个“阿公”吗，我说不认识，他说：“这是我们的老板”。

蒋夫人我也见过一面。我的二姑母同蒋夫人是中西女中的同班同学，还有一位是富文寿医生的太太，我叫她 Auntie Pearly，她们三个人最要好。我姑母和 Auntie Pearly，是蒋夫人结婚时的伴娘。说到 Auntie Pearly，她是澳洲华侨名郭宝珠，丈夫是儿科专家富文寿医生，平时讲英文和广东话，她的上海话十分糟糕，常闹笑话：一次她吩咐女佣去削两个梨给楼上的老太太，她说“老太太要依去叫两个小白脸(小白梨)”。

蒋总统官邸在旧法租界，靠近如今的衡山路，也近美国学校。那是一栋二层的小屋，客厅几乎走几步就到另一端，比起我们在兴国路的小屋子还要小，花园也很小，但里面很整洁。二姑母带我去那里，说是要去看看美龄。我只是在窗前对着花园的椅子上乖乖地坐着。印象之中，蒋夫人很斯文，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她们谈了一会，我姑母就告辞了。

宋子文，我只见过二次。一次是他装修了屋子，置了新家具，要我父亲去“指教指教”，父亲带我一起去。他的屋子很大，比我祖父的要明亮多了，家具都是当时流行的不锈钢和玻璃的。我父亲看了对宋说，很好很好，宋说：“有你这大画家说好，我就放心了。”事后我父亲对我伯伯说，没有想到“老宋那么土，这房子如果是电影明星的还差不多，但和外交部长的身份，就一点也不配”。

另有一次，是宋子文买了辆 Lincoln，特地开到我家，给我祖父看。他叫我祖父“老伯”，讲话带上海本地口音，他说那防弹玻璃是最新式的，同平常玻璃一样，看不出是防弹的。这时他的警卫傻呼呼地抽出佩枪，向玻璃开了一枪，玻璃没有碎，但龟裂了，气得宋子文骂了句上海粗口，训斥了他一顿。

培 培

我们两边的邻居，曾仲鸣的屋子是敌产，被当局没收，住了几个美国兵，他们常来我家的网球场打网球。后来，有人来要买那块地，我祖父那时常患风湿，不打球了，而且球场也很少用，因此卖了。另一边，李医生已故世，他的几个女儿搬回来住，女婿是眼科曹医生，他的儿子培培，比我小一岁，我又有了伴。我们在墙上架了两条梯，在墙上爬来爬去，不用走大门，我们互相呼“小朋友”。他就读中西小学，后来入徐汇中学。在初中三年级时，他因为写信给国外的朋友，告诉他大陆已经在配给粮食，因而被押，判劳动教养。他父母都很宠爱他，因而吃东西很挑剔，但在劳教时，他因为饥饿而偷吃猪食，惨遭殴打。直到六十年代后期在我被捕之前，他仍是劳教留场人员，所幸的是现在他已到了美国，经营一小超级市场，生活安定，他前后总共被关押了二十多年。

解放前夕

由于我父亲工资高，又有佣金，记得当我升到二年级时，父亲又想买汽车了。为了此事，他同我祖父吵了架，因为祖父认为我父母都不会开车，何况他已经有三辆，没有需要再去买，而且车房也停不下，因为我伯父还有一辆车，结果父亲终于放弃买车的念头。我们还有一块三亩大的空地，在湖南路，用来建自己住的住宅，父亲已经画好设计图，并由建筑师友人计算好，准备造房子。就在这时，政局开始动荡，我只记得收音机里总是“共产共产”的。

我的舅父被抓了，大家又紧张起来。舅父家就在衡山路美国学校斜对面。表哥 Andy 比我大一岁，就读美国学校。我母亲常带我去看电影，总是同 Andy 一起。由于场内空气混杂，对身体不好，我们只看儿童场。我最不喜欢看的是《小鹿班比》，因为班比的母亲被猎人打死，看得我直哭。

母亲安排舅母带两个小孩，即 Andy 及他的弟弟 Benny 先到香港，待舅父一出狱，家也没有回，直飞香港。后来我才知那是因为蒋经国在搞“限价”，舅父商场上对手诬指他套汇而被抓。

二姑母一家搬走了，他们去了香港。伯父也到广州去了。二年级暑假过去，升到三年级，我是乙组，在幼稚园楼上的大教室，级任方老师。这时老师们开始问同学将会到哪里去，有的说去香港，有的说去美国。班级里的人越来越少，连幼稚园的曹老师、王老师和教琴的张老师都走了。

祖父、祖母要去香港了。他们乘船去，同时带走二辆英国车，因为这些车的驾驶盘是在右方的，上海不适用。他们一走，大屋就显得冷冷清清了。有人劝我父亲走，南洋烟草公司的老板，把飞机票放到父亲办公桌，希望我父亲也到香港，并让他当广告部副主任，薪金照旧。我父亲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性格被动，何况在三十年代末期为了逃避日本人打仗，全家迁到香港。到42年又逃回上海，损失了大笔财产。此外，在上海我们还有房地产，他是不想走的。父亲将我母亲的首饰别在一大块黑丝绒上，父亲特地让我看了，说是“Mom的首饰”，当时我看了也不懂，首饰交给我祖父母带走了。

教室里空荡荡的，后面几排空了，老师说如果人再少，大教室两班合并为一班，每天都说次日会停课。一天，见到有很多汽车都在学校前调头，司机们对阿祥说不上课了，我就回家。母亲接到父亲公司电话，说他这晚不回家，同事们都在公司过夜，要我们住到静安寺附近姨母家去，因为共产党大半是从市西虹桥路一带进入上海。

我们收拾了一些日用衣物，雇了辆三轮车到姨母家去。三姨妈名宝莲(Pauline)是外公的第三个女儿，我母亲是第六个，母亲的弟弟名国樑是第七，就是上面提到的，现住加州 Piedmont 市。再有一个妹妹名瑞芝(Nancy)，我们叫她八阿姨又叫她 Auntie Nancy，她是最小的，现住麻州 Cambridge 市。那天晚上，从窗外望去，只见天上火光通红。次日一早，只听见些零星枪声，我们也没有敢出外，在姨母家住了两天，阿祥就把我们接回去了。

共产党来了

共产党不受欢迎，本来已经单调冷清的家，更安静了。来往的亲戚，只有三姑母一家(三姑母名菡如 Elsie)，及三姨母一家。三姑丈杨少南是太古洋行船务部主任，有业务，留在上海。他们的子女都已出洋留学，大女儿惠兰(Lorraine)，毕业于康乃尔大学，曾任职联合国，现已退休，住在纽泽西的 Fort Lee。大儿子铁铭(Roland)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是机械工程师。记得他在上海时，我喜欢看他保养汽车，他送我好几本飞机的和其他的科学书。他是我表兄中同我玩得最多的，现已退休，住在加州 Moraga，比我年长 13-14 岁。次子铁松(Thomas)是 CPA，现居纽约市。最小的儿子是铁樑，毕业于伦敦大学，曾经是香港首席法官，现仍在香港。三姨丈早已亡故，我的

三个表兄分别是千根、亿根、兆根，他们毕业于之江大学，是机械工程师，现都退休了，住上海市。

学校里教唱解放歌，我们都没有好好学，我们唱改了歌词的歌，记得一首“解放区的天”被改为：

解放区的天是阴私天，
解放区的人民不喜欢，
人民政府害人民，
共产党的坏处说不完。

.....

另外一首是“你是灯塔”。同学们唱：你是灯塔，我是警察，打喇头塔，无没还价。据说这首歌的曲调是列宁出殡时奏的，在一次欢迎苏联代表团时，政府用这首歌来助兴，令那帮苏联人大为恼火，这首歌的作者因而被捕入狱。还有一首歌，大部分歌词都记不起来了，但有一段是“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好像两个太阳就在天空当中照！”当时级任的方老师说天空当中有两只太阳还弄得好吗？

美国电影被禁止放映了，我很少看电影，所以无所谓，我姐姐的同学和老师，都赶着去看最后一场。

49年10月1日的大游行，街上的人说是大出丧。

父亲失业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被共产党接管，取消了广告部，说解放了，不需要做广告，要我父亲“自动辞职”。我父亲想不通，明明是裁员，却要他说“自愿”，他说不自愿也不行。家中经济断了来源，我原先学琴，也学不下去了。祖父写信来，说把汽车卖了。不久我父亲找到了一份在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影音部的工作。当时主任是美籍牧师林顿博士（Dr. Rindon），他也是国际礼拜堂的驻堂牧师，当时我们都去做礼拜。父亲同事中，林嘉通先生同他最好，他曾经是燕京大学教务长，学识渊博。他有英国利物浦大学教育和统计学两个博士学位，他的儿子林风，同我年龄相仿，是我好朋友之一。

世道每况愈下，昔日那种热闹的气氛没有了。培培一家搬走了，虽然搬得不远，却不能天天玩在一起。

祖父母在香港住不惯，回到上海，家中是热闹了些，来客多了些，但同以往相比，冷落多了。生活方式改变了很多，祖父身体渐渐衰弱，休息时间多，外出少。

为了得到确实的消息，我的那台通讯接收机派上用场了。在韩战爆发之前，我开始每天收听广播，我把听到的告诉大人们，他们讨论局势，仁川大捷的消息最令人兴奋。当时，美国还希望中国在联合国监督之下，实行公民投票，或以长江为界，分成南北两部。我喜欢收听美国之音，它的新闻广泛而确实，内容很吸引我，我的国语，就是从美国之音学来的。此外伦敦的英国广播电台，也是我主要收听的电台。台湾的只是骂得多，实质内容不多，我不太留意。美国之音每天有四次内容不同的国语节目，也有粤语。那时足球健将李惠堂还主持节目，我爱踢足球，所以也听他的节目。到韩战时，有江士华短评。之后，又有江士华先生同共干聊天的节目“学习讨论会”等，都很吸引我。

土地改革，首当其冲的是三姨母，她在江湾有很多地，但她从不收租，在她交出地契时，乡间的佃户都说唐太太是好人。她不但不收租，还帮助几家孩子上学。这样，当局斗争会开不成。过了数星期，当局又组织了一次斗争大会，上台的都是她不认识的人，声泪俱下地说我姨母如何逼租，如何派打手去威迫佃户。姨母作了最坏打算，如果当局要枪毙她，她只好咬舌自尽。好在佃户表示斗争会可以开，他们也出席，但要对我姨母作处置，他们不同意也决不作伪证。因此，这件事就以斗争会了结。

接着是镇压反革命，警车天天在路上呼啸而过，每天放学都看到店铺里有人被抓。一天我们往南京西路一家叫廖九记的广东点心店买点心，见到警察将一个人五花大绑，这人看来是广东人，中等身材，梳分头。当时店员说是否到后面去绑，在客人前不好看。公安人员不依，这位被绑者说：“这样好，让大家看到共产党系几咁残忍”（广东方言：是多么残忍）。到如今我还记得他的模样。看来他早已遭难了，这间店铺不久也就关闭了。

家中友人，原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被抓了。原先他们已经到了香港，是周恩来托宋庆龄去请他回大陆的。凌先生被抓之后，凌太太去问宋庆龄，宋说她无能为力，结果凌先生劳改时死在南京采石场。

学校英文课取消了。附近的马太太一家搬到我家暂住，因为马伯乐先生是棕榄公司驻上海的总代理，早去了香港，马太太一家申请出去，没有得到批准，而屋子却租了出去。马太太请了一位董太太替她的子女补习英文。董先生原是圣约翰大学教务主任，也被共产党抓了去。我记得董太太谈到她到劳改农场见董先生的事。她带了罐红烧肉去，董先生就在田边吃起来，一不小心一块肉跌到地上，董先生立刻拾起来连泥沙一起吃了，见到泥中还有一点汁，大叫浪费浪费。董先生最后于70年代末期被释放，不久因积劳成疾而逝世。

祖父患了白血症，次年去世了，83岁，大家都很悲痛，尤其是我。

宋版书

说到祖父，还要提一件事：一天他收到一个电话，开头就问他是否有套宋版书，那个人讲北方话，听来好横纹(专横)，因而就没有理会。不久又收到封公文信，但又不知它出处，只是说希望他出让那套宋版书，只是具名康生，我祖父根本就不知道康生是谁，只知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的一家康生洋行，叫 Bianchi 的意大利咖啡室餐馆，因此也没有在意，直到最后有个讲广东话的自称康生先生的秘书，约定时间要拜访，这才引起注意。祖父去问好友，前上海商会会长赵晋卿，赵即告诉他康生这个人千万得罪不得，是毛泽东的戴笠，比戴笠还要厉害，连毛泽东都要怕他三分，是共产国际！而且极度残忍，有时同毛争吵时他会装疯，毛只好就范，他是斯大林派来监视毛的人。记得那时是 1951 年我读四年级的暑假，在家二楼窗口见到一辆黑色的 Buick，卦窗帘的，当时中共干部汽车都卦窗帘，走出一个穿淡灰色唐装戴深色眼镜的人，祖父在楼下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他。事后祖父讲述了经过：经过一轮寒暄之后康生就切入正题，他自称是一直研究书画的，尤其古书古画，自听闻你陈先生有这一套宋版书，今天特来见识一下，只要看一下摸一下就满足了。如果你肯出让只要你讲个价他都会接受；接着祖父告诉他明白他是爱书之人，藏品要让会欣赏能欣赏才有价值，既然康先生如此欣赏，我愿意赠送给你，也让这套书有个好归宿。康生当时当然十分高兴，随即也卖弄了一番他自己认为的才华后带着那套宋版书离去。“中国书读得不少，冇乜知识(没有什么知识)。”是我祖父对此人的结论。

家谱

有一天在书架上看到一本线装书，抽出一看封面上有‘德星堂陈氏家谱’，其中有我祖父，父亲和伯伯等家庭亲戚的名字，发现祖上还有是什么皇帝似的，为此我去问我祖父是怎么一回事，他笑着说家谱都是“乱咁递嘅！”即是胡乱编造的，他告诉我以往乡间有人发达了，买田地置房产要光宗耀祖，就造祠堂修家谱，本来小家庭，但周边的同姓人家要来攀龙附凤，说是要认祖归宗，因而就成了一个大户，平常人最多也只是记得自己的曾祖，再上一代就没有办法知道了，但是编写家谱的笔者都熟知各种姓氏的名人家族，也就东搭西攀而最后攀上一个皇帝之类。接着他告诉我其实他的阿爷是从南洋过来的，来打工的，没有人知他的名字，只因他长得很高因此大家都叫他高佬。据说他做工又快又勤力故很受乡间人们欢迎，后来他到一陈姓人家打工娶了他们家的一位西洋撑寡妇为妻(广东话中葡萄牙人同广东人混血的被称谓西洋撑，讲得难听些又叫咸虾

撑或半唐番)，然后替他取了个中文名字叫陈达生。我祖父说他懂事时他的祖父母都去世了，他的父亲年轻时曾去过金山，即美国加州，当时叫卖猪仔，由于没有碰到运气又回到上海。有说是遇到两个苏格兰人，办起了洋行即日后的太古洋行；那时上海开埠不久，商业发展迅速，太古生意也蒸蒸日上。因此我的曾祖父陈可良成了上海名人。我祖父陈雪佳在香港出生，在香港大学毕业前他父亲要他到上海协助生意而不得已中断了学业。我很小的时候发觉我祖父的眼珠是蓝色的，我就问了，只听祖母急忙说“傻仔！年纪大了眼睛当然要变颜色的啦。”我信以为真，直到后来发现祖父常戴茶色眼镜，当然是不想被人发觉他的蓝眼珠。

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母亲说外公名胡耀庭原来生在日本横浜，他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混血的；九岁那年大地震，双亲亡故，由当地亲友联络到广东番禺的远亲，就同他十二岁的哥哥前往投靠。后来到上海学生意，渐渐积累财富成实业家，他第一任妻子生产了我的二姨妈后就去世了，接着娶了我的亲外婆，是当时邻居兼生意合伙人的女儿，叫米可(Miko)，其实就是宫本美子的美子，母亲说她母亲在家从来都讲广东话而不讲日本话的，她很早就去世了，我见过我母亲的继母，50年去了香港到六十年代去世的。我外公由于他的日本血统以及有日商亲戚，因此大家连同日本商人都极不赞同日本当局的打仗行为，商定在大战发生前为了避开政治于1937年准备逃去桂林避难，但在成行之前中风故世。

共产党进驻学校

小学来了个共产党副校长。她来的第一件事，是给我们五年级一个剧本。学校每周六上午有周会，各班级都有节目。一次，我们五年级甲组排了个剧目：一位老妇人梦见天使说耶稣次日会到她家作客。第二天一早，老妇人就把家打扫干净，准备了好吃的迎接耶稣。谁知等到深夜，还不见耶稣来，最后有人敲门，原来是一个又冷又饿的乞丐。老妇人起了怜悯之心，招待那可怜的乞丐，拿出食物，让他得到温饱。这时，时钟响了十二下，老妇人突然想起为耶稣准备的食物都让乞丐吃了，正在着急，幕后响起了读经声“你作在我弟兄中最小一个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老妇人恍然大悟，转忧为喜。

这个演出令那党员副校长周身不舒服。她带来了另一剧本，叫“聪明的贼”。一爱财如命的老妇，整天整夜握着她的钱箱钥匙不放，一天一个贼人混入她家中，躲在角落里一直低声叫“老太太”，弄得那老妇人心神恍惚，最后那贼人偷到钥匙，将老妇洗劫一空。这戏演出后，倪校长到我们班级，问是哪里来的剧本，级任顾老师全然不知。问到演戏的同学，才知道是葛副校长拿

来的剧本，并亲自导演。倪校长同顾老师都说这不是一个好戏，教学生做贼。大多数同学也有同感，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葛副校长要拿一个坏戏给我们，我心里想，共产党都不是好东西。

倪校长自杀了，学校中有几个接近葛副校长的，都说要开会，“控诉”倪校长，但大多数老师和同学都尊敬她，大会夭折了。倪校长的追思仪式在万国殡仪馆举行，老师、家长、学生、校友把礼堂挤满，没能进入会场的，站在屋子外面的花园里。倪校长自 1902 年从事教育工作，桃李满天下，她的学生，有得到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有加拿大国会议员，有香港两局首席议员，首席按察师。至今，我还记得她所作校歌的最后几句：“觉民，觉民，我可爱的觉民，伟大的将来就在觉民。”

学校来了个新生，由于太顽皮，没有学校收，他母亲把他送到觉民。他外祖父是以前的驻俄大使，母亲在俄国长大，而父亲又是驻阿富汗大使。当时她在教俄文，我的阿姨也在她那里学俄文。这位同学在学校里组织了个“团结组”，同我最要好的冯国乔参加了。一次冯国乔同他打架，被他打得很重，其中有位名叫張崇良的同學看不顺眼，走过去对正他眉心一拳打去，他跌倒了，同学把他们拖开。教体育课的林老师走过来，要他们互相握手道歉。我十分佩服張崇良，放学时同他一同走回家时，那位新來的同學向我們走过来，我们原先以为他来找我们打架，结果是他是认为张同学学过摔跤，要他教教。张同学直言说，那些都是从他表哥那里听来的，他是摔跤选手，上午他还是第一次试验呢。新同学叫邹霖，聪明过人，中学也在时代。我们不在一个班，知道他是排球校队队员，之后就没有来往，六十年代初他去了香港，后来入英国牛津大学。他的姐姐邹灵告诉别人，说他当上了某个英联邦国家的国会议员。

升到六年级时正好是三反五反运动。姑丈在太古洋行被关了一个星期，当局查不出什么，放他回家，我们全家受了一场虚惊。同班好几个同学的父亲，被打成“大老虎”，有的搬家了。还记的比我低一班的一位潘姓同学，他父亲是怡和洋行高级职员，也被打成大老虎，报纸上点名批判潘经理，这位同学就被同班有些同学起了潘金莲的绰号(上海话经理同金莲同音)，当时老师马上出面干涉，不准这样提绰号。他们家很幸运地在二年之后有机会迁往香港。明显地看得出，他们的生活艰苦了，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同情他们。我记得全校有二位同学的父亲跳楼自尽，在路上到处听到那一幢大楼又有人跳下来了，事后得知，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晚坐在沙发上听下级汇报，打趣地说：“哈哈！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呀？”。

积极的青年人

一天，家中来了个亲戚来探访我祖母。她是祖母后母的孙女，叫阿德，以前是地下共产党员，如今得势了。她梳了个当时女共产党员特有的那种短发，边上扎了条辫子，我们叫她“共产婆”。她坐在沙发上一面冷笑，一边得意地说“打成一片，哈哈，打成一片。”我对此极为厌恶。她有个弟弟叫五弟，在上海市公安局政治科，他们俩都是在学生时代去延安的。

阿德后来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自杀了，因而牵连了五弟，由市公安局调到青东农场(是共产党内部人员劳动教养的农场，在上海青浦县)去当管理人员。记得六十年我刚从部队复员，春节往姨婆家拜年。大家问起我的情况，我说大半是因家庭成份不好而提早退役的，大家有顾忌也就一言不发了。临走时，五弟的太太，她也是青东农场的管理人员，对我说：“现在亲戚朋友很少，有空多多来。”她又悄悄地说：“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一本正经的。”后来我才知道，在监狱劳改、劳教场所当管理干部的，大多数是在公安部门犯了错误的、或家庭出身“不好”的或是共产党的异己分子，他们被称为“公安部门的渣子。”

祖母的弟弟就是我叫他舅公的去了香港，他有一女儿 Ann 有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学教育的，在大学时就同被发展她成为中共党员的人结了婚，当时她俩都是教育局的干部，有天那男的来找我祖母，要我祖母劝劝 Ann，说她也太过份了，共产党讲话都是敷衍敷衍的，哪有这么当真？说他老婆每天晚上都要交换思想，谈学习心得，到了周末去看场电影总算可以放松一下了吧，谁知回到家里还要谈电影内容的教育意义和思想总结，他实在吃不消了。事后我祖母对我们说，阿安的共产思想是他教的，叫我有什么办法？数年后反右运动中 Ann 受到批判而自杀了，又是一场悲剧。记忆中，Ann 在日据时期有时跟她父母来我家，人人都赞她的功课出众，当时她就读中西，而且钢琴也是弹得很好的，奏萧邦的幻想即兴曲、Polonaise 及舒伯特等的高难度乐曲；大约是二战一结束就去美国留学。

我姐姐突然变了，也梳起了“共产婆”式的头发。一天她带我去兰心大戏院看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演出。没有一个节目是我喜欢的，只记得弹伴奏的钢琴家休息时挖鼻子，把鼻屎弹在旁边。还有一个大肥婆，声嘶力竭地叫喊“蒋匪帮哟，闹得一团糟哟！”算是女高音独唱。我姐姐也一本正经地学那肥婆唱。有时我们发生口角，姐姐扬言要去检举揭发我收听短波，我则说：“我听时你也在场，是一齐听，你也逃不了！”

姐姐学校的老师打电话来我家，说姐姐报名参加“军干校”(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听说已经批准了。是祖母接的电话，我母亲赶到学校，姐姐的级任老师见到我母亲，就说我姐姐是大小姐，怎能吃得起这种苦。母亲很感谢这位老师帮助，同校方交涉了大半天，才把姐姐的名字从出发名单里除去。姐姐回家大吵了一场。不久，她交了男朋友，是棒球健将，笃信基督教。我姐姐

也对基督教热心起来，把辫子盘在头上，将自己装扮成女牧师的模样。过了数年，我姐姐得到消息，那些当年由中西中学入军干校的同学，有的自杀，有的成了右派，没有一个有好结果。

顶 撞

小学六年级开始上政治课，由新来教导主任名叫周长的任课。她先是教“谁养活谁？”结论是工人养活资本家。有同学问，如果资本家不开厂，工人到哪里去做工？周长教导主任也不知说些什么，大家都听不懂，反正由她去说。接着是教从猿到人。开始她讲苏联故事，说苏联的一个工人家庭，晚上全家正在吃着一顿丰盛的晚餐，墙上挂了幅伟大领袖，这时她突然停下，抬起头，斜眼望着天花板一角，然后高声讲出斯大林三个字-的画像，她接着说在吃饭的时候，家中小男孩问他是那里来的，他母亲说是她生出来的，而祖母即说是上帝赐予的，最后，那位当工人的爸爸说人是从类人猿通过劳动而变成的。当时有学生问，那就是说人是猴子变的，或者猩猩变的？她说既不是猴子，也不是猩猩变的，而是由“类人猿”变的，好像现在的猫，都是由野猫经过人类培养，到如今才有各种各样的猫。我举手问问题，同她有如下的对话：

“既然各种各样的猫是由野猫变的，还是由猫变成猫，为什么类人猿就不是人呢，也可以叫野人。”

“不是的，类人猿通过劳动才变人的。”

“那么有没有不劳动的类人猿，永远变不了人的呢？”

“没有，所有类人猿都劳动，”

“为什么不能叫类人猿是原始人呢？”

“类人猿是猿，人是人，就像课桌椅是木头做的，但你不能说课桌椅是木头。”

“课桌椅是由木匠把木头做成的，没有木匠，木头变不成课桌椅。没有上帝，也就没有人。”

其实在这场对话中，我违反了逻辑辩论的基本法则，我本来是否认“变”，而最后却又承认了“变”，我是无意地偷换了概念。但那教导主任看来不懂得逻辑学，没有哲学常识，以至有如下结果：

只见教导主任双手捂住脸，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急急往外跑，回到她办公室里去了。下课了，同学们为我担心，我闯祸了。我也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这样一直到下午放学，没有人找我。

回到家里，校长、教导主任、级任应老师都在，他们说我上课不守纪律，影响全班上课，顶撞老师。我说我是举了手，站着问问题的，当时马太太一家住在我家。马太太讲话了，她说我既

没有骂粗话，只是问问题，“学问学问是有学有问，你们做教师的连一个小学生都不能说服，我真怀疑你们做教师的资格。”

我见到那两个共产党脸色很难看，想发怒又怒不成。这时应老师忙说，“你们先回去，陈文立由我来开导。”那两人即溜之大吉。

应老师说：“陈文立个性太强，脾气太倔，在这种时局要吃亏。”他说为了此事已经吃过“排头”（被训斥过）。“他们（指共产党）可以敲掉我们的饭碗，今后你把想法放在心里，不要同他们争。何况他们还会给你父母带来麻烦。”这时，我才知事态的严重。

小学毕业照我不愿同那党员校长合拍，拒绝照相。还是应老师说：“你又倔了，看在我面上，拍了就算，否则我又要吃排头。”我这才参加，但我只要全班同学同应老师一起照的那张照片。

进入初中

到了中学，大多数同班同学都是少先队，全班只有两个人不是，我是其中之一，因为小学没有建队。我为了不突出，也报名参加，但没有被批准，辅导员说我小学表现不好。我把小学成绩单给他看，评语是勤奋诚实，有礼貌，爱劳动。缺点是个性强，功课粗枝大叶，并没有特别不好的地方。他只说：“那继续努力吧！”。后来才知，那教导主任或校长对我怀恨在心，不知在我的档案材料上写了些什么东西。

我进入的中学虽然叫圣芳济中学(ST. Francis Xavier's Middle School)，但已经由政府接管。校长是代理的，叫陈新。以往的教会教长白修士已经离境，是同教廷公使黎培里同时被中共当局驱逐的一批。不久，学校改名时代中学。

老师当中，我最尊敬的是唐才林老师。他原先是教英文的，我在学校时他教算术、代数。他写得一手十分漂亮的拉丁花体。上课之前，他要默祷。本来枯燥的数学公式，他却能解释得生动易懂。作业，他是不允许涂改的。据说以往他当英文老师时，谁涂改了要罚抄写数遍。我们的作业如有涂改，他会用红笔圈出，边上写“涂改”两字，我们都不好意思起来。为此，我先是在草稿上做作业，再誊到练习本上。唐老师在本子上批了“整洁”，我看了受到鼓舞。上课结束前，他总要讲个小故事，大多是敌伪时期发生在电车上，或一些家常的事。例如钱包被扒手偷了，小偷给逮住了，但这些扒手小偷，又是为生活所逼，结果是他们觉悟了，逮人的又原谅他。他讲得那么生动，很多同学感动得流泪。小故事激发了我们的同情心，他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要相爱。

初三时，唐老师不见了。后来我在教师办公室里见到布告，他因反革命被捕。那是 55 年 9 月 8 日，中共那天大肆镇压天主教。同时被捕的，有沈伯良老师、李安琪老师、周献会修士等。学校里的天主教同学，都要开会学习，因为我还不是天主教徒，没有参加。胡志芳老师除了上课之外，就被叫到一个办公室，坐在藤椅上，旁边有人向他问话，他一言不发。这样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他没有被捕。事后，天主教的同学说他“门槛精”，就是守口如瓶，不同当局争，结果对他没有办法，运动过了，就不了了之。

我开始踢球，为了抢场地，同高班同学打架。他们人多势众，宋千里一拳打得我流鼻血，他急了，把我送到医务室，忙说对不起。医务室的桂春老师正在筹备一个演出，宋千里会拉小提琴，桂老师要我帮他伴奏。所谓不打不相识，我们演出的是托赛里的小夜曲。宋千里到我家来了两次，都是练琴，当时他拉得并不好，有时走音，当然我的钢琴也不见得好。

初中三年级时，有次到江湾体育场看足球赛，一场大雨，浑身湿了。回到家中，开始发烧，热度一直不退，经医生诊断，患了肺结核。家人说我踢足球，运动过度。当时我是睡在二楼，二楼中间两间睡房是相通的。睡房外面分别有个小会客室，我可以在会客室里做功课，祖母就睡在另一间睡房。我的房间是祖父去世时睡的，祖母说祖父去世后，她一个人一间有点害怕，要我在隔壁陪她。这种房屋结构，是仿以往英国上层家庭的设计而建的，上了年龄的夫妇分房而睡。我患肺结核后的第二年祖母去世，才发觉她的肺结核病在二、三十年代被控制住后，又复发了，而且半边肺已全部失效。我的肺病是由此传染到的。

停学休养一年后，我痊愈了。邻居一位退休药剂师在家觉得闲着无聊，上无线电学校学习。我向他借了些书来看，因为我的那台通讯接收机，是管制器材，被公安局以 180 元人民币收购，另一台是我祖父在日占时期使用的三十年代飞利浦三波段八管机，已经老旧，但还可以使用。我将书上学到的，把那机器改装了一下，就是原先的二级中频放大，是用外耦合的。我从芝罘路旧零件摊上买到上好的中频变压器，改成内耦合，灵敏度大增。当时中和无线电行尚有欧洲式电子管供应，我把 EF5 换成 EF9，这都是边接触式的管子，机件整旧如新。这架机器，一直用到我入狱。因为机件看来很古旧，我家被“扫地出门”时没有被没收。80 年我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时，那台收音机还能正常收听，十分耐用。

我从小就喜欢听音乐，抗战胜利之前，我总是听一台大概是 30 年代的老式 RCA 的电动留声机放唱片。抗战胜利后，家中买了台 Zenith 的落地收音机，有了自动唱机。我伯伯也爱听音乐，购置了好些唱片。我最喜爱的是那套爱尔兰民歌，尤其是那首 Danny Boy，旋律优美，歌词又是那么耐人寻味。另外一首是从我懂事就喜爱的德国民歌 Ach wie ist's möglich dann. 这套德国

民歌是我父亲从维也纳带回的。到了初中，开始喜欢古典音乐，尤其是舒曼、门德尔松、韦伯和萧邦以及莫扎特的作品。至于流行音乐，只是停留在五十年代的，都是从短波听来的。那时澳洲广播电台、美军电台、BBC 都有音乐节目，我最喜欢 BBC 的 Sing Something Simple，是由手风琴等乐队伴奏的合唱的 Adam's singer 都是些老歌，我还记得开始曲的歌词：Sing something simple as cares go by, sing something simple just you and I, we'll sing the old song like you used to do, we'll sing something simple for you—something for you.

每个星期天我们去国际礼拜堂做礼拜，那里有个少年团契，在三楼。当时由冯家声先生负责，他要我弹琴，因此我每天先在家里练好，星期天去司琴，结果技术大有进步。除了圣诗之外，我姐姐学的我也跟着练，人们说我弹得比她好，因为我练得比她勤。冯家声是沪江大学的教务主任，55 年肃反运动时被捕。

56 年是一个动荡的年份，匈牙利发生了自由革命，可惜被苏联镇压下去了。那时我正病休在家，天天开着收音机。祖母的健康每况愈下，已经卧床不起。为了方便医生进出，她搬到楼下“电话间”去睡。电话间其实是给客人更衣用的，旁边的浴室在靠大门的第一个房间，是给打球或骑完马的人洗澡的。祖母患的病叫 Degeneration of the cord，即身体各部机能逐渐衰竭，请了好多医生，都没有办法。她在 57 年去世，享年 75 岁。

祖母一去世，太古洋行每月 3000 港元退休金就停止了，家里开始拮据起来。三姑母去香港的申请批准了，当时祖母曾要求她将我姐姐带出去，姑母认为姐姐个性太反叛，怕管束不住，说她只愿意带我走。姐姐是祖母唯一的孙女，对她特别宠爱。我个性倔强，不讨祖母喜欢，加上父亲认为我年龄太小，没有让我走。当时放了好些人，马太太一家也去香港了。国际礼拜堂几乎四分之一的人都走了。当时我的确很想走，我一直梦想将来去剑桥大学学数学或物理。58 年，我第一次申请去香港，没有批准。59 年去当兵，60 年上大学，第一个暑假又再申请，接着寒假再申请，一直申请到文化大革命被捕，也不知被拒绝了多少次。

高中生

57 年升到高中一年级，班里没有女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班级里开始有团员，学校老师开始“大鸣大放”。我从广播中听到印度总理尼赫鲁忠告中国知识分子谨慎，少说为妙，我将此话告诉了父亲，因为单位领导对他说，他是唯一的留学生，一直没有重用他，要他对党提意见。他想不出说什么，要他讲笑话开玩笑他很能，说正经话他就很结巴，这种长处救了他。他发言说他想

开一个班，讲授绘画透视学，因为好多同行没有学过，领导说这不是对党提意见，却马上让他开班讲课，结果他逃过了反右这一关。

学校里几乎所有好的老师都成了右派，教研组长、教导主任冯懋昆老师，都在学校监督劳动，连原来是新四军的校长路竹也成了右派。我们做学生的要发言，我已经学会了人云亦云。发言都是千遍一律，“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罪大恶极，我们要同他们划清界...然而他们有学识有才能，希望他们早日觉悟，回到人民队伍里来，继续为人民服务。”那最后一段，教政治的赵庆麟听了不舒服，说我们有的是人才，不希罕一两个右派分子。赵庆麟父亲不知是地主还是反革命分子，总之遭共产党枪毙了。那时他在沪西中学念高中，突然积极起来，宣布同死了的父亲决裂，加入共产党。中学毕业后就到时代中学教政治，身材只有 150 公分左右，獐头鼠目。在反右运动中，他是斗人的打手。记得我们班里一位成绩极好的同学，因为父亲在香港，赵说“像方德华只能读读松江师专”（松江师专是中等专业学校，收初中毕业生）。大学放榜，方德华果然是松江师专，气得他放弃上学，准备等一年再考。那时我刚从部队复员去探望，他说赵庆麟对他怀恨在心，在他档案里乱写，次年他考大学未被录取。幸好他在 62 年去了香港，后来经营建筑业，颇有成就。

记得在初中时，有位姓葛的同学很顽皮，他父亲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抓，说是开地下工厂，造钢笔尖，其实只是在家中置了台机器，由他父母买了些原料自己操作以维持生活。他父亲被捕后，葛姓同学家中极为困难，是申请“人民勤学金”读书的。当时赵庆麟训斥他：“吃了人民的饭，还要调皮捣蛋！”因而得了个“吃饭”的外号，我对此很气愤。那时唐才林老师也严厉地责备那些叫他“吃饭”的同学。“他家中经济困难，已经很可怜了，你们不能这样侮辱他！”自此之后，才没有人再叫他“吃饭”。他功课不好，我同情他的遭遇，放学后到他家帮他做功课。后来他考入了中专技术学校，就没有来往了。他家住在我大学同学金文达的隔壁，我离开上海往香港时，去同学家道别，顺便探访了葛家。当时他父亲已出狱，他不在。我作了自我介绍，说到当年我对他的遭遇极为同情，我们一度成了好朋友。问起他的近况，葛老先生感慨地说：“还是你有良心，我们的儿子如今同家里断绝了来往，说是由于我害得他入不了党。如今听说他是单位里的小领导。”我说：“那就好啦，党员值几个钱一斤？我当兵时只差两个月就入党，只是因家庭出身而提早复员，共产党与我无缘，我是天生的反革命。”我们大家都笑了。

大跃进

“在大入团的前夕，一定有很多人要遭殃”，这是班级里传开的一句话，班里的团员，争取入团的积极分子，身边总有一本“工作手册”，那是一本大约2寸乘3寸的小笔记本。一天我好奇，趁一个团员不小心把手册忘了放在课桌板凳上出去打球之际，偷来一看，前面是全班同学的名单，在名单前打了“*、√、△、×”的符号，即五角星、勾、三角、以及叉叉；凡是团员及争取入团的，都是“*”，在他们认为表现中上的是“√”，△是中下的，他们认为是坏学生，就是平时为人爽直同他们作对的，打上“×”。同我一起看的有方德华等同学，我是属于“√”一类，而方德华是“×”。他记起有一次大家闲谈，说如果有外星人，一定比地球人进步，有人讲到外星人的社会制度，这时赵庆麟在场，他说：“可能是共产主义了，或比共产主义更高的制度。”方德华说“修正主义”。他是说笑的，引起大家哄堂大笑，这个赵庆麟面色大变，为此，他得了个“×”记号。

那本子上还记录了班级同学的一言一行，当然方德华的言论在其中，大多是收集同学无意中讲的笑话，同当局宣传口径不一的，都有时间地点，一一记下。这些，都是在未来整人斗人的材料。正看着，有人说他回来了，我们忙把那本子收起，后来丢到垃圾里去了。我们见到那团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寻找东西，当然他又不能问任何人。如果别的团员知道他把那手册丢了，他将会面临什么？没有人能预料。

当时我在学校里表现得很小心，同学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收听短波，他们只知我家信奉基督教，埋头读书，有人说我是“被人遗忘的”，反正我在或不在，没有人在乎。由于初中时患过肺病，体育课都不让我踢球，因此，我只能到住处附近的交通大学去玩。我的成绩，大半是5分差一些，我有个坏习惯，测验、考试很急躁，总是第一个交卷，从来不重复核对一遍，往往都是粗心而出了些差错。从小学开始，“粗枝大叶”的缺点就一直跟着我，直到我来到美国，才把这缺点改了，只有高中二年级下学期，学生手册全是5分的。

学校调来了个新的教导主任，叫董效俭的，讲话带河南口音，做起报告总是一边讲话一边冷笑。我发觉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党棍都是如此，后来到了美国，接触到一些俄国人和德国人，他们也觉得苏共特务或纳粹分子，都爱冷笑。这个董效俭，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事后，才知他是由复旦中学调过来的。他原是复旦中学的教导主任，由于同一有夫之妇的女教师发生桃色关系，女教师的丈夫是另一学校的老师，走到复旦，给董效俭一记耳光。丑闻传开了，董在复旦呆不下，又不知他同那一级的高级干部有点关系，没有受任何处分，就调到我们学校，仍旧当他的教导主任。

他一到时代，就开始“整团”，这在其他中学也有，如市西中学，51中学，我都有朋友在那儿。他们只是开开会而已，我们学校可不同，大批大斗。记得有一位团员同学叫崔乃荣，批判他

的大字报贴得全校都是，内容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例如，他家中是信佛的，他说了句“佛教也有它一定的道理”，就成了滔天大罪。有人甚至把他名字改成“臭奶油”，结果他被开除团籍，以后他怎样，我不知道，因为他比我高一班。最可怜的是一位姓瞿的女团员同学，她是为了要升大学而争取入团的，为此受到批斗，最后因受不了侮辱，在锦江饭店跳楼自杀了。当时学校还准备开大会批判她，不知道什么原因，大会没有开成，整团也结束了。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学校时，见到我同班的一团员同学，他也因出身不好而没有考上大学，谈起整团时的那位瞿姓女同学时，他说：“我们的太平，是用她的性命换来的。”

学校似乎停课了，先是下乡，我们去青浦。由于我们没有农村劳动经验，连摘棉花农民都觉得我们帮了倒忙，记得我们只是推车子运送货物。有的同学嫌乡间伙食差，当然不敢公开讲，只是说没有油水，大便不通。而我却觉得蔬菜挺新鲜，米也好，那是因为我家吃得很省，我父亲工资不高，又要维持那间大屋，只能在吃的方面省了。农村的茅厕很脏，大便时苍蝇尽往屁股上叮，有位同学闹了个笑话。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他找到了一个干净的茅厕，没有大群苍蝇，说明天带我去。谁知次日，有个农民大叫，说有人把大便拉到他们的酱缸里了。

农村劳动的第一二天，晚上混身肌肉疼痛，到第三四天就习惯了。有人要偷偷地溜到镇上买东西吃，问我去不去，那时我身边只带5元，是以防万一的，我没有去，他们都去吃了碗油豆腐线粉汤，回来时都说有了油水大便即刻畅通。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次日晚上学习讨论会上他们遭到团员和积极分子的批评，有人说我也去了，我说我没有钱，吃不起，我没有去。这里有个在争取入团的董建国厉声斥责我，说我“明知别人去了，却不报告，是包庇！”当时凡包庇右派分子的，也被定为右派。我想，一碗线粉汤，又不是什么大事，但我知道，如果我同他们争，事情会越闹越大，我只好说：“是我不好，今后一定报告，”这才过了关。

一天，天气不是很热，但由于推车，我们都热得只穿汗背心。那天田边上的人特别多，有几个人把上装披在身上，有的是没有符号的军装，看来是复员军人，他们在指手画脚，这些人是大队或公社的干部。当时农民有个顺口溜：“大衣披了披，不做二三千”——这是指干部，他们不干活，一年有二至三千工分(计算劳动的单位)，“胡须撬松松，勿做勿成功，”——这是指老年农民。

呜呜……，来了二辆黑色的小汽车，停下了，后面的那辆坐在前面座位的第一个下车，走到后面去开门，一个个子不高的干部下了车，这时前面那辆车的人也都下了车，有的背照相机。那个干部站定了，几个披了上装的农村干部围了上去，只见那干部把脚一伸，于是有人前去把他的皮鞋脱了，换上草鞋，又有人替他脱了上装，他把手一伸，那人又帮他卷衬衫袖口，又卷裤筒，

农村干部给他戴上草帽，再递给他一把带着泥巴的铁搭，他摆好各种姿势，背照相机的忙替他照相。照完相，又有人忙着替他换回原来的衣服，他自己一点也不用动手。之后，那帮人又坐上汽车扬长而去，披上装的农村干部向他们挥手送别，历时大约二十分钟。

次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张照片，就是那天所摄的，报导说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下乡参加劳动，边劳动边同农民谈心，同农民打成一片，又问寒问暖，关心农民生活。

我看了之后，想那些“新闻记者”也真会做文章，把那二十来分钟的换衣服、扮相作秀改写成面目全非的报导。然而这些在当时司空见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两个星期的农村劳动结束，就投入了大炼钢铁运动，当时的宣传，要十五年赶上英国，又要完成 1080 万吨钢的指标。各单位、各学校，不做工不上学，在空地上塔起了土高炉，我们学校在小足球场上架起四座。白天，我们到郊区去挖黏土，又到砖瓦厂去取砖头，我踏三轮运货车，上海人叫黄鱼车。到了晚上，由化学老师一本正经地绘好了高炉的图样，我们用黏土和了砖头，砌成高炉，谁知一生火，高炉爆裂了。有人说粘土要加头发，有几位女同学立即剪了辫子，刚剪了，化学老师说没有用的，同样的高温头发早成灰了，他说要用耐火砖才行。这时，我们班里的团支部书记王仁淦说他住处附近一家工厂也在炼钢，他们有大批耐火砖，由他带着我踏黄鱼车到那工厂去偷。耐火砖来了，高炉架起，放了些废铁，把学校伙房蒸饭用的鼓风机拆了来鼓风，将半溶化的铁水倒入坩锅，结成一块铁疙瘩，大红喜报就贴出，说高二三班炼出了第一炉“中碳钢”。为了炼钢，全上海的大铁门都给拆了，当局甚至连铁锅也要，结果炼成的铁疙瘩全是废物。

说到团支部书记王仁淦，他的父亲是被共产党枪毙的，母子相依为命，家境非常困难。邻居戴天老师，是我们高一的班主任，教生理卫生，帮了王家不少忙，王仁淦得以继续念高中。在反右运动中，王仁淦反咬一口，检举戴老师言行，戴老师被打成右派，我们班主任由赵庆麟接替。王仁淦善于钻营，后来考上北京钢铁学院，文革时是造反派头头，当上了革委会主任之类的官。四人帮被打倒后，他受到清算。我在香港时听老同学讲他郁郁不得志，但还想东山再起。

我们班里有一姓钱的同学，阅读了好多书，几乎出名的翻译小说都读过，写得一手好文章。他酷爱音乐，会拉小提琴，是自学的。他开始同我接近，虽然我不太相信看相，但我祖母常有句话，说“耳后见腮反面无情”，那位钱姓同学，就是属于这一类相貌，因而我一直对他存有戒心，从不对他讲真心话。学校的文娱演出，他拉小提琴，我伴奏。他到我家里来过几次，当时我父亲单位号召美术人员在家创作，所以他见到我父亲在楼下书房绘画。我父亲有很多绘画的参考书籍，其中有十几大本罗佛博物馆的油画册，他看得爱不释手，我姑母寄来的一些杂志，他都一一翻阅

了。祖父以往的线装书，在二楼走廊里有几千本，他说我家好像图书馆。这些，想不到会使我成为班中白旗的材料。

58年的暑假，在大炼钢铁后开始，我不是在家中平静度过的。学校开始了拔白旗运动，这运动，也只是时代中学进行，其他中学，大多是下厂劳动而已。我们每天下午六时就要到学校，全班开会，团员及积极分子根据他们整理好的材料，对同学逐个进行批评。第一个星期似乎平静地过去了，因为提出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事，大多数同学作了些检讨，通过了。接着，他们炮火对准了姓钱的那位同学，批评他平时讲罗曼罗兰，讲巴尔扎克。由于钱姓同学口才极佳，反唇相讥，把那些批判他的人驳得丑态百出，所以几天下来，似乎没有人能批倒他，而我们大多数同学，都认为他是“好样的”。到了第三星期，开会前钱同学对我说，他要对我提些意见，当时我还是处之泰然，我觉得在他面前一向十分谨慎，他不可能对我说严重的话。

那天他来个180度大转弯，他先是承认了他崇尚外国文学，接着检讨了上一星期作了不应该作的发言，影响了拔白旗的运动，接着，他对我作了如下的发言：

“陈文立在班级里是不注目的，是穿着朴素的，是一个不花钱的人，就好像他平时骑的那辆自行车一样，看来很旧，很不显眼，你们有没有试骑过呢？我就试过，我可以说那辆自行车比班上任何同学的还轻，就好像是童话祖母的奇椅那架神奇的纺车，看来破旧得要散开，但在那老祖母手上，飞快旋转，纺出最好的纱。他的自行车是英国三枪牌的。我到过他的家，那是一幢好像英国贵族城堡那样的大屋，有数不清的房间，有两间以上的大客厅，我只看到两间，每间都放了台三角钢琴，那台钢琴，就是苏联反特小说《XXX》那变节的军官，西方特务机构给他巨额奖金才买得起的那种，也是当今四大钢琴名家如鲁宾斯坦所使用的那个牌子。他家还有落地收音机，他家的图书，中文线装书就有上百箱，我想它包括了历代所有的名著。他享有两间以上书房，都是外文书。他家的睡房，就是莫泊桑短篇小说《项链》中女主人公玛莎梦想的那种，外面有间小会客可以同男朋友幽会的。”他说到这里，引起全班大笑。接着他说：“连他家的痰盂都是全金的，上面印有英国贵族的纹章。他留我在他家吃午饭，刻意把小菜弄得简单清淡，以显示他们节约，但盛载那些小菜的碗盘，倒是清代最细致的瓷器。我不善于表达，如果曹雪芹到他家，一定会觉得他家比起大观园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讲到这里引起全班同学的目光都转向我，对于这些似是而非的描绘，弄得我头晕目眩。房间是多了些，也不至于“数不清”，那几个从倒闭了的饭店买来印有该店商标的铜痰盂，变成了金的、印有“贵族纹章”。他来我家吃午饭，我家还加了菜，但他却说我们刻意装穷。我的心跳加剧，不知他把我这样描绘之后，要对我下什么结论。接着他说：“平时陈文立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除了班级集体看电影之外，因为电影票只是二角

五分一张”他把二角五分讲得特别，又引起了一阵笑声。“他的表现，就好像是葛朗台一样”又引起一阵笑声。

他接着说：“陈文立家真的是他表现的那么穷吗？不是的，只要他们变卖任何一二件东西，足可以使普通家庭舒舒服服吃上几年”。我的天啊，我想，我们也的确想卖掉些东西，但那旧货店的估价人说我们的钢琴是假的史坦威，最多只值二百元，整套柚木卧房家具，是老式的，尺寸太大，只值 75 元。“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在解放前陈文立家是过怎样的生活，现在解放了，他们装穷，充满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度不满！”这时，他停顿了片刻，寂静的教室，只听到团员和积极分子记录时在本子上发出的沙沙声。我环顾了四周，看见几位同学向我投以同情的目光，我感到安慰，也向他们投以感激的目光。

那位姓钱的同学接着说：“他特意给我看他家中从国外寄来的美国杂志，最反动的美国生活杂志。我一边看，他在一旁解释。”胡扯！是你自己在我父亲的画室里翻到的，当时我叫他不要看，说是坏书，我那里解释过？“那杂志上有纽约的照片，也有莫斯科的照片。而纽约的照片是用正光拍摄的，看起来很明亮。莫斯科的照片，是用逆光拍摄的，表现得极灰暗。可见得陈文立就同美国记者一样，崇尚资本主义的美国，敌视社会主义的苏联！”他接着说：“这还不止，在他房里，还有他订购的美国《大众机械》。”哪里是我订的？是香港亲戚订了看旧了寄给我看的。“其中一本封面上有布鲁塞尔博览会上原子结构式的建筑，我问他是不是苏联馆，他气急败坏地说这是美国人设计的！”他是问过我是不是苏联馆，我说记得我们一起去看过苏联拍摄的记录片，解说人说比利时人擅长建筑术，那是比利时筑建师的杰作。

他又说：“陈文立在班级里从来不对任何人讲内心话。”“他的朋友都在其他班级，他常常去交大踢球，我真不知他在校外的朋友是些什么人。”

接着，由会议主持人团支部书记王仁淦讲话了：“陈文立平时是沉默寡言的，我们都不知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现在葫芦打开，同学们要积极地把那葫芦里的药彻底倒出来！”

首先由团员积极分子发言，有的说我不参加去苏州杭州春游，是对祖国大好河山的不屑一顾。有的说那天参加反对美国武装干涉黎巴嫩游行时，我的用薄纸糊的标语旗被雨淋破了，是蓄意破坏游行。其实全班同学的旗那时都破了。

随后，全班同学逐个发言，大多数都是重复地说我“装穷”，但有一件事，却令我震惊不已。一位同学说，“陈文立常同人提外号，说这人像啥，那个人又像啥，一天人们问他自己像什么，他说像艾森豪威尔。”当他一说，没有人笑，只听到察的一声，那是多支钢笔在本子上记录的声音。事情原来是这样的，那天大家在谈论电影，有人问，他觉得有一部电影里的人物同一位同学

像极了，就记不起哪个电影，当时我说，是《天堂里的笑声》里的银行职员，大家都说是。那位同学有些生气，因为那个人物有点傻，他急着说：“你就像那照片里的人！”他是指那贴在墙上那张上了绞索的艾森豪威尔的宣传招贴。大家见他不高兴，也就不再说笑。怎能料到这样一件说笑的事，也会弄得面目全非。我后悔自己记忆力太好，太多嘴。而发言的那位同学，的确有点傻乎乎的，他倒不是有意中伤，当他发觉事态严重后，事后一再同我打招呼说对不起。我一点都不怪他，因为我当时已经是有如一身蚂蚁在爬，多一二个都无所谓了。

这样前后一共三天，到第三天结束时，发言的人也差不多都讲过了，我当时一言不发，因为我很明白，解释辩驳，只会把事情闹僵以至没法收拾。那王仁淦发言了，他说我是消极抵抗，不要以为一言不发就可以蒙混过关，他们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的。

我想了之后作了如下发言：“同学对我的帮助很中肯，很正确，也唤起了我的记忆，认识错误需要时间，需要过程，我一定会作一个彻底的检查。”“多长时间？几天？几个月？还是几年？”一个团员在叫喊，“明天”我说。

回到家里，电话响个不停，同我接近的同学，打电话来都怕我会出卖他们，方德华为人直爽，早就告诉我他听美国之音，特地关照我千万不能说。我向他们保证，绝不做小老板(钱 XX 的外号)。我也告诉他们，我不准备在会上做检查，我会写份书面检讨，只不知道交给谁为好。他们都向我推荐交给教导处副主任张孝治。

张孝治是化学老师，听别人说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化学系，是最后一班，之后加入共产党，父亲是“红色资本家”，是人民代表。平时衣着光鲜，谈话颇有讲道理的感觉，没有那种党棍的跋扈气息，相貌上也是属于“耳后见腮”的。

整个事件，我没有告诉我的父母，一是怕他们担心，二是他们也帮不了我什么。

那天晚上，我作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祈祷，求天主赐我智慧，写好这篇检查，以顺利过关，接着就开始动笔，先是检讨了自己走白专道路，只顾埋头读书。我否认了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我说在日占时期祖父被抓过，国民党时期舅父又被抓过，我父亲又被流氓敲诈，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当初我父亲的公司要他去香港，但他说不愿当白华，坚持留在上海。解放后虽然生活艰苦些，但很稳定。说到我装穷，我说我住处是大了些，那是祖父的屋子，家中的东西不全是属于我家，有国外亲戚寄放，我们代为看管的。而且我父亲工资不高，以往房产的确有些定息，但为了维持那间大屋，花费不小，我当然不可能拿出二、三十元去杭州游玩。至于说我反苏，是没有理由的，苏联是伟大的国家，他们的交响乐团、芭蕾舞团，以及奥伊斯特拉赫来上海访问演出，

我都去，苏联电影我也看，我也读契科夫，普希金的书。最后说到有人说我自己说自己像艾森豪威尔，我写世界上没有傻瓜会承认自己像艾森豪威尔的，这是一场误会。

检查写好，大约是近十一时，我睡了，倒没有睡不着。第二天一早就上学校，等到张孝治老师一来，我即上去要求同他谈谈。他让我进了他的办公室，我先把拔白旗的过程说了，我说我完全接受同学们的帮助，接着把检查交了给他，我说我正等待学校给我处分。他粗略地将我写的看了一遍，说，“学校是教育人的，不是处分人的，你有了认识，就吸取教训嘛。”然后，把我打发走了。

傍晚六时的会议，王仁淦说我不宜参加，要我先回去。次日一早，我去方德华家问究竟，他问我到底写了些什么，我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他说：“到底是张孝治上路，昨天赵庆麟说了，你作了检查，他说你的检查还可以，陈文立的问题告一段落，接着他作了总结性发言，这白旗算拔好了。”

而其他班级，拔白旗活动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小学的同学华克伟，他班里要批斗他，幸好他申请去香港的通行证批准了，他即刻动身。赵庆麟带了几个团员赶到公安局，想把华克伟截下来，反遭公安局里的人抢白了一顿，“你们会比我们公安局更了解华克伟？瞎胡闹！”华克伟现在在美国，是个成功的商业人士。

勤工俭学

暑假没有结束，学校搬到闵行去“勤工俭学”，这又是董效俭的一大发明。一部分班级去汽轮机厂，我们去木材加工厂，校舍空置不上课，在厂里也不上课。在厂里，我们在场地用板车运木料，以便工人放到大锯床上去将原料锯成板条。

我们发觉有几个团员和积极分子，老是往厕所里奔，他们是在察看大便。班中为了贯彻勤俭节约的原则，规定我们一天只能吃一顿荤菜，这又是王仁淦想的点子。如果某同学的大便是深浅交杂的，或是金浅色的，说明他守规矩，一天只有一顿荤菜，或全是吃素菜。如果某人的大便全是深色的，证明他都是在吃荤，就将此事记录下来，成为未来批判的“证据”。

有位同学买了个小沙锅，里面是只小白蹄，受到批评，“小白蹄”从此成了他的外号。

在闵行几个月都不准回家，天冷了只是叫家里送衣服来，信中还要说明不准带吃的东西。

由于我是“大白旗”，同学们不敢同我接近，只是暗中打个招呼，他们认为我的一生完了。因而我有更多时间看教科书，做习题，高中三年级的上半年，我是自学完成的，而其他同学大多数都不自习，他们过一天算一天。

一次吃蕃薯，一位初中的同学，吃得太多而被送进广慈医院，那位同学是肠梗阻，必须立刻动手术，但由于当时该医院正在忙着抢救邱才康，手术贻误了，那位同学丧失了生命。

不久，我们就搬回学校。那失去了儿子的家长，去同教育局交涉，因为学校没有照顾好学生。之后，教育局批评了董效俭，命令把学校迁回上海，正常上课。

那个董效俭还恬不知耻地做报告，报告中一再说，他没有受到任何批评，还说我们学生受到了“革命意志的锻炼。”“我们这次得以回家，是用一位同学的生命换来的。”同学们说。

应征入伍

暑假前，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下乡劳动之前，征兵开始了，我们全班同学刚满十八岁，我差几个月，但同我一样十二月份出生的，都报了名，我当然不能例外。按照常例，高中生不会被征入伍，何况我是独子。秋季征兵我们学校没有一个被招。

我们从闵行回上海，上了没几天课，就放寒假了，春节一过，就是我中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二月下旬，通知我去做体格检查，大约二星期后，我接到入伍通知。

由于学校刚迁回上海，经过大跃进，大炼钢铁，整个社会似乎很不安定。在这个时候，父母没有给我任何意见。一天在学校的走廊，我们的前任班主任，教政治的赵庆麟，见到我时对我说：“陈文立啊，你是独子，前几年又生过肺病，你如果有困难，组织会照顾的”。

这个赵庆麟，好久没有看见他了，拔完白旗，我们班里换了教俄文的陈碧园老师做班主任，到高三下学期，我们的班主任是化学老师郭时平。

我觉得很奇怪，平日赵庆麟视我如眼中钉，他曾多次对我说：“你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要看你今后的表现！”。怎么今天突然关心起我来了？我回答他：“服兵役是青年的义务，我自己会掌握的。”他接着说：“你要仔细考虑考虑，想想你的父母喔，有困难可以找我。”

他走了之后，正在一旁扫地的冯懋昆老师（他原先是历史老师兼教导主任，是足球好手，毕业于辅仁大学，被打成右派之后，在学校监督劳动，校方不准我们叫他们老师，但我们还是暗中叫。）见四周没有人，悄悄对我说：“你回答得好，我看你是应该去的，换个环境。”

他的话正中我下怀，他是知道我情况的，去年暑假时的拔白旗，我至今仍心有余悸。在闵行劳动时，有位同学对我说，我的一生完了，就好像被打成右派一样，永远翻不了身，除非有突发的灾难，好像火灾，如我能奋不顾身地去抢救，或许会有转机，而他们（指当局）还要调查，看这火是不是我放的。

部队到底怎样，我全然不知，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当过兵。严格的纪律，艰苦的生活，对我并不是挑战。我生活一向很有规律，以往下乡、下厂，有好些同学抱怨生活太苦，吃得差，而我却能适应。我所顾虑的，一是要离开一直在身边的父母，我不舍得。另外，我的英文不能再学了。那时我父亲的朋友，前面提过的前燕京大学教务长林嘉通先生，在家里开设了一个英文班，他的儿子，我的好朋友林风和他的妹妹，另外还有几个小朋友，每周两次，都在他家学英文，这是友谊性质的，不收费。当时我们正学到的 Essential English 第三册。此外，生活将有大改变，何况我是一个内向，不善辞令的人，到时如何应对？

我被打成白旗一事，父母一直不知道，我怕他们担心。那种铺天盖地的批判，无中生有的揭发，想来都觉得头晕目眩，想到这里，我决定要去换个环境。

这次是春季补征，我们一起去的不超过十人，除了我一个人来自市区学校，其他的都是郊区农民青年。我们问带队的部队在哪里？是什么兵种？他的回答是：“到了那边就知道了。”火车往北开。同大家一样，我以往很少坐火车，这次还是第一次出远门。而郊区农民，更谈不上远行，一年一度能到上海市区城隍庙吃个八宝饭，已是一极大的享受了。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往窗外看，我把靠窗的座位让给了别人。

那带队的军官，一一询问我们的情况，问到我说：“上海学生都是很娇的，你得好好锻炼，部队很艰苦。”他又拿出纸牌象棋让我们玩，可惜这两样我都不精。俄式纸牌游戏“杜洛克”，即大傻瓜，我根本不会，因为我祖父憎恶赌博，家中没有人爱打牌，何况我在学校大部分时间花在功课上，加上每天都收听美国之音和英国 BBC 的节目，因此我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这些玩意上。

我们到了济南要转车，到我第一次听到的潍坊下车，军用卡车早已在等待，我们连跳带爬，上了车，一路上尘土飞扬。三月初，不是很冷，我们穿了棉衣裤，车子开了相当长时间，才到达部队。同所有军营一样，大门上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字样。第二天，从各地来的新兵到齐，开了个欢迎大会，我才知道，我们是属于装甲部队的一个机械化团。

各地来的新兵不到一百人，四川、湖南、湖北的占了大多数，训练三个月之后，会分配到各中队(连)去。大家都想当坦克兵，制服漂亮，伙食待遇好。最差的是步兵、工兵、修理队，伙食

每个月只是 12 元 5 毛。由于我以往的经历，没有什么指望，只觉得好事轮不到我，过一天算一天，我想念我的父母，我的同学、朋友，还怀念每晚的新闻广播。我不敢将圣经带到部队，每天晚上的圣经阅读停止了，但每日的反省、祈祷，颂天主经和信经，还在继续。

新 兵

第一天长跑就大出洋相，才跑了不到十分钟，就头晕想呕吐，只得拖拖走走，新兵中我最差。一个星期后，体力增加了，主要是肺部换气适应了。新兵连连长说：“你们看，城市里的学生，特别是上海来的，就是差点劲。”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有如众矢之的，新兵们开始欺侮我了。有一次上床，我是睡在下铺，睡上铺的把他的鞋脱在我的鞋上，我将他的鞋移开放好，他就不高兴说：“上海人就是那么斤斤计较！”我只得忍气吞声。

伙食，有白馍、有米饭，这里的米比上海的标准米好多了，是新米，每人一碗菜，有荤有素，是大锅菜，这就是每月 12.50 元的基本伙食。每隔二、三天要改善伙食，即加菜，有炸鱼，有红烧猪肉，我觉得很不错。在家里，还吃不上那么多的肉类，但有好多人抱怨，说淡而无味，有的说他们没有辣的就吃不下饭。

除了体能训练，步操，每天要学习《内务条令》，应该说那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厚厚的一本，有好多要背诵，要考试，吓得那些农村来的和文化程度不高的不知如何是好，结果什么都不考。我倒是背出了所有要求背的。至于步操，在学校体育课必须学会，加上五八年大办民兵，每天操二小时，对我没有问题。而有些未训练过的新兵，要纠正古怪的动作，花了不少时间。

有天，团长来视察新兵，前呼后拥的。他胖胖的，讲话嘻嘻哈哈，普通话带有很重的外地口音。他走到我跟前，盯着我看了一会，用不纯正的广东话问：“你广东人呀？”“系呀！你点知？”（是呀，你怎么会知道？）“你这个样话你唔系广东人我都唔信”（你这个样子，你说你不是广东人我都不会信。）他笑着说。这时有另外两个广东新兵过来，用广东话说他们也是广东人，他们的话我不太听得懂，团长用普通话讲：“你们不是真的，广东话讲得不好！哈哈，开玩笑的，他讲的是正宗广州话，你们的和我一样，乡下话。”从此，人们开始叫我“小广”。

连长向团长介绍说我是从学校来的，有点“娇气”，团长问我：“现在怎样了？”我说：“报告团长，刚来时缺乏锻炼，体能较差，现在没有问题了。”“是嘛！”团长说：“部队就是锻炼人的地方，你带兵要有点耐心喔！”他对那连长说。很明显团长对我印象不错，他在偏袒我。自此之后，我的地位变了，连长对我的态度，来了个 180 度转弯，夸奖多，不再钉着我批评。也

没有人欺侮我了，人们亲热地叫我小广，要我帮他们纠正步式，帮他们背内务条例，一时成了红人。不过，我同任何人都保持距离，我还没有找到有共同语言的伙伴。

有次，部队同空军比赛足球，左卫回家探亲，新兵连长见我踢得不错，吹嘘说新兵中有一好手，硬是把我推出去，其实我的球艺连中学校队都轮不上。我只得硬着头皮上，说也奇怪，或许是走运，我居然救出了三个险球，因而士气大振，以三比0胜了对方。以往空军一向强势，能踢平已经是皆大欢喜，这是第一次赢球。团长是球迷，跑来就说：“广东人就系叻！（广东人就是利害）”

新兵中我年龄最小，他们把我当小孩看待。打牌、讲下流笑话、讲女人，我都没有兴趣。倒不是我清高，那时我还没有完全发育，胡子还没有长出来。不过，很快学会了讲北方粗话，以往在上海，我讲话是没有粗口的。在家中讲广东话，当然不许有粗话。一到部队，北方粗话三字经他妈的，很快就上口了，一直说到来到香港之后。在警队里，不但学会了广东粗口，还讲英文粗话呢。

部队同学校一样，总有几个积极分子，平时把旁人的一言一行记在小本子上，一见到上级，就迫不及待地上前汇报。到周末“民主生活”，就抓住别人辫子不放，比如动作慢啦，把菜帮子丢掉啦，吃肉吐肉皮啦之类。由于我动作比别人快，生活检点，又不多讲话，他们说不出什么，但还是说我吃饭时是盘腿坐在地下，不是蹲的，“没有劳动人民本色”。为此，有个绍兴籍的新兵悄悄对我说：“要像佛一样敬伊拉，像贼一样防伊拉。”

为了那位绍兴籍新兵，我还同人打了一架。我们宿舍一共十人，是双叠床，我睡下铺，那绍兴人在我旁边，他的上铺是个从江苏高邮来的，我替他起了个外号叫咸蛋，因为咸蛋是高邮特产。那咸蛋就是成天向上级汇报的那种人，而且思想极下流。那天他坐在床上抽烟，烟灰不停地向下弹，而且双脚像钟摆一样不停地晃，那绍兴兵忍不住说：“唐生祥同志，你把烟灰都弹在我被子上，你的脚摇得我头晕。”那咸蛋却说：“你要你妈的卫生，你要你妈的清静，住你妈的医院去好了！”我忍不住说：“别人说你几句，又关得他亲娘什么事，你也太过份了。”“又关你妈的什么事？”他指着我说：“你再骂，我就揍你！”他说：“你他妈的敢？”我即刻顺手把他的一只脚用力往下一拖，他跌下床，头撞在床前的桌子上。我也不知道那里来的蛮力，抓住他的衣服，把他抛回床上。这下他可火大了，猛站起来想跳下来！不料鼻子正好撞到屋梁上，痛得他眼泪直冒。这时有人把连长叫来了，他见到连长，哭叫道“他打我！他打我！”我凭从小学得的经验，赶紧说：“报告连长，是我先动手，我错了，我向他道歉。”“到底发生什么事？”“我错了，我没有资格讲话。”接着那绍兴人一五一十地告诉连长。连长说：“好啊，一个会打，一

个会骂。”他指着我说：“小小年纪，火气这么大，这么野蛮！”又指着咸蛋说：“你的嘴也是够臭的了，开口就骂人，真不像话！”接着说：“本来你们两人都禁闭，这次初犯，我放你们一马！”熄灯号响了，他说：“明天还有很多科目，熄灯睡觉。”当他要走时，咸蛋跳下床，递过一张纸说：“报告连长！检举揭发！”连长接过纸，随手撕了说：“无理取闹！”

分 配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剩下没几天了，那些积极分子可忙得不得了，天天往上级那里跑，谈思想，汇报周围情况。各中队的干部也常来看看，我发觉有个坦克队的军官，长得同我像极了。他也注意到我，互相点头打招呼，但没有说话。出乎我意料之外，我被分配到坦克一中队。当坦克兵的一共只有三人，其他两个的父亲都是部队的师级干部，当坦克兵是理所当然的。那些积极分子白忙了一阵，咸蛋分到工兵，绍兴人分到摩托侦察队，算是不错了。

一中队是个加强中队，有“英雄坦克连”的称号，是部队中最精锐的。有人告诉我，连长是出了名严格的，火气很大。“小心挨揍！”他说。到连部报到，见到了那出了名的连长，原来就是那个同我长得像的军官。我仔细看他，年龄大约有三十左右。他姓郭是浙江黄岩人，“你一定听到别人说我的坏话了，我是很凶的喔！你要小心！”我觉得他是在哄小孩一样哄我，说实在的，我对他印象很不错，觉得他开朗，直爽。

从司务长那里领到新军装，2号的正合身，皮靴领大了一号，但我还是觉得太短，几乎差了一寸半多些才到到膝盖下部。我第一次穿紧身的马裤和高筒马靴，对镜子一照，果然威武剽悍。连长见到我说：“像个坦克兵了。”接着他教我打磨皮靴，花了我休息天的整个下午，那是用绒布蘸了多量的鞋油，慢慢地旋转用力磨，从头一直磨到整个靴筒，然后用软布轻轻一拖，就光得像漆皮一样。

练 兵

练兵是紧张的，连长对我抓得很紧，他似乎特别关心我，就像教小学生写字，把住手来教。他要我当驾驶员，说如果学不会，就只能当二炮手，即装填手，不过先得练射击。当时使用新型的56型，亦即苏联AK47。射击并不难，关键在于如何掌握扳机，从扣扳机到触发碰针，有段空隙，在射击前先越过空隙，一经瞄准，轻轻一扣，一定命中。如果只简单地扣，枪口一定移动、脱靶。我以往收听短波，度盘微调，早已练好了手感，在射击时正好用上，以5分成绩通过了射

击考核。我把所有空余时间，都花在练习上，短期内不但学会了在机枪上打点发，甚至能在冲锋枪快机上打点。练习射击要以“假想敌”为目标，当时鼓吹假想敌是蒋介石，是美帝。而我心中，却是什麼都没有，一个靶子而已。

学习驾驶也不困难，主要是动作要快，操纵杆比较紧，当然不像老兵吓唬人说拉一下要 80 公斤的力量。考核得过五关，我只记得是过深沟、过高墙、一二换挡、高速冲坡，我也是以 5 分成绩通过。连长对我很满意，他见我学得快、练得勤，说：“你这小鬼是天生的军人，什么东西都一学就会。”不久，我以 5 分成绩得到全能乘员的称号。

中队长

连长同我越走越近，别人认为我是在奉承他，其实是他主动接近我，可能这同我们长得像很有关系。我怎么会分配到坦克中队，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同团长是同乡，又踢球，他对我有特别的印象，选中了我。二是我同连长长得像，他一见到我，就同我打招呼，我被他挑中。

一次连长谈到他的家庭，原籍福建，祖上到浙江做官而落籍黄岩。他父亲以前在乡间办学校，办慈善。我打趣地说：“那他是乡绅喽！”他用粗话骂了我一句，又说他父亲早年肺病死了，那时他才十岁左右，母亲就到杭州亲戚开的工厂做工。他在杭州念完高中，原先想往之江大学深造，但解放了，开厂的老板没有多余的钱供他上大学，只好参加志愿军去“碰碰运气”，结果“混到现在，也算不错”。我想，当然不错啦，三十岁就拿 180 元薪金，我父亲留学回来，五十开外，每月只是 103 元呢。

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的普通话讲得不错，比通常上海人好，哪里学的？不过，听起来软绵绵的，好像美国电台。”我马上会意到他一定是偷偷地听美国之音，我即刻说：“去你妈的美国电台，你的普通话才怪呢，像蒋介石的。”他非但不生气，反而说：“浙江官话嘛，我们杭州音重些，比他(指蒋)好听。”事实上，他的确是收听短波的，有次保养坦克，他独自哼小调，居然是自由中国之声的流行音乐节目‘台湾之音’的开始曲由谭世英小姐唱的‘我要为您歌唱’的曲调，当时我也为之一震，他发觉了，问我听过那首歌吗，我当然说没有，他就解释说是一首朝鲜歌；这样双方都互不拆穿对方。

他在杭州念高中，念过英文，喜欢看外国电影，尤其是西欧意大利、法国的。那时苏联电影已经不像 50 年代早期那些“革命”的教条电影，而大多是根据俄国文学家果戈尔等改编的，他同我一样喜欢看。在潍坊，外国电影不像上海那么抢手，看的人不多，从不满座。倒是香港电影

热门，很受欢迎，队里的兵也各自偷偷地去看，但我们没有兴趣。他也仔细观察我，说我虽然满口脏话，但看来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吃东西循规蹈矩，生活有规律，准时。他说：“看来你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说不定还留过洋。”我不否认，只说我上代听说很丰裕，但经过日本侵略战乱，什么都没了，目前家中经济拮据。这一点他同意，他见我很节约，仅买些必须用的东西。

讲到节约，有人说我“财迷”，因为我不抽烟，从不上馆子。说真的，潍坊没有什么好吃的，部队伙食已经够好了。一次有位战士的父亲让拖拉机给压死了，家中很困难，我把存在银行里的六十多元全部给了他，人们才不再说我“财迷”。为此，我还得到表扬，说是“发扬阶级友爱”，其实这只是人类的同情心。

连长也是属于“乖仔”一类的人。当时的 180 多元薪金算是高薪，他从不乱花。除了请我看电影之外，他把大部分薪金寄回去给他母亲。他有一个弟弟，本来他想供他念大学，但成绩不好，去当艺徒了。他说：“如果你是我的弟弟，该有多好。”我说：“如果你有这弟弟，就倒霉了。”我讲的是真心话，当然他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始终同他保持距离，因为他是党员。而他倒不防我，在我面前发牢骚，我怕他越讲越远，对大家不利，说：“你不怕我在争取入党时把你检举立功？”他说：“检举立功？你永远学不会，你是军人，不是兵痞，偷鸡摸狗的事你做不来。何况我讲了，你听了，要死，死在一块。”

我在他的指挥车里当驾驶员，只三个月就升了中士，人们说这是升三级，按他的计划，到我当满三年兵时，就可以升我当少尉车长。我们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上级同部下的关系，他在生活上处处照顾我，私下叫我“小弟”，也要我叫他“大哥”。说实在的他对待我，比我自己的姐姐好多了，或许是我姐姐从小惯坏了。

驾 驶 员

我们的坦克，是最新运到的 59 型，我们是第一批得到的，仿苏 T54/55，装备 100MM 线膛炮，人工装填，可带 36 枚炮弹，配 12.7MM 高射机枪，有两挺 56 型轻机枪，乘员四人，分别是车长，炮长、驾驶员同二炮手。以往 54 型多了个机电员，新型的取消了，除了二炮手佩带 56 型折叠式冲锋枪外，其他乘员佩带手枪。坦克使用 12 缸柴油引擎，马力 700 多，最高时速约 50KM/HR，34 吨。

有几次拉练，即长途行车，坦克里面的温度高达 50 多，我是那种属于“蒸笼头”的，头上先冒汗，还得戴上皮帽，汗珠不停地往下淌，连工作服都湿透了，而且又有狐臭，为此我又多了

个外号一狐狸，人们叫我小狐。不过我不出脚汗，行车一天下来，脱下长靴，袜子还是干的，他们说我的汗都在上身出光了。而炮长同二炮手就不同了，他们有脚癣，休息时就忍不住脱下靴子，奇臭难闻，连他们自己也捂住鼻子，而且靴子可以倒出汗水。连长打趣说“海菜梗(浙江霉臭了的苋菜梗)”煮烂洋葱一指我的狐臭。

也不知是谁，就在连队黑板报边上写上一行“新到西洋小狐狸，四毛四分一斤”。(当时猪肉是八毛八分一斤)

我们的连指导员姓冯，甘肃天水人，是我见到指导员中最老实的，讲话结巴时，会不好意思脸红起来，他讲话从不超过十分钟。连里的事，连长说了算，当然连长每次都问他，他总说一个“行”字。他的年龄比连长大，连长向我介绍说他是骑兵部队调过来的，曾在新疆打过仗，清剿分裂叛匪。他说当年蒋介石花了十几年时间，都奈何他们不得，而共产党花了不到一年时间，就把他们消灭了。这时突然有了个想法要讨他欢心，这样一来可平安无事，我说：“骑兵用马刀打仗，一定很带劲，”这下他可高兴了说：“可不是，一刀一个脑袋，像切萝卜一样。”这时连长讲话了：“小鬼，你一定很羡慕他，告诉你，打仗可不是玩的，敌人也是一刀一个脑袋，劈到你，你就完了。”当时我心中骂了句，朝他看了看。指导员解开他的上衣，露出他肩上的刀疤，说：“还好砍在锁骨上，斜一点，我的脑袋就没了。”连长说：“你这么凶看着我干什么，想杀了我？”我忙说没有，他笑着说：“你当然不会，我们无冤无仇，但你一定骂了句‘我揍你！’有没有？”我想他也猜得真准，笑了。这时指导员说：“小鬼，他带兵这么多年，你眼珠一转，他就知道你想些什么，往后你得好好向他学习。”可见他们俩相处得很有默契，不像其他地方，连长同指导之间勾心斗角，面和心不和。

部队生活

在 58 年前部队每周都举办舞会，我在的时候，已经不是每周，但也举行过几次，连长拉我去过两次。大家都穿便服，我的便服只是两套运动衫裤，一件黑毛衣。舞会，当然不能穿运动装。因此，我只是穿上黑毛衣，里面还是军用衬衫。我没有皮鞋，所以仍旧穿马裤和大马靴，我只是去看看，我不会跳舞，而且也不想学，就推说：“穿了马靴咋跳？”

舞会的音乐是用唱片放的，以东德、捷克、匈牙利的为多，苏联的也有，再加上中国的民乐如步步高之类。女的大多数是文工团、医院护士、军官的女朋友，或年轻的太太。连长新交的女朋友，是他在舞会上介绍我认识的，杭州人，名字我忘记了，浙大机械系毕业，在青岛一家机械

厂当技术员。初时我说是他弟弟，她当是真的，说怎么这么巧两兄弟在同一连队，后来才知我们只是相像而已。

每周末大家三五成群地凑些钱去买喝酒，大半是白干大糍一类，喝多了，有的哭，有的笑，有的大唱大闹，丑态百出。不会喝酒的，就逃去睡了。我平时喝半玻璃杯，有点头晕就停止了。一次人们说我面不改容，硬要我喝下去，喝光一杯再加了点。我觉得浑身发冷，他们说我脸色苍白，我又想吐，才放我走。当时我神志还清楚，急回宿舍，呕吐大作，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方才睡觉，第二天有些不明白的人还说我是装的。

可能是部队生活单调，引起个别人心理变态，有个外号叫乌克兰的，这人超龄了，还是个上士装填手。他是属于只动嘴，技术不上进，平时爱批评别人，打小报告的那种人。吃东西又不节制，不爱运动，导致肥肉满身，当时学校动物学课本中，说苏联乌克兰大白猪是全世界最肥大的，因而他得此外号。这个人思想下流，鸡奸被人逮住关禁闭，据说不止一次。有个人告诉我，他有时抓住对方的缺点，强迫别人同他搞下流动作，他还说：“我看乌克兰爱上你了，小心被他强奸了。”我当时说：“你以为我是一个胖大姐吗？”令到大家哈哈大笑。

一过了十月下旬就开始冷了，我们的伙食每况愈下，但部队生活同往常一样，抓紧冬季练兵。开始下雪了，十二月中旬，在连长安排下，我递了入党申请书，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准备在三月份我当满一年兵时，吸收我入党，同时升我为上士。

退 役

元旦过了没几天，通知做体检，结果说我身体不及格，不宜当坦克兵，应该退伍。连长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去问团长，团长说他到师部问了，“也问不出什么名堂”。

正逢周末，我把家庭的情况大概地告诉了连长，他听了连连叹息说：“讲成份，讲出身是多么封建，多么不合理。”我说：“我曾跟你说过，有我这弟弟，你就倒霉了，你的前途完了。”这时他竟流下了眼泪，拍拍我的背，说我真会替他着想。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赞成如果我有机会，应当到国外去发展，我觉得他真的是当我弟弟一样关心我。

临行前一天晚上，我们又长谈，都知道这一别，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我说我是信天主的，人生只是旅途，天堂才是永恒的。他表示他并不是唯物主义者，只要是真的，什么都信。他最不相信“人定胜天”这句话，“人类有什么能耐？最多把地球毁了，毁了之后，地球照样转。”他是善良的。

他送我上开往上海的火车，挥泪而别。初时我们每个月一封信。他结婚后，生了个女孩，后来调到师部当教官。通信越来越稀，我大学毕业工作之后，65、66年，每年一封。最后一次通信是67年初，之后中断了。我至今还怀念他。

回家路上

回上海的火车很拥挤，好多人没有座位，我上车后，就有一中年妇女把座位让给我说：“解放军同志请坐！”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哪有年轻力壮的男人要妇女让座的道理？但我明白，当时军人在人们心目中高人一等。我说：“您坐着，我年轻，站着没问题。”有个人开腔了：“你们看解放军同志风格就是高。”我当时真想过去对他说：“请告诉我你的工作单位地址，好让我写信去表扬你乘车不忘宣传党的政策的好作风！”但我还是克制自己不要惹事生非。火车向南开，我见到一个奇怪的现象，铁路两旁的树干是白色的，同我去济南时见到的不一样。仔细看，树皮给剥光了，我心中纳闷，到底怎么回事？直到后来才知道当时已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树皮早被人们剥来吃了。

连长有心，为我包了好几个包子，给我路上吃，还有几个煮鸡蛋。他告诉我火车餐很贵，而且不好，自己带着点。路上似乎没有人去餐车买饭。这时我有点饿了，当我拿出一个包子时，只见对面座位上的两个小男孩直盯着那包子，我下意识地感到他们一定饿得慌，过去给他们一人一个，他们父母忙说谢谢，也不推辞，两个包子，他们三下五除二地吃光了，我再给他们一人一个。当他们吃完之后，脸色顿时有了生气，眼神也正常了。又有人来问我要吃的，我把带的全部分光，饿着肚子回到上海。

父母都来接车，他们仍同以往一样，没有什么改变。母亲说我长高了，父亲说我：“靓仔左”（长帅了）。当时我正饿得慌，告诉他们我已经两天一夜没吃了，带的东西全分光，也不见火车上有餐可买。“你还想在火车上买东西吃？”母亲说：“难道你一点也不知道现在的情形？”我问到底怎么回事，我的确一无所知。他们告诉我，自从我一走，市场就越来越紧张，东西越来越少。“现在什么都要排队，你根本不要指望能在饭店里吃到东西。”“什么都没有了。”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部队伙食每况愈下了。

回到家里，他们特别为我开了罐头，边吃晚饭，边问我部队吃些什么。我告诉他们，我们伙食费每月48元，一个大专毕业的工资，每顿四至六个菜，有米饭、白面馍，肉包子和汤。牛奶放在食堂桌上的桶里自己去盛，只是最近两三个月越来越差，但吃得饱。“你回来要吃苦了。”

母亲说。我还告诉他们，连长每次还特别凉好了牛奶，替我倒好凉水。“他为什么待你这样好？是不是要引你讲真心话？你有没有说什么？”他们的怀疑是正常的。当时，不要说朋友，连兄弟、夫妻、父子之间，都互相猜忌。为了讨好当局，出卖对方，这种事层出不穷。直到他们看我们通信过数年，才说：“他倒是个真性情的人。”

考大学

想要升学，就得去高等教育局报到。想要就业，就到劳动局去。我决定升学，高教局说大学已是下半年，要我参加下一届高考，把我踢到教育局，教育局要我回母校，我当然不干，难道又要背上大白旗的黑锅？

学校搬家了，原来延安中路的校址，被解放军征用，建了招待所。学校搬到了南京路成都路交界的地方，一部分在原来新成分局，另一部分在路口原来的人民银行，即意大利领事馆对面。

那天我穿上全套坦克兵制服，先往新成分局的部分。经过物理实验室，见到戴天老师，现在没有顾忌了，我大声叫他戴老师。一时，周围的学生都用异样的目光看我。我把戴老师拉进实验室，他以为我是探亲回来，我告诉他真相，问他近况。他说有好几个右派老师摘帽了，如冯懋昆老师。而他有严重肺病，做不动，所以没有被摘帽。我只得说耐心点，以保重身体为要。他告诉我校部在哪栋屋子。在我念到大学二年级时，听到戴老师去世的消息，想不到这一次，竟是永诀。

到了校部，经过教导处，见到张孝治老师，一年不见，头发已花白。他欢迎我回母校，说他会同教育局联系让我插入高三下学期，正好补上去年的。“当然你也可以在家里自习，准备高考。”我说要考虑一下再说。走出教导处见到冯老师，他笑着说：“你探亲回来啦，长高了，晒黑了，看你多威武。”正说着，教音乐的姚丽芳过来，她不认得我，对我说：“解放军同志，同你讲话的是个右派分子。”姚丽芳是共产党员，患严重肺病。七十年代末期，各单位都为在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平反，时代中学也不例外。当时体育老师吴厚仁，还没有平反，绝大多数教职员都提出要为吴老师平反，只有姚丽芳反对。她说：“免得现在平反了，不久又再将他打倒，不必了吧。”真可谓食古不化。我当时听了她的话就有火，把脸色一沉，“他身上没挂牌子，脸上没刺青，俺咋知道什么右派不右派的？”我的话把她吓跑了。“真他妈的多管闲事。”我骂了句。冯老师脸呈尴尬之色，我忙说：“不好意思，在部队脏话讲惯了，不是说你摘了帽吗？”“摘不摘一个样，工资减了，除了劳动，还得上课。”他告诉我，如果在高教局有认识的人，可以托一下，反正复员军人是金字招牌，说不定可以插入大学。当时我还想不出有认识的人，

然而十分感激他出的点子，后来居然用上了。接着，又见到胡志芳老师，手里拿了本英文北京周报 Peking Review。我上去同他打招呼，问他现在教英文了，还教不教动物学？他对我很冷淡，他是我初中时的老师，大概不认得我了，也可能是那套军服他见了害怕。

我回忆起教语文的章奇雄老师，有一次我们学到《晏子将使楚》，章老师说，这是段人们都熟悉的史实，以往的书评，只是夸奖晏婴的善辩口才，为他祖国争得荣誉，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楚王呢？楚王最后说：“寡人自取病矣！他当场当众认错，表现了不凡的政治家风度，也可以看到当时国与国之间，还能和睦相处。如果换了秦始皇，那他一定恼羞成怒，大喊把他杀了，然后发兵去踏平齐国。”章老师独到的见解，我们同学也都同意。当时正在反右，章老师能这样解说，我佩服他的胆量。他这番话，使我对中国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也就是说，孔子不但是位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周游列国，劝说各国君主施仁政，要求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处，是一位和平使者。可惜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焚书坑儒，毁灭了除秦以外的文字和文化，使这块地上的人民，遭受了二千多年残酷的封建统治，一直到如今。

回到家里，正好我伯母的妹妹来我家，说起她二姐夫蔡宾牟先生，他是华东师范大学数学教授，而且是教育局编写数学书的，何不去问问。

次日，我同父亲走访了蔡家，我们原来相识，只是平时没有来往而已。我记得小学里一本算术习题集是由蔡先生编的，蔡先生答应替我去问。第二天，消息来了，说有几个归国华侨，参加特别高考，插入大学一年级下学期，要我马上去高教局找某室的李同志。我带齐证件，马上前往，找到李同志，说明来由。他问我怎么会知道的，我直说蔡先生介绍的。他说：“老蔡，老朋友了，后天考试，你行不行？”我说：“行！”

回到家里，我就把高三下学期的书翻了一遍，很多内容，不知看哪些好，无意中选中了代数的高次方程，看懂了，做了几题习题，再看了几段有机化学。

考场设在高教局里，他们腾出一间办公室作考场，总共七个人，除了我穿军服外，其他都是衣着新潮的归国华侨。我想，我要出去都来不及，你们还要回来，真莫名其妙。

考试分上、下午进行。说也巧，考高三下学期的课业，正是我抽来学的，其他都学过，幸好没有忘记，我都是第一个交卷。考数学交卷时，我注意到另一考生，正在做第二道题目。考外文时，考官问我在校是学英文还是俄文，我说俄文。考完俄文，时间只过了四分之一，我问监考老师可否给我英文考卷看看，他给了我，我也做了。交卷时，他告诉我外文不记分，“你白做了！”我说那也无所谓，那时其他考生还没有做完。

直到过了春节，学校都开学上课了，通知还没有收到。父亲说：“希望冻过水。”去问蔡先生，他说没有那么快，像这种情形，考试只是形式而已。

姐姐生了个男孩，叫邦彦，他的生日好记，是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一星期后，我收到通知，被同济大学建筑工程分校录取，分到机电系。

初入大学

学校已经上课，我到系主任处报到。他问我是不是在考前问过老同学他们大学考些什么，我说从部队回到上海天天在外奔走，还没有时间去找老同学。他说我的成绩很不错，并将我的考分告诉我，现在忘了，总之不是三百六十几就是四百六十几，算是很高的。

一到班级，团支部书记就说“生力军来了。”他是调干生，即以往在其他单位工作调来念大学的。问我是不是团员，我说只差两个月就入党了。问我是怎样争取的，我说：“苦练杀敌本领呗。”他告诉我学校不像部队，要从入团开始。又说学校情况“非常复杂”，要我注意周围情况，及时向组织汇报。我想，难道要我拿了小本子去看别人的大便？我说：“我脱了好多课，上学期的还没有补上，等我在功课跟上之后再说。”团支部书记是苏北人，同学们早已替他起了绰号，叫他拿破仑。

其实一年级上半年倒是没有什么课脱节，数学只教了解析几何，我在中学时已经自习了。其他如金属工艺学，在下学期都有重复的地方，我一点也没有困难。数学课代表同我谈得来，瘦小个子，大眼睛，他平时很节约，当时食物奇缺，他带了瓶肉皮辣酱，有的同学取笑他，说他拿一只筷子，只蘸一点，放在舌上，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大眼睛，眼珠子转三转，来欣赏辣酱的美味。当然这是夸张了点，他只是吃得省。同学还替他取了“肉皮辣酱”的绰号，他却处之泰然说：“有肉皮辣酱已经蛮好了。”这里学校的伙食，天天是烂糊面，那位金属工艺学的讲师说天天烂糊面，吃得他头昏脑胀，他名字中有个寿字，刻薄的同学叫他“寿头，”其实他一点也不傻。

还有一位姓施的同学，以前喜欢踢足球，那时为了节省体力，大家都不玩了。他患有肝炎，食量大，功课倒是不错，只是讲话的样子傻呼呼的，绰号叫“大海”。每逢月底，他粮票用光，钱也用光。而我的食量不大，粮票有多，因为我的定粮是由部队转过来的，每月 44 斤，而学生大多数 30 余斤。大海同我一个宿舍，一次我见他心神不定，就叫他先到宿舍去，我到食堂去买了半斤饭。当时食堂开过饭，没有菜了，我把饭带到宿舍给他，他高兴地说：“解放军叔叔你真好。”他一下把饭吃光，摸摸肚子说：“吃饱饭就是人生一大乐事也。”他年龄比我大，每逢

月底我总给他五斤粮票，他总是说笑道：“解放军叔叔做好事了。”他叫我别一次全给他，要一斤一斤地给，否则一下就吃完了。他是团员，在中学是团支部书记，但再三对我表示他没有害过人。大学期间，他倒算很“上路”，从不去汇报别人。三年级时他帮了我一个大忙，下面会提到。毕业之后，他好像是分配到柴油机厂，我们一直没有再联络过。

我那时也馋得要命，回到家里就到处找东西吃，但冰箱里除了水也没有其他东西。姐姐从崇明好不容易买到了一些面丈鱼和黄鳝，我父亲约他的朋友黎乡斌和高镜朗两位医生来吃饭。大家当然谈吃的，高医生说前些时替柯庆施的儿子看病，病愈之后，柯请高医生去锦江饭店吃饭。席上，都是四九年之后在市面上绝了迹的精品。当时柯庆施说：“现在困难时期，我只能用些家常菜招待你！”饭后付帐，只六元，柯说：“哈哈，很便宜。”

我家以往的茶房阿潘，人很聪明，跟着厨师王玉春学会了很多菜式。后来我祖母介绍他到眼科医生张福星家当男佣。张福星后来是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眼科主任。一天阿潘来上海探访我们，带来了许多食品。他说，高级干部食品不受限制，在上海，凭证在锦江饭店地下室可以买到市上没有的各种食品。级别越高，可买到的东西就越多，而且价钱同市上不同，低到令人不能相信的程度。他带给我们的，就是凭购买证买到的。阿潘后来在总医院营养部当了个小头头，每次他来上海都会来我家住上一、二天。

拿破仑

一年级的暑假，我递了去香港的申请书，没有批准。自此之后，团支部书记再也不找我谈入团的事了。但他同我的关系，倒是一直不错。二年级时，系主任安排选我当理论力学课代表。理论力学理论性强，对于中学毕业，又已工作数年的调干生，或称内招生(他们都未经高考)来说，很困难。当时，我建议用部队的所谓“一帮一，一对红”的方式，即安排有困难的同学，搭配成绩好的同学一起学，同做习题。我的对象，就是团支部书记顾某，外号叫拿破仑，他是第一个来找我的。在一起学习中，他讲起自己身世，他说叫他拿破仑是冤枉的。他原籍无锡，父亲共产党，早年在苏北一带工作，他在苏北长大，因而一口苏北话。四十年代初期父亲只身去延安，从此失去音讯。抗战胜利，母亲带他到上海。母亲做工，他念初中，后进542厂当工人。直到五七年，组织找他，说他是烈属，他父亲在四二年牺牲了。我问：“你父亲究竟是日本鬼子杀害的呢，还是国民党？”他说：“我也问了呀，他们说不清楚，反正是为党牺牲了。”接着，他家有了津贴

和照顾，还发展他入党，现在又让他上大学。他说曾一再询问父亲的遗物，父亲的坟墓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不清楚。”

我听了，也觉得他可怜，到后来，我才知道 42 年，共产党特务头子康生大搞党内整风之时，杀戮了大批党内外人士，可能顾的父亲就是那时被杀的。而这个同学比我年长很多，又是党员，读过党史，不可能不怀疑的。

由于他只有初中程度，所以学习很困难，我几乎每一道习题做完了，都仔细解释给他听，他还是不得要领。年终，他不合格，原先他的数学和物理已经不合格，积到三科，要留级。作为调干生，这就得自动退学，他急得哭了起来。我对他说，还有补考一关，如果过了，没问题。但我也清楚，叫他过补考一关，比登天还难。

我去打听补考的情况，通知来了，理论力学补考，分别在两幢大楼，一是为大二各系不及格学生补考，另一是为毕业班原先积累了不及格的毕业生补考的，并说明不要走错了，否则对批卷带来麻烦。

我得此情报，决定为他冒险。考试那天，我不穿军服，叫他在大楼外面场地等，我径自往毕业班补考的大楼跑，一共五道题，我填了他的姓名、学生号码，三下五除二，第一个交卷，逃出考场。

这时，我发觉我做了件大傻事，我把五道题全做了，而且肯定是满分，这对一补考生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一说，拿破仑急了，说怎么办？我让他跟我到我的宿舍去，假期宿舍空空，我选了十五道习题，逐一教他做，并要他写下草稿，全部东西保存，十五道题要背熟。

开学了，系主任把顾叫去，说他补考很不错，他告诉系主任，假期我天天同他补习，说一次叫他做十五道习题，并要他牢记，结果其中五道同补考的相似。

系主任见到我，问我暑假过得怎样，我说很忙，天天帮顾温习，好让他过关，他笑着对我说，“你知道吗，这憨大(傻瓜)跑错了考场，成绩转了好几个弯才能到系里，他得了 100 分呢！”

“好险呀！”“拿破仑对我说，我们都知道，如果发觉了，两人都会被学校开除，他对我说：“你是我的救命大恩人。”

这年暑假，我申请去香港又没有批准，当时“自然灾害”，的确放走了不少人，方德华就是这时候走的。据说当时陈毅有个内部报告，说如果大学生想去看资本主义，让他们去，他们可以比较一下谁优越，可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却说上海的大学生原则上一个不放。

又遭审查

升到三年级，我是电工学课代表。一天，学校的人事科来人了，在班上说我们班有几个坏学生，捣乱学习环境，接着点了名，最后说“还有陈文立。”我想，我算得安分守己了，又有什么差错？

人事科把我叫去，这个人也不自己介绍自己的姓名和身份，我只注意到他的办公桌面上有一块大玻璃下压着一份《公安人员十大纪律》，他开始就先说系里民兵不用我负责了，说“不要以为你是复员军人就是在红色保险箱里，你怎么复员的你自己清楚！”然后大讲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很清楚这次不是为了补考的事，而是认为我同其他几位同学有瓜葛。到底他们做了什么，我完全不知，只知他们常一起去看电影，有时上馆子。我同他们去看过两次电影，看完他们要去吃东西，我说要先回家，没有跟他们去，无非就是这些。也不至于是捣乱学习环境。

这里我要向未曾在共产或独裁国生活过的读者介绍一下，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单位，都会有一个人事科或叫保卫科的，更小的单位如幼儿园，也有个党支部，纳粹德国有盖世太保、苏联叫克格勃、在中国就是公安……；都是在内监视控制老百姓，对外进行间谍活动的机构，当然如今中国更有五花八门的如国安乃至统战等等特务部门。

人事科隔天又把我叫去，又是不停地讲从宽从严，我听得不耐烦，就说：“我犯了什么，你们直说，让我知道，有的我不赖，搞错的我也可以作解释。”他们说我“态度嚣张！”旁边一个人说：“你知道什么是一七六？”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就问：“什么一七六，我不明白，”他大叫：“你们的组织，你还装蒜！”我记起了，我说：“那是同学讲笑话，一天他们打乒乓，说他球队叫一七六，意思一吃了就乐。我又不打乒乓，我只是经过乒乓室时听到的。”“你开始老实了，继续说下去！”“我就知道这些，别的没有了！”“你不老实，你们还一块去看电影，吃点心！”

“看电影倒是有过，但从来没有吃过东西！”

“电影是谁请客？”

“是我！”

“你哪里来的钱？”

“我每月十八元津贴，电影还算请得起，三轮电影，一角五分一张票。”

“你真的没有去吃点心？”

“没有。”

“为什么？”

“现在高级饭店很贵，我请不起，我也不愿意白吃！”

这次他们叫我先回去，要好好反省考虑再作交代。过了一星期，又把我叫去，劈头问“807”我又完全糊涂了，“什么807！”

“你是懂无线电的，还是电工课代表！”

“你们是指电子管807，那是功率四极束射管，原来用作发射机，也可以在扩音机上用的那种？”

“对了，对了，继续说下去。”

“我只知道全市电影院的扩音机，都是由807接成三极管，功率10W。”

“我们不是问你这个！”

“你们要知道什么？”

“你又装蒜了，有没有人问过你关于这种电子管？”

“有呀，你们刚才就问过。”

他大怒，用力将桌子一拍，由于拍得太重，把自己手拍痛了。

我说：“犯不着发那么大脾气嘛，桌子木头做，痛在你自己手里，真不值得”

这时他气得两眼直瞪，而旁边的科员在哈哈偷笑，我明白他们之间勾心斗角。

我说：“有什么你只管问，我又不是不肯说，把事情真相搞清楚。”

这里他才镇定下来：“我问你他们有没有问过你有关807？”

“有呀！徐同学有次问我807是怎样的电子管，我告诉他的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

“还有问些什么？”

“没有了”

“你不老实，他们有没有问807值多少钱？”

“有的。”

“你为什么不说？”

“这又无关紧要，我怎么记得？”

“这么重要的事你会不记得？你怎样说？”

“我说807根本不值钱，因为它失真大，只有小工厂单位作讲话扩音机用它。”

“那你要用什么？”

“我装了台扩音机是从无线电研究所材料科买的，特别便宜，而且是配了对的EL34，只五元。”

“我不问你这个，你有没有向他们买无线电零件？”

“他们怎么会有零件？他们不玩的！”

又过了一个星期，又被叫去，问我：“你同谁提了绰号？”

在学校我没有同别人提过绰号，我到学校时大家都已经有了！

“你不老实，你侮辱劳动人民，拿破仑是谁提的？”

“我不知道，反正在我到校之前别人就背地叫他，这一点你可以去问他本人。”

“那到底是谁提的？”

“我已经讲过在我来校之前别人已经提好了，我怎会知道？”

“那么寿头是谁提的？”

“这也是我到校之前别人早已提好，但我从来不叫戴讲师寿头的！”

我又被打发回去，这样前后经历了一个多月，人事科要到系里对我作调查时，团支部书记来问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一五一十告诉也，接着他们开了个支部会议，事后大海告诉我，顾说会同那几位同学根本就不在一块的，问大家有没有意见，但大家都不表态。大海要拉顾去人事科澄清事实，顾有所顾虑，说目前正在风头上，去了怕对支部带来不良影响。这时大海急了说“你不去我一个人去，你做事不讲原则，你的党性到那里去了！”这时，顾才勉强去同人事科说了，次日，人事科又把我叫去，问我：“你们看了《阿里巴巴四十大盗》后，到哪间饭店吃饭的？”“到现在我还根本没看过这电影！”“没有你的事了，你先回去。”之后，再也不找我了。

事后我才知那几个同学，偷了学校的一些东西去卖了，包括扩音机电子管，吃了几顿，当时大家饿得慌。但是，为什么把我拉进去，至今我不明白，这是在 62 年年底，正是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人总是要捕一点杀一点的。”之后，全国又在开始整人抓人杀人了，几个同学有的记过，有的警告，最可怜的是徐斌，被送劳动教养。他毕业于上海中学，聪敏过人，成绩优异，就是顽皮了些。他在帮助别人功课时，得罪了几个团员。

受过审查，虽然证明与事无关，但在共产党统治下，是没有清白二字的。人们认为“事出有因”，身上已经抹了黑，何况，大海告诉我，那人事科姓来的说：“陈文立想去香港？哼哼，他今生今世休想踏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半步！”

连我的电工课代表也被革职了，无官一身轻。同学之间，还是有讲有笑。一次顾某问我，“你真的是身体不好而提早复员的吗？”“你既然知道了，为啥来问我？”“是呀，班上数你身体最好，混身肌肉硬梆梆的，自然灾害对你一点也没有影响。手劲，有谁比得过你？”“那你还想问我什么？”“我只是告诉你，不必为过去的事担心。我已经知道系主任同政治辅导员对你印

象不错，那次人事科是胡闹。毕业分配，权在系里，人事科管不了，我替你说了好多好话呢。”我想，算了吧，说好话？咋个说法？不过，我还是感谢他给我通了消息。

系里比我高一班的几个同学，同我小学同学冯国乔认识，他们常来我家听音乐。倒是经常来往的一位同学，在大一时数学不及格，我又为他做了补考，他才得以毕业，到如今我们还有通信来往。现在想来，我甘愿为别人冒这么大的险，的确是够傻了，但我也不后悔。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电缆厂，算是不错了，拿破仑没有骗我。

新交朋友

61、62 年之间，中共实行了一种政策，号召海外的有钱人认购化肥，以支援中共农业建设，至于详细情形，我不清楚，但确有其事。在认购之时，可以提出条件，申请其子孙到香港。我认识的亲友中，就有用这方式到海外的，其中之一是我父亲友人王先生一家。王先生有颜料大王之称，他们是天主教徒，王先生的儿子因为是“公青”（公教青年），55 年 9 月 8 日被捕后，一直在安徽劳动教养。62 年时，全家，包括正在劳动教养的儿子，被批准前往香港。我的表姐妹们，因他们的祖父是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当时在海外通过关系，使他的孙儿们成行了。当然他还想申请他的长子，我的姨丈出国。或许中央开价太高，没有谈妥，后来文革了，此事搁置了下来。我的姨丈李德庆，原来是上海电力公司总工程师，兼总经理，有麻州理工学院电机硕士学位，忠于职守，中共接收上海市之后，他坚持留在上海，并将已经赴美的太太和子女接回上海。上海杨树浦电厂被炸后，不分白天黑夜抢修电厂，受到解放日报赞扬。可惜到 55 年肃反时竟被诬为美蒋特务，而遭拘留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家中被澈底搜查。经过数个月，释放后调往西安电力设计院，仍任副总工程师职，直到 63 至 64 年间，调回上海电力设计院。文革中又再受审查，当时发现鼻癌早期，但得不到及时医治，不久逝世。

再回来说中共接受外汇的行业，是由统战部通过“工商联”、“侨联”等组织进行。其中红色资本家如简日林，郭琳爽，吴宗一，刘念义，刘念智，洪祖尧等来往香港—上海之间做牵线工作，我家没有巨额款项在海外，没有受惠。

当然款项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钱，以致有人说如果在国内有外币者，也可以用“奉献”方式，取得通行证。

我姐夫的同学吴继玠是外科医生，因患肝炎在家休养，他的未婚妻于 62 年到香港，吴医生几经申请未被批准。

吴医生交游甚广，为人圆滑，结识了一个自称为“有点路数”的人，说如能凑满数千美元，可以让一批人成行。当时我姐姐、姐夫听了心动，但他们没有外币。吴说，那人有办法。于是，我姐姐给他五百元人民币。事后才知道上了那人的当，那是个公安局便衣警探，当局不但没收了吴医生家中以往保存的数千美元，也没收了人民币，并将吴拘留审查了三个月。

当时我已经工作了一年，吴继玠出狱之后，正近阴历年底，当时他到我家中，答应过了春节一定偿还我姐姐、姐夫的金额。记得姐姐当时又哭又闹，逼他立即偿还，吴只好答应。告辞之时，我姐姐还在骂他。当时我对姐姐很气愤，极同情吴的处境。我送他出去，在花园的走道上，我向他表示我正好有五百多元存款，次日可以如数给他，好让他还给我姐姐。当时吴医生正是焦头烂额之际，我的帮助他自然接受，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

那是一个星期一，中午休息时我溜出去到银行取了五百元，绘图室里有中式长信封正好把钞票装好，下班时下着大雨，照吴医生告诉我的地址往他家去，那是在南京西路梅龙镇酒家的那条弄堂里的一所公寓，楼下是沿街店铺，上了楼梯找到号码就轻轻敲门，开门一见就知是继玠的母亲，我叫了声伯母，但只见她面有惧色地问“侬是啥人？”不知怎的我却问非所答地说“我寻玠玠。”当吴医生母亲正吓得发呆时继玠在里面大声说阿弟来了，让伊进来。这时他也走出来对他母亲说我是毛头(我姐夫的小名)的阿舅，复员的，绝对靠得住。这时我才会意到我的穿着，军装外穿灰黑的军用雨衣再加长统雨靴，确实象公安局里的人，于是我连忙道谦说对不起吓到他们了，“玠玠刚刚放出来我以为公安局又来寻他有啥事体，这叫心有余悸。”他母亲说。谈了一会我告辞，他们还留我吃晚饭，我推辞后继玠送我出门时我把信封交给他。

不但如此，原先我姐夫的同学朋友，都爱同我交往，由于他们比我年长很多，大家都叫我“小阿弟”。

中学里的同学，大多数都去了海外。大学生同班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大三审查之时，他们对我落井下石，我们疏远了。大海同我最好，毕业后结婚成家，但住得远，没有来往了。剩下是比我高一班同学，他们经济条件很好，家中有定息收入，平时所谈的，都是如何享受，话不投机，但毕竟属于所谓酒肉朋友，当然同酒肉朋友也不尽相同，我们的聚会，不只谈生活，亦谈工作上碰到的问题，聚会大半在金文达家。同学之中，王智丕分配到轻工业设计院，他常有设计任务。而我的电缆厂是大厂，技术科人员多，设计任务轮不到我。

我入狱之后，金文达倒是常探望我父母。我姐夫的朋友，还有他的老师，同我特别投契，因此我们常在一起。吴继玠外号扁头，从他那里，认识了他的表兄姚琪，为人豪爽，原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被打成右派。一次，在批斗他的大会上，他突然大叫“报告！”

“你报告什么？”

“我要一把伞。”

“为什么？”

“你讲话时，唾沫像下雨一样。”

全场哄堂大笑，于是他被开除学籍，当时他在上海做临时工。

同我经常来往的还有刘永达，他是我姐夫的表兄，但在姐姐认识姐夫之前，我们已认识了。他的太太是姐姐的同学，也是姐姐钢琴老师的女儿。刘永达小名阿 B，虽不是广东人，但在香港出生，而得此小名。他习钢琴十多年，因而具有专业钢琴家的水平。考大学时，音乐学院同南京工学院同时录取他，他进南京工学院，专业是企业电气化，毕业后分配在南京附近的建筑行业。由于学非所用，他又患严重胃病，后来辞职回到上海休养。由于家中条件比较优裕，不愁经济来源，他母亲兄姊都在海外，他也想申请出去，但未得批准。

文革开始

四清运动开始了，我所在的电缆厂开始贴大字报，人人自危，不知道运动会怎样发展。我是新分配进去的，大家不熟悉。父亲的出版社，开始整人了，例如汪观清在 56 年时曾说过：“匈牙利人真结棍，把共产党吊起来。”这句话又给翻了出来，正在这当口，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上下班大多是骑自行车，从杨树浦军工路电缆厂到家骑上四十分钟。记得那天经延安东路，就有游行队伍，都是些学生，有的穿了军装，还系了武装带，一连两三天都如此。人民日报出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金文达来电话，说他家被抄了，这叫“破四旧”，家中的摆件如花瓶等，都被砸碎了，书籍、西服、皮鞋都是“四旧”，被烧掉，其他的被搬走。

人民日报社论，引用了毛泽东的话，说抄家的行动是对“吸血鬼、寄生虫”的一次声讨，他完全支持这一行动。如此一来，那些学生组织起来的红卫兵，更肆无忌惮地挨家逐户进去乱砸乱烧，他们尤其热衷于金银财宝。

我们家，也等着红卫兵来。当时只要听到敲锣打鼓，人们就提心吊胆。以至今天在美国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凡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一定会有人说：“抄家了，抄家了。”到如今，有时见到屋子有大块玻璃的，我就会想起如果红卫兵一来，那玻璃一定被砸碎。

过了数天，上海市党委出了十条通告，内中有不得抄家。全市平静了二、三天。接着，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被定为走资派，那十条通告，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产物，抄家行动重新展开。

抄 家

终于轮到我家了。那是傍晚时分，对面马路长新中学的红卫兵光临了。事前我父亲早就通知他的单位人民美术出版社，说家中有很多古书，如果单位需要，可以来搬。单位表示，我父亲是美术工作者，不属于“地、富、反、坏、右、资”分子，不是抄家对象，他们不管。不过，我父亲还是将我母亲的全部首饰，这些都不是好的了，包成一包交给单位，说这就是金银财宝了，单位收下。

这批红卫兵一到我家，就把我们全部人 - 父母亲、一个女佣、姐姐的两个小男孩和我，赶到二楼的浴室，说不准外出。那时姐姐在崇明医院工作，姐夫已调到山东枣庄工作，不在家。

全条新华路，大屋里只住一户人家的，只有大约不到七、八家，我们一家，同另外俞家邓家等。其他的，不是住了高干，就是几户人家合住的。因此我们当然首当其冲被抄家。

好多学生以前没有用过几次电话，现在有了电话，玩个不停。夜深了，我们都睡在浴室边上的书房地，门口有红卫兵守着，连上厕所，都由男女红卫兵监视。

第二天早上，他们不准父亲和我去上班，我们只得打电话去请假。上午，我父亲的单位和电缆厂都来了人，父亲单位来的是连创室(连环画创作室)的头头，我们厂来的是总务科的人，我不认识他。他们都说我们不是抄家对象，不过他们表示“大力支持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行动”，并要他们“常常掌握党的政策”。那位总务科人员说：“他(指我)是好同志，是复员军人，你们可以请他帮助。”“他是狗崽子！我们不要他！”一个操北京话的叫喊，他是北京来的高干子弟，我父亲单位里的人对他们说：“这里很多书籍，陈俭已经献给国家，这是国家财产，你们要注意，不准损坏！”“这是四旧，要烧毁！”“这是国家财产，用作反面教材，现在我要你们保护它，直到古籍书店来运走。”“真他妈的混蛋，别理他！”那北京口音的叫道。旁边一个女的似乎是头头，说“既然是国家的，就守着吧。”

我家女佣的父亲是衙门里的师爷，家中有地，她丈夫原先是南京税务局做事的，共产党来了之后，改行在路边摆了个替人画像和写信的摊挡，我说他是多才多艺。由于伪造粮票，共产党要

抓他，他逃之夭夭。为此，这女佣是不允许迁户口的，当时公安局多次问我家，那女佣是否有同她丈夫联络，我们当然不知。

女佣名叫起文，在抄家之前我们告诉她，如果红卫兵来了，不必老实讲她自己，只说是绍兴乡下的农民就可以了。谁知当红卫兵凶恶地再三盘问，她说：“小土地出租，”一时成了地主婆，被戴上高帽子游街。问她是不是黑六类，她说：“是呀！我的心被你们吓落来了。”红卫兵还用武装带抽打她，她也硬气，不吭一声。

我收到一张“借条”，上面写道：“狗崽子，红卫兵勒令借你军装和自行车，速借！”我对他们说，我除了军装没有其他衣服了，留一套给我替换，他们答应了，其他的军用品他们全部拿走，我想我那条武装带不知要坑害多少人。

这次抄家一共历时九天九夜，红卫兵走后，我们出去看，倒并不担心失去什么，而是如何清理那些凌乱的东西。从四层阁楼的楼梯、走廊，一直到花园草地，全部是衣料、毛巾、被单、旧式衣服。由于亲戚们的箱子都放在阁楼，红卫兵们打开了箱子，就从楼梯往下倒，倒满了，他们就往走廊里拉，再拉到下一层。

我们的亲戚，买了那么多整箱的毛巾、被单，那些红卫兵说“这家人可以开医院”倒是一点也不错。有的说：“这家人家真奇怪，除了书画，一点值钱的东西也没有”。

不过，倒也不是没有值钱的，金文达的同事住在我家后面，他告诉金文达说我家很有钱，红卫兵带走了整个雪茄烟盒，里面全是金币。那是我三姑母家的。后来我们到了香港之后，她问起过，我们当初也不知道，只是听别人说而已。可惜姑母不相信我们，认为我家侵吞了，到如今我们还背了“侵吞”的黑锅。

我父亲急着要整理东西，我不同意，我认为只要把花园里的拖到屋里，东西由它堆着，说不定红卫兵来第二次、第三次。不出所料，隔二、三天，别的中学红卫兵来了，毛巾、被单他们都有用，搬的搬，拿的拿，那堆凌乱的东西渐渐少了。事后人们问：“你们到底被抄过几次？”我们也实在没法去数。

最令我父亲心痛的是那些他从欧洲带回来的瓷制艺术品，全部砸碎了。我是不懂的，父亲说都是出自有名陶瓷制作家的创作。我父亲也擅长泥塑，他创作的原型是歌剧里的人物，诸如茶花女、艾伊达、托斯卡及卡门等，人们一看便知是谁。特别是一套根据斯蒂芬福斯特的歌曲创作的人物，当初刘诗昆一看，便认出了题材。这些虽然是父亲空闲时的创作，但凝聚了他的心血和才华，这些都被红卫兵们放在地下踩碎。

这里顺便提一下，那九天九夜的抄家，女佣受了鞭打，由我做饭。我把家中的咸鱼，一些咸肉再加青菜，煮了一大锅饭，这一来，可以吃上几天，反正广东人和绍兴人都吃得惯。只是那些红卫兵看见了说：“他们吃的是什么鬼东西。”

红卫兵

学校早已停课，由于大部分工人参加造反派，忙着开会，停工了。复员军人成立了“红卫军”部，设在华山路郭棣活的屋子里。他们要我参加，我推说出身成份不好，不宜参加，做了当时所谓的“逍遥派”。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到厂里坐半天，再就是领工资，那是每月一次，其他时间，闷在家里。

我家楼下，被一批造反派红卫兵用来作司令部，这批学生不像抄家的那批干部子弟那样凶狠，很同情我们的遭遇。他们要我父亲帮着画宣传画，画完之后，他们说：“到底是大画家，比美术老师画得好多了。”他们又带来了破旧不堪的旧军装，要我替他们到警备区换新的，我就带他们一起去了，警备区明知不是我个人的，也都照样给换了，他们很高兴。

一次我从厂里回到家里，见到那班红卫兵的小头头躺在沙发上，大叫“狼狈”（这是他们受挫之后的常用词），他被人打得鼻青眼肿。一问，旁边的另一小头头对我说：“都是你。”“这又关我什么事？”

“昨天他借了你的军用高筒皮靴，今天一早就出去耀武扬威，被天山中学的红卫兵打了一顿，皮靴、军装都被抢走了，他只穿了汗衫，赤着脚逃回来。”

“还好没有借你的马裤，否则还要光屁股呢！”另一个红卫兵说。

“不要摊我招势了（出洋相的意思）。”那躺在沙发上的说，他对我说：“你放心，我会去再弄一双还给你。”我对他说算了，不必再去找麻烦，何况我还有双全新的，在第一次抄家就被“借”走了。这时，另一个红卫兵说“怪不得某某有一双新的，他说他的父亲以往是骑兵。我告诉他们，骑兵的皮靴同坦克兵的不同，骑兵的靴筒是软的，而坦克兵的是硬筒，看上去挺括。自从他们搬来之后，其他的红卫兵再也不来骚扰了，我们过了段太平日子。当然，家中以往堆积的被单、毛巾、毛毯，也被各处来的红卫兵“借用”的借用，搬走的搬走，家具、办公桌、上海人叫写字台，都搬走了。反正，我们只要清静，没有人打扰，就谢天谢地了。”

我家邻居李医生的屋子，经公私合营之后，成为第二医学院的宿舍，大多是广慈医院（后来改名瑞金医院）的医生或职工。住在汽车间里的是医院里的木匠一家，女儿名叫阿采，是红卫兵，

她在我家打电话给医院的负责人说：“你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要造你的反！我家是木匠，是工人阶级，住在汽车间里，那个做医生的反动学术权威，老右派，住在好房子里。”

“什么？你说要加租？”

“你们收租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不交租！”

“怎么，你们不给，我要砸烂你的狗头！”

阿采外出串联回到家中，发觉已经怀了孕，和她的母亲大吵大闹，最后，她母亲问，

“那肚子里的到底是谁的？”

“这么多人，我哪里搞得清楚是谁的？”她回答。母亲问：

“这些人之中，谁条件最好？”

“小吊眼，他父亲修汽车的，工资最高。”

“那么就吃牢小吊眼！”

那些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比较精明的又投身“造反派”。另有一大批自认“出身高贵”，他们的对子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些人中的上辈大多数被整肃，他们组织起“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他们不敢去碰“造反派”，专挑那些已经被抄过家的“资产阶级”的住处去骚扰，所谓“毁灭性抄家”，即一进门见东西就砸，见人就打，有要的就抢走，连水瓶，酱油瓶都砸烂。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毛泽东接见她时，要她改名“要武”，她到处打砸抢，先后被她殴打至死的，至少有七个人。听说此人现在美国，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刘永达家附近有一唐姓人家，是天主教徒，那帮红卫兵将碗打碎了，要唐氏两姐妹跪在上面，直到放弃信仰为止，两姐妹足足跪了六小时以上，待那帮暴徒走了之后，好心的邻居才让两姐妹回到屋里。

二楼的书房被红卫兵作休息室用，他们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一张双人床，放在里面。那个叫“小燕子”的头头，每次都带女朋友进去，门外有个小学生看着，有时他们在里面时间长了，他们的同伴在花园里大叫“小燕子，你们快点！我们最多只等你们十分钟，否则我们先走了！”

议论文革

工厂里成立了纠察队，都是些工人当中的党员、积极分子，当然人事保卫科里的人做头头。他们抄了几个资方的家，技术科副总工程师的家也抄了，连铸造车间里的一位八级铸工师傅，也

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他同另外两个老师傅，被称为“三家村”。有另外几个年轻些的工人也被纠察队整了。

当时有几处大字报集中的地方，有的在各大院校的校园里，有的在马路上。我们就近的，在华山医院乌鲁木齐路一带，大字报报导了文革的各种消息，当时被称为“小道新闻”。

从小道新闻中，得知有批被整的工人，要到北京去告状，停留在安亭车站，他们截停了火车。当时上海市委下令要就地枪决几个工人。突然中央文革小组由张春桥出面，支持工人的造反行动，于是，上海工人造反派总司令部成立，简称“工总司”。而其他各行各业，纷纷成立了相应的造反派，院校红卫兵也出现了造反派，而以往的工人纠察队、红卫兵组织，一时成了保守派，又被称为“老保”，他们纷纷解散，大部分人摇身一变，又加入了造反组织。

当时也有人说发生在安亭车站的“安亭事件”，是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等一手策划的，旨在打击上海市委高层干部。

由于我会修理收音机，所有亲戚朋友的收音机坏了，都要我修理。有的嫌灵敏度不够，我替他们加多一级中频放大。以前被公安局征收的那架通讯接收机的说明书和维护手册还在，详尽地叙述了维修项目，我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因此经我修理过的收音机，对收听短波特别灵敏。后来我被捕判刑，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每逢星期三，我的厂休，同时也是我表兄唐千根的厂休，以往我们一家都去探望姨母，她身体不太好，很少外出。文革后，她家也被抄了，当然没有我家那么严重。千根表哥很会讲话，对有些事物有独到的见解，因此我们都爱听他滔滔不绝地谈形势。我姐夫以前的朋友，是我的朋友了，也同千根表哥谈论。千根表哥有时也会来我家，认识了我们的邻居退休药剂师李国宁和他的老上司林秉聪外号“高佬林”。他以往任职科发药厂会计部，50年代中期退休在家，太太和小孩去了香港，他多次申请没有批准，高佬林常来我家，我替他修理过一架收音机。

隔离审查

1968年7月5日早上10时左右，有一帮人到我家，说是湖南街道的，要我去“谈谈”。我到那边，是湖南路派出所。我见高佬林也在，他们问我们是什么关系：

“一般朋友。”

“你们干些什么勾当？”

“没有，他说要同我介绍女朋友。”

“他有哪些朋友？”

“以往是李国宁，他们是同事，李国宁死了之后，我不知道了。他有时来我家，帮忙修理些门窗等东西。”

“他介绍些什么女朋友给你？”

“他的邻居，我没有兴趣交女朋友。”

“你同那女的有什么勾当？”

“我只见了一面，还没有正式谈过话，连名字我都忘了。”

“那个长脚平时做些什么？”

“我不清楚，他退休在家，有时上公园打太极拳。”

他们问话时，我特意把话讲得很响，好让高佬林知道。他很笨，一再对我做手势，示意不要讲听短波。我用眼色示意他不要做这些动作，他却不懂，似乎想同我讲话，故意装成自说自话，把发音搞得模糊不清，结果我一句也没有听懂。

下午我听到一个派出所的警员接电话，他说：“我们也并不清楚是什么，那是街道群众搞的，什么女朋友的…我看没有什么大问题…明天一早我们让他回去。”

我一听，就知道一定是我父母去问了我的单位，或通知了我住处的派出所，他们打电话来问了。这通电话，对我说来是好消息，那高佬林(即林秉聪)应当也听到，但我发觉他根本就没有注意，还在自顾自地叹气。

晚上八点多钟，街道的人带来了一批红卫兵，说我是“流氓阿飞”，把我汗衫脱了，用皮带抽打我的背，由于紧张，我一点也不觉得痛。红卫兵走了之后，他们让我在地上睡觉，我由于知道第二天事情可以结束，就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才觉得背上痛，而且汗衫粘在背上，那一定是晚上被他们打出血了，好不容易把汗衫脱下，当然又引起一阵剧痛。8 时许，还不见有人说放我们走，而且也不见高佬林，我发觉我被打完之后，就没有看见他。到十点左右，有人把我带到高邮路 5 号的一幢小屋子里，这是一座西班牙式平房，屋主一定是被“扫地出门了”。这里我见到高佬林，有人在问话，这时，我就觉得事情不妙了。高佬林在客厅的一角，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他们对我说，要对我隔离审查。

我估计一定是昨晚我挨打时高佬林吓坏了，以为打完我会打他，因此就坦白交代了些东西。到底他说什么，我完全不知，但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因为高佬林不是一个精明的人，不懂得轻重利弊，在对方的威逼利诱下，可能会失去控制。

他们问了高佬林一天的话。问话的人是个瘦高个子年轻人。我听到旁边居委会的干部在夸奖他，说他当兵三年刚复员，分配在公安局，好几个女孩在追他。我听了，就有点看不起他，当了三年兵就复员，肯定不是好兵。按常理，好兵不复员，三年之后超期，再升官。如果我不是因出身关系提前退役，三年后已是少尉了。

我整天坐在墙角，有几个里弄干部看守我。到晚上八时许，那瘦高个子来了，他穿了件白色的确凉短袖衫，蓝色军用长裤，裤带是军用武装带。他坐在我面前，混浊的眼睛盯着我一会儿才开口。我想，他是在学捷尔任斯基 - 苏共特务组织契卡的创始人，据说他审犯人总是先盯着人看，那凶恶的眼神，可以吓倒对方。

我决定同他开个玩笑，也把眼睛盯着他，只不过一秒钟，他结巴地说：“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在等你说话呀！”我笑着说。

他闭上眼睛，定了定神，然后说：

“金门，马祖、大担、二担、三担、四担、五担都在我们炮火控制之下，台湾，我们随时都能拿下！”

“这我知道，你告诉我又有什么意思呢，你我不是都复员了吗？不过，你是三年到期复员，我是身体不合格，如果身体好，当时上级告诉我，当满三年兵升我当少尉车长呢。”这下他可火了，咬着嘴唇直喘粗气，想了一阵说：

“我不是问你当兵的事！蒋介石的双十文告，你那里听来的？”

我立刻明白高佬林已经招出他听短波的事，并供出了我。

“参考消息不是登了全文吗？”

“那林秉聪又是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他的事？”

“你不老实，林秉聪已经交代是你告诉他的！”

“他怎么会对这感兴趣？他只知道喝咖啡，交女朋友。”

“我问你，他的收音机是谁修的？”

“我不知道。”

“你又是怎样认识林秉聪的？”

“在李国宁家，他们以前是同事！”

“李国宁死了，你提他干什么？”

“我认识林秉聪时李国宁还没有死。”

“李国宁有没有给林秉聪修理过收音机？”

“这我不清楚，现在想要知道也不可能，李国宁已经死了！”

这时他又在咬嘴唇喘粗气，想了一会说：“你不要以为你这样顽抗到底就没有事了，你要对你的态度负责，你会后悔的！”

“到目前为止，我对以往的事从来没有后悔过！”

“同你讲话真没有意思，想不到你年纪轻轻，还不如林秉聪那五十多岁的老头想得开！”他悻悻地走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人。

从这一次谈话，也可以说是审问，我知道高佬林已经招供我们听短波，讲时事，我替别人修理收音机的事。当时，我还希望高佬林到此为止。过了几天没有人来理我，但天天有一帮人在审问高佬林。为首的是梳两条辫子的女人，大喊大叫，又拍桌子。这种女人广东话叫“癲婆”，北方话就是疯婆子。高佬林吓得手足无措，我预料他已经把所知道的全部招供。他知道我来往的朋友，他会说我姐姐有时在场。只要那帮人找到我姐姐，她一定会和盘托出。因此，我决定不回答任何问题，不提供任何情况，如果他们问到有些话是谁说的，就包到自己身上来。

一天下大雨，那帮人来向我问话了。房间是空的，他们搬了张桌子，坐在桌子后面的椅子上，让我坐在地下。一共五个人，其中有前面提到的那个女头头。一个男的开始讲话：“陈文立！你知道党的政策是什么？”

“我不是共产党员，不执行政策，知道和不知道没有关系！”

这一下可惹火了那个女的，她又顿脚又拍桌子，嚷着：“还没有见过像你这样顽固的！”旁边另一个男的开口了：“陈文立，你的态度恶劣，这样对你没有好处，坦白告诉你，你们一伙人都在我们手中，逃不了。你年纪最轻，问题最少，犯不着这样顽抗。我们认定你是从宽的对象，只要老实交代，就可以回原单位工作。即使单位把你开除了，我们还可以再给你安排嘛！”

这时我才知道已经被单位开除了，而且他们对我的朋友开始隔离审查，到底几个人被卷入我还不知。

“既然人都在你们手上，为什么不问他们，要问我这不会说话的人呢？”

“我们是给你机会！”

“我看这机会还是给别人吧，我不需要。”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是敬是罚都在你们手里，你们要怎么干是你们的事！”

“你真的不在乎？”

我没有回答。

“我看今天你一点也没有诚意，你要仔细考虑考虑，我们改天再来！”

他们每天都审问林秉聪，把我放在一边。初时审问林秉聪，我被安排到汽车间的里弄加工工场去。一群“社会青年”——失业的年轻人在加工仪表板。他们稍微有些工资，我不清楚具体数目，只知道很少，连自己都养不起。

后来，审问的人也在乎我听到他们审林秉聪了，问什么问题他的回答都是“有”。他们也给我看公判的布告，其一是谢念椿的案子，一班年青人，谈论文化大革命，包括给毛泽东算命。另外就是“叛国投敌”——谈论越境。为首的谢念椿判无期徒刑，总共约八至十人，分别有15年、8年及戴反革命帽子监督劳动等等。另外是钱大伟的案子，主要是“叛国投敌”，为首的方丽丽因为坦白交代，并检举他人，判12年；钱大伟因出身反革命家属，重判18年，他的弟弟判5年。

看守我们的人，都是居民，有个退休的汽车司机，这人爱搬弄是非，东家说到西家，忙着拍居委会、支部书记的马屁。有几位老太太倒是挺善良的，她们不齿高佬林的坦白交代。有位曾悄悄问我，是否有话要传给林，我告诉她，林已经什么都交代了，我觉得有些还是伪造的。我感激她的好意，要她今后千万不要冒这险，以免惹祸上身。一次我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而水泻，她问我要不要“烧酒杨梅”，说治疗腹泻很有效，我婉言谢绝了。看来她并不是当局用来设饵陷害我的那种人。这些老太太专作加工纺织网袋。在谈到袁世凯的孙儿，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教授被“扫地出门”时，她们表示同情，并不像另外一班人那样幸灾乐祸。

当时我情绪虽然不好，但心里倒不乱，因为已决定硬顶。我预料到将被判刑，多长我不知道，至少不至于死吧，但也说不定。

那时我知道的只有交响乐团的副团长陆鸿恩一人被判死刑，当时判刑是根据“公安六条”，内中一条是“凡散布反动言论的，运动后期酌情处理”，我们应当是属于这一类。我看了公判布告之后，也作了入狱的思想准备，甚至作了被处死的打算。我想，到时一定得精神振作。我最关心的是到底有几个人在对方手中，是些什么人。于是我决定承认一些“罪名”，说都是我所说的，以此引他们来审问我，捉摸看有那些人是对方掌握的。

天气转凉了，家里送来了我的衣服和被子。一个穿卡其雨衣的中年妇女交给我，并说是父亲送来的。我说想见见父亲，她操着一口苏州话：“你爹爹！你爹爹！你哪晓得你爹爹是啥个货色！嘿！”她刻意把那“货”字拖得特别长，说完回身就走了。到了门口，又回转身子，两手叉腰，恶狠狠地“嘿”了两声，才离去。

这时我知道父亲也在被审查，但他还是自由身子。下午，上面提到的好心的老太太问我：“你们是住在法华镇的‘乡下房子’里吗？”我说不是，看来我家在前些时被扫地出门了。她劝我当心身体，要我“吃得好点”。我告诉她我已经被开除了，没有收入，家中经济又困难。她说：“真是作孽，这样的好小伙子。”于是每次她替我买饭，总是贴了些钱为我买好一些的，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一再叫她别这么做。她说“趁现在吃早点，一到里面(指监狱)想吃也吃不到！”我感动得落了泪。

她又告诉我，“长脚”——高佬林跟她说，原先以为我是复员军人，当局不会对我怎样，所以说我是他的朋友，谁知我身上问题这么多害了他。她明白我是被林拖出来的，而我自始至终守口如瓶。她气愤地说：“长脚真不是个东西！”

我那时也学会了抽烟，那是刚开始工作，有了收入，见朋友们大多数抽烟，我也抽上了。到我知道被厂里开除之后就停止了，而那几位老太太却自己掏钱去买烟送给我，说抽烟的人，一时很难戒掉，动脑筋时需要它提神，我也就收下了。

来了个戴眼镜的矮个子，面色腊黄，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眼白也是黄色的。他不停地抽烟，满口咖啡色的牙齿。他一见我就操常州口音说：“陈文立！你要升到哪一级，我们奉陪！”我说：“我有什么能耐升级？抓我处理我是你们的事，难道你们送我进监牢你也陪我进去？”他气得打了我一耳光，我把身子蹬下了一些，让他打另一面。他悻悻地说：“我看你的好下场”，就走了。

接着几天，以那个被叫做“老王”的女头头为首的专案组人员，来问我一些问题，诸如我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之类，我照实说了。他们问到一个叫“韩琪”的人。我一听，便知道林秉聪咬出了姚琪，因为林一直把姚琪叫错为韩琪。我说没有这个人，倒是有一叫姚琪的，是吴继玠的表兄，以往当过右派，他总是要讲以往在上海捧球队里的“光荣历史”，讲如何同人摔角等。姚琪他们只问了这一次，就不问了，我知道他被我们保住了。

最后一次审问，他们问我，一次有几个人在我家吃晚饭，问起我唐千根表哥，问他当时是否说过，“共产共产，将来都要冢家铲。”我即刻会意到这是林秉聪虚构的，因为千根广东话并不好，平时多半讲上海话，不可能用这种典型的广东话谩骂。我照实回答他们，他们似乎信了，出去大骂了林一顿。这次一个男的说我态度恶劣，并说：“怕就怕你在被拖出去枪毙时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我一条小狗命’，那时可来不及了。”我笑着说：“这一层你放心，我不会让你们看到这场面的。当然，我不是演员，不会像赵一曼那样昂首阔步，何况五花大绑了，头也昂不起来。”这时那个女的开口了：“你不要以为我们治不了你！”“你当然治得了我，你治得了任何

人，就可惜治不了你自己。”这又惹火了她的，冲过来打我，被旁边的人拖住了。我看她的丑态不禁笑了，那男的悻悻地说：“我们看得到你的下场！”

过了几天，我又被带到湖南路福园 5 号去，那是一间三层的屋子，我被安排在客厅，高佬林在饭厅，中间的拉门拉上了，但在玻璃里互相看得到，他不断地同我打手势，我没有理他。次日专案组一个男的问我，“林秉聪有没有同你打手势？”

“有啊，不过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你怎么回答他？”

“我没有理他。”

“你为什么不报告？”

“那是看守我们的人的责任，与我没有关系。”

我发觉刘永达也被隔离到这屋子里，他在二楼，早晚洗脸，他要用楼下的盥洗室，我被安排在他们后面。他先已发觉我在客厅，次日一早，我发觉他把肥皂盒子留下，翻开一看有张小纸，写了一些他已经交代的東西，内中有一条是他曾说“毛泽东是佛面蛇心！”我看了立即用抽水马桶冲了。洗完脸，我回到房里，马上写了回条“此事至此为止不要再传了，至今我还没有写过一次材料，你可以把任何事推到我头上，我决定死顶，不必为我担心。”写完，我报告看管的，说我水泻，要用厕所，我进去把字条放入他的肥皂盒。等了一会，抽完马桶，刘永达已在门外说要拿回忘了的肥皂盒，我们打了个面照，交换了眼色，他拿了肥皂盒就上楼了。

又换了另一批看管人，他们管我叫作“5号”。

客厅里又来了个审查对象，40多岁，睡觉鼾声打得震天响，白天也会睡着，也一样打鼾。这对我倒没有什么影响，我每天晚上都睡得不错。有人替他送衣服来，其中有以前我提到的“好心的老太太”，她又偷偷塞给我几包烟。

在这屋子里，我只被问了一次。我被叫到二楼，见到吴继玠也在。这一次，只问了我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收听敌台的？”我回答，早在共产党一来就开始了。这次那女的倒是不像以前那样大叫大嚷，她只是说：“我们本来想放你出去，可惜你不识好歹。”每次问话，都要我在他们的记录上打手印。

9月30日门外来了辆公安局的吉普车，我知道时候到了，对同室的那位难友说，我要进去了。他说：“不会的，你年纪轻，会放你出去，我们在外面见，我请你到淮海路吃点心。”

后来我才知那人叫陈廷襄，震旦大学毕业，中国唯一的冷冻机专家。十多年后我们是相见了，不是在淮海路，而是在香港北角，我们在一家饭馆里吃了一顿饭。

5 点左右，那个脸色腊黄的矮个子来了，他手中托了样纸包的东西，一面打开纸包，一面说：“陈文立，我宣布对你的决定，拘留。”

包着的是一副手铐，我被反铐带上了吉普车。接着，吴继玠也被反铐着带了出来，“不准讲话！”他被安排坐在我旁边，吉普车拉响了警报，直驶徐汇分局。

拘 留

吉普车开到分局屋子的后面，拘留所是在地下室。我们所有的物件，都要搜查一遍，抄了抄身前，我们的手铐开了。在这期间，我发觉吴继玠的目光在避开我，我趁机过去同他说：“我一点都不怪你，我们仍旧是好朋友。”这时他回过头来，两眼充满了泪花。我却没有泪水，对他说：“振作点，不要在他们面前这样。”

搜查我们物件的是一女警员，五十开外。搜查完毕，要我们交出手表、钥匙、钱包、鞋带裤带都要解下，甚至连我的军用内裤的带子也要交出。东西都放在一个布制的小口袋，由当局保管。

黄脸的矮个子要我们在拘留证上签字，我见到下方有逮捕我们的负责人签名，王国成，三个字都是向左倾斜四十五度。

我被安排到 10 号监房，番号 495。一进监房，一个有无锡口音的人叫我坐在他旁边，“你是地勤人员吗？”我点点头，因为当时我穿了件军用工作服，蓝色军用长裤，军用解放鞋，完全是空军的模样。他问我在什么地方当兵，我顺口说兰州，一看他也是军用上装，蓝色长裤。据我所知上海人很少到兰州当兵，我是不想他多问。果然他不熟悉兰州部队，不再问了。另外有个犯人向我介绍他，说他是徐汇分局公革委会小头目。我想怪不得，警察当时也是绿军装蓝长裤，他姓刘，说叫他老刘就可以，番号 882。那介绍人自称姓范，名德威，并说这里一姓邓的管理员取笑他的名字，缺德的德，威糟猫的威。范德威也是一身军装，士兵装，讲话有点女性化。他是在 4046(隧道局)里开空压机的，他说他家里条件很好，父亲是留日本的，一直在三菱洋行当高级职员。我想，那是被称作汉奸的。那老刘说他的太太是汇丰银行上海代理人姓李的女儿，他本人曾参加志愿军，后来在徐汇分局预审科工作，后来我们在里面相处得还不错。他十分机灵，后来天冷了，家里给我送棉衣时，他见我的罩裤是马裤，就说我不是空军地勤，是坦克兵，我只得推说甘肃天气冷，我们穿毡靴的所以发马裤，他半信半疑。事实上我也不是有意骗他，那是从吴继玠那里听来的，说在拘留所不要把自己真实的情况告诉别人，因为当局经常诬指人民在拘留所里组织反革命集团，互相交流真实情况，就是罪名之一。

不久就有管理员来问我吃过饭没有，我当然说没有，这也是从吴继玠那里学来的。老刘喊道：“上路。”那管理员操苏北口音，大声嚷着，“饭开过了，这又不是饭店！”“小张就是爱咋呼。”老刘说。接着他问我多久没有洗澡了，我说快三个月了，平时只是用水揩身，他问我想不想洗冷水澡，是用水冲的。我的确想冲一下，老刘大声叫：“报告管理员，新犯人很脏，要冲洗他了！”不久，管理员小张接好了橡胶管，我蹬在厕坑上，厕坑就在墙角，由老刘替我冲水，全身洗了个干净。

在监房坐定之后，就见到那黄脸矮子在拘留所转了一圈，穿了件警察制服，侧着头，一副得意的模样。老刘讲话了：“王国成哪里去弄来这套制服？”

“你认识他？”我问，

“他是法院里的，问题多着呢。他写字像蚘爬的一样。”

“我是他送进来的！”我说。

“那我要塞他些辣椒了！”他即刻拿起纸笔写了些材料。

拘留所里每天吃两顿，上午大约9时许，下午4时。第一次，由管理员大叫一声“开饭！”只见一高大的老人，推了辆车，车上放着饭盒。老刘介绍说，那老人叫乔老爷，在炊事房做，以前是法租界是巡捕房里的伙房职员。管理员把一名姓何的犯人称“劳动”，让他把饭盒一个个往监房里送。“劳动”叫何应祈，工科大学毕业，在厂里当技术员，由于言论而被拘留，他在年底被释放，戴着反革命帽子在单位监督劳动。

饭盒来了，一股霉味，粉红色的米，面上一层绿色，水煮青菜。我饿了，把菜吃了，饭也吃了三分之二。我食量一向不大，吃不下，剩下的老刘要去吃了。他说有好多入一进拘留所，完全吃不下饭，要过了二天之后，才开始一点点吃。“我可没有那么娇，”我说。

10月1日的国庆，犯人也改善伙食，每人一块红烧肉，我觉得滋味很好，饭也吃光了。

第三日，我上了反铐，被送到电缆厂。厂里开大会批斗厂长和党委书记，我是陪斗。他们喊口号“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某某！”最后叫“打倒反革命分子陈文立！”我也在被“打倒”之列？！我从不当权，何来“打倒”。对我的问题，会上只字不提。会场上看到了我的同事，有的对我点头示意，我也回以感激的眼神。有的用异样的眼光看我，表示惊奇。我没有见到怨恨的目光。

回到监房，饭已开过，余所长，就是搜查我们的那女警员，给我送来了两个白面馍，说：“菜没了，凑合着吃吧。”众犯人都对我投以羡慕的眼光。老刘说：“这就是批斗的福利！”监

房里有一姓钱的犯人，番号 1031，老刘说他是 10 级干部，常熟人，他是《沙家浜》里的新四军，因不服批斗而拘留，对他有些照顾，每餐都吃白馍，但菜同我们一样。

隔天，那姓钱的同一姓高的老头下棋，被管理员发觉，结果给姓高的上了手铐。姓高的大家叫他高老头，我不清楚他是外语学院还是其他大专院校的法语老师，早年留学法国，后来在法国驻上海领事馆当高级职员。日占时期遭日军囚禁，当时意大利领事出面向日方表示法国是维希政府，是同盟国，日本人才放了他。49 年之后，法国领事馆的产权由他代理，直到中共同法国建交。他的太太前几年故世，有一女儿嫁到美国，女儿有时会寄钱给他。

第二天开饭，姓邓的管理员拿来张旧报纸，要犯人把高老头的饭倒在纸上，好让他像狗一样趴着吃。我本来已经对他偏袒那姓钱的干部，只给高老头上铐不满了，这时我十分愤怒说：“哪有这样的道理，犯人也是人，谁想出这法子，比狗都不如！谁说不能喂，我来喂。”那邓管理听了，倒也没有勃然大怒。“嘿嘿嘿嘿，你倒是胆子不小，告诉你！今天我心情好，刚过国庆，不同你计较，如果你再啰嗦，高老头的手铐给你，带你一生一世，让高老头喂你一生一世！”

“我正等着你这么做！”我说。

“过来！”他喝道，“我 X 你娘的 X！你这贱骨头！”

“我生来就贱！”我也不甘示弱，结果被戴上了手铐。

“你的胆子也真够大，这次我大开眼界。”老刘说。

手铐不很紧，初时并不觉得什么，过了大约四十分钟，身上有的地方痒，但不能抓，跟着越来越痒，好像浑身有蚂蚁在爬，有时间歇地同别人讲话，有时忘了，就不痒了。

监房很挤，睡觉有个规矩，新来的睡在厕坑边上。每人的地方不足一尺，往往边上的人睡到一半会被人挤到木板下面，而我倒没有被挤的事。不久来了新犯人，我就在第二位了。上了铐，合扑着睡，痒了二天。由于不活动，肩部关节开始疼痛了，过了两个星期习惯了，但肩部、肘关节，还是不停地疼痛。也不能洗脸刷牙，好在老刘每天都替我揩揩，他对我挺照顾。因为他是“内部人员”，那些“积极靠拢政府，要求改造”的犯人不敢去汇报他。

高老头释放了，饭由老刘喂我。到 11 月初，我被带到我父亲的工作单位，人民美术出版社。同我一起去的有吴继玠、刘永达。刘永达也被拘留了，他是关在徐汇分局“前所”即前面的看守所。

出版社开大会，少不了大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陈文立”等口号，又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陈俭”那是我父亲，接着，给我父亲戴上手铐。当时我急了，他一向脆弱，如果拘留，我真不能想像他

怎样能在拘留所里呆下去。这时他们宣布了对父亲的处理：判他管制三年，在原单位监督劳动。最后，宣布我们被正式逮捕。

我松了口气。逮捕，意味着要判刑，我也管不了这些了。这天，处理我们这个案子的专案组人员都在，那个姓王的组长，对于我父亲的处理极为不满。她说：“真想不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对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是这样的不积极，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这时，我发现出版社的造反派头头汪观清看着我，我很明白是他帮了父亲一个大忙，坚持我父亲由本单位处理，否则，专案组非判他刑不可。我对他投以感激的眼光，他也以神会。汪观清是一位有才华的画家。他素描速写，草草几笔便能把一个人的形象、性格勾画得淋漓尽致。现今他已移民美国，住三藩市。

回到拘留所，我心中放下一块大石，父亲虽判管制，但免了一场牢狱之灾，不幸中之大幸。

余所长，就是那位女警替我开了手铐。我说：“报告余所长，是邓管理替我上铐的，说要戴上一生一世。”“算了，我说了算，你年纪轻轻，往后就不要那么犟了，吸取教训。”我马上来了个立正，对她行了军礼，大声说：“是！余所长。”她笑着说：“回去，还那么顽皮！”在行军礼时，肩部关节一阵剧痛，长久不活动了。

拘留所每天活动二、三次，由管理员叫“活动！”“大家站起来在监房内兜着慢步走，走不动的可以坐在木板边上。”

平时，就是闲谈，也有人在写材料。那个叫范德威的，不停地写。有时他想起什么，自言自语地说：“这家伙太舒服了。”每次一写，就有人被拘留，这样共有三、四次，我们都不齿他的作为。

还有一个华侨，番号 1031，是参加造反派两派之间斗争被另一派送进拘留所的。另外一位是徐汇区法院的副院长，姓徐，我们叫他老徐。他不大讲话，为人和气，也挺斯文。当时管理员要我把监规纪律用毛笔写到墙上，我觉得自己的毛笔字不好，老徐的毛笔字很工整，自告奋勇地写了，当然写了会有一盒饭吃。老刘说他是因为“历史问题”而被拘留审查的。

另有一位山东济南人，是 5703 厂的老工人，早年参加志愿军，因为 49 年前又参加过三青团而被拘留的。他的夫妻感情十分好，每当有人谈到家庭，谈到自己的老婆，他会默默流泪。

有一位高中刚毕业的学生，已经准备动身前往新疆建设兵团，因为父亲曾参加工福会在厂中被批斗，他不服气而讲了几句话，被别人汇报说他“为反动老子翻案”而被拘留，他天真而纯情最不齿范德威咬出他的同伙。

一天晚上进来一个新犯人，大约十六、七岁，带来一股恶臭，老刘问我，你猜他从那里来的？我考虑后回答：“医院开刀的。”“你资格还嫩。”他说。“这是血腥味，但开刀的同杀了人的就有点不同，这小子是杀人犯！”老刘到底是办案的，有点经验，我想。

这小家伙自称他是菜场卖肉的，吹虚自己会这会那的，我明知他是在胡扯，不同他多讲。而且，此人品格败坏，一开口就没有一件事是对的，满脑子是坏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还鼓动大家去欺负老年犯人。好在监房内大多数人都颇善良，没有人理会他。有时他太过分，我真想过去揍他，但一想他没有几天好活，也就算了。

过了三天，小家伙走了，晚上消息传来，他已被枪决，因为他把邻居的小女孩强奸了，事后用铁丝把女孩勒死，还用刀干了极下流的勾当，以至弄得满身是血。

12月25日，改善伙食，每人一块肉。有个犯人，我们叫他小绍兴，问管理员，怎么提早庆祝毛泽东生日？怎么没有面条吃？那邓管理开口了：“嘿嘿嘿，你们想得倒好，毛主席生日是你们庆祝的么？我X你娘的X！毛主席生日是我们人民庆祝的，没有你们犯人的份！吃肉，是乔老爷请客，今天是他的圣诞节，他是天主教徒。”

邓管理员，名叫邓福海，家在徐家汇是开烟纸店的。他平时装斯文，喜欢训犯人，“不为‘我邓管理’言之而不预也”是他常说的，那“为言之而不预”是从《毛泽东选集》中的《安民告示》学来的，他加上“我邓管理！”

粗口骂得最顺口的要算小张管理了，他一进拘留所，就如连珠炮一样大骂粗话，有腔有调有板有眼，足足可以骂(唱)上三五分钟。如果有人向他报告头痛，要些药，他总是大叫一声“死不了！”一次，我洗好的一双军用袜子丢了，老刘报告管理员，大抄监房，原来小绍兴偷了。罗管理当场打了他两下耳光，把我叫出去，问我要不要同小绍兴上铐，我说算了，反正耳光也挨了。罗管理说：“他是坏东西，你是大学毕业生，又是复员军人，你要小心，拘留所很复杂，坏人多得很呢！”看来他还把我当作好人。不过，小绍兴不久释放了，我被判了刑。

元旦过了不久，我被叫出去，有个男的，问了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宗教信仰以及同事之间的关系，接着在记录上打了手印，就完事了。事后老刘告诉我，这叫“结案”，即案子了结，等待处理。接着他在纸上写了一些东西递给我，内容是他叫刘士荣，又叫刘飞，原来是徐汇分局四科，即预审科的，因当了造反派小头头被另一派送拘留，结果如何尚不清楚，但无论如何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我们互相要设法再见面。

判 刑

1月25日上午，听到小张管理叫我收拾东西，同时也听到他叫“416”——我表哥唐千根，“494”——吴继玠收拾东西，判刑的时候到了。我一边收拾，一边同监房里的难友道别。

我被带出监房，“今天让你们见见面！”小张管理咋呼着，我们的东西已堆在地上，只见桌子上有多副手铐，有英国制的、法国制、德国制的。法国货已发铜绿，我被带上英国货的，千根表哥骨骼大，他们试着替他带德国货的，但年代太久不灵活了，换了几副都不灵，结果还是带上英国的。

囚车是在49年之前已经使用的那种，当时漆成大红色，因而有人叫它大红袍，又叫飞行堡垒，因为车顶开了天窗，警员可以伸出半个身体操作机枪。记得50年代初镇压反革命运动，这种囚车整天在街上呼啸而过，人心惶惶，这叫“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列宁所津津乐道的“红色恐怖”！如今囚车漆成军绿色。

我们被押上囚车，从驾驶窗看到，我们由交通大学后门开入，门口等了一大帮人，其中有几个是刘永达岳母的亲戚，他们都住在对面叫“信义新村”的弄堂里，跟着囚车跑，我想他们一定去会场听判决的结果。我们被押到交大大礼堂的台上，一共六个人，有唐千根，吴继玠、刘永达、林秉聪和我，另一个人我不认识，莫非也是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人？

我觉得很热，满头是汗，汗水直往下滴，我用被反铐的手轻轻地拍了押我的人，轻轻对他说：“请你解开我的风纪扣。”他没有听清楚，紧张得不得了，当时扬声器正在播放文革时的革命音乐，他以为我要喊“反动口号”，我也听不出他说些什么。这时二个解放军战士走了过来问怎么回事，我同他们说：“别紧张，你瞧我热成这样子，请您解开我的风纪扣”，其中一个战士笑了，替我解开了。

我看到台下我的母亲站在前面，她是陪判的，头发全白了。旁边站着吴民休，姚琪的大舅的同学，我姐夫有时会同他打桥牌，我不明白他怎么会牵涉到我们案子里？

大会开始，由唐千根的单位控诉他的罪行，说他家以往是茶叶大王，如何剥削工人等等，拿了180元的高工资，还不满意。接着，电缆厂的人控诉我的罪行，说我家以前是太古洋行买办，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按：太古洋行从未经营过鸦片业务。经营鸦片的，只有怡和洋行的前身——东印度公司，这是他们的专利。）又说我平时偷懒数次，旷工，屡出事故，破坏生产，说我同走资派勾搭，得到走资派表扬等等。接着宣判唐千根17年，我抗拒交代，从严判处15年，吴继玠对罪行有所认识，判10年。接着判金振华，我想听听是不是我们集团的，但听来只是说他

利用行医散布反动言论，进行攻击污蔑，判7年，刘永达判5年，林秉聪对罪行有认识，能坦白交代并揭发他人，从宽处理，判管制三年，由里弄监督劳动。

当我听到被判15年，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并没有后悔沮丧，也没有考虑这15年怎么过。我有一信念，现在这么乱，说不定过些时候又有变化，不至于15年吧，我安慰自己。放心不下的是我的表兄唐千根，他有老婆孩子，我姨母有病在身，他家怎么办？还有刘永达，也有老婆小孩，孩子还在幼儿园。我对自己说想这些干啥，干着急也没有用，我也没有能耐改变这情形，不如不去想它。

我们又被押上囚车，途中那个王国成说：“结棍呀，嘿嘿，陈文立，”看来他对我是恨极了。“结棍呀，15年，到了提篮桥，减也减得结棍，你表现好放你，加也加得结棍，你反改造，杀你的头！”那个姓王的专案组长狂叫“他还往窗外看！”他跳过来将我反铐的手铐猛按，扣得更紧了。不久车子驶进了上海市监狱。

提篮桥

下了车，被带进一个大房间，那批专案组的人在门外。手铐开了，要我们在一个高的柜台上打手印。“不准看！”有人大喝道。太迟了，我已看到那张纸上印有“提押证”。这时，我发觉我的双手肿了。

打完手印，听到那姓王的专案组长在门外叫嚷，“他不老实，给他重新戴上手铐！”看来他们是不允许进这房间的。里面的人大声同他们说：“没有你们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这时，我用带挑衅的眼光看着她，只见她狂怒得双脚一跳，大叫“陈文立，你们问题还没有了结，我们会再来的，加你的刑！”“别理她，神经病。”里面的狱警说。

我们被带到隔壁的大房间，里面已经有三三五五的几堆人，就在这大房里等着，没有狱警看着，好朋友们又聚在一起了，可以相互谈话，即使是很短暂的时间；但是一时却又是想不出什么话要说，纵然有千言万语。这时吴继玠过来望着我，“阿弟呀！”他摇着头，眼泪汪汪的。我同情他，他是他父母的宝贝儿子，以往两次拘留，他们急得很，现在真不知如何是好。我想不出任何话来安慰他，刘永达说：“真是阴沟里翻船。”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

等了一回，来了个穿灰色工作大衣的人，皮色白皙，面目清秀，笑着同我们用带上海本地口音的上海话说：“开心点，开心点，判了刑，进了监狱，前面的已告一段落，新生活开始了；现在同你们拍照。”他把我们带进摄影房前排队，当听到他叫名字就一一进去拍照。

上海市监狱的摄影房，同市上的专业照相馆无异，各种设备一应俱全。我整了整上装，扣好风纪扣，幸好前日在拘留所理发，剃了胡子，我仍是小孩的儿童头，不用整理。那白脸警员也精心地调节灯光，犹如专业摄影师一样，“笑笑笑，一二三，拍了。”我面带微笑地让他拍完。

照完相，被带回到那间大房，里面已经排了长龙，排好队，又等了良久，有人把我们带出。经过一幢大楼，外面有“壹号”的字样，有人逐个问“判几年？”我表哥说：“17年”就被带进那幢大楼，我是“十五年”，要继续走，我同表哥互道“保重”。我们被带到另一幢，是三号监，十五年以下的关在那里，我们上了一层楼，四个人一间房。轮到我，一边满了，走到另一边，我被关进了45号。监房面积大约是4 X 7.5英尺。就在我们被安排进入监房时，我发觉楼上也关了犯人，有人叫，“噢！啥地方来的？”“不许叫！”狱警喝道。

大家坐定，整理了一下东西，我们交换各人的判决书看。同监房的，有金振华，就是同我一起判刑的中医，年龄比我大一、二岁，因为谈论文化大革命，被指称“攻击污蔑”判了七年。另一位秦文彬，老工人，是八级铸工，年轻时参加侠义社，49年又参加人民解放军，去接收国军留下的枪支弹药，那些枪支弹药也的确交到共产党手里，谁知后来有人说那人民解放军是假的，“参加伪人民解放军”也是他的罪名之一。当然“收听敌台，攻击污蔑”是主要原因，被判十年。另外的一位是锯木工人徐志舫，食量大，因定粮不足而发牢骚，又是“攻击污蔑”判十年。他年龄最大，快六十了，一进监房就哭个不停，他并不是为了他的妻子儿女而哭，而是再要挨十年的饥饿，不知如何度日，又说他儿子是复员军人，现在“光荣人家”的金字招牌敲掉了。秦文彬劝他说，“你看那小陈，他是复员军人，判得比你重，倒比你镇定。”那老头说：“他福也享过了，当兵不计定粮，可以尽量吃。”金振华打趣说：“真是天吃星下凡”。

上海市监狱，座落在上海杨树浦长阳路147号，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由当时公共租界工部局所建造，当时是根据英国监狱的格式建造，号称世界上第三大监狱，第一算是伦敦的，其次是日本东京的鸭巢。

关于上海市监狱的历史以及它的鸟瞰图，已经有一本《上海市监狱史话》出版，虽然作者是在歌颂共产党，但也记述了一些确切的资料，有参考价值，该书在上海图书馆应当可以借到。

有首顺口溜在犯人中间流传：

“一进监牢心惊肉跳，
两个两个来排好，
三顿茶饭，顿顿勿饱，
四季衣衫，独缺夹袄，

五层楼洋房，
六亲无靠，
七尺半牢房，
八根铁梗，根根牢靠。
究竟为点啥？
实在勿知晓。”

据说这顺口溜早就有了，在租界时期饭是尽量吃的，因此是“三顿茶饭，顿顿吃饱”。到了日占时期，开始限量了，后一句改成“顿顿半饱”。到共产党来了之后，又改成“顿顿勿饱。”而最后一句，原来是“实在自家勿好”，到共产党统治之下，大多数人是冤枉的，成了“实在勿知晓”了。

日常生活

上海市监狱犯人的一天作息时间表，我在的70年到75年期间，没有更改过，大概如下：

6:00 起床、开门
整理内务，洗脸刷牙
劳役犯来倒便桶，倒污水桶

7:00 发开水，早饭

8:00 开门，学习

10:00 发开水，学习，或放风，看电影，洗澡

11:30 午饭

14:00 开门，学习或上大课

14:40 发开水，关门
发完开水，倒便桶，发冷水，锁门

17:30 晚饭

20:30 摊铺睡觉

每天早上六时，就听到队长吹哨子(队长即政府干部，犯人叫他们“队长”)。接着，听到打开门锁声，上海市监狱的门锁都是英国制造，早上队长要用钥匙转动三下，门才打开，门锁后部有一突起的小方块，只要门一碰上，就自动锁了，这是第一道。钥匙孔边有一箭形扳手，将它向

左一转，就上了第二道，这是通常在晚饭后由事务犯转动的。最后一道，要有钥匙锁上，那是在事务犯转好之后，队长跟在事务犯后面上锁。

监狱每一层楼有 90 个监房，分成两部，称东部、西部或南部、北部，每部 45 个监房，而 1 号监比其他监狱短，每部 40 个监房，头尾 4-5 个监房通常不关犯人，是堆放物品的。5 楼通常是不关犯人的，堆放犯人平时不用的衣物，当然在人满为患的时候是例外，监房全部关押犯人。

起床，是由队长吹哨子，之后穿衣服，但有好些犯人，在吹哨子之前就起床了。通常是听到警卫的起床号，那时是五点半，大家轮流用便桶大便，这样，不至整天都有大便积在便桶内。

穿好衣服，叠被子，这叫整理内务，把各人的包袱放在最下，上面逐一放叠好的被子，要求叠得方正整齐。由于各人被子大小不同也比较厚，不可能像部队那样整齐。为了好看，我们用一张硬板纸铺在上面，再用一张毛毯包在外面。有的用被单包好，叫内务包，上面放毛泽东选集。

每个人都有两个一大一小洗脸盆，小的可以进出铁栅，大的放在铁门外盛冷水，小的盖在上面。洗脸时，小的可以拿进监房，用搪瓷茶缸舀水。洗完脸再刷牙，漱口的水也吐到洗脸盆，完毕将污水用茶缸舀到外面污水桶，因此，每人都备有两个以上的搪瓷茶缸（杯）。通常污水杯是公用的，污水杯另一用途是小便，因为便桶在地下，为了使小便不至飞溅，好多人是跪在地上小便的，也有的先尿到污水杯里，再轻轻倒入便桶。

一吹起床哨子，队长就开始开门了。先开底层劳役犯的，好让他们出来做事。接着开各楼面的，一共三道锁，每次开门要转到三周，这倒是要有些手劲的。通常两名队长开门，新来的干部，开了十多个锁，就要甩手。

门一打开，犯人就便桶提到门外，由劳役犯拎到下面冲洗。劳役犯通常一只手拎两个便桶，倒光了，一只手可拎三个，分发到各监房，犯人把倒空的便桶拎进监房就把门关上。这是第一道锁。

接着劳役犯把污水桶拎走，只听到伙房的人叫“出开水”，劳役犯就去把开水桶起上来分发。开水桶是木制的，大约 70-80 公分直径，两人提一桶到监房门口，用铅质饭盒勺开水，每人 11 公分口径的搪瓷茶缸一缸，届时各人的茶缸早已放在门外，到发完就可以拿回监房喝。

劳役犯倒完便桶，倒完污水桶，是没有时间洗手的，接着又去提开水桶了，当然在监狱顾不了这么多，久而久之也习惯了。

发完开水不久，就会听到伙房里的人叫“出饭啦！”劳役犯就到伙房去捐饭盒，饭盒放在木制的框架上，每板 40 个饭盒，由他们捐到各楼面，搁放在通风洞扶手的铁架上，然后分发到各监房，早、午、晚饭都一样。

劳役犯又称劳动队，是犯人中间做劳役工作的。倒便桶、发冷水、开水、发饭、监仓清洁，都由他们负担。他们的伙食定量，比普通犯人高些。由于他们的活动范围比较大，通常是挑选当局认为比较“可靠的”，如刑事犯，农村来的，当然体能比较好也是条件之一。

另一类犯人叫事务犯，负责发放报纸，通知学习，做干部的传声筒，犹如干部的秘书。在劳役犯忙碌时，也要帮劳役犯做体力劳动，他们定粮，同劳役犯相同。他们大多数是以往在社会上当党员干部的，或是关押时间长了，一贯“积极靠拢政府，要求改造”者，即平时注意其他犯人，热衷于打报告，在学习会上总是抓住别人小辫子，在批斗会上充当打手者，或者是有亲属当高级干部，或同监狱干部有关系的。另外，医务犯，是从犯人中间的医生里挑选的，也以他们的“可靠程度”为依据。

事务犯大半是为人圆滑，能在干部和犯人之间左右逢源的，那些穷凶极恶，一味竭尽所能批斗其他犯人，装得比共产党更左的，也会令有些干部生厌，是当不成事务犯的。

早饭是粥，米要比拘留所里的好，至少不是霉的，是碎米。刚入监不劳动，定粮每月 25 斤，早、中、晚分别是 2 两 3 两和 3 两，这个数字的定粮显然不够，整天都觉得饿。菜打在粥上，有时是酱菜，有时是大头菜，有时是咸菜。逢年过节，或有上级干部来视察要改善伙食，一人一块红豆腐乳。

吃完之后，空饭盒放到门外，由劳役犯收了，放回木框架，再掬回伙房，由伙房里的犯人冲洗。

早饭吃完，如果有劳动，就是拆纱头，那是把针织厂裁剪下来的边角料拆成纱头，以便运到工厂作揩拭机件或作包装的填料。每人发一个汽水瓶的盖子，用它来刮出沙头，接着用手拉，拉成棉花状。有人用清凉油的盖子，有些则将平时拾到一块铁皮，留到星期天发放剪刀时，剪成如弹吉他的金属指甲套在姆指上，用来拆纱头。各人快慢不一，那时不计定量，但有人仍在竞赛，诀窍是开出三至四根纱头就顺势拉，通常可拉到底。纱头开多了，会打结，又要重新开过，浪费时间。而且，拉也要顺势，太急了就打结。因此，有些人动作看来慢条斯理的，产量很高。而有些看来混身是劲，急得满头大汗，到时产量却不高。我想起龚主教，他拆得很快，不过当局不给他很多，只是少量的几块，他三下五下就干完了，关于龚主教的一些情况以后再述。

早上八时许，通常事务犯会通知：“准备学习！”接着就听到开门声，犯人们就走出铁门，坐在走廊的地上，这又叫“里阳台”，面对面。

犯人分成若干小组，通常是四至五个监房一小组，由干部指派一个值星犯，以前叫小组长，但那长字同“队长”共用一字，同犯人身份不相称，改为值星犯。另有一个记录犯。在我刚进监

时，还有“早请罪”和“晚认罪”，即在学习之前，众犯人站在监房门口，面对窗，由事务犯领谈《毛主席语录》之后，由事务犯喊“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接着大家同声：“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这是毛泽东语）。然后大家又同念“我们犯下了滔天大罪，我们低头认罪，我们要靠拢政府，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早请罪就此结束。晚认罪，只在傍晚进监房前举行，形式同“早请罪”一样。当时，在社会上，每天早、晚都要向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以至在监中亦兴起这“早请罪”、“晚认罪”！这实行了大约半年，由于当局认为这种活动使犯人走动范围大了，恐怕不易控到，后来就不再用了。

小组学习，先由值星犯领读《毛主席语录》，由值星犯讲翻到的页数，然后喊一声：“最高指示”，组员再同声念读。如有组员讲错了话，就要批斗。那时总少不了那一段，“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去组织起人民去把它打倒”是不允许念的，只念后面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在念到“你不打，它就不倒”时，有些人会趁机对被批斗的拳脚交加，边打还边喊：“你不打，它就不倒！”来发泄一下。到打得差不多时，队长走来了，假惺惺地说：“怎么打人啦，党的政策不兴打人呀！不过，你如果坚持反动，激起要求改造的气愤，我也制止不了呵。”这是在暗示可以对批斗对象进行殴打，但万一有死伤，他又可以推卸责任。

在这里，我只是粗略地介绍监狱一天的作息，至于详细的学习会，在往后的篇幅再作叙述。

学习，除了批斗，就是讨论形势，由狱官指定读一段报纸，小组各人发言讨论。例如中国发射了人造卫星，人们就都说中国的科学技术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这卫星要比美帝苏修的都先进得多。讲到国民经济，大家一起附和说“目前形势大好”，当时的宣传是农业连年大丰收，工业大增产，尽管事后当局又说到了崩溃的边缘。接着要批判自己的罪行，有的说自己反动出身，反动本质不变，犯下滔天大罪。有的说自己翻身忘了本，睁着眼睛说瞎话。除了讨论形势之外，就是讨论“大课”。监狱里每月都开一、二次大会，在大礼堂举行。通常是午饭之后，由事务犯通知“准备上大课”，他环绕各监房通知一下，然后到各监房根据干部拟好参加大会的名单，逐个监房通知。值星犯同记录犯都要去，一到队长开门，被点到名的犯人就站到门外，两个两个排好，在队长带领下走到大礼堂。

“上大课”就是监狱管教科领导作形势报告。当时由一个造反派头头姓许的苏州人作报告，内容就像毛泽东所讲的“八股文”——一国际，二国内，三监内，都是形势大好。这个姓许的文化程度不高，做报告的发言稿由秘书写好，他总是念得结结巴巴，而且有很多字他不认识，总是把巴勒斯坦读成巴基斯坦，过街老鼠读成过鼠老街，无所不用其极读成无所不用及其，而每每念

到“不用”这两字时，总是停顿一下，可能是他认为原稿写错了，因而把其极改成他熟悉的及其；向隅而泣念成向耦而立，分崩离析念成分朋离拆。到最后讲到监狱内部，大骂犯人时，却流利得很，“加你们的刑！杀脱你个头！我呢无产专政(他总是漏了阶级二字)决不手软！”

另外一个做报告的徐队长，年龄较大，河南口音，听他的口令，是军人出身，根据老犯人说他是管教科的高层干部。他的报告，内容当然是千篇一律，但读得流利。他总是坐在最边上，看来，是属于当时“靠边站”一受批判而还未打倒的干部。

大多数时间是军代表做报告，他姓张，胶东口音，尖声，来自空四军。估计他是大队一级(团级)的干部。大课还有加减刑大会，我所知道案情的，有数位犯人被加到死刑，以后再叙述。减刑的有死刑缓期执行减到无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减到二十年，十八年不等。这些减刑对象大多已经关押了十多二十年，而且平时是所谓“积极靠拢政府，要求改造，同反改造分子作斗争者。请读者注意，新的刑期是从减刑的一天算起。当我初进监狱时，林昭刚遭处决，因而，每次大课，那些干部总是威胁犯人“反改造份子！你们听着，林昭就是你们的下场！”。

监狱里运动不断，那些干部说：“社会上刮起一阵风，监狱里就要兴大浪。”平时搞“过三关”，即认罪服法关、思想改造关、劳动生产关，其中最强调的是认罪服法，包括交代余罪，就是继续向当局坦白以往未曾交代过的问题，包括检举其他亲属、朋友，甚至有时开会将交代了“余罪”的个别减刑。不过吸引力不大，大家都明白，事实上交代大多数是害人，而且得到加刑的机会就更大，尽管如此，仍有个别傻瓜上当。

除了过三关，就是“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大斗”。我在的时候，就有几个“反革命集团”案如“张吕反革命集团”一工农民主党，“陈金反革命集团”一社会民主党，牵涉到上百人，还有李阿根，沈秋良反革命集团，为数十人全部枪决，这在后面详细叙述。

每天学习到 10 点左右，事务犯会通知：“进房间发开水”，有时会再加一句“把门关上”或“不要把门碰上”，因为有时发完开水，队长早已通知继续学习，事务犯重复一次，或“准备放风”，这时，门是不关上的。如果楼面上的队长有事外出，事务犯就通知关门，发完开水，如果有沙头拆，就拆沙头，否则，就等午饭。如果监房里的同监犯相处融洽，相互之间就闲谈，如果监房里有个专要抓人“小辫子”、要无中生有向当局汇报的，即所谓“积极靠拢政府”的犯人，那么讲话只是互相敷衍，甚至“白板对煞”，大家不讲话，手里捧着毛泽东选集，看得进时就读几页，看不进时就装装样子，有好多时间捧着就打瞌睡。午饭是米饭，同早饭一样的碎米，在铝制饭盒(罐)里蒸熟、菜打在饭上。

上海市监狱的伙食冬季大多是白菜，上海人称黄芽菜。夏季是鸡毛菜，平时是青菜。听伙房里的人说，先是把菜用橡胶管喷水冲洗一下，放到大木桶里，注了清水，然后插入一条同锅炉相通的橡胶管，开放蒸气，弄到水沸菜熟之后，放下一铲盐，一瓢油，搅混后用勺子分发到已经蒸好的饭盒里。除了上述的菜之外，有时是萝卜，平时是加酱油的。间中还有茄子、黄瓜、洋葱、冬瓜、芋艿、卷心菜，犯人们称之为“特色菜”，尤其是茄子是放了酱同大蒜煮的，在监中算是美味。

荤菜每隔三天一次，大部分是每人一块红烧猪肉，有时是油炸带鱼，咖喱鸡鸭块，犯人用部队里的行话，叫“改善伙食”。如果那第三天是10月10日，荤菜要推迟一天。会有人大声问：“怎么今天没有开荤？”有人大声说：“是蒋匪邦的国庆，怎么能让你们吃肉？！”有位犯人是原南京警察厅代理厅长，名叫陈宋烈，是蒋经国的结义兄弟，他就说：“今天吃素好，让我们永远记住这日子！”

69年刚军管时，军代表认为犯人伙食太好，他在报告中说：“我们把你们养得肥肥白白的，你们还要反改造！你们的伙食，是每月12元5毛，同部队一样，那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订的，贫下中农每月只是4块左右嘛！”他讲过之后，那年春节就没有荤菜。那些已经运到堆放在伙房外场地上准备过冬的白菜，也不让犯人吃，等到烂了，由卡车拖出去处理了。那时一连好长时间没有开荤，到夏天，天天是鸡毛菜，吃得犯人们出的汗都是绿色的，每每洗脸擦身，毛巾上都沾了绿色。直到一次有上级干部来视察情况才又变回原状。

逢年过节或有上级干部来视察，也会改善伙食，甚至像尼克松访问中国、墨西哥总统访问上海时，监狱伙食都会改善。这时干部的穿着也整齐了，也要求犯人的监房内保持内务整洁，要犯人穿着整齐。对条件差的犯人，还会借给制服，直到“贵宾”离去，似乎监狱也等他们来参观。听老犯人说当年宋庆龄到监狱劝说陈璧君，每次宋来总是连续两天开荤，而且蔬菜也是浓油赤酱；并且说宋庆龄告诉陈璧君，只要她认罪了就马上可以出狱，而陈说：“蒋先生依靠美国，他失败了，因此犯了叛国罪，汪先生依靠日本，他也失败了，为此他也犯了叛国罪，而毛先生依靠苏联，只是他胜利了，你叫我怎麼认罪呢？”

午饭之后，坐在监房内，如果有沙头的话，拆纱头，如果没有就视各监房的情形了。同监关系比较好，可以打瞌睡、闲谈，谈话内容大半是各人自己的“光荣历史”，谈到自己出洋相的过去，反来复去地谈。还有，就是谈吃。在监内由于食物短缺，总是觉得饥饿，犯人只得画饼充饥，谈以往去过的餐馆。比如上海的老饭店——老正兴，以红烧划水最好，炒蚬粉就要到城隍庙的德兴馆，新雅的炒虾仁等等。老一辈的怀念法国式的马赛餐馆，及意大利式的康生洋行制作的

拿破仑蛋糕。会煮的就谈到各种烹调方法，怎么作红烧肉，怎么煮咖喱鸡等，大多数人都是不会煮的，只是听了别人讲，再凭自己想象，反正在监中也无法试验，讲过算数，既解了馋，又打发时间。

放风是监狱中的术语，就是到监房外的场地上活动，透空气。上海市监狱的通风好，平时就不会有气闷的感觉，但犯人们都喜欢放风，坐在监中烦闷，活动一下，改变一下环境总是好的。放风由事务犯通知：“准备放风”，接着犯人们在监房里穿上鞋子，小便的小便，并待队长来开门。门打开后，两个两个排好，在事务犯带领下，到楼下的篮球场兜圈，年老体弱走不动的，就在旁边坐坐，晒太阳。我所在的楼面，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也在，他总是走在最前面，上身是穿监狱发放的犯人上衣，警察穿的蓝色长裤，黑色的军用高帮皮鞋。冬天，龚主教穿警察棉衣裤，军用棉制大头鞋。放风时，也有年轻人打篮球，但由于营养不足，打了不久就体力不支。做裁判的名叫高华德，看来有七十多岁了，听说他母亲是德国人，因而得这个名字。以前他在四川路开设了“高华德化学钢铁试验所”，由于政治问题被判无期徒刑，也有人说是因为他信天主教，他享受三级外侨待遇，尽管他是华籍。

以前曾在公安局工作的犯人告诉我“外侨犯待遇”一共分四级：特、一、二、三。特级是指国际影响大的知名人物，不是关在监狱内，而是某地的一幢小洋房，或一套有房有厅的公寓。例如，建国西路 400 号的高楼内就有。他们有佣人（监管人员）照顾，形同软禁，生活待遇十分优厚。一级的同特级差不多，只是条件差些。以前天主教中央局(CCB)华理柱主教就是享受一级待遇。二级是在监狱内，单独监禁，但犯人可以要求另派一犯人照顾生活，如洗衣服、整洁等等，通常照顾他的犯人就关在他监房的隔壁。他们监房门在早上打开之后，要到晚上才锁上，但不准走出监房同其他犯人谈话。三级的亦是如此。二级、三级之间的差别只是在食物，二级可以有多样主食和菜式供挑选，而三级主食只是白馒头和米饭，荤菜只是鱼或肉，没有多种选择。外侨待遇的主食不定量。

洗澡，正常情形之下，是一个月一次。但在搞运动，特别是 70 年代初，三号监发生两起“反革命集团案”，在大批大斗期间，停止了数个月。这两起“反革命集团”案，以后再详述。洗澡有时是上午，有时是下午，通常是九时之后或下午二时左右，先是由事务犯通知“准备洗澡”，接着由队长开门，两个两个排好走到另一幢大楼。上楼之后，把衣服脱在架上，一排排囚犯裸体站在水管下面，水管上有出水孔，大家站好之后，由管澡房的犯人开水，水温倒是不冷不烫，第一次不到一分钟，就停了。接着大家搽肥皂，搽毕又开水，这次也不到三分钟，水就停了。大家回到自己放衣服的架前擦干身体，穿上衣服，再两个两个排好走向监房。老年体弱不能走到

澡房的，由劳役犯发给开水一满面盆，可以揩身。新犯人洗了一、二次就有经验，因为搽了肥皂，第二次冲水总不可能洗净肥皂，于是，犯人们一听到事务犯喊准备洗澡之后，马上准备，预先在自己身上搽肥皂，穿着越简单越好，夏天只是汗背心短裤，衬裤都不穿，只带一条毛巾。冬天只是光身子套上棉衣棉裤。这样，两次冲水，才能把身上的肥皂冲干净。

每月有一到二次电影，也是由事务犯预先通知“准备看电影”。队长开了门，两个两个排好走到大礼堂。我在监狱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大部分是看新闻简报，故事片只有地道战和地雷战，此外就是样板戏。记得在看电时常有犯人会边看边插嘴，例如有一次看红色娘子军时，当党代表走进地主家唱那一段说他不会被‘花灯美酒’所打动时，就有人说：“听到吗？大家都要向革命先烈学习呀！自己同自己打防疫针，抵御糖衣炮弹，这就叫自我改造，否则，中了糖衣炮弹，就得象我们一样抓起来，同我们一起强迫改造！”大家都知那位犯人是在用队长平时训人的话来讽刺，但又没有人能说他讲错什么。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放映了一次中国记者拍摄的一些美国镜头，虽然没有纽约的高楼大厦，但见到富裕的美国人，丰硕的农场，再加上那三首熟悉的美国民歌一直在伴奏，令人们深有感触。

下午四点左右，事务犯通知进监房，接着是倒马桶，倒完马桶，门关上了，各监房前放一污水桶，接着队长上锁。之后，发冷水，每人一洗脸盆。在三号监冷水限制得比较紧，只是每人两饭盒的量，而在一号监，就比较松，如果要求多些，劳役犯会将个别的洗脸盆打满，发完冷水，就发开水，同午饭前和早餐前一样。晚饭，就同午饭一样。

晚饭之后，犯人们就开始洗脸刷牙，有人揩身，上海市监狱一直都是冷水洗脸揩身，那怕是零下5度的寒冬，没有热水。听说龚主教，是每天冷水揩身，从不间断，就在下午4时左右，劳役犯再倒一次污水，接着他们也进监房了。

晚上八点半左右睡觉，有时是事务犯在各监房口通知“摊铺睡觉”或先通知“摊铺”。摊铺，就是把“内务包”（先前讲过的由被子叠成）打开，摊好被子，犯人只可以坐着，下半身在被窝里，要到通知“睡觉”，才可以睡下，有时是由队长吹哨子，大家就可以睡了。

睡觉是头脚交叉睡，如果是三个人一个监房，两个人头朝外，中间的头在里面，通常犯人都愿头在里面，因为便桶在里面。因此，新调进的人惯例是要睡这位置。如果犯人被禁闭，理所当然头朝里睡。如果监房关四个人，那么，两个人头朝里，两个人头朝外。最倒霉的，当然是头就在便桶边上的那个人了。

三号监通常一个监房关四个人，在高峰时，关过五个人，而1号监，大多数是三个人一间。

晚饭后到睡觉这一段时间，如果有沙头拆的话，还要拆。监房里灯光很暗，灯是在监房外叫内阳台的走廊上，每隔两个监房一盏灯，是 15 瓦的，大多数时间就是坐着闲谈等通知睡觉。当然这就要看监房内的犯人关系好坏了，关系比较好的大家精神放松些，关系紧张的一言不发。有的读者可能要问，只有 4 尺半宽的监房，怎么能容纳四个人甚至 5 个人？实际上的确如此，人是会适应的。在我们被调往青海前，我就经历过 5 个人一间，而且，随身带的东西都在监房内，在刚睡下时是感到挤一些，但睡着之后，什么都不觉得了。同拘留所相比，要好些。在拘留所里，人们只能侧睡。如果形容它好比罐头沙丁鱼那样，一点都不夸张。要是谁半夜起来小便，他的位置不见了，他只能把睡在最外边的人用力猛推，才挤出一个位子。

以上是上海市监(这是上海市监狱的简称，犯人、干部都这样说的)的日常生活。

监 房 内

我进监第一天，已经是下午傍晚时分了。吃过晚饭，事务犯来给每人写了名牌放在监房门上的一个框架里，我的番号是 6641，这是按进监先后，早在照相之后就排好了。金振华是 6638，刘永达是 6639，吴继玠是 6640，唐千根是 6642，我同房另一老头徐志舫是 6643，秦文彬由于曾寄押在上海市监狱，先前已经有了 8359 的番号，就沿用下来了。寄押，那是因为分局拘留所人满为患，关不下的人被暂时关到提篮桥监狱。

由于秦文彬在上海市监狱关过一段时间，知道作息规矩，他一一向我们介绍了。睡觉时人人都推来推去，不愿睡便桶边的位置，我自告奋勇叫大家不要争，我睡。秦文彬说，今后大家轮流，不能让一个人老是吃亏。

次日早餐后开了门，事务犯叫大家坐好开始学习。有个姓李的队长，到我们小组逐个问了刑期，及“犯什么罪？”结果选中了一个判 5 年的盗窃犯李金和当值星犯，金振华当记录犯。小组里除了我们监房外，其他都是从南汇县来的。内中有一个姓周的农民，为人极老实诚恳，只因议论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判决书中就被写上“用尽人间最恶毒的语言，丧心病狂地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当时几乎所有的判决书都是千篇一律的。不久，李金和被调去当劳役犯，其他监房也有所调动，值星员换了位姓关的游泳运动员，他监房里有位老人，是上海诗会的，他有时亦作词，记得有首打油清平乐，寓意狱中天天吃茄子：

“昨日六蔬，今日又茄子，笼中盘餐无兼味，天天六茄相饲。乐迦山上高僧，时刻打坐念经，只因凡胎未脱，心中独想开荤。”

另一首是沁园春，是他女儿来探访时，得知妻子因病不能来，儿子又调往新疆后所写下的。我已忘了大部分，只记得些断句：“花随春去，月为云淹，鸟被弦惊，叹家园寥落，九秋蓬散……老妻多病，孙子远离，百感丛生……朝朝枯坐，夜夜孤灯……。”内容悲惨，那位吴姓难友说，王老边写边落泪。

被抓进来判刑的，大多是为了一点小事，下面举几个例子。一个年轻人，外号小江北，讲话苏北口音，平时爱开玩笑，在监中也常笑声不断，番号 8165，我说谐音就是不亦乐乎。据说他在做工时，有次谈论毛泽东诗词，刚好他痔疮发作，就把《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那首最后两句改成“天亦有情天亦老，人间正在生痔疮”。这下可惹祸了，有人去报告说他讲“毛泽东的嘴里生痔疮”。被捕后，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引诱下，他先供认说他讲过毛泽东是生嘴疮，结果越弄越糟，以恶毒咒骂伟大领袖罪判了八年。另一个青年农民，生产队小队长，快要结婚了，只是家中地板破了，又买不到木料，夜间把路边的毛主席语录牌拆了修地板，他是在结婚的婚宴上被抓的，大家说这很有戏剧性，好像《基督山伯爵》一书的主人公邓蒂斯，他被判 7 年。另一位拆了语录牌为丈母娘家修地板被判八年的是个雷达兵的排级干部，崇明人，丈母娘家离他驻地很近，说每次回家丈母娘就煮八只水浦蛋给他吃，他判决书里的罪行是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踩在脚下。

另一位原是店员，一向胆小怕事，文革中总是在单位里抄写毛主席语录供别人张贴，以为这样万无一失。谁知一次抄好，有人直着上下来读，竟是打倒共产党，这不得了，“借张贴毛主席语录为名，行宣传反动口号之实”，被判 10 年。

在监房里面，金振华大多是讲他在外面行医的故事，徐志舫也只有听的份，何况他文化程度不高，报纸看不懂，那时也没有拆纱头，所以不时地打瞌睡。秦文彬向我讲述了他在寄押时遇见的同监犯人老严。老严原是国军机枪连长，49 年之后在上海某厂当工人，但仍从事国府的反攻复国工作。老严谈到在江西的山区，有他们的据点，那是从浙江的江山出发，有公共汽车经浦城、水吉，那是公共汽车最后一站，要步行或坐牛车进入江西山区，以都为名称，外边是六都、八都，越往深山越荒凉，据点就在 64 都之后乃至 128 都。那边的居民自给自足，偶尔到水吉等地用农土产品交换盐、工业日用品。这些居民都是以往国军的旧部，因此，如果有机会逃跑，那边也是一条生路，可以暂时栖身。老秦为方便记忆，写下了：“江山真美丽，清城有特色，水吉光明自由六四都”。接着，老秦给我看了他的语录本上老严替他画的一个暗号，说到了那边，如出示这暗号，人们会收留。那时，老秦对我说：“我见你为人靠得住，才把此事告诉你，你要注意，不要随便告诉别人！”接着，他拿起我的语录本，也照样画了暗号。

当时我就觉得有些不妥，问他是否另有人知道这事，秦说另一人叫仇福林也是十分靠得住的人，叫我放心。我说，直接写在语录本上不太好，不如将它画到如鞋舌，或其他地方，到要用时，再描到语录本上也不迟，秦说我这是“多此一举”，谁知日后，倒是被我讲中了。

不久，我们二楼的犯人全部搬到五楼，我们仍在 45 号监，五楼只是打扫了一下，看来以前没有关人，在墙上还刻有字：“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在监中客客气气，出牢狱各奔东西”、“大家起来赶走日本鬼子”，还有总理遗教，整篇的孙中山遗嘱。最有趣的是：“真高兴，戴先生身体好，请你救我们出去。”看来这些都是在日占时期刻的，另有每日菜单，有红烧肉、牛肉……看来那时伙食不错。

我进监过第一个春节，是在军管之后不久。先前已经提到，那军代表认为犯人伙食太好，因此 69 年的春节没有改善伙食。不久，可以写封不到 100 个字的信回家。可以每月一次接见家人。犯人要填写接见单，其实就是一张明信片，把家属姓名地址写上。文革之后，不准送吃的东西，送物包括日用品，洗脸盆、茶缸、牙膏牙刷、纸、笔以及衣服、被子等，都得在 100 个字之内。有位难友写信告诉他母亲春节吃素，他将样板戏京剧红灯记中李奶奶的话改写了一下：“妈，每逢过年我要吃斋，你不让我吃，今年，政府请我吃！”

上面要我们交出军装，要染色，可以选咖啡色或深兰色。我一共有四件上装，其中两件我包了起来寄放在仓库里。另外两件给染了，拿回来是黑色的。而军装裤是蓝色的，没有染的规定。

几个监狱中的名称

反革命被称为‘撒字头’，因言论，判决书上称之为攻击污蔑的叫‘口腔科’，企图偷渡，即使是谈及想越境去香港的，罪名就是叛国投敌，叫做‘翻墙头’或叫‘穿横道线’，收听敌台的叫‘中耳炎’，看“反动”小说或“黄色”小说的叫‘红眼睛’，盗窃叫‘开窑堂’，姦污幼童的叫‘孵小鸡’或‘骑小马’等等。

接 见

第一次接见那天，吃完早饭队长把门打开，事务犯跟在后面，关照大家“准备接见，不要把门碰上”。不久，事务犯到某监房前，喊犯人的番号姓名，犯人走出按叫喊的次序两个两个排好，队长点齐人数，走出监狱大楼。监狱大楼，除了工场——包括仪表厂、印刷厂(中小学生课本是在监狱里印的，还有政府文件)，伙房分成 10 幢。犯人在监内，分 10 个中队即 1 号监是 1

中队，2号监是2中队，依次类推，其中4中队是伙房工作及仪表厂的犯人，5中队是印刷厂及机修。6中队叫“出入中队”，以往新犯人先到6中队，再分到各中队。而犯人调往外地劳改，也是先调到6中队集中。7号监通常空置不关犯人，但人多时会开放。8中队叫休养监，是病号出了院，但又不能回到平时监仓，尚需一些治疗或照顾的犯人住的。9中队是女监。10中队是医院。9中队的式样同其他监仓不同，是红砖的，鸟瞰时呈丁形，又叫甲格牢监。10号监是10层高的大楼。以往1号监又叫大刑监，是关押被判15年以上犯人的，2号监大多是刑事犯，3号监大多数是反革命犯。但到了文革，就有些不同，1号监有时也有被判15年以下的犯人，但没有被判15年以上的关到3号监。而2号监亦有数个反革命犯，但不多。3号监刑事犯也不在少数。

整个上海市监狱就像一社区，经过一幢幢的大楼，再过一道围墙，就到大礼堂。这大礼堂原先是一块空地，礼堂是在50年代中后期造的。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犯人就是在这空地上整批整批地被枪决。

在拘留所里，番号882的刘士荣告诉我说起当年镇压反革命时，枪毙人除了在上面所说的空地上，甚至在监狱两幢大楼之间的篮球场里；又令我想起我的大姑母，父亲的大姊凤嫦(Florence)当年面有惧色地告诉我们，当时她就住在虹口，说每天下午就开始拍拍声不断，最初居民还以为有人放鞭炮，后来发觉不对，才知是人民政府在枪毙人，这枪声一延续了好几星期，吓得小孩都不敢大声哭。顺便提一下，大姑母在1952年间同她的唯一女儿名梁雅云(Jean)去了香港，前几年雅云姐曾有信给我堂哥时雍(Sidney)，说她在夏威夷，她们一家刚去了印度去朝见达赖喇嘛。

大礼堂平时用来开会，诸如上大课，加减刑大会，放电影，每月一次的接见，也在大礼堂进行。家属根据接见信的日期，一早就在监狱外面排队，根据交入接见信的次序，由干部带领进入大礼堂。每批接见约20人，依次序分组排好队。礼堂中间，有一约三米宽的长桌，这里，犯人就会看到亲人在桌的另一端。接见时，大家高声讲话，家中送的物品，早就由队长仔细检查过，放在各犯人的后面的长凳上。谈话不到十分钟，队长一吹哨，犯人就依次排队从另一边门出去，家属当然也散了。接着放下一批进来。

我第一次见到父母，父亲流着眼泪，用广东话讲：“都系高佬唔好（都是高长脚不好）。”我会意到监里或许不准讲队长不懂的方言，就说还是讲上海话，不料我身后的干部笑着说“唔使！我系广东人。”正在互相问好之际，又来了个队长，恶狠狠地推了我一下，说：“不准讲隐语”，我只好开始讲上海话了。接见结束时，那广东队长轻声对我说了声：“真不像话”。这队长姓瞿，接见之后有一次他开我出去，见到我穿的是军服，问了一些我的过去及家里的情形。他说他是刚从海军复员，派到监狱。接着，当然是队长的老八股，要我“相信党的政策”，“认罪服法，好

好改造”。初时他见到有的犯人上了紧铐，他会去开松些（因为不是他上的铐，他是不能卸掉的）。但是过了不到一年，这些和善的态度完全没有了，对犯人凶狠异常，动不动就上紧铐，以虐待犯人为乐。

那个推过我的高个子队长姓丁，不管我们楼面。一天开门叫我出去，他见我穿的是军装，问了我以往当兵的情况，我没有告诉他我只当了一年兵而提早退役。他说他也是部队来的，“看你还有军人味道，还是当官的呢。”我告诉他我没有当过官，只是复员后领了干部制服，四个口袋方便些。他又说：“你不介意上次推了你？你的态度还不错。”我笑着对他说：“没有军人味了吧。”接着他又开始了队长的八股，什么“你是受过党的培养，要相信政策，接受改造。”

另一次接见，我旁边的犯人刚离婚，那妻子恶恨恨地大骂他，他所要的衣服都没送进来。那丁队长对她说：“你这女人也太厉害了，你不要以为离了婚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你仍旧是反革命家属，凡是方某的东西，明天就送进来，否则我通知你的单位，好好地把你斗一斗！那个犯人叫方惠良，中学教师，在反右时，他的老婆正在争取入党，于是揭发她自己丈夫的“右派言论”，企图立功表现自己，谁知上级说这些言论必定是有问有答的对话，于是夫妻双双打成右派。

最初几个月的接见，我总是同刘永达排在一起，因为我的父母同刘永达的妻子认识，我们家也住得近，家属在监外排在一起。我总是见到刘永达的女儿，她只有四、五岁，趴在桌子上，但三米宽的桌子，刘永达想摸一下也摸不到，初时几次接见，互相都禁不住流泪。

在上海市监狱关押期间，曾经有两次接见是在一个走廊里，有一排由铁丝隔住的窗，每个窗的两边有木板隔开，犹如集体淋浴室似的，只是背后没有门。家属在窗外，只一窗之隔，讲话不用大声叫喊，我感到自然多了，那些隔着的铁丝网都不在乎了。据说，50年代初期或以前，都用这种方式接见，但一批人数有限，所以改在大礼堂。但特殊的个别接见，还有另一种形式。

监中生活片断

在初进监的一年中，允许一个楼面的犯人到下面洗衣服，大家把要洗的衣服放在自己的洗脸盆里，带到楼下的放风场，在两幢大楼中间，比一个篮球场大一些。劳役犯操橡胶水管，犯人各自洗，完毕将湿衣带上楼，在自己监房前的通风口栏杆上绷好绳索，衣服就晾在上面，干后可以叫劳役犯收，或在学习时自己收。不过，一年之后，出现了“反革命集团”案，犯人洗衣取消了，各人只能在监房里面搽肥皂洗，由劳役犯分组到下面过水，再带到上面晾。但由于劳役犯不会过

得干净，而肥皂又是用腐败了的油脂制造，衣服会发臭，犯人们只有自己省水，化整为零，一件件洗，在监房里晾干。

衣服不能晾在铁门上，不单队长不允许，劳役犯事务犯看到也要干涉，而三面水泥墙又没有钩，犯人们想出一个办法，用线系辫成细绳，绳长大约 40-50 公分，绳的两头，分别钉在一块一寸见方的布上，那两块布的一面搽上米饭，贴在墙上，相隔 30 公分左右，等米浆干后，相当牢固，汗衫、短裤都能晾。

中国的里弄、单位、学校都由共产党工人员控制，人们的一言一行，只要他们看不顺眼，就可以将之送进拘留所，或在单位隔离审查，由他们决定送劳动教养(劳教)或劳动改造(劳改)。劳教算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必经法院判决。上海的劳动钢管厂、劳动电焊机厂、安徽的白毛岭、大丰和君天湖农场等都是劳教单位。劳教没有期限，当局认为犯人表现不好，可以一直被劳教下去，解除了劳教，就是劳教就业人员，这叫留场，不能回家，仍要留在工厂、农场。一年可回家探亲一次，一星期可以往镇上买些东西，外出当然要领队批准才行。劳改是经法院判决的属敌我矛盾，劳改有期限，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无期等等，但刑满之后，就是劳改就业人员，同劳教就业人员一样，没有自由，其实劳教同劳改，没有多大的区别。过去的右派分子都送劳教，但有很多劳教分子，上面认为表现不好，再被判劳改的比比皆是。

69 年间有数次下楼观看文娱演出。最初，是由劳役犯中几个从农场来的犯人表演，以前他们被判劳动教养。文革中，再判劳动改造，关进监狱。这些人穿上新的犯人制服，每人一本毛语录，一边齐喊“毛主席万岁”，一边上场，唱的不外乎是“三句半”及一两首当时的“革命歌曲”，常常唱得走音。不久，来了批新犯人，他们中间有上海合唱团的吕海生、上海管乐团的孙季斌和潘音。舞蹈团的伴奏彭永清，手风琴拉得很熟练，他把林彪谱的“老三篇”拉成节拍鲜明带爵士乐风味的曲子，又把那首“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拉成三拍的，令人耳目一新。演出的阵容强了，歌唱家吕海生一唱，其他中队的队长也过来听，最受欢迎的是乌苏里船歌和赞歌，连监狱外面的居民都打开了窗户听。但好景不常，当局制造了一起“张弛、吕海生反革命集团”案，不仅音乐组的人员，整个三楼楼面大多数人都被牵连进去，文娱演出也不再有了。

我所知道的“张吕集团”，只是一些零星的材料。这个组织叫工农民主党，张弛同吕海生当初被拘留在上海第二看守所，同一监房，两人都曾参加过志愿军。他们先后判刑之后，都关在 3 号监的三楼，当局指称张弛、吕海生为首，组织了工农民主党，搞修正主义，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策画越狱，上山打游击，逃到国外。他们在外面的联络方式是不论男女都提一手提包，站在市区的图书馆前，手提包要露出一本畅销杂志。结果，张弛由 7 年加刑到无期，吕海生由 8 年加

到 20 年。他们在邓小平复出之后都平反出狱。但我知道有一个叫鄂铭的年轻人，右手被铐成残废，除了姆指有些力之外，其他手指都不会动了。我从五楼调到三楼，同他同一小组时，他对我说，早知道这样，他就胡乱交代，瞎写白写，苦头或可少吃很多。

我希望读者中有亲身经历“张吕集团”的，把详细的情形记录下来，公布于世。

一打三反

我介绍一下所经历的另一个反革命集团——“陈金反革命集团”——这是个所谓的社会民主党。

当局揪出张吕集团时，正值“一打三反”运动。那时队长做报告说：“只要社会上有一阵风，监狱里的反改造分子就要掀起一层浪。”三楼出现了张吕集团，因此三楼近楼梯的前面一组办起了学习班，底层的几个监房，还有另外一个大型学习班，整天对“集团成员”进行批斗，或上铐，或坐喷气式飞机，迫使成员“老实交代”。

不久，五楼前面也办起了学习班。一天，事务犯把秦文彬同我的“毛泽东语录”收了，我立刻知道出事了。秦文彬头脑还算清醒，他说反正严永全已经被枪毙了，一切都是他出的主意，何况我们又不清楚外边情形，如果如实说了，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过了一、二个星期，我被调到前面的小组，但并没有参加学习班的学习。同房内有以往来同济讲过课的潘宗岳教授，另外一位姓茹的，是菜市场会计，因贪污被判 7 年，是刑事犯，颇善良。他每次写报告，总是写“刑事罪犯茹 XX”以示他在犯人中高人一等。另外一位姓张，精神不大正常，但从不侵犯其他人，是因为年轻时曾参加工福会足球队，被判 15 年，罪名是“工贼”。他总是说自己从不偷东西，还有一老母亲，每次写信总称自己“犯儿”。潘教授是浙江湖州人，是潘公展、潘铭新等国民党元老の堂弟，因此被定为恶霸地主出身。反右期间他是大右派，被劳动教养，后在劳动电焊厂当总工程师。文革中说他咒骂毛泽东，被判 12 年。他有时被叫去参加学习班的学习，只是在一旁听听。我在这监房住了大约一星期就被叫到学习班。之前，我对监房里的人介绍过个人的情况。

这是一场批斗会，说我参加了“小圈子”。主持批斗的是一个姓李的队长，戴一副金丝近视眼镜，个子不高，脸膛不胖，但身上很结实，犯人们说他像盖世太保，平时讲话还会露出一两个英文单词，所以犯人们觉得他文化程度颇高，有点“来头”。我被人按倒在地，边上的人大叫“跪下”，那姓李的队长打了我一下耳光，骂了句“你娘的落材！”他讲上海话。

这一两天，吴继玠也受到批斗，被戴上了飞机铐，我当时正坐在前面小组学习，他大叫“阿弟呀，我对不起你！我害你进来，现在又对不起你呀！”

这话我后来才明白是什么意思，这也是我听到他讲的最后一句话。

酷刑

上海市监狱使用几种不同的铐法，其中一种是英国制的铐，一个圆柱，上面有一孔，柱顶有钥匙孔，柱边有一洞，另一端安上C形锁，一格一格，头上可穿进柱边的洞，以扣紧手腕，C形好似羊角铐，两个铐中间有一小铁链相连，平时押送犯人就是反手铐上。

一次军代表在报告中讲到共产党讲究政策，不打骂犯人，但犯人反改造，可以带上刑具——即手铐，越反动就应铐得越紧。以后各式各样的铐法就出来了。

穿心铐，两只手腕先后被铐住后，C形锁角从第一只手铐中穿过去再锁上，只须铐得松松的。十分钟之后，手腕开始痛，而且越来越痛，但又不会痛得昏倒。狱方用这方式逼供，要到供完才开，到时皮已磨破出血，（因为两手臂是平行的，而两铐圈却有角度），我的手上至今疤痕还可见。

扁担铐：北方监犯叫“苏秦背剑”。一只手由前面过头伸到背后，同另一只手在背后相接而铐上。韧带松的人，比较容易，韧带紧的，要两人硬扳才铐上，约20-30分钟，人因韧带紧扳而昏过去，除了痛之外，还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即使韧带松的人，几次以后，韧带受伤，也会变紧。

飞机铐：手铐铐在两边上臂，由于一副手铐距离比两臂短很多，要有两个人将被铐者的肩向后扳，才能铐上，据说这部位有一穴道，铐上之后，会觉得内脏在翻腾，这痛苦是无法形容的，比起扁担铐痛苦多了，被铐人15-20分钟后会晕过去，不久又醒，但过10分钟左右又再晕过去，而且周期越来越短。如果上铐超过7小时，双手双臂因血液不流通会造成终身残废。

猪猡铐：双手前铐，另一对手铐铐往双脚，犯人弯腰，再用一副手铐将手脚的两副铐子穿起来，将整个犯人吊起，先是手脚剧痛，继而是腰部疼痛，20分钟后晕过去，据说时间一长，人会死亡。因此，一晕过去就会将犯人放下除铐，这倒不是什么仁慈，因为犯人死了，要追究责任。干部之间美其名是互相监督，实则明争暗斗，谁也不愿负这个责任。铐过几次之后，腰部永久受伤，经常腰痛背痛，尤其是天冷的时候，更为严重。

吊铐：双手反铐，再用绳吊起，吊到双脚只是点到地，吊高了要脱臼，干部要负责任，被吊的人所有关节都剧烈地疼痛，10分钟后晕过去。

以上都是我所亲身经历过的，在上海市监狱，就是这么多，其他地方就有待人们再补充了。

第一次受刑

批斗会上李队长问我在监房里干了什么坏事，我回答没有，接着就被上了飞机铐，组员们你一句我一句，有的叫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渐渐地他们所说的我都听不清，我晕了过去。回监房，醒过来，再晕过去。清醒时潘教授对我说，“你这样硬顶实在是 meaningless，你想保别人，别人全说了。仇福林一定把你不知道的都和盘托出，秦文彬也早写了一叠材料。”接着他大声叫喊，“报告队长，6641 愿意交代了！”李队长来了，潘说：“他想通了，要交代了，不过也请你打开他的铐子，手都肿了，恐怕会残废。”

李队长带我到前面办公桌前，替我开了铐，要我把手放在桌上，回监房后要举起，否则“你的手完了”。他问了些问题，我也把秦文彬告诉我关于严永金的事说了，李问我为什么秦要在我的语录本上画上暗号，我也照实说他说我靠得住，这时李冷笑几声，说秦还算老实，“你靠得住，但是秦文彬靠不往，他把你卖了！”我会意到他在挑拨，他问我秦平时讲些什么，我推说他好多半时间在打瞌睡。他说，“你看，如果说了，可以不吃苦头，你所知道的只是一点点皮毛，其实秦文彬什么都没有告诉你。”我说：“我也不感兴趣，是真假我都不清楚。”于是他让我回监房。

老潘告诉我，在我被调到他的监房之前，小组批斗仇福林。那李队长一拍桌子，仇什么都讲了，说他很崇拜严永金，一天，他同秦文彬二人跪在严永金前，要严吸收他们。接着，仇又说秦文彬又吸收了我，是秦告诉他的。李队长说他还算老实，同秦所写的材料相符。老潘说他不了解秦文彬，但仇福林本来就不是个东西，他是“吃女人豆腐”（调戏）而被判劳动教养，在劳动电焊机厂当工人。文革中又因言论问题再被判 7 年，老潘知道仇的为人。我感到秦文彬并没有夸大其词，对我的交代也是确如其分，没有使我感到任何压力，我感激他。

晚上睡觉，老潘替我将双手轻轻用衬衫袖子缚住，挂在铁门上，好让血液流通，两天后，肿消了，但右手只能握，而不能张开。

李队长倒没有要我写材料，但我的接见停止了，也不出去学习，这叫禁闭。

潘教授

同潘教授同监房的确有较美好的回忆。

天气渐渐冷了，我家已扫地出门，家中没有多余的被子。我现有的已经破得像猪油渣，那套军用棉衣裤又很薄，老潘让我同他合一被窝，暖和多了。他对我家有些了解，特别是我的外公，曾经营丝绸生意，是有些名望的，而湖州潘家又是在浙江丝绸上有地位的。他是一位极具经验的优秀工程师，教了我很多机械设计上的知识。他教我在铸造、锻造、金属热处理等书本上所没有的经验，我记录下来，在日后，的确大有帮助。我在青海劳改时的设计，乃至到了香港，都用上了他所传授的知识。尽管那笔记本后来被监狱当局搜去了，但我还记得大部分数据。

狱中另一位工程师翁文漪是翁文灏的堂弟，英国剑桥大学工程硕士，是某设计院的副总工程师，因为儿子同朋友打桥牌时议论了文化大革命，说他也参与，被判 13 年。翁个子不高，穿了条西装裤，走路有些蹒跚。有一次，刚开完饭，他的监房门没有关，或许是有人到下面被外调提审，盛装饭盒的木框架就搁在栏杆上，那天开荤，翁老见到有一小块肉落到框架上，他打开门出去把那小块肉拾来吃，虽然那木框很脏，而且肉也沾了砂子，那可惹祸了。劳役犯发觉了，报告了队长，队长下令批斗。会上当然是人身攻击，什么臭知识分子啦，资产阶级思想等等。这时另一个队长来了，见到低着头挨斗的翁老，说：“看哪！那个剑桥大学的高材生，你的绅士风度哪儿去了？还不是只狗熊！偷肉吃！你不怕脏吗？这种肉连狗都不要吃，你是连狗都不如？”大多数犯人，都敢怒不敢言，有人私下说，如果毛泽东落到这地步，还不是一样。我悄悄对他说是谁把一位有教养的人搞到这地步，才是比狗都不如。

同潘教授同监房大约半年多，正如小说中所说的，人间竟无不谢的花，无长绿的草，人间无不醒的梦，人间也无不散的筵席。我被调到了三楼，接见恢复了。表面上似乎事情解决了，但我心中仍旧不安，有着一一种莫名的预感，大风暴将要来临。

调到三楼

三楼同监房的，一是值星犯陈某，在上海教育学院任教，写得一手好字。刘治强是时代中学毕业生，我读初一时，他已是高三了。他同我姐姐的第一个男朋友吴某是同班同学。当时我姐姐陈佩瑜很漂亮，追她的男生很多，外号大鼻头的刘也是其中之一，他到过我家，我们算是相识了。另一位难友，是乡下来的，也是因言论被判刑的，一只耳朵是批斗时打聋的，另一只耳朵也被打得半聋。我们四个相处得相当好。

小组里有刚受完审查的张吕集团成员，如以往管乐团的孙季斌和潘音，因为管乐团就在我家隔壁，孙和潘都说见过我，他们人多，我记不得了。还有一个叫焦上君，是机电一局党委副书记，

他自我批判说：“我出身恶霸地主家庭，那个狗地主父亲因骂了句‘东洋小日本’被日本鬼子杀了，我一气之下，混进了八路军，混进了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服批斗，反动本质大暴露，竟辱骂伟大领袖，判我7年，是我罪有应得。”焦被判刑7年，初入监时，还摆老干部资格，被认为不认罪而遭批斗，饱受拳脚之苦。我见到他时，官架子完全没有了，对当时的政策，也流露些带刺的话，我感觉他还是颇直爽的。最令他气愤的是一个曾经当户籍警的人，此人姓陆，由于借了当地居民的钱，被追债，因而怀恨在心，写匿名信诬告，致使那居民被拘留审查。哪知办此案的是公安局里的另一造反派，查出那匿名信是诬告信，姓陆的被判7年，入狱后装疯买傻，屡遭批斗，但没有任何人同情他。

聪明的小陈

同监的那乡下难友调走了，补进一姓陈的年轻人，名字陈玉林。他告诉我们，他是个扒手，判五年。他很好学，他要刘治强讲《基度山恩仇记》的故事，刘记性很好，从头至尾讲了两天。接着，他问什么是化学反应，什么是方程式，原来，他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他是我碰到的最聪明的年轻人，代数、几何，一讲就通。刘治强教他无线电路图，他也很快学会了。他说以前常在火车站、船码头专对出差的解放军干部下手，一是他们钱多，二是他们的钱丢了，是公家的。他说：“我最不愿做伤阴德的事。赚钱是用合法的手段，将别人的钱往自己口袋里装，我只是用了非法的手段，实质不是一样么？”

他还问我们什么是圣经，我花了大约三天，同他讲旧约的故事，也介绍了一些新约的内容。另外，我向他讲了圣奥斯定和他的母亲圣摩尼加的事迹和圣芳济的事迹。他认为一个人曾经荒唐过而能改邪归正，是不容易的，圣人才能做到，他十分佩服。

如果那年轻的小陈在正常的环境下生长，说不定会成为杰出的科学家。是社会把这聪明的小伙子糟蹋了。后来我在青海听另一难友说，小陈出狱之后，仍操旧业，再次被捕，判了十五年，我真为他可惜。

风暴前夕

我被调到另一面的监房，关了数月。一次有了大调动，调来了一个老四川。监仓只有我们两人，他对我看了好一会，摇了摇头说：“好险呀！”我正纳闷，他说：“你放心，虽然你遭遇杀身之祸，但一切都会过去。我看你是信教的。”这时他指指上面，“有他保佑，你没有问题。”

我当时充满疑虑。他又说：“看你的眼睛，你是信有两个指头伸着的。”“你怎么知道？”我问。“我是船上做的，各式各样的人见多了。不过你是个好人，不会害人的，我要帮你。今后碰到任何灾难，千万不要认为你是孤立无援的，有他在。”他指指天上，“你一定要坚持。”我们互相介绍了自己的情形，他是在成都一个法国人办的天主教中学毕业，信了教。他背了段法文诗，我听不懂。接着他唱了段 *Veni Creator Spiritus* 的拉丁文歌。他说曾在重庆附近的渡船上管轮机，当年蒋介石搭乘过他工作的那摆渡船，他因此成了历史反革命。被捕之前他在上海柴油机厂工作。

下午，监房又调来了两人，一是个老绍兴，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另一中年人，自称原是商业局的科级干部，名叫丁金山的刑事犯。这人官腔十足，因此大家说话就小心起来。那老绍兴只顾念毛泽东的诗词，但有两段他念得很有趣，“如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他会停一下，“哼！你个人还欠惜！？”（绍兴话，意思是你这人还不够坏吗？）然后再接着念下去，此其一。另一段是“江山如此多娇……惜”，他又重复上面那句话，他是在骂毛泽东，但那个“科长”听不懂绍兴话。此外，老绍兴平时会不停地唱音乐，*do fa mi ray do fa mi ray do do do do*，而且是不断地重覆这一段有大约半小时以上之长，当然犯人也或多或少，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会神经衰弱的，只是表现不同，一天，那个科长打了份报告，检举老绍兴在监房里哼唱反动的日本歌曲《大东亚进行曲》，不久有位队长来了说，丁金山！你说XXX唱《大东亚进行曲》，我年纪太轻，没有听过，而且我也问过好多年纪大的，都说没有这首歌的，现在你倒给我唱唱，我不说你唱反动歌，唱啊！这时那个丁金山急了，说他是一直不停地“淘来米”地唱，我觉得是反动曲调！这时，我说是托儿所小朋友唱的“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小朋友”的歌，最后一句是“拉起手来跳午”；顽皮的小朋友就改成架起手来惹污，他哼的就是最后一句。我的话逗笑了大家，接着那队长说：丁金山！你打小报告诬告他人，目的就是要搞乱改造秩序，破坏改造环境，给政府造成麻烦，小组里要好好地把他斗一斗！

不久，丁金山调走了，进来了一位姓俞的年轻人，他原是俄文老师，也是因为言论被判5年，他当过劳役犯。一次有人在劳役犯劳动场所发现“反动词句”，认定是俞写的。在各种手铐的严刑之下，他被迫承认，估计会加刑到15至20年。谁知一次批斗会，另一犯人自己承认曾写过这词句，俞才得以解脱。但上面说他“事出有因，平时思想言行反动，暂时不予算帐，如果再反改造，新帐旧帐一起算。”这就是狱方对他的结论。幸好他铐的时间不长，飞机铐只铐20分钟，手是肿过，肿消了就没有大碍。我当时仍然是只能握紧，而不能张开，我以为将永远残废了。

张吕集团一案似乎已经搞完了，底层的学习班还在热火朝天地批斗人。出了个陈金反革命集团，为首的是个青年叫陈忠人，是前蒋夫人陈觉如的养儿子的儿子，父亲陆玖之，据说曾是地下共产党员。文革之时，陈忠人被认定是蒋介石的“外孙”，被判7年。

吴继玠的母亲是浙江湖州姚家人，同陈觉如家有亲戚关系，所以吴同陈在以前见过面，入监后又重逢了。由于年龄相差悬殊，彼此也没有说过什么。同我一齐进监的金振华，后来调到陈忠人同一监房。狱方认为，蒋介石的外孙，一定反动，会组织反革命集团，因此杜撰了一个陈金反革命集团。金振华是中医，中文底子好，当时陈只是21-22岁的小年轻人。

三中队在大礼堂开大会，重点批斗陈金反革命集团。戴金丝边眼镜的李队长讲话，通篇是四个字的成语，把不遗余力读成不遣余力，把自己很有文化教养的面具撕了下来，犯人们都说不知他讲些什么。记得他最后一句是纸船明烛照天烧，以后大家私底下就叫他纸船明烛。

学 习 班

我被调到底楼的学习班，学习班有三个监房，连我在内，一共十二人。值星犯汤明，原是卢湾区副区长，曾参加过志愿军。此人是十足的党棍，文革中被定为走资派，不服批判，被判7年，在狱中为虎作伥，是批斗犯人的打手。他津津乐道地回忆他当志愿军时，如何用香烟去烧炙美国俘虏的生殖器以取得口供。

在学习班吃完早饭就开批斗会，直到午饭进监房，午饭后又开会，回监房晚饭，晚饭后，又开会，到晚上队长锁门睡觉为止才结束。

我是唯一被斗的，站着弯腰90度，久了，腰疼得不得了，跌倒了，一阵拳脚，再弯腰。队长审问我如何教唆陈忠人组织反革命集团。最初我还相信事情会搞清楚，因为我对“集团”一无所知。我同陈忠人只讲过二三句话，介绍自己是吴继玠的好朋友。我能讲的，也只是秦文彬告诉我的关于严永金的事。队长说，“你老是提严永金这死鬼！不要讲了，这鸡毛蒜皮的事，我们没有兴趣，讲主要的！”

他要我交代“组织”的名称，说参与起名称时我也有份，我更糊涂了，这是哪里来的事？我想一定是他们搞错了，或许有人在诬告我，拉我下水，他可以脱身。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全部是一个假案，从头至尾是由狱方设计的。

学习班将我折腾了两个月，我对那集团，还是一无所知。最后我被调往 1 号监。在此期间，腰部疼痛得好像要断了似的，臀部、手臂、大腿，又被人踢得青紫红肿，幸好没有伤及内脏。最后，决定将我调到一号监。

一进 1 号监，我心中倒有一种莫名的高兴，我可以见到以往没有见过但十分崇敬的龚品梅主教了。或许也可以见到我的表兄，不知他这个资深工程师是否已调到工厂劳动了。

1 号 监

我被关在二楼东部第一小组，监房内一共四个人。一个是讲话带镇江口音的殷止庵，他是值星犯；另一个老年人姓洪，安徽人，另一个是年轻一些的，姓王，比我年龄大些。

殷止庵很会讲话，滔滔不绝地解释“坦白从宽”，说他看得多了，监狱里无论多么严重的事只要坦白交代了，通常都不处理。“你看，队长不都是保护犯人的么？”他问我被外调提审过没有，我说有过几次，记得有一次我看到外调的人打了另一个犯人的耳光，队长见到了，立刻停止了那些外调的人的审问，把他们赶了出去。殷止庵马上说：“可不是么，队长就是要犯人不受到伤害，怎么会加你刑呢。”姓洪的老人也在一旁附和，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国民党军官，同共产党打仗判了 20 年，是宽大的了。

1 号监的监长姓李，我一去，就同我谈话，一口上海本地口音，笑嘻嘻地说我的问题不大，只要老实交代就没有事了。不过，千万不能在监房里调皮捣蛋，否则“把你铐起来！”

最初几天，对我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不让我出去学习。放风还是让我下去，我见到了表哥，我们只能用眼光互相问好。排在第一的是龚主教，上身穿着蓝色的警察装棉衣，下身的棉裤是蓝色军用或警察用的，一双军用棉鞋。

小组学习我虽不参加，但见到的组员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位高瘦个子方镇，年龄 40 多近 50，头发花白了。他十分有礼貌，每次见到都点头打招呼。殷止庵不止一次地说他又顽固又反动，叫我提防他。但我对他印象极好，他写字十分工整，没有一个简化字，可见他意志的坚决。可惜后来我听说他身体不支死在狱中，等不到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平反的那一天。

不几天，1 号监的犯人全部搬到 7 号监，71 年的春节，是在 7 号监过的。春节不久，又搬回 1 号监，原来地板全部换新了。

对我采取的行动开始了。一天开了个批斗会，由殷止庵、王高明、刘明华和陈希吾对我批斗，我只是站着，也没有叫我弯腰，他们也只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这叫“帮助”。帮助了一天回到监

房，殷对我说，由于他掌握会议，所以没有激烈的事发生，他是完全按照政府规定的政策，“如果你再顽固下去，我也管不了的。”

下面几位是“帮助”我的犯人。

几个犯人王

殷止庵自称是镇江人，出身破落地主家庭，母亲是一善良女姓。他早年丧父，到上海学生意谋生，进入报馆从杂工、办事员做到部门主管、科员和科长。他早年加入国民党，继而加入共产党。1927年声明和共产党“决裂”。日占时期，任汪伪政权政治保卫局镇江站站长，直接受马啸天指挥。他逮捕到抗日志士，软硬兼施，发明在便桶中点燃腊烛，迫使受审犯人坐上，犯人忍不住火烧肛门的痛苦，被迫招供。1944年，他见到日本侵略者行将失败，“弃暗投明”，率部加入军统局的忠义救国军。1948年，又“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被派接收上海市公安局，但不久即为共产党逮捕清算，被判无期徒刑，罪名是特务。他的被捕也颇具戏剧性。那天他率领手下去捕人，抓了九个回局交差，上级说少了一个，他说没少，上级说少了个殷止庵，他也被捕了。他在监狱中仍用其特务手法，将犯人情况不断向当局汇报。当局利用他作打手，专斗犯人。此人能说会道，中文程度颇高，写得一手好字。有人问他不认识的字，他除了解释之外，还附带一个成语。他似乎也懂日文，狱里后来关了日本犯人，有干部来同他用日语交谈，殷侧着头很仔细地听。同监犯问他那日本人讲些什么，他忙说：“不不不，我不懂日文，我只是一时头昏，刚才有些不舒服。”殷止庵的学识是很有限的，有次有人问他“什么是哲学”，他回答“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无产阶级哲学，也有资产阶级哲学，各人又有自己一套哲学”，说了半天，也没有明确的答复。

他总是这样“批判”自己：“我以前总以为自己很注重道德修养，洁身自爱，以此掩盖我的反动本性，这是最可恶的。”他满口仁义道德，装得道貌岸然。他的生殖器上的伤口，已经十数年不愈，不停流脓，懂医的人一看便知是梅毒，而且已经扩散到他的面部神经及眼。他的面颊不停地抽搐，有人背后叫他歪嘴。他的眼一直是红肿的，不停流泪，他老是问医务犯要眼药水。医务犯告诉他，“你这是梅毒性沙眼，医不好的！”他曾减过刑，改为15年。在70年，又减为5年，75年刑满，但仍留在监狱里劳动。

王高明是惯窃，49年前已多次入狱，跛足，据说是逃跑时被打伤的。他认字是在监狱学的。从报上和别人嘴里也学了东西，会说出“北京最长的马路就是长安街，全世界最大的王井府

（王府井）百货公司就在长安街上等等”。他是属于积极靠拢政府，汇报、同反改造分子作斗争的那一类犯人。当局用他作打手，在监狱除他之外是不允许穿木屐（木拖鞋）的。在斗人时，他用木屐打人。75年被我打了一顿，日后仍不见收敛，依旧恶声恶气地斗人，他从未减过刑。

刘明华，强盗，48年同警察驳火，杀死了警员，被判无期徒刑。共产党接收监狱后，由于他是江洋大盗，维持原判，这称为“伪判”。他一向是监中的打手，动辄殴打被批斗对象。75年间，在我打了王高明之后不久，他亦遭到另一年轻犯人痛打，从此收敛不再打人了。

陈希吾，国民党尉级军官，有外遇遂谋杀自己妻子，被军事法庭判无期。49年之后，共产党维持原判。他自称是少将，有时又说是中将，也是属于积极靠拢政府的积极改造者，斗人时他总有份。我知道他在70年代末被释放，后来去了香港。不知他从那里得知了我的电话，打电话给我，解释说他以前在监内有“苦衷”，要同我见面，好介绍些生意给他。其实那时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说：“你有什么苦衷？当时你是多么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不要装了，你是少数的几个斗人专家，难道大多数犯人都没有苦衷？”话不投机，我们没有见面。

逼供信

狱方见犯人“帮助”我没有奏效，于是由队长亲审。第一次是在1号监外的一间小屋，由军代表、许队长等一大批监狱高层干部出马。他们没有要我讲话，只是重申“党的政策”，接着就是辱骂，不到一个小时，我又被带回监房。

当晚10时许我被叫醒，带到5楼。一到就给我上了穿心铐，审我的队长之中，有姓陆的，姓卞的、姓陈的，其他就是在1号监值班的队长。他们反复地问组织名称一直到早上4时，带我回监房。不准我睡，但替我除了铐，我的手腕痛得难以支持了。这样一直反复了三、四天，我已经疲倦得神志不清了。

在审问中，他们一再提示说，“有一次，你不是在往大礼堂途中向人解释地上阴沟盖板上的字母的吗？”我记起当时有人问我，那板上的SMC/PWD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这是租界时期上海工部局公务处的英文缩写。正说到这当儿，那姓陈的大喝一声说：“关键就在这S字母！”他又提示：“英文中，什么字是以S为首的，而且同组织有关的？”我猜了几个字，当我猜到SOCIAL时，他说：“你早知道了，就是要同我们兜圈子！”于是替我松了铐，放我回监房。往后，日间是个别谈，每到晚上9-10点把我叫醒，马上上穿心铐，一直问到凌晨4-5点。审问时不停地替我上扁担铐、飞机铐，昏了过去，用冷水泼醒，再问。

我得知那个组织有“社会”二字，接着他们又提示另一个关键字母是“D”，如同以往一样，最后我猜到 Democrat，他们又满意了。“社会民主党”的名称终于定下来了，这已经把我折磨了近两个星期了。

当时我的神志已经不太清楚了，我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同我第一次被捕的情况完全不同。那一次是我的朋友，我要尽力保护他们，那怕是赔上一条命也是值得的。这次不同，我不必替任何人负责，如果我再坚持下去，最终将被他们折磨至死，还不如争取一下喘息的机会。

我的东西，连毛泽东选集都被收去了，奇怪的是共产党的九大时出版的那本红旗特刊却让我保留。根据日夜审问的提示，那社会民主党的党章、党纲，就是根据共产党九大的党章、党纲改写的。接着我写出了一份社会民主党的章程、纲领，再经过几天几夜的审问，才得以修正完成。他们要将各人所写的尽量吻合，这叫“材料碰撞！”

接下来就要我交代在组织中的地位。他们说“你当过坦克兵，会驾车会射击，机枪手枪都行！”又说：“你是同济大学毕业，懂工程又懂英文！”

当时我曾猜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他们说都不是，“主席是陈忠人，副主席金振华你是说对了，你不是说过，陈忠人不能文又不能武，金振华只懂中文！”我想我的天呀，我几时说过？但我得记住，这是“我的话”，写材料有用，否则过不了关。

这段期间我突然听到三楼有吴继玠的声音，狱方将他调走，我猜想大概是将他调回三号监，但到底如何我始终不知。

他们提示我，我们的组织仿照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因此有“政治局主席”的职位，吴继玠理所当然地成了政治局主席，我是副主席，这样我们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真正首脑，是幕后策划者，而陈忠人，金振华只是名义上的头头。

在交代中，他们还要我编造出这个社会民主党成立的日期，宣誓仪式，誓言，以及党内的人事关系，总之楼面上大多数人都包括进去了。还逼我交代出一个“顾问”，就是曾当过管教科科员，我们进监时的三号监监长吴中队长，看来，此人在文革中在被打倒之列，别人要整他。

我把这些“交代”视为编写小说，因为全部是虚构的。当然编写并不简单，它完全要附合狱方的口径，他们可能用待我一样的方式，逼使其他人修正和编写材料。事后许多当事者谈到各自的经历，没有人有我所遭受的虐待那么厉害。

反 击

我一向认为自己比较坚强，但这次不同了，每晚上九、十点，听到脚步声来领我去提审时，心里就害怕。但到了楼上，给我上了穿心铐，我反而平静了，反问自己为什么那么软弱，有机会时我还能反击。例如，他们说：“你的问题，就像小葱拌豆腐，你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明白，是一塌糊涂！”

“这怎么讲？！”

“豆腐是淡而无味的，当拌了小葱，葱味进入了豆腐，即使你花了长时间将小葱一粒粒拣出来，葱味还在豆腐里，这叫跳到黄河洗不清！”

他们又拍桌子又蹬脚，我亦少不了吃苦，这次是替我上了猪猡铐，吊了起来。难受之时，我默念天主教经，只念了两遍，昏了过去。

尽管他们可以对我使用酷刑，我还是认为自己打了胜仗，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的狼狈相。另一次，他们又用了歇后语说：“你是瞎子吃馄饨，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明白，这叫瞎吃！”

“住口！你这家伙又要放毒了！”

“让他说，看他说些什么！”

“瞎子看不见。”我说。“有人对他说，他吃的是馄饨，他才知道这叫馄饨。如果另一人说，不对，他哄你，你吃的不叫馄饨，是水饺，那瞎子就弄不清了。到底是水饺还是馄饨，都是别人说了算，那不是瞎吃一通么？”

“把他吊起来！”对我又换了猪猡铐。有时他们的提示，我一时记不清，他们也对我上吊铐。最初审问时，这种酷刑用得最多，一天二、三式，每次都是昏过去后用冷水泼醒再问。有一次例外，有一个队长说你这家伙信教，“哼！在你的上帝面前见到我们，你一定会恶狠狠地说要把我们统统打下地狱！”我回答说你错了，我们信基督的每天祷文都有求天主带领所有的灵魂上天堂，你们当然不例外，咒人下地狱是犯罪的；这时我听见有一尖叫“这家伙在传教！”我说这话题是你们提出的……“把他吊起来！”那队长又尖叫；但这次为首审问的队长却说算了算了，不要再讲这些无聊的东西，我总算逃过一次受刑，后来渐渐地减少了，但仍然每天有一次，总是在我昏过去之后，叫劳役犯把我抬到监房。

无辜的受害者

我还被叫去上大课。一次，有一个叫郭胜虹的人发言，说他同一个医生关在同一监房，那医生是反革命集团的幕后策画者。他说：“他样子凶狠地说，我是医生，以往是用手术刀救人的，今后，我要用刀杀人了！”我立刻会意到，他是在说吴继玠。

另一次开批斗大会，有三个犯人五花大绑。其中一人叫彭晚钟，神志不清。不几日，这三个人全部被枪决。不久又有一次加刑大会，将 1 号监搞反革命集团的十个犯人判处死刑，为首的叫李阿根，沈金良，说他们是香港派遣来的特务，全部是广东人。又说他们准备夺取政府的警察制服，取得钥匙，越狱逃跑。李阿根同监房的犯人告诉我：李在香港一个学校的总务处工作，经常油印学校的文件。他从香港到上海探亲，谁知一到，公安局就将他逮捕，指控他在那学校印了“反动传单”，带到上海来散发，并拿出一大叠传单，说是从他的物件中搜来的。不由分说，他成了派遣特务，判了 20 年。至于传单是什么内容，他到最后也还弄不清楚。如果真要发反动传单，何必在香港印好再带到上海。在上海，油印机腊纸都可以买到，世界上没有这么傻的派遣特务。

那位同监犯人还告诉我，李说他最怕的是提审，那种铐法的痛苦，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李的记性不好，把提审者的暗示记错了，因此一次次地修正他的交代材料，又吃了不少苦头。“到被枪毙时，他们的材料还没有完全碰拢呢！整个案件，都是李监长一手包办，由他汇报上去的。”那同监犯说。李阿根被带走时，来了五、六个队长，他们命李面朝墙，背对门，铁门打开后，又命李倒退，由两个队长以擒拿术将他行反铐带走。次日在人民广场公判，宣判的军代表不停地喊“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次一口气杀了 30 多人，在旁的一男一女带头喊口号：“坚决镇压反革命！”“打倒……！”“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那女的声音尤其可恶。

幕后的头头

对我的审讯大约过了一个月后，那些队长说：“你总是说吴继玠是你的顶头上司，这是推卸责任。你说过扁头只会摇笔杆子，只知务虚，不懂务实。而你是抓枪杆子的军人不会讲话，只会行动(这是引用东德电影《科伦上尉》里的一句台词)，组织让你说了算，这个党你当家！”当时我不明白，他们不要我再提吴继玠，说他被我排挤，只得个主席的虚名，而我这个副的，却真正掌握实权。他们又问到，“如果掌权之后，怎么处置我们？”据说“张吕集团”要对他们五马分

尸。这次我演戏更投入，我说：“你们只是执行任务，将来还让你们干你们的队长，管理犯人你们有经验！”

“你真的这么想，别人同意？”

“我交代过，组织里的事我说了算，别人不敢不同意！”

事后我才知，那时吴继玠受不了严刑审问，他原来身体就不好，加上肝炎复发，对生命失去了信心，被迫选择了一条捷径离开了人世。我决不同意他是自杀的说法，他是被活活逼死的，共产党借用他自己的手将他杀死了。吴继玠的确说过“我们只会务虚，不懂务实。”的话，我也知道他在交代中提到了我，但我一点也不怪他，如果能减轻他的痛苦，我甚至极愿意再多忍受一点。

他们还要我承认，我计划在事成之后，会像刘邦杀韩信，朱元璋炮轰功臣楼一样大开杀戒。说真的，由于我出身在一个十足洋化的家庭，这些中国历史故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历史教科书上从没有这些故事。提审时他们讲给我听，我付出了又忍受一次酷刑的代价，才弄清楚这些故事，而他们却说我在“装糊涂”。

审问、写材料，直到5月份才告一段落。记得那时已经开始穿单衣了。那段时间我每次洗脸，总有细头发黏在毛巾上，到写完材料时，我已成了秃头，连手臂和腿上的毛都掉光了。后来调到青海，一照镜子，我简直不认得自己了。眉毛也几乎掉光了，后来就一直没长出来。

监房里，一日三次殷止庵不停地打报告。每次总有半张报告纸那么多。我的一言一行，甚至他想象中我在想些什么，都写进去了。我每天的睡眠不足2-3小时，但我一打瞌睡他就把我推醒。其他二位同监犯，倒没有对我有任何苛刻的地方。有时他们为了生活问题同殷发生摩擦，殷就声色俱厉地说“你们在反改造分子面前同要求改造的犯人争吵，是什么居心？……”接着，他可以写上三、四张纸的材料向队长报告。

好队长

有二位队长，我很难忘。从医院调来的高个子北方人沈福喜，有些年纪了，看来也是从部队来的。他管劳役犯。

一天提审结束，已经是早上六点多了。提审的人将我交给他，让他带我上楼，他却把我带到底楼的办公室，关上门长长地叹了口气，不住地摇头说：“陈文立呀！你是在拿你的小命开玩笑啊！怎么搞的，你知道自己的后果吗？”

“报告沈队长，我能不知道吗，已经到这地步了，我又能怎样？”

“你明白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呀！”

“你要我怎样实事求是？能行吗？我已经太累太疲倦了，只希望早点处理，我真是没有能力耗下去了！”

“唉！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还是劝你相信党的政策，不要想到歪里去，有一天问题会弄清的。”

“我信天主教，不会自杀的，你放心！”

他走了过来说：“这就好！”接着拍了两下我的背说：“坚持一下，我看你是从部队来的，好歹也是受过党的培养，要相信党的实事求是政策。”然后把我送回楼上监房。

另一位队长年龄似乎比我长一、二岁，我不便提他的名字。他管1号监，如果轮到他值夜班，他就参加审问。每次审完，他送我回监房。每当走到楼梯只有我们二人时，他说：“你逞什么强，吃不消你就叫，大声地叫，否则很伤身体，要损害心脏的。你越是这样，他们越恨你，你吃的苦头就更多！”我听他说“他们”，就明白这位队长同那些审问我的人是两路的。每次送回监房，他会关照让我睡。有时睡了不到一小时，他们又来提我，他总是先跑上楼将我叫醒。白天，如果他值班，总是让我打瞌睡。那殷止庵老是不停地将我推醒，被那队长看到，他就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破坏我们办案么？等他有了精神才能老实交代问题，你这都不懂吗？”殷止庵因而有所收敛。我的问题澄清后，一天他叫我出去谈了一次话。他说，“你是大学生，太天真了。听说队长管教犯人，你们就当我们是老师。错了，我们不是老师，不传授知识。管教管教，关键在管字，要把你们管得死死的，你懂吗？你信天主教，但我不是神父。你向神父忏悔了，神父作个祈祷，你的罪过就赦免了。而这里是很严肃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你向我们讲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记下来，一笔笔同你算帐，你懂吗？你们不要以为我们队长神通广大。不讲别人，就讲我自己，我只是一个小人，微不足道，你我之间的差别，仅仅是一道铁门，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

“我有什么权？或许唯一的就如果你要求发一封家信，我有权同意或不同意，如此而已。至于说给你一次特别接见机会，那都得监长批，更不用说额外给你一两饭了。你的命是保住了，至于下一步怎样处理你，我不清楚，能活就有希望。这些话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装着没事儿，今天算同你通个风！”

针 灸

这位队长关照了医务犯来看我的手，这年轻的医务犯是从上海郊区农村来的，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他地主出身，有几个积极分子天天到他家惹事生非。一天他祖母刚病故世，那班人又来了，悲痛之余他一挥手说：“人都死了你们还来！”刚跨进门槛的积极老太一听这话，吓得向后一倒，后脑跌在门外砖地上，不久死亡。这小青年因此成了“预谋凶杀犯”，幸亏旁人证明他根本没有触及那老太，才免去一死。

这医务犯在乡间是赤脚医生，学过些针灸，因此他每天来同我扎针，最后选定三个穴位。大约一个月之后，一天在上下臂交界的那个穴位上他来了次强刺激，我的手指震动起来。接下来的一星期，我的手开始可以活动了，以后似乎完全好了。他告诉我，我受了重伤，以后年纪大了，血脉不和，会疼痛麻木。他的话果然应验了，如今每睡到下半夜，双手就会麻木痛醒。

破有神论的学习

有段时间，除了接见之外，我什么都能参加，放风、上大课、看电影、洗澡都有份。我在放风时看到龚主教仍旧是排在第一。天热了，他的穿着还是以前我提过的军用蓝色长裤和高帮皮鞋。

就在我写材料即将结束之前，我被带到大礼堂里听大课，那一天是军代表做报告，每次提到我们的“反革命集团”，总免不了大骂那“小蒋介石”一陈忠人。接着喊道：“陈文立！我要射爆你的脑袋！”这时坐在我边上的殷止庵轻声对我说，军代表的意思你要明白，他不是要杀你，而是要你彻底交代，交代完就没有事了。我很明白他是要稳定我情绪，这才是他的任务。

接着军代表说：“我们把你们养得白白胖胖的，你们还要反改造！你们中间还要搞迷信，信天主教！”

他尖声喊叫：“龚品梅！你给我站起来！”龚主教站了起来，所有犯人的目光都注视着他，那军代表又嚷道：“龚品梅！你最近怎么样？”“宗教信仰不变！”，龚主教平静地回答。“啊！你真反动？信天主教的，全都给我站起来！”他狂怒了。坐在我前排的一位老人站了起来，陆续又有几位难友站了起来，我亦跟着站了起来。不一会，人越站越多，几乎会场三分之一的人都站了起来。这下，出乎意外的坐在主席台上的军代表和队长们着急了，他们交头接耳，商量如何收场。姓许的队长用双手紧紧捂住话筒，不让犯人听到他们商量的声音。全场鸦雀无声，足足有好几分钟。这时殷止庵又在自言自语：看这些反改造份子！就是这么反动！我看他们也不全是天主教，就是要和人民政府对着干，看他们对政府带来多大的麻烦！这时，我听到站在我身後的一位犯人说：“皇帝不急急太监！”，殷止庵立刻回过头看後面的那位难友，“看啥看？去汇报啊！”

他只得回头坐好口中念念有词我也不清楚他嘟哝些什么。末了，话筒被拖到最右边，坐在边上的徐队长握着话筒讲话了：“你们干什么？坐下，坐下，我们党的政策不是一贯的么？宗教信仰自由可以，就是不准用宗教作反革命活动！”

待大家坐定，话筒又被拖回到了中间，许队长讲话了，他先重复了徐队长的话：“现在我宣布，一中队“‘破有神论学习’胜利结束！”他忘记了军代表的报告还没有完，就重复每次大课结束前的老套：“我呢要加你的刑！杀脱你个头！我呢无产专政决不手软！”会议提前结束。

通常上完大课，已经开晚饭了，这次竟在发开水之前回到监房。上楼时，大家都很高兴见到队长们的狼狈相，如果不是那个靠边站的老奸巨滑的徐队长，他们还真不知如何收场呢。回去的路上，我看到坐在前面的那位第一个站起来的老妇人，他昂首阔步，面带笑容，他是谁呀？我想，”看那个反动透顶的张宪兵！趾高气扬，多么嚣张！”殷止庵说。张宪兵是谁？我问自己。

进了监房，殷止庵就斥责我：“你为什么站起来？”

“军代表不是要我们站的么？”“那你也不应站！你看，估计有好多人根本不是天主教，他们就是要同政府对着干，这对政府带来多少麻烦！”

“手无寸铁关在笼子里的犯人能对武装到牙齿的人民政府带来麻烦么，你也把人民政府看得太软弱了！”我不甘示弱。

“我看得你的下场！”他动怒了。

“是呀，你是希望我被拖出去，然后一枪两个洞，再用铁丝捅一捅，那多过瘾，是吗？”他按捺不住，马上拿纸笔写报告，写到晚上近一小叠，交了上去。

他在写报告时，隔壁调人了。搬来的是开会坐在我前排的那位第一个站起来的老妇人。我们监房姓洪的老妇人说：“张希斌搬来了，他是外国和尚。”张经过我们监房时，他朝监房里望了一眼，我借机同他交换了眼色，那怕是不到一秒钟。

殷止庵说：“张希斌是犯人中最反动的，比龚品梅还要反动，他是龚的助手，龚却什么都听他的。你们要提防，谁同他接触，政府都会记录下来，没有好下场的！”啊！原来殷止庵所讲的张宪兵就是张希斌神父。

死 囚

材料写完，又调监房了，老妇人全部调走，可能殷止庵又要去“帮助”其他犯人了。有五个犯人轮流 24 小时看着我，以防我自杀，就是我一个人佔用两个监房，一共六个犯人，我一个

人不动，其他五个犯人分日夜班轮换，晚上睡时与我同监房的两个犯人值班看我，他俩是不准睡的，到次日白天这两人去隔壁监房睡觉，换两个白天来看着我，我很清楚，要我编写的故事已经完成，好像自己编成了绞索，已经套好在脖子上，只等别人拉绳索。他们在等时机，每年5月1日、10月1日都是大开杀戒的日子。

一天那姓张的军代表巡视1号监，走过门前尖声地喊我的名字，“我看你这花岗岩的脑袋还能长多久！我看也不见得是花岗岩的，是石灰的，子弹进去，嘿嘿！怎么样？”“像打翻了的豆腐一样。”我大声说。“你知道就好”，他走了。之后有几次开大会时，他都讲要射爆陈文立的脑袋。

直到我出狱之后到了美国，有次遇到儿时国际礼拜堂的朋友，他惊奇我还活着，告诉我当时有布告，说陈文立在提篮桥监狱内组织反革命集团，这案子是提交“群众讨论”的，他一见我的名字就吓坏了，因大家一致都说要杀，他以为我早被枪毙了。

这军代表在大课里总骂犯人狗嘴里长不出象牙。这时他又经过另一监房，里面关了一个北京的年轻工人，父母双亡，同他姥姥相依为命。他不是低能儿，只是迟钝些，在文革中讲错了一句话。挨批斗时，他急了，越解释越糟，结果以“攻击污蔑”罪判7年。由于不够精明，在狱中屡遭批斗。军代表见了他就问：“你嘴里长的是象牙还是狗牙？”“哟，我说我的军代表呀！”他用纯正的北京话说，“您真行，您居然还听得懂我这狗嘴里讲的狗话，真不简单，了不起！”这回轮到军代表装傻了，他问旁边陪他的队长：“他讲的是啥？”队长忙拉他走，边说：“疯子，神经病，别理他。”

之后，军代表又经过陈宗烈的监房，对陈说，告诉你，我们可以派几架大飞机，大军舰，三天就能拿下台湾！陈回答说，你讲的话我完全相信，不过很可惜呀，毛主席不信任你，就是不派你去！这次军代表又装傻了，“他说啥？”旁边的队长推他走开。

我介绍一下值班看守我的几位难友的情况，让读者知道上海市监狱关的是一些什么人。

外号老广东的何元光，曾跟随名厨师萧良初当招待员。以前宋子文带着萧厨师和他去过美国，后来跟顾维钧再次去过美国。解放之后，跟周恩来去过印尼万隆和印度新德里、跟朱德去过东德。就是莫斯科没去过，据说几个去苏联的高官带的是川菜师傅，而萧良初是粤菜师傅。在文革中，何元光同一青年同事发生口角，举起捍面杖说：“打死你！”因为他在旧政府里工作过，被冠上“历史反革命实行阶级报复的杀人犯”的罪名，判无期徒刑。他为人颇忠厚老实，对我也挺照顾。尽管他不操厨艺，但是见得多了，也能滔滔不绝地讲述各种烹饪法。他讲的上海话夹了一半广东话，尤其是在背诵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中，背到“毫无利己的动机”时就问别人，“读 gei

还是读 ji 呢”？旁人总是同他开玩笑，用广东话笑他“读 gei，咖喱鸡啦！”他也哈哈大笑，自得其乐。每次接见，他的妻子都来看他，两人感情很好。有时想到妻子，他会一人默默落泪。

傅家仁，铁道上的通讯段工人，家中条件不错。文革中，购得几具从资本家中抄出的高级音响设备，连我家被抄去的那台 Scott 的 24 管收音机也被他的朋友用不到一百元购得，因为我谈到我曾修理过是用了某种电解电容器，傅告诉我就是这台；为此，他就惹来了是非，说他传播黄色音乐和四旧、“收听敌台”，被判无期徒刑。他平时爱讲讲笑话，源自过去常听滑稽评弹。

陈颂年，大专学生，他父亲就是同我一起隔离审查过的冷冻机专家陈廷襄。陈因参加造反派，无照驾驶汽车出了车祸，被判 20 年。有一次接见，由于家中被抄，父亲穿得有点破烂，军代表见了就问：“你是老工人吧，老陈点头，陈颂年成了老工人的独生子，因此马上被调出来做劳役犯、值星犯。不久由于他用衣物接济家境不好的犯人，被指控“拉拉拢拢”，又遭批斗关回小监房。他对我也是挺照顾的。

黄达胜，浦东川沙县农民，亦因批评当局而被判 20 年徒刑。他是天主教徒，但很多教理记得很混乱。比如说，四大瞻礼他说是圣诞、复活、婚配、追思，又把旧约故事中的若瑟同梅瑟混为一谈。陈颂年笑他是“浦东说书一讲到哪里是哪里。他念玫瑰经是用上海乡下话唱的，记得有次小组有年轻人问耶稣是在哪里出生的，有人讲在犹太，有人讲在罗马梵蒂冈，他说：“我看是在白冷郡马槽里呀！”小组中有人说他这乡下人不懂乱说，只有张希斌神父看看我在微笑。他为人忠厚老实，也曾当过劳役犯，但由于有心脏病，体力不支而回小监房。平时也爱唱唱，反正广播里有歌曲，有样板戏，他就跟着唱，但歌词都是他自己编的，如红色娘子军，他唱：“向前进，向前进，急得来卡人中，人中要卡得深……”。唱沙家浜中郭建光那段：“要学啦(在)太岁头上一轻松啲格(的)身上臭哄哄……你们通通烂臀功！”最有趣的是那首歌唱祖国：“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此就要卖爹卖娘，从上海到新疆，一跳跳进了黄浦江。我们伟大的祖国，就像嫁勿脱格老姑娘……”他改得挺押韵。

马啸天，调到我们小组时他是从医院再到休养监的捌号监过来的，满头白发，络腮胡子都是全白了。矮矮的身材，讲京片儿；同监犯告诉我他以往是中共高层干部，潜伏到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情治机构政治保卫局任局长之职，在监中当过事务犯，后因心脏病住院了。两年前由外地劳改单位调来一个需要调查的犯人，也是知名的沈姓共产党大叛徒，当事务犯来登记饭帐时，沈说那声音好熟，是马啸天吗？我就是！马说：“我恨死你了！我的眼几乎瞎了都是你对我用刑造成的！”沈几乎在哭诉。

“你不能怪我，对你用刑是我根据组织上的指示，我还要告诉你，能活到今天要算你走运，是日本人提早放了你让你逃脱，我还接到组织的命令是要把你消灭呢。”马告诉他。

一天早上学习时，马啸天打呵欠就倒下了，之后犯人大喊有急病，不到三分钟医务犯赶来时马已经气绝了。

我也想过好几次，在被拖出去的时候，绝不能有任何怯懦的表现，一定要镇定，反正没多久就到另一个世界了。五花大绑是很难受的，倒底是什么滋味？同飞机铐，猪猡铐比又如何？千万要顶住，我告诉自己。最怕想到年老的父母亲，当他们得知我被枪毙，他们会怎么办？想到这里，我禁不住落泪了。所幸我的睡眠很好，加上监房里常说说笑笑，胡思乱想的机会不多。以往3号监那老四川的话，我渐渐忘记了，同时我有一种预感，觉得不至于会被处决。

沈国孙

沈国孙是位书法家，也善于篆刻，当年跟随齐白石管理过他的文房四宝，解放前为几个高官刻过图章，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判了十二年。在狱中，几个队长都要他刻图章。他很乐意教人写字，见我一个禁闭在小监房里，就教我在纸上打小方格，依照报纸上的活体字临摹，结果我写的字大有进步。他早上出了监房是不用再进去的，因为队长们有的要刻图章，有的要写标语，有的还找来一小块象牙要他雕毛主席诗词。他会微雕，即在一粒米那样的大小的面积上，可以刻出整篇孙中山遗嘱，不过那刻刀是特制的，沈老自己会磨。

刘少奇一类骗子

自从广播里播放了尼克松将访问中国后不久，报纸上出现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词句，犯人们都觉得中央又有人出事了，监房调来了一姓薛的难友悄悄告诉我是林彪出事了。仔细看报纸，林彪果然好久不露面。薛说，那是王瑞容告诉他的。王瑞容原是国民党的国防部翻译局副局长，留学美国，精通4国语言，尤专俄语，他被判无期。妻子亡故，有一女儿在美国，没有联络。他很硬气，不要当局发给他任何衣物，平时穿件破旧不堪的西装。一天，他见报上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的总统齐奥塞斯库的照片，其中谢富治似乎受伤包了头，而林彪却不站在中间而在旁边，王说：“我们的副统帅失宠了，共产党同国民党一样，新闻图片都要经过宣传部审查后才可以发表，重要人物要在中间。现在我们的付统帅不重要了，看来不久就要消失。”果然不出王瑞容所料。

不久，狱方要我们交出毛主席语录，事务犯将《再版前言》撕了，再发还给大家，又要我们交出印有毛泽东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邮票，大家暗暗说：“结婚照撕了啊！”

尼克松

尼克松到中国访问之后，军代表不见了，监狱里的紧张气氛缓和了些。尼克松访问上海的那几天，监狱天天开荤，队长都穿着整齐的制服。衣服不够的犯人，也都发放新制服。要求内务整洁，似乎尼克松要来参观一样。

重 审

队长认为我情绪稳定了，值夜班就停止了。一年过去了。到 73 年的夏天，几个队长亲自到监房来，给每个犯人一套制服，把所有人的东西全部搬走，盖公家被子。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付家仁非常害怕，他说：“苦了，他们要搜搜看我们写了什么，说不定在处理你时，说我们也参与了攻击污蔑，我们要陪葬了。”他这么一说，我感到很内疚，共产党是栽赃能手，什么事都做得出，我一个死了，竟又要连累几个无辜。

过了几天我被叫了下去，看到三个穿着公安制服的人和管教科的陈队长，其中一人问我犯了什么罪。我说：“在狱中组织反革命集团。”“好吧，现在我要你把以往的材料，重新再写一次，时间不限！”“这办不到，前几天你们把我的底稿全搜去了，叫我怎么写？”我说。“你自己干过的事，你会记不起来吗？我们知道你的记忆力很好。”这时我也不知那来的火气：“要杀就杀，反正我是等着了，何况你们已经掌握了全部材料，开什么玩笑！”“哈哈，你火气倒不小，我们不是来杀你的，我们是要帮你交代问题的。”

“怎么个帮法？告诉你们，再来几个月的疲劳审问，上铐，我可受不了，我已经太累，太疲倦了！”

“谁说我们要你写什么污七八糟的社会民主党的交代！把它忘了吧，我要你将那时怎么审讯你的过程全部如实写下来，哪个干部叫什么名字，姓什么，不知道的你可以写他的长相。详细地写，他们怎么引你瞎编，怎么对你用刑，都要写！”

“那都是写政府队长呀，可以吗？”

“我们是部里来的，我们要这材料！”（他们说的部就是公安部）

“这不是越级么？”

“这里不是部队，反正你写就是，写完交给我，什么人都不准看，任何其他干部问你要，你都不能给！”

“万一他们强要，你怎么办？”另一个问我。

“反正是坐在里面写，我会把稿纸全部扔进便桶，就算再拿出来，墨水化了，看不清楚！”

“到底当过兵，好吧，详详细细地写，这是你性命攸关的事。还有，告诉你，当初那军代表，现在和你的情形差不多！”

陈队长送我上楼，他说：“材料连我都不能看，你懂了就好！”

回到监房，大家急切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如实告诉了他们，大家向我道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第一、二天，他们上下午都来拿走我所写的。第三天，房间里又调来了殷止庵。

晚上殷止庵问我写些什么，我说是政府要的，根据干部指示写的。“看你的情形，是写翻案。你原本不是已老实交代了，怎么又翻案？”他大叫：“报告队长，陈文立要翻案！”李监长同那个姓卞的队长来了，要我交出材料。我说：“部里的首长指示，任何人都不准看！”姓卞的队长破口大骂，李监长说：“你不要弄虚作假，不服管教，这对你没有好处。”正当李监长准备用钥匙开门，殷止庵打算抢我的稿纸时，一位先前照顾过我的队长带着(公安)部里的干部来了。那干部喝道：“你们想干什么？”狡猾的李监长说：“有人报告说这监房里的人写翻案，我来看看！”那干部对我说：“材料交给我，今晚不要再写了，明天再继续！”又对李监长说：“这是很严肃的调查研究，不要玩把戏！”李监长说：“都是犯人在挑拨队长之间的关系。殷止庵！你这老特务！明天好好地批判你！看你在监房里继续兴风作浪！”

第二天，殷止庵调走，小组里开始批斗他。殷止庵对旁人说，他改造了那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栽在别人手里。我很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姓卞的同李监长策划的，他们想知道我到底写什么，殷止庵只是他们的工具，到头来，殷是自讨苦吃。不过，我事后才知道，殷止庵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共产党，有老犯人说他当年在商务印书馆做办事员加入中共时，陈云还是个排字工人，后来中共组织派他潜入国民党中统，之后他再潜伏在日特内部，那时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情治机关基本上都是中共的特务，当年毛泽东派潘汉年去同日方沟通，也是由殷止庵等人安排的。但到最后，他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却知道了共产党的大量阴谋丑事，因而把他们一伙全部关进监狱。

材料写了一个星期，写完后我的东西全部归还，公家衣物收走了。

特殊禁闭犯

尽管问题似乎是澄清了，但到底对我怎样处理，还是个迷。共产党一向不认错，凡是错了，依然往对方身上推。不过我得到队长口风，知道不会死了。我想，判了15年，加到20年乃至无期都一样，凡是进了监，就别想出去了。

以往值夜班的人是劳役犯定粮，当时我亦加到这数额，有人说这是死囚犯定粮。如今减了，恢复到拆沙头犯人的定粮。中队里扩音机坏了，叫我去修理。之后，每逢中队开会，我管扩音机。有人说：“这个死囚禁闭犯又活络起来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次监房里调来个叫马永祥的犯人，罪行是强奸幼女。在监狱中，这是最“高级”的犯罪，当局认为这类人最“纯洁”，因为不带任何“反动色彩”，但大多数犯人都看不起他们。马永祥是苏北人，却要学着讲苏州话，把自己的名字读作马永强。他要对我做思想工作：“你是严重的禁闭犯，只要向政府老实交代反动思想(他把想读作向)，政府会宽大你。让我们来讲讲我妮有点啥个反动幻向(想)。比方讲，昨日夜里厢，我突然间出现一个非常可拍的反动幻想哟，嗜嗜嗜嗜，可怕啊，非常可怕格反动幻想呀。我马永祥胆子是顶小咋喂，碰着有星事体是要吓格，要吓咯！”他把那个吓字讲得特别嗲。

“是啊，你胆子顶小，犯事体也犯在小里。”傅家仁插咀。因为马永祥是犯了强奸幼女。

“不准交谈案情！”马永祥厉声喝道。

这时，在旁的陈颂年说：“是呀！要吓格，吓咯吓咯特拉克”；我知那喜欢捣旦的陈颂年在说笑，是讲舒伯特的歌曲 Hark! Hark! The Lark.

“你讲啥？”

“我讲依要吓咯，是吗？”陈答。

“是呀！不过为了思想改造，我要鼓起勇气，大胆暴露思想！你们听好，我要讲了喔！”

“喔唷！这反动幻想实在太可怕了，我还是唔没勇气暴露。”他又缩了回去。接着他又继续，“这次我要再次鼓起勇气！不暴露思想就不能批判，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你们要听好！我要讲了哦！”

“昨日夜里厢啊，我突然间，突然间啊，想吃一碗面，一碗阳春面，好嗜。你倒讲讲看你有啥个反动幻想呢？”

我真想用苏州话对他说，我妮反动幻想差仿不多，我想吃一块糕，一块条头糕。但记起队长给我通了风，不要惹事生非了。

就在这时尤队长走了过来问：“你们房间里讲点啥？”

陈颂年说：“报告队长！马永祥叫禁闭犯暴露思想，他自己首先说他的反动幻想是要吃一碗阳春面。”

“马永祥，你讲想要吃一碗阳春面？”尤队长问；

“我意思是……”

“我问你是否讲过你想吃一碗阳春面，你回答我讲过还是没有讲过！”

“我是讲过，不过……”

“你承认讲过，而且讲到你的反动幻想就是想吃阳春面？”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我们犯人吃阳春面是没有可能的呀，想没有可能的事就是反动思想呀，这同想资本主义复辟也是不可能的一样呀！”

“你刚才就是说想吃阳春面就等于想资本主义复辟，大家都听到了吗？”

周围监房里很多犯人都纷纷说听到，并说马永祥反动！

尤队长又说：“刚才我尤队长吃的夜饭就是阳春面，因为我想吃，就去吃了，照马永祥的讲法，我尤队长不但有要资本主义复辟的想法，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行动，因此我尤队长就是反革命，应该抓起来同你关在一起，对不对？”

“啊唷喂！我不是这个意思呀！”这时马永祥开始讲苏北话了。

尤队长：“尤队长文化不高，理解能力差，弄不懂吃阳春面同资本主义复辟之间的关系，又为什么两者又是相同的，你们中间又有专家又有教授，明天学习时由马永祥解释一下两者之间的关系。”

次日，小组开批斗会，马永祥又少不了挨拳脚。

马调走了。事后，我把我想讲的苏州话的想法告诉了陈，他大笑，说当时我为什么不讲，不然他一定气得发抖。

一天，那个进监时给我们照相的白脸队长来找我，问了我一些绕好了变压器怎么处理的问题，我教他用灯泡做个低温烘箱。过了几天，他把我带到他的修理中队，要我看看烘箱为什么不热。他操上海话对一个犯人说：“姚糊涂，我叫你做只烘箱，你替我做只冰箱。”那犯人把线接错了。我接好线之后，他搬来一长板凳要我坐下，来看看几个变压器，他坐在我旁边。我打趣问：“你不怕别人讲你同犯人坐同一板凳上吗？”他说“我勿在乎此。”

痛打恶棍

监房里调来了王高明，他一进来就对我说：“你不要以为李监长开你出去做点事就嚣张起来，你的问题大着呢。你小心点，我是专同反改造分子斗的！”吃过晚饭，我揩地板，无意中弄湿了他东西，他又借故挑衅，破口大骂：“你这死刑犯，不要以为我像殷止庵那么文绉绉的，我会动手的！”其实我早已在找机会动手了，他那么一说，我正好一把将他拉到墙角，一脚踩住他的胸部，左手在他面颊上一抓，让他张开口，顺手将擦地的揩布塞进去，谁知他竟毫无反抗的能力。我将他翻转身，捉住他的头，在水泥墙上猛擦，再抬起他的木屐(木拖鞋)，往他脸上一下下地打，我打得不太重，因为打伤了就有麻烦，只将他的脸打痛打肿。等我打得差不多，旁边的同监犯才大叫报告队长，说监房里打架。我停了手，王先把揩布从嘴里拔出来，然后大叫：“死刑犯打人！”李监长上来，问是怎么回事，我抢着说：“他先挑衅，我先动手！”王高明哭诉说，他要同反改造分子作斗争，却被我打，自己没有动手。李监长说：“你王高明会不动手，啥人相信？”他把王高明调走，给我上了反铐，不过铐得很松。他一走，旁边监房的犯人大声说：“打得好！否则拳头没有地方伸了！”

次日放风，王高明说走不动不肯下楼。队长说：“你哪里走不动，打架还打得动呢，一定要去！”他只好服从。我见他本来瘦削的脸肿得歪了，满头红一块青一块紫一块的，我看了也觉得打得太厉害，有些不忍。但旁人都借机笑他：“王高明，你今天打扮得特别漂亮，像梅兰芳一样！”“王高明，表演大头娃娃舞呀！”你一言我一语的，他的确得罪了太多的人。好多人对我投以一种赞赏的眼光，我为他们出了口气。一个星期后，松了铐。

旧帐新帐

我被叫下去，办公室里管教科的陈队长、杨科员及李监长都在。一上来陈队长就说：“陈文立，你一进监，就表现得很糟糕，特别是在审查期间，更糟糕。你伙同一帮反改造分子，兴风作浪，弄虚作假，使政府在人力、物力上损失巨大！”他讲得太离谱了，我的胡乱交代，是他们刑求强迫的。我正想讲话，他作了个手势要我打住：“等会有时间让你讲，你先听我讲完。”“你在禁闭期间，表现还是不错的，若以评分的角度，我们可以评你良好。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我们共产党一向注重现在的表现，过去的，仅供参考。”我想，这些人倒是学得快，连尼克松的话也学来了。“对你的过去，我们不予追究。现在对你的决定，解除禁闭，恢复接见。但是，如果你再反改造，我们就旧帐新帐同你一起算！”

知道没有事了，我又要同他们开玩笑。我也学了尼克松的话：“既然队长提到由于大家所知道的原因，我不想再提了，过去的已经过去，让过去的误会和不愉快都过去！”

“你现在就上去收拾东西，回三号监。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我真舍不得隔壁的张希斌神父和龚主教，以及那几位对我照顾的难友，我说：“我之所以能有比较好的表现，这同李监长的管教是分不开的。李监长把1号监管得好，我想留在1号监！”

“这我们同意！”陈队长问“还有么？”“当然如果我提出放我出去你们也办不到，我也不会那么荒唐。我只想一次特别接见，几年没有见到父母亲了，他们着急的！”“这你同李监长提，还有么？”“没有了！”他又说：“是了，我们不是治好了你的手吗？”好像他们在施恩呢，真不要脸。“如果今后再有什么发生，我们会用全世界最好的医生给你治！”牛吹得不小。“李监长送你回去！”上楼时李监长讲风凉话了：“你看，党的政策多英明，对你宽大处理，今后你要注意了，不要再打架，等会邵德良会给你接见卡！”邵德良是事务犯。

特别接见

过了一星期，事务犯走来说准备接见，接着有个陌生的队长来开门说：跟我来！我被引到同开会礼堂的另一方向，到一个没有去过的区域，进入一栋建筑物，一条长走廊，边上似乎等距离的门，队长打开了其中一扇门让我进去，我从窗口望到了站在屋外的面对室内的双亲。

这是一间如单人宿舍大小的四周水泥的房间，门在墙的一边，一进门就看到位于中间的窗户，两扇窗向内打开，中间是铁栅栏，外面还有铁丝网，窗户的下端到我的腹部，而外边似乎要比我站的住置低，室内空无一物。“接见开始。”站在门边的队长说。

母亲焦急地问：“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都没有了，总算弄清楚了，你们放心！”

母亲本来已经灰白的头发，变得几乎全白了，双眉紧锁，愁容满面，“听小弟(唐千根)话你又在搞事，点解(为什么)？”

“冇咁嘅事，乜都有，都係佢地作出來嘅，而家都由公安部搞清楚。”我说。(意思是没有这样的事，什么都没有的，全是“他们”一指当局-杜造的，如今已经由公安部来搞清楚了)

母亲还是在慢慢地摇头，父亲仍然是老样子，只是瘦了些，皮肤黑了些，他告诉我他在五七干校的农场管农具，因此不会太劳累，大家都知他是老好人，因而对他有所照顾。“你的头发怎么都没有了？”他问。

“全部甩晒啦(掉光了)。”我回答。

我又不能多说，父母亲也心领神会，看他们的神色，好似松了一口气。

原因也是他们告诉我他们来接见时那些管理人员待他们特别客气，而且说很久没有见到儿子了吧，他表现不错，因此特别让你们来鼓励他。

接着我问了些亲友，都是情况依旧，互道平安。站在我身后的队长对我们用广东话交谈一点也没有干涉，当他似乎觉得我们谈话快要结束时他说，这次是特别接见，时间不限，有啥要讲的尽量讲，这种机会不大会有的。

我真有一种要拥抱他们，亲吻他们的冲动，真想伸出手指穿过铁丝网让他们吻一下，这些只不过是空想而不被允许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是我们回家的时候了，知道你的情形我们也放心了。”我母亲说。我们相互道别之后他们转身离去。回监房的路上那讲话带无锡口音的队长说，你父母看来是高级知识分子，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母亲是退休英语教师，父亲是画家，茶花女就是他画的。他叹了口气，早晓得我要跟他学画。

法西斯式

就在对我宣布处理决定前后，监里传达了周恩来关于禁止在狱中实行“法西斯式”的审讯。据说有个别监狱使用了法西斯式的审讯，以致犯人死亡。有人说，可能就是针对上海市监狱审讯张吕集团及对我们的审讯。其实全国范围内，行法西斯式审讯的比比皆是，倒是找不出有那个监狱(包括劳改、劳教农场、工厂)，拘留所不实行法西斯式管治的。今后如再发生，犯人可以上告。如今队长的态度变了，很少训斥犯人，伙食也改善了。很多犯人感激周恩来，其实这是周恩来虚伪狡猾的一面，也是中国人数千年受专制压迫的恶习，大家永远盼望有个“明君”，有个“包公”，却永远盼不来。

后来我到了青海，听到各地监狱来的人介绍他们的情况，我才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由于上海市监狱是重点监狱，互相监督紧，干部不敢太过胡作非为。那些“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惨案之多之严重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

奇谈怪论

我又可以参加学习了。值星犯王石风 70 多岁，原是国军少将，随傅作义“起义”，在中共政协学习时讲错了话被划为右派，文革时被捕判 20 年。他自称文化程度不高，以往是管运输的，

然而却是一本活地图，当我讲起过去经过的路线，他了如指掌，连桥边有块碑他都记得。学习时犯人除了鹦鹉学舌，照报纸上吹捧“大好形势”外，也常指桑骂槐地发泄一下。

以前军管时，那军代表讲到犯人的“反动本质”时，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两碗奶糕，一碗放了糖是甜的，另一碗是淡的，而婴儿就是喜欢甜的一碗，说明爱吃好的是本性。因此人就要自觉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不自学改造就要犯罪，就得强迫改造。很多犯人就接着说，人生来就有资产阶级思想，要吃好的，赞扬军代表的讲话是真正的唯物辩证法，把马列主义哲学话学活用了。

有一位犯人，每天看报纸时，把越战打死的美军人数记下来，一天他说，美国人快要死光了，美国有二亿多人，我已经统计过了从X年X月X日到现在，总共打死美军二亿多。

监狱中号召学习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哪里来的》一文，有位叫林梦的难友就提出一个疑问：“人的错误思想又是从哪

里来的”？结果引起了大辩论。毛泽东说正确的思想从实践中来，不是天上掉下来，也不是脑子里固有的。根据唯物主义理论，错误当然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固有的，争了大约半个月，没有结果。龚主教开导林梦，说：“人是很难承认自己错的，你有这思想，藏在心里，不要讲出来，不是没有事了吗？”最后还是军代表下结论，“是你们犯人胡思乱想想出来的嘛！”犯人暗自好笑，大家一致说，“军代表讲话千真万确，人的错误思想，就是胡思乱想想出来的！”

有个时期，全国都要学唱两首歌，一是国际歌，一是东方红。犯人就借此机会大谈国际歌中的“从来没有救世主”，而东方红中中国出了个“大救星”，大家一致讲救世主同大救星的“原则区别”，结论是救世主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而大救星是属于“无产阶级范畴”，弄到队长哭笑不得。还有一次，有位年轻人问，“孔老二提出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意思是复辟，但字面上用白话怎么讲？有位喜欢讲古典文学的青年说，“就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呀！”

那时号召大家“弄懂弄通马列主义”，很多犯人要家里送进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等。恩格斯写道，布道家们一百次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还在一百零一次地再证明上帝的存在。有位难友说“无神论者一百次否定神的存在，还在一百零一次地否定神的存在！”张希斌神父说：“其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两个极端，互相把不同于自己想法的，推给对方。其实世界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也没有真正的唯心主义者。像我这样信教的，只能说是唯实主义，是事实我就承认！”我说：“用科学来作证明，肯定或否定，都是无效的，因为每一个科学结论，是对以前研究的补充或否定。因此新的科学成就，都将面临

被修正，甚至被否定，否则科学研究停止。换句话说，每一个科研结论，都是不完全甚至是谬误的，我们又怎么能用完全或谬误的论点去证明任何事物呢？”有位难友说：“有人发现进化论，发现人工能合成蛋白质，就像捞到了救命的稻草，证明自己千真万确，但如果知道现在的核糖核酸，我想他会气得自杀！”他是在指恩格斯。这人并不是教徒，他说他赞成所有的宗教，那时小组里没有一个犯人是爱找人辫子到上面去汇报邀功的，因此讨论过就算了。

也常有队长对犯人恶作剧的，一次有一老年犯人，说是国民党少将，讲错了话被同监犯无限上纲时队长来了，又不分缘由训斥老人，急于解释的老人说因为……“因为因为？你罗里八嗦点什么？因为所以虽然可是，然而不过甚至而且，必竟何况非但如果，至于还有因此难道，”队长一连串流利地背了四句介词，我也有些佩服他怎么一下能背出这么多，接着，“难道难道，是了！长毛乱时我逃难，我要你替我队长倒过来念！”“勿来事个耶，报告队长。”老人无奈。这时周围众犯人纷纷“念呀！队长命令你敢违抗，你违抗政府啊？”这时队长暗暗笑着开溜走了，大家还在起哄，不知哪个傻瓜“难道我是 X 毛长？”一阵哄堂大笑，“你是 X 毛长！你是 X 毛长！”他急急改过来……一场苦中作乐。

有人在监房念毛泽东的水调歌头，当念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时，另一同监突然说一块臭乳腐，那个念词的犯人见到有队长走过就马上检举说另一犯人说臭乳腐，“臭乳腐又怎么样？吃的东西嘛！是了，你们明白毛主席在这句诗词的意思吗？其实毛主席是在批林批孔，是讲到孔老二在四川看到有人抬着死尸，狂叫这死鬼是他的师父，你们知道谁是孔老二的师父？是老正卯，就是少正卯的老子，孔老二读书作弊被抓到，被老正卯打屁股，因此孔老二怀恨在心，恨不得他的师父早点死，就在孔老二当上公安部长后立即将师父的儿子少正卯抓起来杀了。”

针刺麻醉

有一位叫蔡文元的瞎子，手很巧，可以自己穿针，在小监房里还可以打被子，而且不要其他人帮忙。他患有严重疝气，要动手术，这时还推行针刺麻醉，他成了试验品。事后他说，针刺已经是酸麻难受了，谁知一刀下去他痛得昏了过去，如果不是及时麻醉，性命难保。

几个名人

再谈谈狱中几位名人，关于龚品梅主教和张希斌神父，请参阅附录，这里省略了。

程锡文，外号夜壶阿四，王金荣的管家，五短身材，乐于助人。同监难友衣服破了，他主动地帮为缝补，手艺高明。他还替别人洗衣服，十分爱清洁，他监房地地板擦得雪白。

顾宝衡，在监中时间最长，是汪伪政权时的粮食部长，因贪污而被日方判无期徒刑。抗战胜利后，作为汉奸而继续关押。共产党来了也不放他，我在 1 号监时（大约是 1974 年），他已经被关了 35 年了。

陈宗烈，原首都警察厅代理厅长，为共产党所俘获，发言中，从不说“蒋匪！”只说“国民党反动派”或“蒋介石反动派！”他是蒋经国的结义兄弟，态度甚坚决。由于他较特殊，亦算是“统战对象”，当局曾吩咐他周围的犯人，不准惹他讲“反动话”，否则同谁算帐。七十年代末期，他在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时获释。廖承志派他去香港同蒋经国联络，以作统战工作。他收到蒋给他的亲笔信，大意是得悉他获释放，感到欣慰，但身为总统也得遵守法律，因中华民国是法治的国家，他不能招待以统战身份来台的人，即使是结义兄弟。希望他在香港过得愉快，并寄给他数千港元，好让他在香港买些东西。陈宗烈回到大陆后，将信交给了廖承志。监内还有共产党的元老季苏，刘昌，他们都是党内派系斗争以托派、叛徒等名义关进监狱的，但我对他们了解不多。

还有一位名叫陈庆庭的，他对自己的父母没有记忆了，只是被告知他们是为了党牺牲的新四军干部，他就是被新四军抚养长大的，五十年代初就是铁路上“首长专车的列车长”，由于他被视为根红苗正，平时就专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他发觉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成熟，工人阶级形成一股相当大的力量时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形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又被蒋介石改成官僚资本，为此他觉得中国应当先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当时 1956 年正在号召大鸣大放号召组党，他想他可以创建一个三民主义式的政党，刚好有一次万里乘坐他的专列，那时万里正是铁道部长，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对首长谈了。

“这个王八蛋对我耍滑头，对我说：‘年轻人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很好呀！毛主席说过实践出真知呢。’如果他有点良心，对我说我已经是党员了，还是继续为党工作不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吗？”他以为万里提毛泽东的话就是鼓励他组党，因此他就把组党的想法向“组织上”说了，过了不久他就被捕了，罪名是企图成立反动组织投靠国民党反动派，而当时他连成立什么党什么名称都还没有想过，他百般解释都没有用，甚至他告诉当局连万里他都徵求过意见并得到赞许，为此又多了条污蔑中央首长的罪名，结果他被判死刑，不过没有立即执行也没有缓期执行的词句，在判刑之后关押十年才改判无期徒刑，判死刑的犯人是戴上反铐的，他就被上了十年之久的

反铐，就在我被调去青海前他调来我们小组，我就问及他这十年反铐是怎么熬过来的，他落泪了，说这些年来我还是第一个这么同情他遭遇的。

出入中队

文革期间，监狱中似乎没有一批批调出去劳动改造的。从 75 年开始有了变化。事务犯邵德良问我是否会修理电视机，我当然会。接着就有队长开门要我去谈，问我一个电视机修理工场需要些什么设备，要我开张清单，我照做了。邵说监狱里仪表厂打算开一间电视修理部，如无意外，我将调过去。反正人在上海是不错的，仍可以见到家人。

听说工场办起来了，没有我的份。邵告诉我，“另外要派你用场”。不久又有队长问我，是否会修理汽车，我照实回答我是学机械的，对汽车没有经验，但看了应该会的。75 年春我被抽中了，我真舍不得离开张希斌神父。临别经过他的监房门口，他对我说：“我们终将见面的，如果不在世上，就在……”他指着天上。

整理好所有的东西，编队调往 6 号监，即出入中队。有的人说要去江西，因为那里办了个汽车修理厂，需要人手。又有说去青海，那里有家青沪机床厂，是上海劳改局管理的。后来，说去青海的越来越多，要离开了，我也不知道倒底哪里好，有的说江西虽近，但条件差，青海气候寒冷，待遇还不错。

离上海前的最后一次接见，发信回家可以写长些，也可以要家中送些糖果饼干，但不要送煮好的熟食。每人还发一套棉衣棉裤。有些犯人间：“写信长些，字数限不限？”“糖果，能不能带软糖？”别的犯人说：“世界上猪头崽真的死不光，如果队长一说 200 字，不是大家都吃亏？！”

接见时，父母问我知不知道去哪里，我说可能去青海，也有人说去江西。父亲说，去江西好，“小弟(唐千根)在江西。”

每天都有几个外地来的队长来巡视监房，大家说这是“看货色”。隔壁监房有个叫包定申的犯人用常州话问：“报告队长，我们是不是去青海？”“到了你就知道了！”其中一队长说。

“我青海是去不得的！我在社会上团支部书记呀！我犯的是强奸幼女呀！我闻到羊肉要呕啊！”

“有羊肉给你吃算是好了！”队长说。

那帮队长走了不久，姓卞的队长来到监房前，恶狠狠地说：“陈文立，你不要以为调走了就没有事了，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小心点！”我也不知哪来的火气说：“姓卞的，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威胁么？你干了什么你自己明白，审查时你还搞小动作，是不是组织对你的决定你不服气，那找我又有何用？”他一听到组织的决定，拔脚就走。我又骂了句：“真他妈的瞎胡闹。”隔壁有人问，“这人是真的队长吗？”“烂污泥底牌。”我说。一个年轻犯说，他真是“落荒而逃”。

鬼魂西行

一清早，编队出发。出了第二道铁门，见场上有几辆旧式公共汽车，有好久没有清洗了。我们按次序上了车，每人都有座位。当汽车驶出监狱大门时，门外早已站满了人群，大半都是犯人家属，他们是得知出发的日期赶来的。前面的警车拉起了警报，一阵呼啸声响起。我们的车窗是不准打开的，人群中有人高喊再见，挥手不住，有的挥动手帕，车上有的人也挥手。这一别，谁也不知何时再相见。

到上海车站，几节陈旧的客车厢已挂上“专车”的牌子在等候。上了车每人都有座位，押送的队长坐在两头，前后还有一个解放军战士，他们带的只是步枪，而不是冲锋枪。

火车往北开，确定是去青海了。路上吃的是火车上的客饭。那时火车过江还有部分是用渡轮的。但我们的专车走当时号称“全世界最长的”长江大桥。进了陇海线，火车向西开，我说现在是鬼魂西行了，引起大家大笑(鬼魂西行是一英国片名)。有人开始唱歌，唱的是苏联的共青团之歌，歌词中有“再见吧妈妈…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不久，有位难友用俄文唱起了“茫茫大草原，有个马车夫”的歌，引起了大家合唱，不会唱的和声。这首歌原是为苏联电影《瓦良格巡洋舰》上的主题歌传到中国的，是一首俄国民歌，描述一个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犯人，赶着马车，由于体力不支，临死前对同伴说，回到我的家乡，把那大黑马交给我父亲，再到我母亲的坟前代我向母亲致意，告诉我的妻子，叫她不要悲伤，如果找到心上人，就嫁给他，他将会是你的好丈夫。这首歌的曲调悲戚，歌词又同我们的境遇相近，或许队长不懂，倒没有干涉，我们唱了好几次。越往西，越贫困，令人大开眼界。已是春天，铁路两旁的黄土上没有一点绿色，人们都是挖洞而居，我们看到了身上一丝不挂的人。一次火车到站，站上很多要吃的，有犯人把自己带的面包、饼干丢给他们，他们真像动物园里被喂食的野兽，看了令人心酸，他们的生活竟不如犯人，可怜的中国人。

到了兰州，离目的地不远了，经过天水，到达西宁。青海省的省会，就在甘肃附近。青海原先属于古西藏王国，是满清开拓疆土时强占的。

几辆大卡车来了，我们先把行李抛上，再跟着连跳带爬地上了车。想起当年当兵入伍，也是大卡车，当然心情完全不一样。三天两夜的车程，一直坐着脚都肿了。果然是到青沪机床厂，我们被安排到了宿舍。工厂不像监狱，犯人可以交谈。开饭了，吃的是用玉米粉做成的面条，虽硬但不难吃。人们说机床厂的伙食，在劳改单位里算是最好的。

初到皮毛被服厂

第二天，有二十多人被点了名，我也在内。收拾东西集中，由一个矮个子队长点名。点名的方式还是第一次见到，就是听到自己的名字要蹲下。我们又上了卡车，开往另一个劳改单位，叫青海省第二劳改大队，是一间皮毛被服厂，地址是南山路5号。

这个单位的风貌，同机床厂迥然不同，机床厂的犯人，都是从上海调去的。机床厂犯人的制服是蓝色的中山装。而皮毛厂是黑色的中式衣服，我们觉得有种压迫感。这里的伙食也差多了，机床厂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菜式，而皮毛厂只分汤菜、烩菜，其实都是一样的水煮的白菜。

几个老犯人告诉我们，皮毛厂要改为汽车修理厂，我们是第一批来的有“技术”的犯人。领我们学习的叫姜重庆的值星犯否定了他的说法，姜说反正是劳动改造，做什么都一样。他也是从上海来的，但从不吐露自己的情况，讲话比共产党员还左。他要各人介绍自己以往做的职业，以便上头分配。

最初几天是学习。姜重庆说：“厂里有个刑满释放分子，你们要小心，她是个女流氓，专挑拨犯人同政府之间的关系，她的罪行是圣母军！”他又说：“在劳改队是不准信教的！”我说：“我不知道劳改有不准信教的规定，以往队长说过，犯人有宗教信仰自由，只是不准用宗教名义进行反革命活动。信仰嘛，是人的思想，说不准想，根本就行不通，而且简直是荒唐！”“这是指导员说的，宗教信仰自由只给人民，不能给犯人！”“我不管是指导员或什么人，这话错了，不附合党的政策！”我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犯人敢说指导员错，你们新犯人不知天高地厚，我得马上汇报！”他走了，不一会儿又回来说：“政府指示，下午开会批判不服管教的犯人。”又恶狠狠地对我说：“你等着！”“我见得多了，提篮桥当时那个林彪部下的军代表，不也发动了一次破有神论学习？9个月之后，还不是不了了之，宣布了犯人有宗教信仰自由！”姜很生气，又跑了上去。午饭后一批押送我们的干部要回上海，来看我们。下午姜宣布：“批判会取消了。”

对我说：“看你们是新来的，政府关心你们，讲错了些话就算了，今后你们要注意！”我说：

“第一，我没有讲错，我也没有要传教。错在你说监狱里不准信教，这是违反政府规定的。周总理有指示，如果监狱干部违反政策，胡作非为，犯人可以上告。”“上告？那个规定犯人可以上告，你不要假借总理的名义，攻击污蔑国家领导人，是犯大罪的！”姜说。但好几个犯人都说我们在上海早已听过周总理指示的报告，还讨论了将近一个月，姜才静了下来。事后才知道，这个劳改队根本就没有传达过。想来那个批判会之所以取消，大半也是这里的干部询问了上海来的干部，了解了那次“破有神论学习”的情况之后，才罢休的。

除了学习，我们可以由干部领着到工厂各地走走。这里不叫队长，叫管教员或干事。厂里有一个小型修理工厂，由杨师傅同沈师傅管，他们都是刑满释放的。我们这批新来的犯人是来创办汽车修理队的，但没有一个是真正懂修理汽车的，只有一、两个学徒，两、三个车工、钳工，大学毕业的只有我一个人。另外一个大学生姓姚，只有我们两人识机械图。

为了辨别我们是不是真的懂机械，他们给我们一人一个机械部件，要我们测绘。我绘了个草图，而姚却必恭必敬地绘了个标准图。有人来看图，说我们俩人都懂机械，绘草图的是老资格，有工作经验，另一个像是学生，很嫩。事后杨师傅告诉我，“看你们图的是位女专家，震旦大学毕业，外科医生，动得好手术，省里、军区里的干部点着名要她开刀。她是因为圣母军而进来的，人可热心哩，谁有困难就帮谁。”我想，她一定就是那个姜重庆说的“女流氓”。可是她是学医的，怎么也懂机械？而且一看就知我们两人的差别。我问扬师傅，为什么姜重庆说她是“女流氓”，还要我们提防她。“这里的干部都当她是宝，优待她，她却不要。只有你们中队里的指导员不喜欢她，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修理厂开张了，分成引擎组、底盘组、加工组、钣金组、电工组、喷漆组、锻工组。由于要我绘图，我暂时分到喷漆组。姚说他懂“汽车电系”（其实是吹牛），分到电工组。

由于汽车零件短缺，市上没有配件可购，好多要自行加工，因此姚同我两人最初是忙着测绘零件，图纸送到外单位加工。由于我的头发掉光了，姚给我起了“灯泡”的外号，而姚做事有时粗枝大叶，我就把以往上海监狱修理工厂里那个叫“姚糊涂”的外号给了他。

指导员

一次收工，带队的犯人赵永芳说：“陈文立，你当过兵，你来喊口令！”我心中实在不愿意，只好轻声地喊“向右转！解散回宿舍！”有个犯人说了句“陈文立的口令喊得比指导员棒”，这又有人汇报上去。

指导员是个矮个子，属于“脸无四两肉”的长相，操东北口音，姓王，叫王致忠。他把我叫去，一上来就叫我“蹲下！”我依了。他又说：“你为什么不看着我”，我原来就觉得这人可憎：“我的眼睛又不长在头顶上，蹲下我怎么能看着你？”他从来没有被犯人这么说过，大怒：“陈文立！告诉你！任凭你口令喊得再棒，你还是个犯人！”“我本来就不想喊，那是赵永芳叫的，其实我也不会喊，我从来没有当过官！”“你还敢顶嘴！”我不作声。回去之后我对赵永芳说，都是他要我喊口令，惹祸了。他却笑着说：“既然指导员不乐意，就别再喊。”原来赵永芳是犯人中最得上面“信任”的，他专门装神弄鬼假汇报，我上了他的当。那指导员过去也不是当军官的，他的口令只不过是拔直嗓子叫而已，他特别喜欢叫，也算是过过官瘾。

一次到锻工组，路边见到指导员与另一老犯人在讲话，犯人恭敬地蹲着。那指导员摸出包烟，自己取了支放进嘴里，再抽出另一支丢在地上，那犯人即刻把那烟捡了起来，放在衬衫口袋里，又马上掏出火柴，奴颜婢膝地替指导员点了火，又再蹲了下去。我看了心中觉得很不是味儿，又发觉指导员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盯住我，我会意到他恨我。

开会时指导员训话：“昨天，广播小说《XXXX》播完了，你们没有收音机，当然不会知道……。”事后大家说，他讲这是什么意思呢？无非证明他有一架收音机。他把娱乐的娱读成“悟”，又大骂一个叫林华狱的犯人，说他出身地主，要奴役工人出身的犯人。原来林自称是航空仪表工程师，实际上专业知识几乎等于零，他原是小学教师，解放前夕参加地下共产党，之后被送到北京航空学院学习，混到毕业。但他不能参加实际工作，只是把文件图纸从设计院和军工单位之间来回送，职位是机要通信员，职称倒是三级工程师。此人生性自私，生活上斤斤计较，又以“老党员”自居，看来他在社会上也得罪不少人，被人检举“收听敌台”，判了15年。在狱中，他经常因生活问题同人争吵，常遭批判。

指导员又说：“我们这里有个大学毕业生，竟然无知到辈份都搞不清楚，他写给父母的信中，居然用了‘我们的母亲’简直狗屁不通！”我知他是在骂我，谢天谢地，他没有看懂我的意思（我们的母亲—Notre Dame—圣母）。指导员还经常说，“不要以为没有技术人员，汽车就修不成，没有他们汽车照样修，你再有技术，思想不好，我们就是不用！”

下 放

汽车修理渐渐上了轨道，指导员的话就应验了，由于设计绘图机会不多，我被调到铺毡组，活倒不重，只是一些体力劳动。有些人觉得，修车是技术活，高人一等，干皮毛就把人格降低了。不过，一旦有问题要我去解决，又马上把我抽到汽车工场，犯人们说我是下放了。此后，哪个犯人被干部看不惯，就会被调到皮毛车间。

制皮是在其他部门，我不清楚。毛毡是我们中队的活，分弹毛、铺毡及洗毡三组，弹毛是将羊毛弹松，铺毡是制作毡坯，经过洗毡才成型，只有洗毡是重体力劳动。毛毡部分，大多数是老犯人。

汪家金

我们宿舍有个洗毡组的人叫汪家金，高瘦个子，安徽人，已经关了 27 年，判的是无期，71 年间曾减刑到 15 年。汪家金在批斗会上口沫横飞，手舞足蹈，大声叫骂。平时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向干部汇报，但怎样表现都捞不到他朝思暮想的值星犯。汪年轻时被抽壮丁，当了和平军，后来为新四军收编，参加过渡江战役。在 50 年镇压反革命时，他受到清洗，被逮捕判刑。

由汪家金我想起了我家隔几户的一个司机，他 48 年到上海，同汪家金一样当过和平军，不过他是解放军的逃兵，逃到上海。经人介绍当了茶房，那家少爷教他开车，他也很伶俐，学会了就当司机。他常来我家同我家司机拉家常，因此我知他的情形。解放后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义勇军进行曲他都会唱。我家司机提醒他别再唱，也别提当过兵的事，只说从乡间直接来上海学生意，否则要惹祸上身。后来他去当了某高干的司机，直到年老退休，要比汪家金幸运多了。

一天汪家金去别的中队帮手，午饭回来迟了，正好那天改善伙食，一人一个羊头。当然大的都被人挑了，剩下那个特别小。他马上头上青筋爆出，目露凶光，在坑上跳上跳下，拿他的塑料碗碟到处乱摔，还一面破口大骂什么操蛋之类，好像要吃人了。我们都走出宿舍由他一人闹，他才静下来吃他的羊头。有人说以往他常这样，现在年纪老了，已经好多了。

不久，他身体不适，查出是晚期胃癌。在医院里，他说他想通了，不再检举别人了。他去世之后，别人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他枕下有张报告，检举 XX 给 XX 吃一块饼干，这就是他的遗书。我为他重写遗嘱：“余致力劳动改造凡二十七年，其目的在求宽大释放，积二十七年之劳改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需靠拢政府，弄虚作假，无中生有，浑水摸鱼，打小报告，现在尚未宽大。

凡我同犯，务须继续努力，步余之后尘，拾余之牙慧，檢余之余唾，继承余之遗愿，代代相传，争取宽大，直至永远，是所至嘱。”

除了汪家金之外，另有一犯人陆裕民，无锡人，外号刁德一，同戏剧中的刁德一同样是地主出身，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加入中共，抗日战争时是新四军干部，被派去策反国民党的抗日部队并当了参谋，再率部编入解放军，1955年肃反时，被定为国民党军统特务判了无期，当时劳改队看样板戏沙家浜，犯人们根据陆的经历，都说刁德一一定是共产党地下党员。还有一个叫吴凤高的江苏启东人，日占时期专为日方跑腿报信，抗战胜利后就被国民政府抓了起来，本来他认为不久会放他，但在审判前共产党来了，又以汉奸罪判了无期徒刑，在劳改队也总是偷偷地听别人谈话不停地打小报告，但他又是不大听得懂河南话，再加文化程度不高，又被指诬告遭人殴打，但他还是热衷偷听别人讲话打小报告，最可笑的是他乡间的老婆每年会寄他一双自制的白布鞋，因此犯人们都叫他小白鞋。

解 放

工厂里的一个电工告诉我们指导员出事了。这电工不是犯人，他说指导员带队，带领知识青年下乡。一天有个女青年要回市区看父母，指导员不准，把她叫到队部做思想工作。突然那女青年在办公室大叫，旁人进去，她指着指导员说被调戏了，而她是省军区副司令的女儿，这还了得？王致忠立即被捕，判劳动教养，在我们厂里打扫做杂工。有几个老犯人仍奴性十足地背地叫他“指导员”。二年之后有批北京来的犯人，我带他们去看设备，见他在扫地，我介绍说：“这家伙叫王致忠，原来是我们中队指导员，他造假案害死过不止一个人。他是个坏分子，现在是在监督劳动，你们千万不要学他。”这时他用一种怨毒的眼光看着我，我说：“你看着我有什么用？你罪有应得，这下场也太便宜你了！”

王致忠的恶行是犯人告诉我的。前几年他说在犯人中发现反动字句，有人汇报，某人写了反动字句后扔到粪池里去了。于是他命此人跳到粪池里去捡出来。那时正是初春，青海冷得很。粪池边上放好纸和笔，好让他随时“坦白交代”。折腾了一天一夜，犯人说终于“找到了”。案子报了上去，结果犯人被枪毙。王致忠说是他“揪出”了写反动词句的反改造分子，他还用其他相似的方法栽赃，真可谓十恶不赦。

我又被调到加工组。这是一个机床车间，我管工具、材料，但大多是做部件加工，可到任何机床上去操作，因此忙得很。直到来了台北韩造的铣厂，说明书是英文的，要我把它译成中文，我才可以稍歇，慢慢翻译。北韓的产品造得很粗糙，精度很差。

抗震救灾

唐山大地震，我们汽车修理队也忙了起来。毛毡部每天加班 2 小时，因为毛毡是救灾物资。要修理的车排长龙，都是运输队的车辆。汽车修理队 24 小时开工赶出车。犯人听司机们讲到灾区的惨状，大多起了同情心，只要干得动，就继续开工。真的累了，休息一下再干，不过得保证吃饱。为了赶快出车，干部也同意了。伙房倒是轮班的，有几个干事(也是干部)把他们食堂里的白面馍和羊肉也带来给犯人。经过 5 天 5 夜不停地修，终于完成，之后就恢复了正常工作。我开始发烧，牙齿都有些松动。烧退了之后，牙齿却永远没有恢复正常。

在这五天五夜期间，厂方干部一次也没有下来看过，只有几个干事在帮手。任务完成后，厂方的干部召开表扬大会，管教员要我发言，当然得先拟好稿和经他们批准，但我到了台上，就按照想好的腹稿发言。我说：“说我们的思想得到了改造，这话我不敢当。灾民之中，既有阶级兄弟，也有无产阶级专政对象，这是我刚才想起的。以我个人而言，我被外面司机描述灾区的悲惨情景所打动，所以尽力，仅仅是出于人类的同情心。我们虽是犯人，政府的革命人道主义使我们有吃有喝，而灾区不仅是吃喝成问题，连生命都没有保障。如果我们不尽力，那我们还能被称为人类吗？”我讲完之后，干部中竟也有人鼓掌，只见方厂长面色尴尬，而犯人因有干部鼓掌才开始鼓掌。事后有个干事对我说：“你的胆子真够大了，厂里领导在那一段时间无动于衷，你不是在骂他们不是人吗？”“我哪里想得到这些？我只是讲真话而已。”事后，上头没有找我算帐，算我幸运。

毛泽东死了

一天放映机载来了，晚上将放电影。下午我去马路对面劳改局汽车队领回他们借的工具。狱方算是对我“信任”，他们知道我在外面没有独立生存能力，不会偷抢，不可能逃跑。回队路上，突然听到哀乐，广播内容因为声音太远，我听不清。我想连周恩来死了，也是次日发表，现在下午就发表，必定是毛泽东死了。

回到车间，我说今晚电影放不成了，大家问为什么，我说等一会就知道了。提早收工，管教员宣布了毛泽东的死讯，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政策是不会变的。明天不开工，不准唱歌娱乐，除了大小便，或值日出去打饭打水之外，留在宿舍房内各自读毛泽东选集，不用发言讨论！”

次日，我同引擎组的两个犯人被叫了上去，因为某局长的吉普车漏油，要急修。我制作好衬垫，好让引擎组的人安装油底壳。那司机见到我们就喜形于色地说：“你们高兴吗？”我说：“你要我们死啊，快闭上你的臭嘴！”他说：“外面的人可高兴死了，你们有指望了，谁家没有一两个改造的？”“别说了，别说了，我们还想活命呢！”“你们真胆小！”他说。这小兔不知天高地厚，他乱讲无所谓，万一被人听见了，可就害了我们。

徒 弟

省监狱调来几个犯人，其中一个分配到电工组。当时我已由加工组调到电工组，实际上两头的活都得干，加工零件、修理电路配件，以及机床接线，绕制变压器等，因为队里会绕变压器的只有我一人。

新犯人姓李，原是现役军人，骑兵连长，因“恶毒咒骂”毛泽东，被判 15 年，比我年长 2 岁，同我一样，从学校里入伍，他对电工是一窍不通，跟了我当学徒。

他就睡在我旁边，同吃同住同劳动，真可谓形影不离，不久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无话不谈，他是我遇见的人中脾气最好的，真像绵羊一样。有一次他把机床接错，变压器烧毁了，气得我狠狠捶了他一拳，嘴里还骂了一连串脏话。骂着骂着自己不好意思起来，后悔侮辱了对方。他好像闯了祸的小孩，低着头一声不吭，我立刻向他道歉，要他捶回我一拳。他说是他做错了，我怎么对待他都不过分，如果是在战场上，我可以一枪处决他。我说：“你疯了，你不捶回我一拳，我心里不舒坦。”他才轻轻地用拳在我胸前碰了一下。他说在生活上我照顾他，所有吃的东西都分他一半，从来没有人这么对待他。他是独生子，父母一过世，什么亲人都没了。

李连长告诉我，他是在“甜水里泡大的”，延安人。父亲早年给共产党打杂，共产党得了天下，父亲也发迹，被派到西安一家军用被服厂当党委书记。但由于没有文化，厂都由副书记和厂长管，他只管开会时拿秘书写好的发言稿，宣读一下。家中又有各种津贴，因此他自懂事以来什么都不愁。他不算高干子弟，就读了普通学校，当过少先队大队长、中学团支书，什么都顺利。直到文化大革命，父亲被定为“走资派”，上台弯腰一斗，中风倒在台上，群众还骂他装死，不久就断了气。母亲得知心脏病发作，也辞了世。这个晴天霹雳之后，个性比较正直的他，对共产

党的作为从看不惯到决裂。他骂毛泽东，被军事法庭判了 15 年。我也对他讲了自己的过去，他说这叫“殊途同归”。

他是真正参加过“平叛战斗”的人，以往在监狱里有自称参加过的人，但都是在吹牛。他对我描述的较合情合理。以往的人所说的番号，有的是南京部队的，有的是济南部队或福州部队，根本没有被派到西藏作战过。他讲述了他的“第一次战斗”经验。首长先作报告，讲农奴主如何的残酷，战士们义愤填膺。接到战斗命令，出发上山。到达山顶正是傍晚，发觉“叛匪”的帐篷就在山腰，大家和衣睡觉，午夜过后不久就出发下山。天开始朦朦亮。当队伍离“叛匪”驻地约 500 米的机枪射程内时，冲锋开始。连长带头下大家抽出了马刀，机枪手开始扫射。我们冲到帐篷里去。天啊，那些是叛匪吗？怎么都不见武器？老的、小的都是普通牧民，是一个个家庭。但上面给我们的命令是“全部消灭”，因此我们见人就杀，帐篷外的人杀光了，就挨个帐篷换着杀。以后的几次“战斗”，情况都差不多。当然他还详细地告诉我他们是如何残酷地屠杀藏民，士兵们以杀人取乐，剖开孕妇的腹部，用马靴踩踏儿童腹部致死，兇残的程度，远远超过宣传中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我说：“你好残酷！”“我残酷？我看你如果在场，根据你的德行，那种火爆的脾气你真不知道要比我残酷多少倍！”他说他有个战友，性格同我很像，平时不爱讲话，一旦帮助别人会把命都豁出去，好打抱不平，做事认真，一丝不苟。一天他们押了几百俘虏，大队传来了指示，要将俘虏“就地解决！”于是他们发下些铲子，要俘虏挖坑，领头的两个俘虏说不干，他那战友抽出马刀，给他们一人一刀，俘虏们就范了，开始挖。等到坑挖到有一个人那么高，战士们连推带踢，有的用枪托砸，直到俘虏全部被推到坑里。事后，那战友还记了功。李连长也是“火线提干火线入党”。

我回到上海之后，在我之后出狱的人告诉我，李连长也平反了，是部队来接他的，给他穿上崭新的军装，回部队了。

劳改队的一天

现在叙述一下劳改工厂的日常生活。那里的计时，用北京时间，严格来讲，是中国沿海的时间，因此下午四，五点就天黑了，而早上四、五、点就天亮。

我们睡的宿舍，是土坯砖房。泥土制成的砖坯，未经烧过，青海雨水不是很多，这种土坯勉强可用。土坯也是犯人做的，我们劳改工厂有个修建队，专责修理、建造房子，门窗都是木制。除了图书馆，医务室和干部办公室有玻璃窗外，其他的窗户都是用纸糊的。屋内泥地，有两排坑，

也是土坯堆成，上面铺毡，我们就睡在上面。有个木架，放各人的热水瓶、漱口缸，架下有些间隔，放各人杂物，如碗、洗脸盆等。日用的纸、笔、针线杂物、日常更换的衣物都放在坑头上。

早、中、晚三餐都在宿舍里。我们轮班当值到伙房里去挑菜挑馍，没有固定改善伙食的时间。星期日有时会改善伙食，另有一次是在工作日。平时的粮食是青稞馍，或包谷馍。菜是白菜，有时加胡萝卜，或洋芋，都是用水煮加些盐。青海五年间，似乎就没有其他蔬菜了。改善伙食大多是羊头肉，好的时候每人一个手抓羊头，羊肉是很难得的。有时是青海鲤鱼，有时一连二、三天都有。猪肉，那边叫大肉，青海回民认为猪是不洁的动物不吃，连讲猪字都忌，因而大家也叫“大肉、大油”了，只在过春节时有一次。牛肉，是牦牛肉，很少有机会吃。此外有羊肺，伙房里从来不清，带着血污、石灰质同白菜一块儿煮，结果腥臭难闻，很不习惯。自上海来的犯人大多不吃，伙房把蔬菜同羊肺分开煮，打饭前统计好份数，只替要吃的人盛。我的食量不大，劳改时没有饿着。吃不完的馍可以给食量大的人。

说到伙房，有留场人员说过原来犯人的伙房就同干部食堂相邻，有天有上级劳改局干部到劳改队工作就餐时见到干部食堂的人将羊杂碎即羊心羊肺之类同犯人伙房的羊肉调换，事后有上级下令将犯人伙房搬到犯人宿舍旁，这时伙食是好了一阵，但不久又回复以往，是卡车先到干部食堂做手脚再往犯人伙房卸货，其实这是众多的干部们使坏事件的冰山一角。

家中可以寄东西来，条件好的人一个月一次，我是一年一次，寄些咸肉之类。条件最好的要算岑伟祥，老家在广东西樵，每月寄上细面条腊肠腊肉，岑的情形写在后面。

守夜的一直呆在宿舍范围，除了管打铃起床、睡觉外，他还负责烧开水，犯人大多有热水瓶，喝的、洗脸洗脚都到锅里去打水。星期天休息，大家可以洗衣服、洗被套。烧开水房边上的炉子生了火，如果犯人自己有面条，咸肉或其他食物，可以煮了吃。每年冬季，一车车生羊皮运到劳改工厂，是用来做皮大衣皮袄的。犯人们就将附在皮上的羊油、羊蛋割下煮来吃。这炉子普通犯人用完了，回民犯人就来清理，整干净了他们可以用。我们多半煮些没有猪肉的食物。可恶的是后来上海来的几个反宗教的小流氓，故意捣蛋，把猪肉油抹在炉上还哈哈大笑，弄得几个回民又念经又清洗，他们还看热闹。

青海下雪，从来就积不起来。但最冷时，可达零下 33 度，人的感觉似乎并不是线性的，零下 15 度同零下 30 度，似乎没有什么分别。好在工房里有暖气，倒不是上头怕犯人们冻着了，而是怕机器会冻坏。因为门、窗都关不严，宿舍里会生火取暖，又有热水供应，感觉上比上海市监狱里零下 5 度时要好些。

每个月都有一、二次放电影，露天的即使是零下 33 度，也都照看不误。没有风，穿暖和了就不怎么冷。传说严寒时小便会成冰柱，边小便边敲，那是假的，不过，小便池里堆起冰块是真的。上厕所用的厕纸，是用旧报纸。中队里，干部看过的旧报纸，都集中在一起，犯人们可以拣来用，只是把有毛泽东照片的挑出来。旧报纸里总有参考消息，我们大家也传阅。有好些河南籍犯人，还是用他们的方式，大便完，抓起一把泥土，往肛门上一抹，再拍净了就完事。

犯人可以抽烟，每人每月有 6 元津贴，买烟当然不能负担（但还是有人买）。劳改队里有种烟草的，老犯人种了晒干用纸卷着抽，这我抽不惯。好在我们修车，外来的司机，见到我们都会塞给我们一、二包烟。我在加工或电工组，他们知道我负责技术工作，为了他们的车早点修好，会整条整条的烟送给我。我抽得不多，干活时也不抽。我按小组摊派，轮流一人一包地分掉，连制毛毡的犯人都有一份，大家就服气了。除了送烟外，有的司机还会送羊肉，送糖果饼干，送水果，当然他们送给干部的就更多了。

每天起床，漱洗早餐后就出工，由赵永芳点名。走出宿舍到厂区，按小组进入各自的工房，至于喝水上厕所，只要同值星犯或旁人讲一声就可以。中午回宿舍午餐再集合出工，傍晚收工，回宿舍晚餐。之后是学习、读报、讨论，只要大家发完言，值星员就布置次日的劳动工作，所以发言都较简短，完了就“自习”，可以看各自的书、写信，等到打铃，洗脸刷牙、睡觉。

警卫战士

一天一个战士抱着用棉大衣裹着的一包东西跑到我们电工间，一进门就叫“救命”。打开棉大衣，是一支 56 型冲锋枪，他喘着气说是在擦枪保养时把一弹簧弄丢了，要我帮他配。我说弹簧在加工组才有，到电工组来干什么，他说是加工组叫他来的，并告诉他电工组有个过去当过兵的。我知道是那个顾副值星员说的，只好到加工组去找了个相似的弹簧替他配上，由于这弹簧未经热处理，虽然能用，感觉上有点怪怪的。那战士说，管不了这些了，只要没人知道我丢了弹簧就行。我要他还是仔细找，找到了装回去。以后，他常带另一朋友到电工室聊天，赶也赶不走，他俩实际上是来抽烟的，因电工室总有外边司机送来的好烟。

翟政委

有个干部到电工房找我，问我过去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照实说是技术员，又问我当兵时，我回答是驾驶员，他却问道不是说你是通讯兵吗？我解释一定有人搞错了，他即问我是否帮过方干

事的小孩装了个半导体收音机，我当然不否认并说还帮他补习功课呢。接着他问我会不会修理收音机，说青海处于边远地区，北京太远，中央台不清晰。我心中马上就知他胡说，西宁是省会，怎能没有转播台？我知他的意思就是要我替他提高他的收音机灵敏度，但我又不知他是谁，因此我只好说机器先要看过，不过首先得请示中队干部，我们犯人不作主。他笑着说我们政委的收音机还要请示吗？拿来就是了！

次日翟政委带着他的大约五六岁的孙女，那个昨日来的干部搬着那台上海 132 型收音机来了，一试，似乎正常，只是短波高频段低端无声，这是这类机的通病，其实我试了中央台，电眼完全闭合，讯号强得很，我当然不好出声，试短波段一半无声时他就说，这就是有故障啦，我也拿到外面无线电行去让他们看过，他们都说是先天不足没有法子的，我笑说有办法，机器放着，待我检查后我会通知留场的按我写的零件单由你批准去买，他说不用麻烦了，他对旁边的那个干部说明天你去买就是了，原来是政委的秘书。

劳改队的电工，他不是犯人，但也不属公安编制的一般工人，他告诉我翟政委六十多岁，文化不高，为人挺和善，平时不大管事，老夫妻只管带孙女，劳改队都由两个厂长张罗，但最终还得让政委批准。

这架收音机，凭我多年收听短波(敌台)经验，波段低端是没有起振，只要在振荡栅串接一个 60-100 欧的电阻就解决了。这里我就把电子原理省略不叙述了，我再替他加装了一级中频放大，由于西宁当时没有如上海那样的干扰台，连中波广播段也有英、俄、印度以及很多我也分不出哪种语言的电台，短波就更不用说了，星罗棋布。翟政委高兴了，说他的收音机象军机一样；这又引来一大批干部抱着收音机堆在电工房，我看这下惹祸了，好在政委下来，我只好老实告诉他我不敢再修理了，万一谁出了事，收听敌台又推到我们头上，我们电工组全组枪毙怎么办？他说他会下令劳改队一律不准干私人活，事情总算解决。

老 三

四人帮被打倒之后，监房里气氛似乎缓和些了。队里有个叫顾国栋的，外号猫头鹰，是同我们一起从上海来的。他自称某大专毕业，在电镀厂当技术员。干部要他搞一个电镀工场的方案，他写了一份正规化车间的材料清单，干部一看被那些设备吓坏了，劳改队当然负担不起。当时我对他说有些塑料盆、整流设备，加工些挂钩，只要镀出几件东西，就可以上马了。但他一拖再拖，直到我离开青海，电镀工场还没有搞起。顾说他是广东人，但广东话讲得很差。又说父亲是银行

家，是顾竹谦的堂兄弟。这可奇了，顾竹谦是苏北帮会头子，怎么会是广东人？他的解释是，顾自己是广东人，而手下的流氓是苏北人。他又说母亲早就在永安公司做事，外号“康克令西施”，因此郭琳爽是他的干爹，而且几乎讲到他可能是郭琳爽的私生子似的。他最在行的是京戏，一天到晚啊欧啊欧地唱个不停，身体很差，自称为半条命。由于他常病，可以在监内休息，结识的人很多，岑伟祥就是他介绍我认识的。

岑在家乡是个公社干部，负责养鱼。他把鱼卖到其他地区，结果他的部门富了起来，当时是不允许的。结果说他炒卖鱼苗，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判无期。他手很巧，到劳改队不久就学会钳工技术。我同几个干事建议，把他调到我们中队扳金组，只是他的身体很不好，有心脏病。

同岑一起的另有一钳工李四，香港来的，号称“派遣特务”。闲谈中，知道他是被栽脏的，“乜都系假既！”当我讲到当初我父亲有机会去香港，但他那时不舍得要造新屋的地以及房产，“到拉尾乜都有晒，想走都走唔甩！”（意思是到最后什么（产业）都没有了，想去香港也走不掉了），他说我的广东话讲得‘真係正’，很久都未曾听到这样的粤语了。我告诉他我原籍是广东中山的介冲（今珠海），他即说这地方就在澳门边上呢，他问我乡下还有没有亲戚，我告诉他有位我祖母的弟妇，是把找领大的，她在北山村的安老院，在文革前我们还通信，她不识字，由安老院一位林姑娘代笔，还叫我们去那边玩，不过去前每人要寄二张相片，办张边境纸就可以了。这时，李四大摇其头叹道“你这个傻仔，北山有条澳门街，一过街就是澳门，而且你这个亲戚住的养老院是澳门天主教修女办的，那位林姑娘一定是修女哟！你到了那边就等于到澳门啦。”我又怎么知道呢？如今后悔都没有用了。

一天顾国栋对我说：“现在我的脑子里，就像蒲公英乱飞一样，怎么说起呢？我们中队里有个‘老三’。”我不解，他说：“中队里的车工陆金龙，是因“516”造反派被送进来的，他姐姐是黄维国（林彪部下，原空四军司令员）的妻子，而陆的妻子，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陆金龙是被四人帮送进来的，目前很快会出去了，他将是国务院总理。以往，人们称毛泽东老大，刘少奇老二、周恩来老三，因此，顾称陆金龙“老三”。

顾说，“老三”答应他，将来让他负责搞革命样板戏。

他的话我觉得蹊跷。按常理，涉及中央的犯人，通常不会到我们劳改队，何况陆金龙原是车工，又是上海青浦人，似乎同高干沾不了边。顾见我怀疑又解释说：“吕正操的侄儿不是在我们大队，张广路（万里的小舅，曾当过辽宁一城市的市委书记），不也在我们中队里吗？”“他说一旦他当了总理，整顿劳改系统也是他要做的事。”

我发觉有好些人都在巴结陆，送他吃的。有几个年轻的也对我讲了同顾差不多的话，我一点兴趣也没有。上海市监狱那次“社会民主党案”我还心有余悸，因此我能避则避。

陆来找我了。他说，“队里我看得中的就你一人，你受过党的培养，技术上又精益求精，你有没有考虑将来为国家作些贡献？”总理还没有当，官腔已经摆出了。我感到厌恶，说：“我们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京剧《红灯记》中的台词），你是共产党员，我是天主教徒，我不会，也不可能到共产党里干任何事。至于说我们之间，以往有外面司机送进来的东西，大家包括你都有一份，大家平分。如今我知道你的身份，仍然不会多分给你！”他讨了个没趣走了。

事后，陆的事穿了帮，他不过是个骗子，就想骗别人给他点吃的，根本跟“老三”不搭边，顾上当了，替他作了宣传员。管教科还是把我找去了，问我在陆金龙的反革命集团里，我担任什么角色。我说：“哪来那么多反革命集团，我对陆金龙根本没兴趣！”

“为什么没兴趣？”

“他当他的总理，我当我的犯人，他真出去了，还会理采我们吗？”

“那你早就知道他是假的，为什么不汇报？”

“我哪能知道他是假的？这是你们共产党里的事，我管不了！”

“你们共产党？这样说来你对共产党还是离心离德！”

“那叫我怎么说？我当然不能说‘我们共产党’。如果我对你说，‘我们都是从部队里来的’，你一定会说：‘见鬼，你是犯人，是反革命。我是干部，什么我们不我们的？’”

他笑了，这家伙比起上海的，资格嫩多了。他说：“你在上海改造时出过问题，这我不想知道，你要注意！”我就知道他对上海市监狱的记录有兴趣，但材料上一定注明了他不可以问。我决定告诉他真相，我说：“反正这件案是林彪手下制造的，四人帮也打倒了，现在告诉你也无妨了。”于是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并说我的命是捡回来的。至于陆金龙的事，我说我吓怕了，还是不碰为妙。他听得入神说：“我们知道你同他没什么关系，你真的那么清高，不想当个高级干部？”

“说真的，我的确不想，我不想劳改，但也不想当官！”

他摇了摇头，我猜他在想，世上真有这样不想当高干的傻瓜？“没事了，今天只是问一下备个案，证明你同他们没有关系！”后来，陆金龙被加刑到18年（原先判7年），罪名是骗子。到了80年代初，他也平反出狱了。

实事求是

77 年底从上海又调来几个犯人，以刑事犯为多，张弛也在内，他被加刑到无期，而吕海生被加到 20 年。他告诉我，陈忠人在他之后，也被加到无期，金振华被加刑到 20 年。

我问既然集团都是杜造的，为什么还要加刑处理？他说我很幸运，虽然在处理我比陈忠人还重，但在广播中，我在该组织的地位从来没有出现，这就是占了“幕后策划”的便宜。本来是准备“一鸣惊人”的，但鸣不了了，而他同吕海生、陈、金、却经常在大会广播里以反革命集团被点名，不处理怎么交代？政府是永远不会错的。这就是共产党所说的实事求是政策。

翻案平反

78 年报纸上一再出现要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最先是赵勇华释放了，他原来是八一水球队教练，以“叛国投敌”被判 20 年。一天上头突然通知他收拾东西，由上海法院来的人将他接走。接着大家都酝酿着写翻案材料。

我收到姐姐来信，提到吴继玠，说他心力衰竭故世，当时我不知道他早已自寻短见，我难过了一阵。

写了材料，又怎么寄出去，这是个问题。中队里的干部，由于先前的习惯，当然是严禁翻案。

我们修车有方便之处。那个告诉我毛泽东死了大家很高兴的司机，主动要帮我转信。他从装甲部队复员，听说我当过坦克兵，自然有亲切感。他说他做梦都想穿上坦克兵制服，但却轮不到。他认为我在修车上给他优先，这是真的，倒不是我，而是干部们对他的主人某厅长特别巴结，关照下来，他的车优先修，我占了便宜。

他说，我写完之后交给他，他代我寄到我家。家中有重要的信，可寄到他家，他再转给我。1978 年下半年，他来找我说：“祝贺你，你平反了！”一面将家中来信给我，信中说我们的案是冤案，已经平反了，唐千根、刘永达已回到家中，要我等法院来接。等到年底，又来一信，是刘永达几次到法院去催，他们说：“如今青海冰天雪地，连小便也是边便边用棍子敲，我们怎能去？到春暖花开之时我们去，反正他已经呆了十一年，不在乎几个月了！”我亦没有归心似箭，捱了十一年，有点呆了。何况回了家又怎样，我全然不知。

回家之前

他们送来了一本东北汽车修理厂的设计方案，是专修解放牌货车的。车辆进厂就全部分解，部件分到各车间翻修，到出厂已经大修得像新车一样。队上要我以这方案作参考，根据劳改队的情况建成小汽车修理及零件加工生产厂，我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出了方案。因为我们队里来的车品牌不一，有大车也有小车，同那本方案完全不同，而且厂房占地面积、资金都有问题，但总算把流水线、基本工房布置、工人人数都搞好。我深知将来的工人都是劳改犯，所以劳动环境条件都尽量设计得好些。

在设计过程中，我全力投入。那时正逢春节，发了些标准面粉，白菜猪肉馅，给我们包饺子。我没有时间，把它们煮成糊吃了算，继续搞我的设计。有些老犯人去汇报，说我是对抗政府，饺子不包，做成面糊，这叫“过个糊涂年！”

有个单位汽车队的小头头来找我，说有人送他一套日本扬声器，十二寸，配一只高音喇叭，他带来给我看，问我用什么扩音机好。我入狱 11 年了，外边情况一无所知，他弄来了一些青海买得到的扩音机说明书，还是老式的苏式电子管 6P6 等小功率的。他告诉我他弄得到所有的电子管，我开列几个 56 年 Mullard 设计的“520”扩音机所用的管子，他果然弄来了全新的飞利浦管子，我就替他装了。线路图和零件数值我都记得，变压器也替他绕好。装好之后他带回家，事后他高兴地说：“大家都赞我那英国泡子的机器，说是全青海第一，灯泡果然是灯泡，有两下子！”

这么一来，几个干部也要我给他们家里装置些小型电器设备。

劳改场新来了一个于管教员，他刚从部队复员，据说他父亲还是劳改局里的干部。此人一来，就规定犯人不准收司机的东西，这不准那不准，搞得大家很紧张。他自己拿公家的东西却特别多，我就将他拿的一笔笔记了下来。那时新来的汽车队高队长和万指导员，都是在文革中“受迫害”现在解放的，正巧碰上要搞反贪污，我趁此机会，把于管教员拿公家的物品清单交给了高队长。

劳改队里的消息也真灵通，对面劳改局汽车队的司机告诉我们，高队长带人抄了于管教员的家，按清单将赃物一一对照，并说这是一个典型，要严肃处理。那于管教员也是蠢得可以，这时候他还对电工组另一已经平反，同我一样等出狱的人咋呼，对方说“你把公家的东西往家里搬！有什么资格对我咋呼咋呼的。”他傻了眼。

于管教员的父亲是劳改局里一个不小的干部，本来准备评他为“五好民警”，这次一来，不但“五好”当不成，还受了一次警告处分。

释 放

我被叫到中队办公室，姓赵的管教员宣布：“陈文立同志，你平反释放了，法院来信，说不来接你回去，让你自己走。火车票已经买好了，我们能买到的最早的是大后天，回去整理东西。明天不用劳动，但得办个移交，把所有的技术问题向袁干事交代清楚，我们还得到外面去请个技术员来接替你！”当我拿了火车票要走出办公室时，赵把我叫住说：“现在大家都是干部了！”他望着于管教员说：“你把他害惨了，他的一生完了！”我说：“不至于吧，人生长着呢，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小于从部队复员分到劳改队，总有个原因吧。有件事我倒想解释一下，小于，你要明白，犯人也是人，不要把关系弄得那么紧张，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就要断。你想想，这么多干部，谁没有一点公私不分？为什么别人就偏偏对着你？”姓于的张大嘴，我想他永远不会明白。

库房里存的东西，破旧的都不带走，没有染色的军装只有一件，一条蓝空军裤，另套以及两件夹克式工作服一定是被人(干部子弟)偷了。毛毯送给了李连长，犯人的衣服都不要了。黑色的军装也送了人，只提一个小旅行包。警卫战士给了我一项军帽。晚上就睡在刑满就业人员的宿舍里，同张广路(他已刑满)同室。

张广路，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毕业，不知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万里是他的小舅，还是他是万里的小舅，反正是亲戚。他在中学时代参加过属三青团的抗日组织，受过审查，说是周恩来已下结论，这问题不应追究。解放后曾经是辽宁省某市的市委副书记。不久旧事重提，被捕入狱判20年，周恩来的话不算数了。“万里这个王八蛋还落井下石。”他说。张刑满后在一所中学教化学，一天傍晚他骑自行车上街买东西，突然被一群女青年围住，他忙说：“我的姑奶奶，您就放过我这老头！”她们把他的帽子一揭，一个说：“他妈的真是个老头！”把他放了。不久，青岛市公判，居然有一个女性的“强奸集团”。

我把所有的厂房改建方案交给了袁干事，以往家中寄来的机械零件设计手册，也送给了他。下午，他带我去逛了西宁市区、百货公司。西宁市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劳改，或同劳改有关系的。

走前，我也同方干事告了别。方干事是安徽人，曾当过管教员，现管库房，他是干部当中唯一不拿公家东西，也从来不要犯人为他做任何私事的人。他有一儿子方超，是个乖小孩，除了做功课就是帮助做家务。一次他装了个半导体收音机，不响，要我们帮他，响了，但不久晶体管烧毁，他急得哭了，说父亲不会给钱再买。我叫我的外甥在上海买了寄给我，给他安上。他要考大学，姚糊涂和我帮他补习，后来知道他考上了。

一清早，车队老杨就把我送到火车站，回家路上心情正如张希斌神父所写“茫茫然！”路上有军车往北走，那是“教训”过越南的部队。车上有两个士兵，是济南部队回家探亲归队的。他

们看到军车说：“妈的，越南是这么好教训的？啃不动了，逃回来了吧！”我不太明白。在劳改队，干部们说快打到西贡了。凉山就在顺化附近，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把阮文绍请回来，气死那个老饭桶(范文同)！”后来我才知道凉山是在中越边境上。

车上的人以为我是出差的，说我一定是从上海到西宁水土不服，脸色难看，哪里知道我是劳改释放。

落实政策

到上海，只是父亲来接，虽过了 11 年，没有觉得有多大变化，好在我戴了军帽，父亲见了也不觉异样。回家路上，父亲就谈到我们或许有机会“出去”。

这个家，我还是第一次见，虽说是上海城镇房子的灶偏间，比我想象的要好。进去时，邻居们好像夹道欢迎似的。父亲说，他们都是好人，对我们很帮忙照顾，我一一打招呼。事后他们对我说，如果他们不知我是从青海释放回家，还真像复员的呢。

外甥长大得我不认识了，印象中还是幼儿院男孩。大的已经要考大学了。父母最关心的还是那几年没有接见的的事，他们曾问我表哥唐千根，他当然不知实情，说我一定在监中不知搞了什么名堂，闯了祸。虽然我把经过粗略地说了下，父母还是半信半疑。

我得知扁头吴继玠是自杀的，高佬林(林秉聪)也是在监督劳动不久，受不了侮辱而自杀了。父亲说他害了这么多人，是自作孽。我并不那么想，初时他也不是要出卖我们，是被共产党逼急了，无法招架，我同情他。

以往的女佣起文告诉我，父母第一次接见了之后，见到我在监中被人打(就是被推了一下)，回到家里，告诉了她之后，就不讲话。晚上，他们自己整了点菜，拿出那瓶没有被抄去的陈年白兰地酒。夜里她觉得有些不妥，回房一看，我父母刚好吊上屋梁。她又不好喊，好在她力气大，把他们救下，三人哭成一团。还是起文相劝，说她自己的丈夫也是被抓劳改，现在仍下落不明。只要等，总有天亮的一天。我听了这件事，一直难过到如今。我想，万一我被枪毙了，将会有多可怕的事发生？

往后的几天，受难友之托，走访各家，通个消息，以前叫“反革命串连”，也是为了他们早点出狱。还去信广东，让老岑的妻子为老岑办理保外就医。

回到电缆厂时，好些人都不认识了，办事不是想象中那么顺利，他们根本没有准备让我回去，说：“要等法院来函，我们再作决定！”

走了几次法院，人们推来推去，都说平反工作任务重，人手不够，要我“耐心等待，慢慢来”。之后，法院说他们并没有去信要电缆厂开除我，所以他们不会发信。在我追问之下，他们说这是专案组的事，而专案组如今的人都散了，没有人负责。

没有工作，待在家里也总不是味儿。我同刘永达一起又到法院去找那姓徐的负责人，他被我们问急了，又摆出了原来那副凶相说：“你们不要以为平了反就没有事了，将来怎么收场谁都没个准。老实讲，我是有看法的！你们已往的言论的确不可理解，你们还是收敛些，今后都要算帐的！”这时刘永达怕了。我说：“要算现在就算，看你怎么算，走，你要到哪里去算就到哪里去！”这下他又软了来说：“我也是为你们着想，为了你们好，什么事都小心为妙。你不是要工作，要赔偿么，这个我一定全力以赴，包在我身上！”刘永达这时拖着我走说：“这种人什么都做得出，还是少惹他们！”

父亲和一批被“解放出来的牛鬼蛇神”一同退休。大会上，见到刚“解放”的少儿出版社社长，以往他是右派。父亲讲起我，他说，“岂有此理，政策就是不愿落实。我来落实，明天我就向出版局要人，等我消息！”

不到三天，父亲告诉我，叫我去出版局报到，入少儿出版社工作，安排在图书馆。有的人以为我是“顶替”父亲，因为有几个年轻人是顶替父母来工作的。那位总务科长对我说，最初他是反对用我的，他以为在监狱里呆了十几年，一定染上流氓习气，谁知“你仍然是个大孩子！”

工作了大约半年，法院才给我 500 元赔偿，这 500 元是怎么算出来的，没有人明白。

我工作卖力，图书馆负责人很高兴。社里办了个英语学习班，由我任教。我父亲以前的单位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图书馆也要人，我的上级介绍刘永达去做。

湖南街道说要赔偿，整套的家具 20-30 元，三角钢琴 75 元，24 管的落地收音机 25 元，至于祖父的古董，好的已经“上缴”，博物馆是没有赔偿的，算是奉献国家，倒底是些什么，又说清单不见了。退回来几件物品，几张字画，连同家具，1500 元左右。

剩下的是房子了，当时除了人民银行外，尚有 36 户人家住着，人们都打趣说，正好是 72 家房客的一半(72 家房客，是以往的滑稽戏)。到房地产公司去问，又是推三推四。父亲对他们说，产业是他们两兄弟的。有个男的说，“你意思是业主有在国外的，是统战对象？看你的年龄，估计你的兄弟早已退休了，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准备出国

海外的亲友陆续来上海，看了我们的住处，都落下了眼泪。我的父母亲一直是养尊处优惯了，一下子搬到没有卫生设备、没有煤气、用水靠打井水的环境，的确是无法想象的。不过也过来了，他们没有抱怨过，或许我们家中的人适应性都比较强。当初我去部队，很多亲友都问我怎么过得惯，说实话，我一点也没有觉得苦。大屋子、漂亮的家具、浴室对我来说都无所谓，说句笑话，或许我生性比较贱。

母亲的妹妹我阿姨来信，问我有没有兴趣再入大学，我当然求之不得。我得马上去办包括中学的学历。时代中学已经搬到原先的一家殡仪馆里。郭时平老师当了教导主任，近二十年不见，他很热情。中文打字机坏了，他亲自手写了证明，我毕业于该校，写了一份毕业成绩单，证明文件上打上硬印，这印几乎穿了大半，好在有透明胶交叉贴好。再到同济，起初他们打官腔，说平反冤假错案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补发毕业证明，学历证明要排时间，因为文革中档案被冲击，如果我的材料烧毁，他们就没有办法。我想起了潘教授，设法找到了他。他高兴极了，邀我去他家晚饭。我特地买了他最爱吃的糕饼带去。

久别重逢，格外高兴，两人都死里逃生，如今弹冠相庆。他当初被定性为社会民主党未来政权里的教育部长兼国防科委特别顾问，十足的“一场闹剧”！这场闹剧里有血有泪，更有人赔上性命。他后来被调往江西汽车修理厂当犯人工程师，当时技术人手不够，他打报告说我是他的好学生，技术设计能力很强，想把我也调到那边去，谁知这报告把我送到青海了。感谢他在监房里教我很多有用的知识，在青海的确用上了。

第二天他陪同我再去同济，这次不同了，大开绿灯。倒底是大学，打字人员马上用英文打出了我各科、各学期的上课时间、成绩，再用影印机印了几份，全部盖公章。

学历办好，寄给我阿姨。当时她在麻州理工学院做学生咨询工作，她替我报了电脑科，读硕士学位。I-20 寄来了，加上表哥替我出面担保，只等护照申请批准，就可以去办美国的签证。

两个多月过去，护照还没有批下来。这时正巧父亲有一老友从美国来上海探亲，请我们吃晚餐。席间他介绍我们认识了他们在上海市公安局政治科任职的远亲，我立即托他查一下我的护照为什么迟迟不批。

消息来了，他邀我到他家中。他已看过我的档案，里面说我从小学起直到劳改队，批语就是“思想反动”，因此怕我出国继续“反共”，我 12 岁那年，就有这样的批示：“伯父是蒋匪帮高级官员，此人不能担任重要工作！”这句话等于宣判了我的死刑。所有的鉴定中，只有部队里的最好：“爱祖国，爱集体，积极争取入党……”什么都是好的。审批的人拿不定主意。他说他帮我讲了话，说我是个老实人，讲真话，一定是得罪了领导。部队里的领导是和我 24 小时共同

生活的，最了解我，所以部队的评语是最真实的。经他这么一说，那审批的人也同意了。他说，不出一个星期，你的护照就会批下来。他是讲了真话。他的儿子要个中学生用的计算机，我答应出去之后给他买一个。

一天我在香花商场购物，被一军人叫住，我不认识他，看他有些年纪。“你就是我们对面的小陈吧！”我马上明白他是警备区乐团的人，他说他是看着我长大的。“你知道吗，以往上海市公安局的人，每周都有二、三天到我们团里来，待在望得到你们屋子的房里，24小时监视。他们说，你们这户人家有问题。我们最清楚，你每天上学，你父亲每天上下班，有啥问题呢。这些人真是无中生有，你吃苦了吧？”“刚从青海劳改回来，吃苦的人多着呢！”

另一次我和母亲在街上遇见一个邻居，正谈话中，一个独臂里弄干部来搭讪说：“是啊，我也是受蒙蔽的，我是受骗上当，是受害者呀！”我想起当初，她要将我母亲打成反革命，在提审我的时候，扯起她的喉音：“态度端正点！”心中有气，我说：“你不要装了，你受蒙蔽？你忘了当时你是多么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掌权了，可以审问人了，多得意呀！你在怀念当时的好日子，我看你还是假话少说。”她转身就逃。

我档案里的那句批语，我可以确定是当时的户籍警写的，那家伙叫秦晋普，讲话皮笑肉不笑，又夹着冷笑，后来因为强奸幼女而被判刑三年。刑满之后分在里弄加工厂做工，不出两个月，又因调戏妇女再次被捕，以后，怎样就不清楚了。

护照拿到，就要去签证。上海美国领事馆刚开馆，要等上几个星期才开始办签证。办签证的第一天我就去了，排在第三个问话。前三名都是办学生签证的，第一个批准了，第二个一句英文都不会说被拒绝。轮到我，问了几句，他见我年龄大了，问我有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我说没有，他问为什么，回答是：“我是天主教徒！”他笑了，用中国话说：“去拿登记单”。正在办手续，进来了一个年轻男子，用电影里外国人讲中文的洋腔普通话同负责签证的美国职员讲话：

“领事先生您好！”

“您好！”

“我的父亲是一个将军，国民党的将军，他现在在台湾，我要去和他团聚，你们应当提供方便。”

“这应当由你们的政府提供方便。”

“我不是要到美国，只要有你们的签证，我可以去香港，再去台湾。”

“我们只办去美国的签证，你不要去美国，为什么办美国签证呢？”

“我父亲是你们美国人的好朋友！”

“我们愿意同所有的人交朋友！”

“我的父亲为你们美国人打仗！”

“不，不，不，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是你们中国人自己打自己人，同我们美国一点关系也没有！”

“那青年灰溜溜地离开了。这家伙的毛选倒是学得不错，但那领事馆人员的回答，正中要害，妙极了。”

南 下

潘教授为我在梅龙镇饯行，因为吴继玠的家，就在那餐馆的弄堂里，大多是难友，刘永达和姚琪也到。张弛也回到上海了，他是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的，在一所中学里教历史。姚糊涂出狱迟些，我成行前夕他告诉我，小汽车修理厂开始按照我的设计动工了。由于资金不够，他作了些小修改，我问他有没有把工人的条件弄差了，他说他不会做这种缺德的事。

火车越往南，两边的景色就越好，青山绿水，同河南甘肃根本没法比较，以往中原人士称这里“南蛮之地”，一定是出于嫉妒。

到了广州，岑伟祥专程到广州来接车。他半年前就办保外就医出来了，而今“修正主义”当道，互通有无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又成了乡下的红人，可惜身体太差。我的表姑正好有生意到广州，她顺便来接我往香港，她为我同岑伟祥在白云宾馆订了一个房间，我们谈了一通宵。当时广州治安很差，岑叫我不随便乱走，宾馆住了两晚，就往罗湖准备过关。

广州到罗湖已有直通车，过了小木桥，就是香港境内。人民入境事务处只是一小办公室，只问了几句话就办好手续，等待下一班去九龙的火车。等候室仍然是“禁区”，但有买饮料的，我买了可口可乐，一喝，还是儿时的味道，三十年没有尝过了。

火车到了，大家一涌而出，表姑早已由香港居民的另一通道上了车，并招呼我上车。不久，我们抵达九龙。

表姑住尖沙咀，一到家即打电话给我表姐，她早就替我安排好了住处。

初到香港

一见面表姐即告诉我：“大伯母特地从美国打长途电话，平时她是很舍不得打长途的。电话里三番四次地叫我把你留在香港，千万不能让你到美国，因为麻州理工学院学费贵到吓人，没有

人能负担得起。”表姐又说，麻州理工学院是很难考入的，这是我的一个好机会，要我自己拿主意，反正有三个月时间。如果留在香港，可以在她的西饼公司工作。

当晚我就住在表姐原来在九龙办的烹饪学校里。学校后来扩大搬到香港跑马地，九龙的校址空置了。次日，表姐带我到她的企业各处看，当时她的生意正是如日中天，分店在全港开了 40 余间。第三天，我就到她的公司上班，在总务科管人事。

有天我下班在家中，有人敲门，来访的人原来是陈忠人。我在來港前已听说过说陈已到香港并住在他外婆陈觉如的以及她以前住过的位于九龙窝打老道上的高级公寓里，而大门外有电话传呼设备的，正如电影‘神童’里那幢被纳粹佔据的豪华建筑一样。我们打招呼之后他就說我怎么住这种地方，当时我就想我是从逃难似的来到香港，住在一个有电梯上落，有独用卫生浴室有冷热水有煤气有冰箱并且还有冷气的公寓，只是旧楼，又有什么不好？我于是说比上海好多了，随即我当然要问及我好友吴继玠当时的情形，出我意料之外他对那时他自认年轻无知一切都是吴指使他的这些交代毫无悔意和內疚，而是说我好友又是迷信基督教等待奇跡又是软弱又是自找绝路，既然话不投机我也没有多同他讲下去，他离去之后就再也没有来往了。

在我表姐的企业里，由于我的特殊亲戚关系，无可避免地受到上层管理人员的排挤，有人又从中挑拨表姐同我之间的关系，引起误会。无论如何，我还是很感激她对我的照顾。不久我父母到香港，生活费用也是由她负担的。

父母来港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年事已高，需要人照顾，另一原因是当时我缺乏勇气，认为面对美国崭新的环境，如何独立生活，麻州理工学院的学费又昂贵，我在这些挑战面前败下阵来，失去了去深造的机会。

人民入境事务处

要办理身份证，就要到移民局，正式的名称就是人民入境事务处；表姑有个远亲说，如果用中国护照办理，就有可能只让过境，拒发居留证即身份证，如果告知是非法入境，即偷渡到香港，根据香港政府的抵垒政策，即偷渡者到达香港市区，政府发给居留证明而不必逮解出境；为此我觉得此法比较妥当。面谈时，那位女官员即说我的广东话好正，问我是否广州的，我照实回答上海来的，并解释说本来就是广东人。根据他们的规定，是不会询问偷渡细节的，但在填写出生地一项，我写香港，当时她就问我有无出世纸，即出生证，我如实讲经历战乱早就遗失了，但我知我于 1940 年 12 月 2 日生于香港大学附属玛利皇后医院，并且母亲告诉我接生医生的名字我还

记得，她说我讲的她都信，但是按规定没有出生证就不能算在香港出生，只能填中国，

“Filling in false information is against the law.” 当时我也不知什么原因爆出一句英文，这时一位英国帮办(督察)走了过来问什么事，我把事由解释了，可能他是听了我的英文口音，问我是否在英国住过，没有啊，我说。他反而问我，既然你不能填在香港出生，那么怎样填呢？

“unknown(未知)”我说，“温打火(wonderful)！”那位女官员说，她的英文广东口音很重。当办完手续转身走开后，我听她对边上的同事说：一个半唐番！

中华民国护照

香港居民在香港出生的，自然是英国籍，身份证上的国籍一项显示‘英国’，并持有英国护照，而从香港以外地区移居香港的，当然绝大多数是由中国大陆去的，就保留中国籍，在身份证上的国籍一项显示‘中国’，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印章是黑色的，并发给身份证明书即 Hong Kong Certificate of Identity，俗称 CI。而英国政府同世界大多国家有默契，CI 同英国护照有相同作用，但是香港的临时居民，是不会发放 CI 的，身份证上印章是绿色的，当然可以申请一本临时居民身份证明书，持有者都没有可能取得各国签证，除非是移民签证。世界各国驻香港机构都不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而我的那本的美国签证三个月后就过期了，当然可以去领事馆续期一次，没有什么意义了，因此有很多人就去中华民国旅行社去申请一本中华民国护照，这护照有很多国家是免签，而且即使签证也不难取得。我去取了表格，填了并交了照片，过了几天有人到我家，事前也没有电话通知，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一开始就问我是否是共产党，当时我就觉得问得也太直接了，真正共产党会承认吗？我介绍自己是坐过牢的反革命，并且拿出我收藏的判决书让他看，他似乎没有兴趣地草草一看，说了句他看得多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接着他说现在共产党也上过当了，不会再乱搞了吧，我告诉他，你以为呢，共产党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前阵不是又要坚持四项原则，清除精神污染.....，那么你倒讲下共产党到底坏到什么程度呢？他问我，“你能想象得出它有多坏，而实际上比你想象的还要坏！”我发觉他似乎在冷笑，告辞了。

看过我的判决书的，有我的铁樑表哥，他看了之后，说是第一次见识了中共的法律文件，他是法官；另一位是劳神父，他马上说光荣！光荣！判决书里没有对罪行有所认识、尚能交代罪行、有检举同案等等，只有抗拒交代，这类判决书，只是象张希斌、朱树德、陈哲敏三位神父是如此的。

等了三星期，没有回音，我到中华旅行社问了，回答是不批准，原因是无可奉告，追问之下，回答是不合格。这事似乎结束，到后来我出生身份搞妥之后，上海潘教授的侄儿到香港，要等他在台湾当教育部付部长的父亲来接他，当年他撤退到台湾时把儿子留在上海，儿子到了香港暂住我家，见到潘叔，讲起曾申请中华民国护照被拒一事，他说要请大家吃饭，让他解释拒绝原因，那位年轻的国民党‘情治人员’来了，潘老前潘老后的，并且说由于我指摘共产党很‘过份’，因此怀疑我是共谍。我笑着对那位付部长说，在反共教育上，你们必须好好学共产党的洗脑术。

服神父

在电话簿里发现有上海教友中心，就在我住处附近的圣德勒撒天主堂。我通过电话约好了时间去见服神父。服神父是法国人，70多岁了，会上海话，但一定得仔细听，否则还以为他在讲法文。他一见到我，马上拿出一张500元的钞票要我收下，说上海来的一定需要钱用。我告诉他，我已有了工作，有收入。我告诉他张希斌神父的情况，他边听边落泪，不时地拥抱我，他也被中共逮捕，关在“法国监牢”，即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后来被驱逐出境。“比起张希斌，我一点也没有什么。”他说。

劳神父

离开上海时，张希斌神父就给我介绍了龚明仁和朱华德，说到了香港可以去找他们。当时他俩正在“法国医院”即圣德勒撒医院工作。通过他们介绍我认识了劳达一神父。劳神父匈牙利籍，讲得一口好中文，他办了一个《中国新闻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的刊物，由于内容丰富翔实，吸引了世界各地中国专家的注意。美国时代周刊(TIMES)也曾两次专程访问了他。劳神父在收集资料上，的确一丝不苟，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他住在香港大学的利玛窦宿舍，劳神父成了我的神师神父，我每月两次去拜访他。有次，在他那里遇到了一位皇家海军的官员，提及香港某部门需要一名工程检修人员，要绝对可靠，劳神父即推荐我。当时我的身份还没有搞好，移民局找不到我的出生资料，谁知那位官员拿起电话，当局马上在电脑里找到了我的资料。两天后我就到湾仔皇家警队去报到，身份护照也一并办齐，在某部门任维修工程师。

劳神父也一再要我写回忆录，当时我只写了份有关在监狱中所知的张希斌神父和龚品梅主教的情况。

在劳神父办公室，遇到了作家徐訏先生，我们可谓一见如故，他同我父亲同年，对老上海的情形如数家珍似的讯问我当时的情形，他说他明白所有的午厅都关闭了，那么如 D D's Cafe,呢？“all gone. (都设有了)”我说：路名都改了，连大华戏院都改成新华电影院，金门改成儿童艺术剧场.....，上海么，如果你没有亲人，就不必再去了，“我不要说‘回去’两字，因它早已不是我们的地方了。”徐先生说他遇到了无数从上海来的年轻人，但是对老上海有如此熟悉的，以及还记得是如何消失的，我还是第一个。我告诉他我拜读过他的小说《风萧萧》，我说他写的地方我都很熟，例如从大西路到姚主教路根本就不必绕到静安寺，买了花再兜去乘电车，而且姚主教路爱棠路口(就是当今武康大楼前的六叉路口)就有间大花店。他笑了，说 I 看得很仔细，他问我，书中的女性，如果是做配偶你选择谁？我说做配偶，史蒂芬夫人，朋友么？梅瀛子；他笑着同劳神父说：He's not a Chinese.

我们互相交换了电话地址，约定以后再叙，谁知大约半年之后，他去世了。

离港来美

香港那时候的确是“港人自讲”。消息灵通人士得知邓小平还无意收回香港，因此盲目乐观，认为香港情况不会改变。但是，邓小平毕竟不是毛泽东，能够一言九鼎。尽管中共中央内部都认为收回香港对中共有百弊而无一利，但由于内部的权力斗争，邓小平受不住被称为“第二个李鸿章”的压力，终于硬着头皮要收回香港。因此香港的情形每况愈下，股市大泻，人心惶惶，生意亦越来越不好做。人们说，在 79 年到 80 年那“鱼翅捞饭”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表姐的企业也开始收缩。中国同英国签署了联合声明，香港人被出卖，自决权利被剥夺殆尽，香港将由英国的殖民地，沦为中国的殖民地。

许家屯是明智的，他很清楚成千成万香港居民中，有三分之二是为了逃避中共的暴政，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定居香港，其中以偷渡的为多数。多间民团体作了民意测验，百分之 95 以上的居民，都不愿意由中共接收香港。1997 年，被称为“大限”，为了“不当历史的罪人”他脱离了中共，移居美国。我也不愿意在香港待下去了，还是通过表姐的帮助，我才得以移民美国。

85 年上半年我来到洛杉矶，初时在表姐的超群罗省分店工作。尽管我一再向经理表示，不会在饼店待很久，要他放心，他依然对我百般刁难。

一切都从头开始，我准备上学。这次不像麻州理工学院那么顺利，除了成绩单要公证，还得考 GRE。忙碌了一阵，总算得以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也借到了学生贷款。劳达一神父介绍

我认识当地圣心会匈牙利籍艾达修女(Sister Ida)，她帮我找到一份照顾老人的工作，住宿问题解决了。

离开了饼店，表姐对我误会更深了，我真不知那位经理说了我些什么。后来那经理跟我打招呼说很抱歉，其实我并不怪他，他不是圣人，在社会上，保护自己是人之常情的本能。这方面我很傻，一点也不懂。

只救灵魂不救肉体

到中国城去找华人天主堂神父，这位神父同香港的服神父完全不同。我感觉到他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一见面他就说：“我是只救人灵魂而不救肉体，你生活上有困难要自己解决，我帮不了你！”那时我生活都已安排好了，并不是来向他要生活费的。我向他解释说艾达修女介绍我来找他。“我很忙，有事你去找艾达修女好了！”他是上海人，在 49 年前就离开中国大陆。当时我想，他对共产党迫害天主教可能不太清楚，所以开始介绍 1955 年 9 月 8 日的教难。可惜他一听就不耐烦地说这些他知道了，我觉得自讨没趣就告辞了，我再也没有去找过他。蒙市圣斯德望堂里爱尔兰籍的欧苏里文神父倒是对共产党迫害圣教会的情况听得很仔细，边听边问，并嘱我好好整理写出来。

迟来的春天

学校功课并不很忙，最困难的还是我的英语水准差，要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好在我记忆力强，学语言占些便宜。我照顾的老年人，原籍爱尔兰，是个热心教友，他生活基本能自理，我除了照顾他三餐外，就是清洁。他对我也很照顾，逢到考试，见我忙，就不要我做饭“Go, go out to eat!” 两年很快过去了。硕士学位的论文，我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写出来的，反正通过了，在 Control Data Corp. 找到一份工作。

我同张希斌神父一直有通信联系。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外甥女 Teresa，说她正在申请来美国，也找到了担保人，但要我去联络一下。我找到了那位担保的女士，她要我写一份书面声明，说明 Teresa 来美之后，一切生活费用由我负担。有了这份声明，她才愿意出面担保。我照办了，当时我还在学校，说实话，自己养活自己还有问题，何况还欠下学生贷款，但也顾不了这些了。

Teresa 来洛杉矶时，我去接机并随即安排她到以往饼店一女同事家暂住。第三天，她就找到了一份照顾婴儿的工作，暂时解决了吃住问题。她报名的学校在芝加哥，因此数周之后，她去了芝加哥。

当我找到工作，Teresa 已经在芝加哥大学读了一年教育系。她后来决定来洛杉矶，她到达之后，我才知道张希斌神父希望我们结合。我倒是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当时我已经 47 岁了，她比我小了足足 13 岁。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异性。

在法律上登记结婚，没有问题。但洛杉矶教区几位神父不承认张希斌神父写给我们的领洗证明，说“没有教区的公文”。我告诉了劳达一神父，他即同香港教区枢机主教胡振中，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洛杉矶主教马洪尼，不久我们接到了洛杉矶副主教瓦德的信，可以凭此信到任何教堂办理婚配。

婚礼在国际机场附近的圣母访问堂举行，那边的欧格莱蒂神父(Fr. O'Grady)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他说“我见了你们，就知道你们是教友，没有教区主教的信函，我也会替你们主持婚礼。”

Teresa 在天主教的劳有拉(Loyola)大学攻读 MBA，她一面在餐馆工作，一边读书。不久，通过了 CPA 考试。

台湾人往往称男的是外子，女的是内人。我们却相反。干电脑往往做夜班，Teresa 又不会烹饪，加上我个性内向，不善同人打交道，因此，我做所有的家务事。烹调做饭也是到了美国才学的，后来还算称职。我们的女儿取名 Cecilia，是在 90 年 2 月 14 日出生的，她比我们幸运多了。

我的父母 80 年代末期来美国，父亲于 91 年复活节前夕因肝癌去世。母亲现在已经 94 岁了，还很健朗。岳母于 89 年圣旦节前夕到美国，Cecilia 是由她带大的，因此会讲上海浦东口音的中文。

杨增年

90 年代初期，岳母，Teresa 同我往蒙市圣斯德望天主堂望中文弥撒。弥撒结束后，李志贤神父说有位由中国大陆来的人士，想介绍一下大陆天主教会的情况。共产党对天主教的迫害，从来就没有放松过，我们以为这又是一位受尽苦难的忠贞教友来了。

我们坐下，见一个戴黑边眼镜的 70 岁不到的男子，开口就是“我们党和国家！”闭口还是“我们党和国家”，讲话中间，啊啊啊的腔调，完全是共产党做报告的味道，简直不堪入耳。我准备退场，岳母说，别走，看他再讲些什么。我们要拆穿他的谎话，否则这里教友都要被他骗了。

他讲到 1955 年 9 月 8 日中共大肆逮捕天主教神职人员及教友时说：“当时的天主教会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把持下，在学校中百般阻挠青年的正常学习和生活，我们党和政府，本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一直耐心地等待，希望他们有所转变，但他们却认为人民政府软弱可欺，变本加厉，我们党和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采取果断措施！”

我站起来打断他的话：“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人民政府’已经在镇反、三反五反，杀了无数人，它会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天主教会忍无可忍吗？张伯达神父早在 1951 年就已经被当局逮捕，虐待致死，你又怎么解释？”那人语无伦次地说：“现在不同了，现在不是全部放了吗？”

有多位台湾来的教友，都向他询问以往一些教会神父的下落，有的已冤死狱中，有的虽释放，但仍遭软禁。此人如数家珍一样，对这些人了如指掌。他自然不说他们被软禁，只说是退休了，在当地教区的养老收容所。

Teresa 向大家介绍了她家中的情况。她父亲是英文老师，信天主教，只因认识一位从北方来的逃避共产党追辑的神父，就遭逮捕。释放后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工厂里做临时工。她因是“反革命子女”从小学起就备受歧视，连中学都不准就读。她的文化知识，全靠自修得来。她家每隔二、三天，就有里弄干部来骚扰。她的童年、青年时代就是在担心受怕和饥饿中过来的。这就是大陆天主教徒的家庭实况。

随后又有多位教友诉说了他们在大陆的亲友们的悲惨遭遇。那个演讲人，如坐针毡，讲话不仅语无伦次颠三倒四。一会儿说自己不是天主教徒，一会儿又否认他是共产党，又说他是天主教的“同路人”，“夹在天主教和共产党之间”，显然他把天主教和共产党对立起来了，他自称是个“一向为天主教向共产党争取权益的人。”

这个人名叫杨增年。杨增年何许人也？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是也。杨毕业于震旦大学医疗系，在大学期间，已是中共地下党员，那是 40 年代末期的事。他没有做过医生，中共接管上海之后，他一直就在做天主教的工作。受过共产党迫害的天主教友，都知道杨增年是中共的打手。中共统治下，宗教由宗教局管理，而宗教局是统战部属下的部门。

文化大革命期间，杨增年也曾受到红卫兵批斗，说他是天主教。他振振有词地反驳说：“是党派我打入天主教里做工作的！”如今，杨增年定居洛杉矶，是蒙市圣多默堂里唱经班的成员。他来美之后是否信了天主教(那次演讲会上他自称不信天主教)，改邪归正，我不清楚。曾迫害过圣教会，后来坚信基督的，大有人在，圣保禄为其中之一。幡然悔悟成圣的，像圣奥斯定，圣芳济。要真正坚信基督，必须同以往的罪行决裂，如果杨增年能做到，揭露以往共产党如何利用他

来迫害圣教会的罪行，他是有大量工作可以做的。但据我所知，他如今还经常进出中共驻洛杉矶领事馆。

附录(补遗)

追忆张希斌神父

— 写于张希斌神父逝世十周年

1979年3月我被释放，从青海回到上海。5月1日是休息日，我穿上了刚办完补发复员军人证而领到的崭新制服（当时还是以穿军装为时尚），骑自行车，直奔东昌路摆渡口，浦东上岸。到达目的地时，张希斌神父早已在等待。他看了手表，我比约定的二时三十分早到了十分钟，他说：“你真是个军人，这么准时！”他向我介绍了在旁的一对夫妇，许先生和许师母，他们是我的代父母。我们进了屋，那是一栋唐楼。许先生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扫地出门”，房屋被没收，如今落实政策，归还了。

我们上了楼，房内早已打扫干净，张希斌神父从手提包里取出桌布，布置圣台，摆上圣器。对我行受洗的仪式，是用拉丁文。礼毕，我们点上蜡烛，我正式成为天主教徒。领完圣体，神父打趣说：“你现在比教宗还要洁净！”斐理伯，是我的圣名。

许先生取出蛋糕庆祝，依据老式规矩，领圣体前不进食。神父说过，如今新规定，只要在领圣体前半小时不进食就可以了，不过，我还是早上起床后，就没有吃任何东西。神父，许先生许师母，也是如此。这时他们都说饿了。我由于兴奋过度，忘了饥饿，倒不是我在劳改队里饿惯了。

吃着蛋糕，我想起了仍在劳改队里的难友，他们正在啃着坚硬的青稞馍，盐水煮白菜，能有个半饱，已经满足了。

第一次见到张希斌神父，是在71年上半年。原先我被判十五年，关押在三号监即被判十五年以下的反革命犯的牢房。后来当局说我组织反革命集团，我对此一无所知，当局对我用了各种

刑罚，诸如飞机铐、扁担铐、猪猡铐、反铐再吊起来，我也不知晕过去多少次，被冷水浇醒再问，但始终猜不出什么是他们要我招供的。他们说我顽抗，将我隔离禁闭到一号监，即十五年以上的犯人关押的中队，又称大刑监。当我得知要调往一号监时，我忘了自己的处境，高兴起来，因为我可以见到一直渴望着，心中极为崇敬的龚主教。

到了一号监，经过一个多月的疲劳审问，加上以上所述的各种酷刑，根据审问时的提示，我开始编写能置我于死地的小说——坦白交代材料：我是“社会民主党”的幕后策划人，因为我是工科大学毕业，懂英文，又当过兵，会驾驶各种车辆，会使用武器。写了一个多月，因审问我的人要我在内容上作很多处修正，以便同其他人所写的内容吻合，这叫“材料碰拢”。当然仍是用疲劳审问的方式，写完之后，审问停止了，批斗我的同监犯调走了，换了两个比较温和的犯人，二十四小时值班看住我，以防我自杀。我很清楚我的处境，一只待宰的猪羊，只要当局需要，分分钟可以把我从牢笼里拖出去处决。我当时并不担心自己，只是想到在家中年老的父母如果得知我被枪毙，他们将如何面对？一天，军代表到我监房门口，大声叫嚷：“陈文立，你这花岗岩的脑袋！我看也不是花岗岩的，枪子进去，哼哼，你知道怎么样？”我大声说，象打翻了的豆腐一样。这时旁边监房里的那些“积极要求改造”的犯人趁机表现自己，大声叫嚷：“反改造分子嚣张！”那军代表冷笑着说，你知道就好，走开了。

次日，监狱上大课，即是开大会。和我被叫到大礼堂去，张神父坐在我前一排。其他犯人在监房里听广播。会上，军代表用他那尖声的胶东话骂犯人：“我们把你们养得肥肥白白的，你们还要反改造…犯人中，还有搞迷信的，信什么天主教的！”他大喊一声：“龚品梅！你怎样了？”龚主教站起来，平静地回答“宗教信仰不变！”“啊！你真反动！”那军代表嚷着，接着他喊道：“那些信天主教的，都给我站起来！”张希斌神父第一个站起来，接着数位教友跟着站起来，我也站起来，人越站越多，大会场几乎有三分之一的站着。坐在主席台上的军代表和干部们慌了，他们交头接耳，一时想不出有什么方法收场。会场鸦雀无声，这样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只见那个坐在军代表边上的姓许的干部，监狱里的造反派头头，他用双手紧紧地捂住话筒，以免台上他们的对话张扬出去，后来，话筒被拖到台上长桌的最边上，一位徐队长打了圆场，他是属于尚未打倒，而是靠边站的干部，他说：“你们想干什么？坐下，坐下，党的政策不是一贯的吗？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不准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待大家坐定，话筒又被传到中间，由姓许的干部讲话，他用他那浓重的苏州口音宣布“破有神论学习胜利结束”。这时，他忘记了军代表的讲话还未完了，就开始了他在每次大会结束前的老调：“加你们的刑！杀脱你个头！无产专政

(他总是忘了阶级二字)决不手软!大课提前结束,当我们走回监房时,大多数人都充满胜利的喜悦,当时我就特别注意到那位在我们前面的那位第一个站起来的老妇人,他昂首阔步,面带笑容。

就在大课结束,晚饭之后,事务犯通知说张希斌神父要调到我们小组,在我隔壁监房。同监的难友说,他是外国和尚,龚品梅的助手,我高兴起来了,张神父搬着小包袱经过我监房门口时,他朝里面看了一下,就在这不到一秒钟的时刻,我们互相交换了眼色打了个招呼。

不久,要我们交出印有毛泽东和林彪合照的邮票,《毛主席语录》中林彪写的《再版前言》也要撕掉。犯人们私下说:结婚照撕了呀!由于林彪出事,他的部下王维国的空四军也跟着被整肃,监狱的军代表是属空四军的,被捕了,监狱领导层的权力斗争,涉及到“社会民主党”一案,说是军代表制造的假案,责任除了军代表外,还是推到犯人身上,说是反改造分子胡乱交代,制造混乱。对我的结论是暂时不予追究,如下次再反改造,旧帐新帐一起算。

我的禁闭解除了,队长要把我调回三号监,又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只要求继续留在一号监,当然为的是要同张希斌神父及龚主教接触,当然我没有同当局说。

监狱犯人中间打小报告的比比皆是,那些自称要靠拢政府,积极要求改造的犯人,时时刻刻无中生有,制造事端,以便他们在批斗会上表现自己。因此大家都不敢过于接近或随意交谈。不过有人会用独特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有一位乡下来的犯人在一次小组批判会上发言说:“你过去是个叛徒,是犹达斯!”大多数人都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信天主的一听就知他是教友。张希斌神父知识渊博,人们有不懂的就请教他。有时他也很风趣。有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在问问题时用了毛泽东的“不耻下问”,神父回答时就用了“我亦不耻上答”来相对。我亦借机会问一个我想不通的问题:一个公正的主人,给三个仆人不同的钱两,我觉得那又恶又懒的该罚,另外的两个都尽了力,但三人都得赏赐,是不是不公平呢?张神父回答说,在另外一个世界,赏赐并不用数字衡量,数字只表示分工不同,比如有所图书馆数学书编号是 1000-2000,物理书是 8000-9000,这并不说明物理学要比数学重要,是一样的道理。

张希斌神父在上海市监狱的番号是 28258,每当放风,我就借机会扶他,同他讲话。接见家属时他都在我旁边,因为我父母见到神父的姐妹和蔼可亲,于是走在一起。神父收到毛巾、洗脸盆的东西,都印有鱼的图样。他告诉我,早期基督徒为了避免罗马当局的监视,以鱼为记号,希腊文鱼是 ΙΧΘΥΣ,是“耶稣基督救世主”的每个字的字首。放风时可以见到龚主教,他总是排在第一个,上身是政府发的犯人制服,警察的深蓝色长裤,军用高帮皮鞋。如见不到他,总有人去问事务犯:“怎么不见龚品梅?”回答是到医院里去了,高血压。

张神父也找机会同我接触。以往放风、洗澡，他多数不外出，我去以后，他也出来了。他的双腿有关节炎，行动不便，小组内又大多是老年人，没有人扶他。现在有了个年轻的军人(因我穿染成黑色的军装，大家都知道我当过兵。)照顾，方便多了。

张希斌神父患有严重胃病，食量很小。为了强调是在教难时期，他是不守斋的。每逢开荤，他把饭盒里的肉分给其他人，这不能让那些“积极要求改造”的犯人知道。一号监监长李金根就去问神父：“天主教徒星期五是不吃肉的，你现在吃了，是不是觉悟了呀？”

神父回答他说：“我们教会有规定，教难时期不用守斋！”李监长马上就到龚主教的监房门口说：“张希斌不守斋，这是什么意思？”龚主教回答：“他是对的，教难时期不守斋！”那监长又说：“你也可以不守呀！”龚主教笑着说：“我老实告诉你，你们要在我守斋的问题上做文章，如果我听了你的话不守斋了，你们一定会说龚品梅觉悟了，教规也不守了。我不会上你们的当，这个空子你们钻不到。”

个别犯人在处决之前，有时会调往龚主教的监房。狱方认为这样死囚的情绪会比较稳定。龚主教总是替死囚付了洗，做了终付，因而犯人在临刑之前能平静地向龚主教道别。我想起曾经读过一本描写纳粹在捷克屠杀利列吉村的全体居民时，最后枪杀的是一位神父，他为全体村民逐个做终付，最后才轮到。当时特工队员说这神父为他们省了不少麻烦。中共同纳粹，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纳粹还让神父公开地做圣职。

张希斌神父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时，看管人员借故挑衅，要他放弃宗教信仰，神父断然拒绝。那管理员恼羞成怒，给神父带上反铐，一直戴了九个月之久。那管理员问神父有什么想法，神父说：“我已经做了九个月的补赎。”那管理员为了不让神父再做补赎，只得替他开了铐。九个月的反铐，是多么漫长的折磨。在第一看守所是不准喂饭的，吃饭时，把饭倒在铺在地上的旧报纸上，犯人像狗一样趴在地上吃。反铐双手不能支撑，大小便难以自理。年轻人筋骨比较灵活，而神父年龄已将近五十，困难可想而知，睡觉只能合扑睡，不习惯的人又怎能入睡？我曾被反铐了一个月，初时，只觉得身上痒，因为不能动，又抓不到，就越来越痒，好像浑身有蚁在爬，这样持续了好几天。接着是浑身关节疼痛，有时厉害有时减轻，当时我只有 29 岁，加上有一难友，对我照顾、喂饭，替我擦脸，有时用毛巾擦身。但神父却没有人这样照顾，当然困难多了。开铐之后，每动一动，都会引起一阵剧痛，这是长期不活动的结果。

张希斌神父告诉我，他曾经给多位干部秘密付洗。我看到了多位干部常把张神父提出去作“个别谈话！”他们是劝神父脱离教宗，还是他们得到圣宠，想接近天主，这只有他们同神父知

道了。我受酷刑，被疲劳审问的时期，发觉有一位干部，暗中给我休息的机会。这位干部就是经常同神父作个别谈话的人。

有个年轻犯人在学习会上诬指张希斌神父过去“玩弄修女”。神父沉默。学习会结束，年轻人回到监房，同监房的犯人说他：“你这样说那外国和尚实在太过份，人家是正人君子。”那年轻人不服气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第二天，神父对那年轻人说：“昨天我错了，我对你发了气，说明我恨了你。对我们来说，是犯了罪，我们不应当恨人，我要向你道歉，请你原谅！”那年轻人羞愧得无地自容，好久才说：“昨天完全是我不好，我无中生有地侮辱你，你却不报复，我是真正的坏人！”

有次李监长把张神父叫去，说他在拉拢其他犯人。神父否认，监长说：“你是信天主教的，不能说鬼话(上海话，意思是说慌)，否则就是叛教！”神父说：“我从来不拉拢任何人。”监长取出一张纸，要神父写以上这句话，神父照做了。监长拿出一件汗衫，放在桌上问：“这是什么东西？”“一件汗衫。”神父答。“是谁的？”“是我给XXX的。”这时李监长得意地说：“在证据面前，你赖不脱了，还说你没有拉拢别人？你叛教了，哈哈！”神父说：“这不叫拉拢。拉拢，是我给人东西有背后的目的，有求于他。而我并不希望得到什么，也不要他为我做任何事。我见他家中困难，政府的政策是不发衣服给有家、有接见的人，因此我把汗衫给他，这不叫拉拢，这是救济。政府发衣服给犯人，能不能说政府在拉拢犯人呢？”李监长自知理亏，强辩说：“我要告诉你的姐妹，你用她们辛苦赚钱买的衣服拿来送人！”神父说：“这不叫送，是救济。如果她们知道我自己宁可穿旧的，用新的救济人，一定认为我已得到改造，有了一些忘我精神呢！”“去去去！真是歪理十八年，这样对你没有好处！”这是干部在理亏时的常用语。

有个犯人向监长汇报，说“张希斌在放风时扳手指，一定是在算变天帐！”李监长把张神父叫去，一边扳着手指，问：“这是什么意思？”神父说：“这只是习惯了，没有什么意思。”那监长见问不出什么，就把另一个叫纪荣生的犯人找来。此人为人老实，是教友，因以往参加了旧政府时的工会，被判无期徒刑。那监长做了扳手指的姿势，问他是什么意思，纪荣生一时也想不出。监长要他再想想看，他突然说：“这是个好办法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可以用来念玫瑰经！”那李监长打发纪荣生，走到张神父监房门口，一面扳着手指，一面冷笑：“哎、哎，玫瑰经，你继续搞迷信，我可以组织批斗。”神父回答：“我从来没有把这方法向别人说过，这是你传出去的，将来别人用这方法念经，责任不在我！”李监长自知失策，只得又说：“这样下去对你没有好处。”

一天，管教科来的干部在张神父的监房门口不屑地说“宗教迷信”。神父说：“迷信是对事物还没有弄清楚就相信，而我对教义已经‘弄懂弄通’，因此不能叫迷信，这叫信仰！”在当时，正宣传要弄懂弄通马列主义，而毛泽东说过马列主义很难啃，因此没有人敢说对马列主义已经弄懂弄通。张神父讲的话，十分谨慎。他对迷信的定义是“没有弄清楚”。干部抓不到他的话柄，自讨没趣，又丢下“这样下去对你没有好处”就走了。

干部要张神父谈谈对“三自革新”和“爱国会”的看法。神父说：“这同你们的工商业政策一样，三自革新和爱国会是对教会的公私合营、限制、利用和改造，以达到消灭宗教的目的。”那干部生气地说：“你真恶毒！”

一次，管教科的高层干部走到龚主教监房门前说：“上次尼克松来，还问到你呢。我们也不想把你一直关下去，监狱的大门对你敞开的，你的信仰，我们不管，你可以保持。只要你能切断同罗马梵蒂冈的关系，我们马上释放你。你要向金鲁贤学习，他认清了形势，我们不是马上宽大了他吗？”读者们请注意，他只说“宽大了他”，别以为是释放了他。当局并没有因为金鲁贤叛教而给他自由，只是将他从监狱调到公安部办的群众出版社做翻译工作。行动依然没有自由，只是生活待遇比监狱好些。龚主教坚定地回答：“你真好像是喇(在)戏馆门口等票咯(的)朋友，不过我要清清爽爽告诉拿(你们)，嗨(这)张票子拿一生一世等勿着。”那干部又到张神父的门口讲了同样的话，他也是讲上海话，当他讲到“我拆穿至脱依讲”，神父马上打断他说：“队长，西洋镜拆穿勿得，拆穿至就唔(没有)戏好唱了。”气得那干部扭身就走。

71年间，监狱组织了一次“破有神论学习”，挑选了一些以往是共产党，后来因为权力斗争而被定为“叛徒”“托派”的犯人，如刘昌、季苏等人，他们自称为马列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同龚主教，张神父辩论，设了一个学习小组，叫“学习班”。另外又挑选配备了几个打手，如王高明、陈希吾、刘明华、殷止庵等。

学习班怎样进行，我不清楚，事后张神父告我，由于龚主教的“国际影响”，只让他坐在一旁听，很少要他讲话。对方虽然自称马列、唯物主义者，但马列著作读得不多，更不懂哲学。他们之间分歧重重，提出的问题互相矛盾。但这辩论并不是学术研究，是批斗会。对方自己阵营内相互指责时，却说是神父在挑拨离间，继而谩骂和进行人身攻击。王高明用木拖板打张神父，接着上反拷。至于“破有神论学习”是怎样收场的，前面已讲过了，不再重复了。

张神父告诉我，1955年9月8日前两个月，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把龚主教同他请去了。一开始陈毅就说：“今天请你们来，你们是我的座上宾。”龚主教会意，马上回答：“我明白了，明天将是你的阶下囚，那么请便吧！”会谈就此结束。

监狱中几乎每年都要填写履历表格，张神父的眼力不好，因此他起了稿由别人帮他填。张希斌 1909 年生于上海，1922 年入徐汇中学。1925 年加入上海教区，决定终身不结婚，不营家庭，不谋私蓄。1928 年入震旦大学，三年文学院，三年哲学院，三年神学院。毕业之后，先后任震旦大学附属扬州震旦中学、徐州欣欣中学、苏州有原中学校长。1949 年任上海主母会文学院院长、上海大通路天主教堂区总司铎，1955 年 9 月 8 日被捕。

他在苏州有原中学当校长时，正是日本占领苏州时期。一天，他被叫到宪兵司令部，一个日本军官要神父交出学校，被神父断然拒绝：“学校属于上海教区，不是我私产，我无权交！”汉奸翻译打开边门，只见有个人被吊着，特务们用烙铁烫他。神父说：“我已经准备好你们将我倒吊起来！”那日本军官懂上海话，马上把门关上假装骂了汉奸几句，堆上笑容用中文说：“我一向尊敬有学问的人，尤其是从事教育、传播知识的。”他改口说并不是要神父交出学校，只是希望学校增设日文课。神父表示，他并不反对学生多学一门外国语言，只是学校已经有英文、法文两科，恐怕没有时间排日文课，何况学校经费不足，买不起日文书本，请不起日文教师。那汉奸开口说大家都是中国人，事情好说，请不请日文教师没有关系，日文课本他们送，不收费，只要学生每人一本放在书包里，学不学都没有问题。

1975 年，张希斌神父的刑期快满了，狱方要他写二十年改造总结。他写完后，交给小组每人传阅征求意见，经过修改要我帮他誊写，内容大概如下：

在刚逮捕之时，他想到自己身体虚弱，医生说他最多只有几个月的寿命，因此他准备用自己的肉体，来完成他在社会上未曾完成的工作，以“一石激起千层浪”。千头万绪只有一句话来形容“此时无声胜有声！”他套用了毛泽东的“革命千头万绪，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总喜欢反其道而行之，“我再反其道而行之，变成顺水推舟，一动一静！”讲到他的“认罪”，他写“既然华理柱认罪了，我没有理由不认！”据闻华理柱说，共产党要消灭宗教，他是传教的，因此他的行为是同共产党相对的。从共产党的立场看，他是有罪的，所以认了。讲到那九个月的“破有神论学习”他写道：“政府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我进行了“教育”。“不同的方式”概括了辩论、殴打、反铐……“使我初步接触到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但远未弄懂弄通！”当时文革中被关闭的图书馆重新开放了，犯人们可以借书。有人借了本《北齐书》是文言的，这触动了张神父决定用文言来写他的《跋》。他讲起在做校长时，小学生作文喜欢用“光阴似箭”开头，但他们不懂其意义。现在他要做小学生了，跋的全文如下：“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此，已值 1975 年。别矣！二十年！临别依依然（舍不得同窗难友，及经他付洗的干部），茫茫然，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何所有？我何所求？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回顾

改造历程，迂回坎坷，老牛破车，寸步维艰。瞻望未来前程，年愈花甲，体力不支，固疾缠身，是知难而退乎？抑知难而进乎？我当从后者：我将忘我龙钟，贾我余勇，踏上新征途，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刚誊写完他的总结，我被调往青海劳改，直到 1979 年平反出狱回到上海，那是 3 月份。我立即到张希斌神父家中去探访，他不在，他的姐妹不认识我，说我找错地方了。我发觉一位妇人同神父很像，就把我的姓名地址交给她，说请她交给她的兄弟，他一定会同我联络的。二天后，我收到了神父的来信，说他住院了，那时刚出院，约我到他家一叙。

四年不见了，仍旧老样子。他 1978 年下半年才释放，多关了他三年有余。我告诉他我的家庭是信新教的，而我自己一向倾向天主教。中学是在圣芳济/时代中学，1955 年 9 月 8 日事件时，我在初中三年级，亲眼目睹尊敬的老师被捕。他们意志坚定，令我极为敬仰。家中友人有信天主的，送我们天主教的英文祈祷手册及师主篇，我从小学起就每晚阅读旧约一章，新约一章，每晚都背诵天主经及信经。只是在当兵和大学住宿期间读经中断，我不敢将圣书带到部队和学校。

神父认为我对信仰的道理懂些，不必从头开始。他向我介绍了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各会的宗旨。至于礼仪，第二次大公会议后，有很多改变，他也不清楚。经文经抄家后没收的没收，烧毁的烧毁了。后来他介绍了王神父，我认识他的兄弟，大家叫他 George 王神父，他给了我手抄的玫瑰经英文版本。

我常去拜访，为了防止当局监视我总是从南昌路一端走前门就可以直接见到神父，因通常其他住户为了安全前门是锁住的。神父告诉我在监中同狱警秘密付洗的经过；有几位队长最初总以做思想工作名义把神父叫到监房前端办公桌进行个别谈话，经过数次交流就进而谈到信仰，直至双方谈话中到达相互信任的情况下警员会表示他决定皈依天主，神父就对他说可以到外面打听信天主的去打听，而有些警员就不相信社会上的是否真的信天主，神父就表示如果坚持要他做仪式，对神父本人而言，只不过是批斗，最多加刑到无期都无所谓了，而对于队长说，失去前途，失去自由，因此要郑重考虑清楚；而大多警员表示同永恒的永生相比，人世间的苦楚都应会忍受，你神父不也是如此吗？至此，神父见他意志坚决，就告诉他准备两块白布，一小瓶清水，一小瓶葡萄酒，一块设有发酵的面饼，一支蜡烛就可以了。监狱的队长值夜通常两个，上半夜的和下半夜的，当值的要求巡视各层楼面，另一个可以睡觉。接受洗礼的队长在当值时可以预先在不关犯人的五楼布置桌子铺上一块白布，当另一位队长睡着后就将神父从监房开出上五楼举行付洗礼仪，洗后披上白布点燃蜡烛礼仪就结束，领完圣体队长迅速收拾所有物件放入包中再将神父送回监房，前后最多十五分钟。这样的队长就有好几位，也可说是监狱里的圣迹。

我被安排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从图书馆可借到 55 年的旧报纸，我把当时九、八的资料作了影印给神父，他正需要这些材料。

张神父向我说起以往圣芳济中学唐才林家。唐老师是我中学时代最敬重的师长。他每次上课前念经默祷，讲课生动易懂，作业批改严格，每堂课结束之前五分钟，总有个小故事启发学生提高道德品格。他在九、八被捕之后就没有消息。其他被捕的老师，像李安琪、周献会，我都在公共汽车上遇到过，知道他们在其他学校任教。神父告诉我唐老师已经在青海劳改农场去世。同唐老师一起判刑的，还有他的大儿子。“人民法官”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说：“这里有一双鞋，请你交给我家，给我弟弟穿！”当我听到这里，已泣不成声，把身边所有的钱，都给神父，转交唐家。我的薪金是每月五十二元人民币，说也惭愧，我没有更多能力去帮助他们。

张神父还介绍了他的堂兄张登义先生给我家认识，他是一位极受尊敬的长辈，热心教友，为圣教会蒙受苦难，当年被打成右派，监督劳动达三十年之久。他是杰出的工程师、科学家，日占时期，为了解决公共汽车油短缺的困难，发明“木炭汽车”即汽车上装一小型煤气发动炉，以煤气代替燃油。50 年代初，他对“木炭汽车”进行改良，将煤气灌入气袋，以减轻汽车载重。79 年圣旦，神父在他家为我坚振，张登义先生和夫人，是我的代父母，斯德望是我另一圣名。当时我的父母在场，之后，他们成了好朋友。

79 年下半年，张希斌神父经医院检查，发现患了十二指肠癌症，是初期，动了手术之后，医生说切得干净，一切顺利。当时我几乎隔天就去医院探望他。他身体刚恢复能讲话了，我见他床边围满了医生护士，都在听他讲话。他们见到我，都静了下来，因为我穿了军装，大家怀疑我或许是公安人员。经神父向大家介绍，我是教友，大家又热烈起来。张神父给他们讲道理，大家都专注而尊敬地望着神父，也提出问题问他，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这些年轻的医生、护士，自幼受共产党的无神论教育，如今却这样热切地寻求真理，我心中感动万分。

张神父出院之后，仍住在他姐妹的家中。有时他想同朋友、教友聚会，大多数由我去通知，因为我单身一人，又有自行车，很方便。弥撒在教友家中举行，也由我去通知大家，时间、地点都由神父决定。到时张神父取出桌布马上可以布置圣台，当时我们还没有中文的感息圣祭，弥撒以拉丁文举行，大多数老教友，能够附和应对。

80 年初，我到了香港，找到了劳达一神父，后来他成为我的神师神父。劳神父托我一位可靠的朋友，在回上海时带给张希斌神父 500 元港币。我朋友到张希斌神父家中时，他刚从医院回来。就在三个星期前，神父同朱树德神父再次同一天被捕，关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后来因心脏病发作而进医院，出院后暂住家中。结果神父被送往徐家汇上海教区收容所，而朱树德神父又被判了刑。

上海教区收容所，名义上是给年老司铎们住的，实际上是对他们实行软禁的地方。人们不能随便外出，要先向管理人员报告，批准后方可外出。总管是一个同爱国会的主教同居的妇人，人称“主教太太”。管理人员监视老年司铎的一举一动，并向她汇报。她集中整理后，呈交公安部门。

劳达一神父曾同我商量了一个营救张神父的计划。当时张神父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医院检查，出院后在家小住三、四天。就趁这几天，由我前往上海，安排他坐去广州的飞机。到达广州，托友人用汽车接他，经文锦渡前往香港九龙。一到香港境内，我将安排皇家警队的汽车接手，劳神父将他送入美国领事馆，办理前往美国治疗休养的手续。我们把计划托友人转达给张希斌神父，他说要给他一天时间考虑。次日，他说计划很周密，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他身体应该吃得消，但是牧羊人少之又少，他放不下上海的羊群，他决定放弃出国，留在上海。他会尽量去写回忆录，如果完成不了，圣神会启示其他人去完成的。这封信张希斌神父是亲笔用法文写给劳神父的，劳神父读完这封信，感慨地说：“圣人！圣人啊！”

陈文立写于 2000 年 5 月 30 日洛杉矶

附录(一)

最高指示

原有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徐汇区军管组

刑事判决书

一九六九年度徐军管刑字第4号

现行反革命犯陈文立，男，二十八岁，广东中山县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份学生，无业，住新华路354号。

现行反革命犯陈文立，系资产阶级子弟，解放以来思想一贯反动，对社会主义刻骨仇恨，陈犯于一九五六年以来一贯收听敌台广播，到处散布谣言，为帝、修、反摇旗呐喊。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同首犯唐千根相勾结，积极网罗反革命成员，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陈犯猖狂攻击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污蔑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恶毒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行严重。陈犯在案发后还订立攻守同盟，抗拒交代。

上述罪行，经查证确凿，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若干规定》，特判决如下：

依法判处反革命犯陈文立有期徒刑十五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徐汇区军管组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附录二 张希斌神父致作者的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斐理：

别了，生前再见！天庭永聚！Alleluia! Alleluia!

你读到这几行时，我已在称颂主名，怀念亲友中，回归天乡，投入慈母怀抱了。我已从战斗的、困苦的尘世，转移定居到永世了！面见主圣容，为你们祈祷主恩保佑。

圣保禄遗留给我们崇高思想：“生为基督，死乃福。”考验，我经受了，长跑，我已到达终点，我仅仅等待公义的恩赐。

我虽是卑微罪仆，但依持主的全善全能，我终身膺学习圣保禄的言教身教。你，亲爱的斐理，用简洁直接的方式方法，给我很多实效的昂勉鞭策，对此我一方面感谢你，一方面我用圣保禄的言教身教抄送给你作为临别赠礼。

我的胞姊胞妹，献身教育，离退后照料我精神及物质方面的各种需要而作出巨大牺牲，这你是知道的，你对她们也有深刻印象。在她们晚年相依为命，慈主会照顾呵护；但我还是请你，可能条件中，精神上多多代我关切，我拜托你。

我的表亲黄德助撒，我深信她是一位杰出的可造之材，我热烈地愿望能给予提拔培育。我曾拜托过你，我再次请你代我，在你力所能及及时鼎力相助，玉成她的雄心壮志。如果你有机会往来，你一定会得到和我相似的印象：庄重诚朴，资质聪颖，品德不凡，好学求进，学业成绩卓越。

她毕业于文学院，获文学学士，她是我的嫡表，她父母是虔诚忠实世传教徒。

你和你爸妈一直在我每天祈祷中纪念着。去天乡后会永永纪念着，将来永永共聚天庭，我也请求你为我祈祷，脱免炼火早赐升天！

天堂相会了，暂时的别离，再见，亲爱的斐理，
全能全慈的天主和你和你的亲人们同在！

玛竇 1984. 11. 圣母主保佑礼

预呈此遗书！

以下是一些相片，文革之前的都已被毁，老照片都是香港、美国亲友保存的



不足 1 岁的我(约 1941, 香港)



同表姐超在花园中(1946)



母亲(1952)



父亲在香港家中，背后是他的画作(1982)

I am the most heartbroken person on earth. I always found ^{time} to go everywhere else but to see my old, gray-haired parents. They sat alone, loving me just the same.

It is too late now to give them those few hours of happiness I was too selfish and too busy to give, and now when I go to visit their graves and look at the green grass above them, I wonder if God will ever forgive me for the heartaches I must have caused them.

I pray that you will print

父亲晚年习书法，以上是他去世前一年的手迹

print this to tell those who still have their parents to visit them, and to show their love and respect while there is time, for it is later than you think.



祖母(1951)



祖父(左是摄于1951, 右是在20年代中期)



释放回到家中同父母合照，家已搬到城镇屋 (1979)



同姐姐姐夫一起



表哥照远从美国来访在灶偏间家中，背后是父亲画作
房间已被父亲布置



初到香港在表姐家中同表姐超群



香港家中的父母



香港家中



香港公寓外



在姐姐姐夫家中



父亲老友何世礼将军邀请



左起，我，铁樑表哥、何将军，父亲，陈其照，何鴻毅

何将军夫婦同我父母，左边是譚雅士夫人



阿姨來香港在酒店里，当时她在MIT任教
离沪去香港，张希斌神父及友人在火車站，左邊是難友刘鑫铭和郭恩生



难友潘宗岳教授夫妇



难友岑伟祥及家人



难友，左來郭恩生、钱大伟、我、钱大统、刘鑫铭



攝于难友张弛家门口

左起张康霖、我、张弛、钱大统、江淼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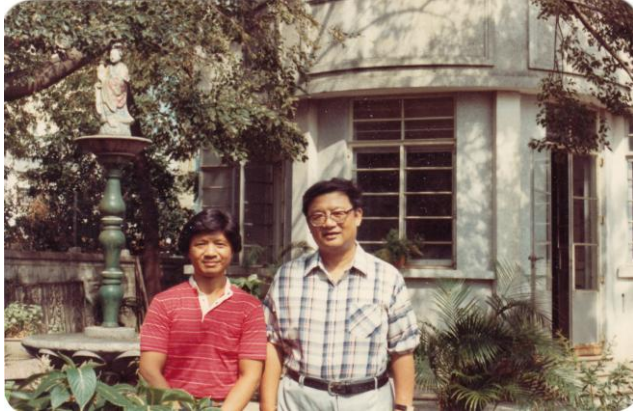
张希斌神父



张神父一家，左起哲宝、雅宝修女、良宝修女



在勞達一神父辦公處同勞神父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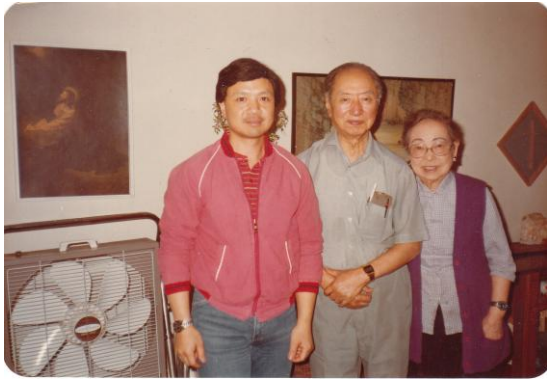
在九龍耶穌會同哀國慰神父合影



全家往康乃狄克州探訪龔品梅樞機主教



教宗親吻顧光中蒙席，顧蒙席在青海堅持信仰勞改 25 年



初到美国在伯父家



同刘永達夫婦合影



结婚照



参加劳改研讨会



往法国露德朝圣



往以色列圣地朝圣

最高指示

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
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中国人民
解放军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徐汇区军管组
刑事判决书

一九六九年度徐军管刑字第4号

现行反革命犯陈文立，男，二十八岁，广东中山县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份学生，无业，住新华路354号

现行反革命犯陈文立，系资产阶级子弟，解放以来思想一贯反动，对社会主义刻骨仇恨，陈犯于一九五六年以来一贯收听敌台广播，到处散布谣言，为帝、修、反摇旗呐喊。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同首犯唐千根相勾结，积极网罗反革命成员，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陈犯猖狂的攻击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污蔑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恶毒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行严重。陈犯在案发后还订立攻守同盟，抗拒交代。

上述罪行，经查证确凿，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特判决如下：

依法判处反革命犯陈文立有期徒刑十五年。

中国人民
解放军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徐汇区军管组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判决书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一九七九年度徐法甲字第401号

陈文立，男，三十八岁，广东省中山县人，无职业，住法华镇路653号。

陈文立因“现行反革命”案于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由原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徐汇区军管组以一九六九年度徐军管刑字第4号判决有期徒刑十五年。陈不服判决，提出申诉。

经本院复查查明：原认定“陈文立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积极参与屠千根为首网罗反革命成员，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下强加在陈文立身上的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原认定攻击、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等罪行，亦依据不足。故原判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据此，根据党的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方针，特作判决如下：

一、撤销徐汇区公检法军管组一九六九年度徐军管刑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

二、宣告陈文立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应自收到判决书四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书及付本，上诉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



平反书

Ego, infra subsigaturus M. Benedictus, Testifior Dominum

Philip S. C. Vanli nobis dilectissimum;

1, esse rite baptisatum, die 1, Maii, 1979.

2, Sacram Confirmationem accepisse die 26, Decembris, 1979.

3, Matrimouium adhuc nundum contrahere.

Reverentiae Vestrae iterum atque iterum, recomendo ut Veleat

eum educare, dirigere, et adjuvare.

Meipsumque Precibus et S. Sacrificiis.

Reverentiae Vestrae commendo.

Salutem in Christo!

Gratias maximas!

in quorum fidem subsignavi

M. Benedictus

die 6, Octobris, 1986

in Sinis

张希斌神父出具的证明信

亲爱的安理：

别了，生前再见！天庭永聚！ Alleluia! Alleluia!

你读到这几行时，我已在称颂主名，怀念亲友中，回归天乡，投入慈母怀抱了。我已从战斗的困苦中解脱，稳稳定居到永世了！而见主名，为你们祈祷，主恩作佑。

李保禄遗留给我们的崇高思想：“生为基督，死不朽”，“苦难，我已经受了；长袍，我已到达终点，我只等待公义的恩赐。”

我虽是卑微罪人，但依恃主的金身金瓶，我终身膜拜学习 李保禄的言教身教，亲爱的安理，用简单直接的方式方法，给我很多实效的教导，报效主恩，以我方面感谢你，一方面我用李保禄的言教身教，抄送给你，作你特别赠礼。

我的胞妹胞妹，献身教育高途后，照顾我精神弱方面的各种需要而作出巨大牺牲，这是你知道的，你对她也有深刻印象。在她们晚年将相依为命，慈主会照顾可爱，但我还是请你，可能条件中，精神上多多对我关切，我拜托你。

我的表亲 黄德助教，我深信她是一位深出的可造之材，我越强烈希望她能给予提拔培养。我曾评论过你，我再大请你付我，在你力所能及同时，鼎力相助，玉成她的存心壮志。如果你有机会往来，你一定得到和我相似的印象：庄重诚朴，资质聪颖，品德不凡，好学上进，学业成绩卓著。她毕业于师范学院，获文学学士。她是我的前妻，她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

你和你爸妈，一直在我每天祈祷中纪念着。去天国后会永远纪念着，将来永聚天庭。我也请你为我祈祷：魔鬼炼火早灼升天！

天堂相见了，暂时的别离，再见，亲爱的安理，
全能全善的主，和你和你的亲人们同在！

张斌 1984.11.25 星期四
于北京西山

张希斌神父手迹

Domino Philippus Long

Benedictio Dei Omnipotentis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
descendat Super te, Et maneat
Semper. Am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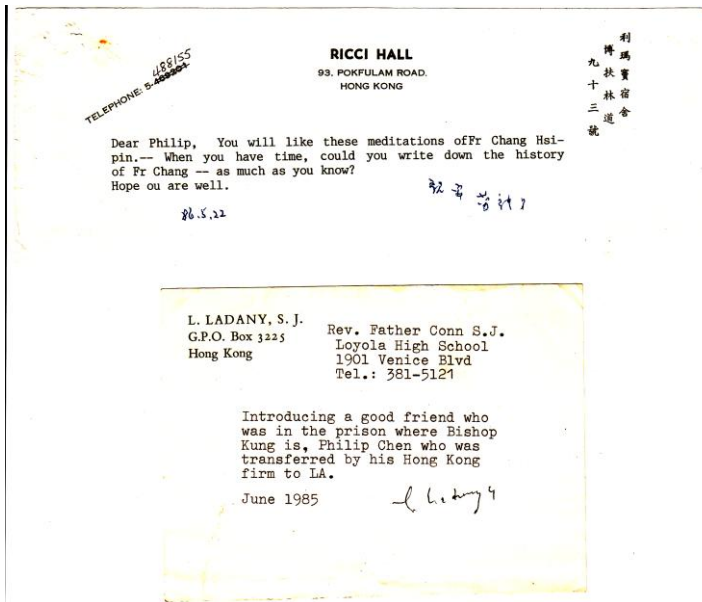
Domino et Dominae Long

Pax Christi!

Via Pacis Et Prospera!
Domino Sit Semper Volens cum

1. 胞妹已二次收到文立平安信，极感。蒙位已增多欣慰。与成弟继续进华自我介绍。
2. 胞妹回国探亲时，分赠幼辈小物品，何生协助送赠。其他物品，则属前议，必买了。
3. 向成立致以最热烈诚挚的感谢。成弟。成弟。曲谅不答。...

张神父书写便条



劳神父的书信

TELEPHONE 5-469201



RICCI HALL
93 POKFULAM ROAD.
HONG KONG

利
瑪
竇
九
十
三
號

Dec. 15, 1987

H. E. Roger M. Mahony
1531 W. 9th St.
Los Angeles, Ca. 90015

Your Excellency,

A Chinese friend of mine, Philip Chun, living in Los Angeles, would like to marry Teresa Wong, also in Los Angeles. Teresa is the niece of an outstanding saintly priest in Shanghai who spent many years in prison for his faith. Philip was converted by him in prison. Now Philip and Teresa wish to be married, and they have certificates of Baptism, Confirmation and free state from that priest in Shanghai, who wrote the certificates in Latin, but, knowing what the situation is in China, did not sign them.

The parish they belong to refused to acknowledge them Catholic because of lack of signature. Obviously the parish does not know the situ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The two were certainly baptised and indeed suffered for the faith.

The address of Philip is: 5832 W. Arbor Witae #7, Los Angeles 90015.
90045

Thanking you in anticipation,

Sincerely,

L. Ladany
L. Ladany, SJ

Robert Ng SJ
Robert Ng, SJ
Provincial



劳神父致洛杉矶教区信件副本

